

俄罗斯现代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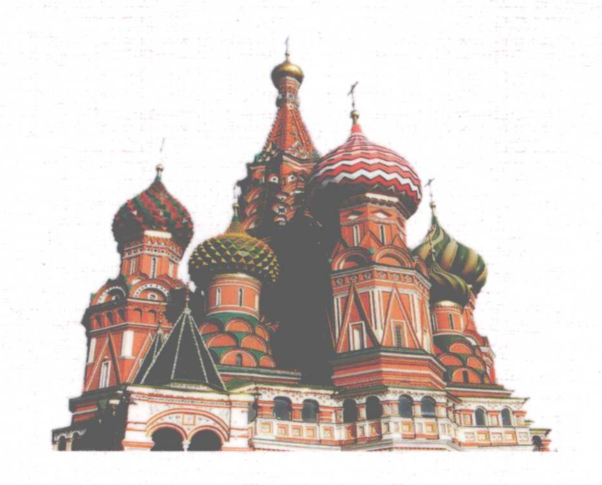


[俄] 亚·维·菲利波夫（А.В.ФИЛИППОВ）/著

吴恩远/等译　张树华 张达楠/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现代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ISBN 978-7-5004-7392-3

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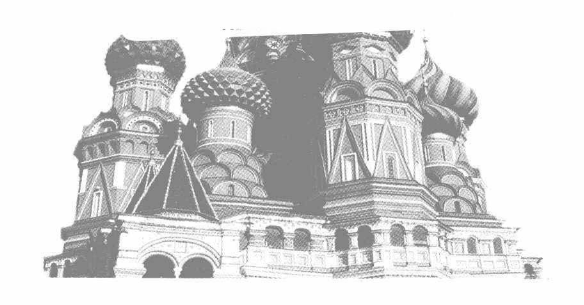
俄罗斯现代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教师参考书

[俄] 亚·维·菲利波夫（А.В.ФИЛИППОВ）/著
吴恩远/等译 张树华 张达楠/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8-46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俄罗斯)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04-7392-3

Ⅰ.俄… Ⅱ.①菲…②吴… Ⅲ.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0100号

本书中文版根据莫斯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译出,经授权在中国出版发行。
原书版权信息如下: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гг.:кн. для учителя/А. В. Филиппов. —М.:Просвещение,2007. —494с. —ISBN 978-5-09-017249-3.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编辑 王 静 陈 林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8.75 插 页 2
字 数 369千字
定 价 45.00元

译者前言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意识形态领域上发生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苏联解体前后那个时期肆意抹黑和否定本国历史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尊重历史。

近几年，在普京等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俄罗斯重编历史教材，重新评价苏联历史，重新评价苏共领袖人物的作用。

2007 年 6 月 18—21 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到会，着重研讨历史及人文社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讨论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6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官邸亲自接见部分与会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

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普京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2007 年 7 月，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了面向教师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 年》。

2007 年 10 月 12 日本书译者拜访该书作者单位莫斯科大学历

史系。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库库什金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列昂诺娃教授及该系教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年）》一书作者亚·维·菲利波夫会见了我们。列昂诺娃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社会思想领域极度混乱，出现各种各样的历史教科书，教学水平下降。社会上充斥着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观点，包括对苏联历史人物斯大林、安德罗波夫等都是持批判态度。目前这股思潮已经遭到俄罗斯史学界的反思和批驳。俄罗斯最近出版的这部历史教师参考书就是其反映。目的是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

新版历史教材的作者亚·维·菲利波夫说道：当初他写这本教学参考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思考，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他强调说，俄罗斯目前还是多元化的思想，自己这本教科书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实际上国家希望通过此书确立对本国历史评价比较一致的标准，以便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教学。你可以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教学必须按照这个大纲进行。

他认为这本书突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历史连续性，不割断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自豪感；二是注重历史资料，一切结论均从史料出发。

这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师教学参考书，是震动俄罗斯思想界、特别是历史领域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然，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其所阐述的观点我们也是不同意的，但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科学部代理副部长伊·

加里宁共同批准的，具有学术权威性。普京多次对历史教材发表谈话，此次又亲自接见与会者，无疑也给此书增添了官方色彩。

其次，俄罗斯修改历史教材及社会对历史的反思已经引起国际范围的关注。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日本颇有影响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两天开辟专栏评述俄罗斯这本历史教师参考书。西方媒体在关注俄罗斯历史观及社会思潮转变的同时，也表示了某种“担心和害怕”：认为普京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是在为苏联历史“平反”，是“从民主体制的倒退”，意味着普京政权开始脱离西方的轨道。当然，判断俄罗斯政府“倒退与否”或者“民主与否”，最有发言权的恐怕还是俄罗斯民众。

再次，更主要的是这本书对苏联历史重大事件和苏联重要历史人物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相比，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如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国内外学界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

苏联体制确实存在一些否定的因素，所以必须改革苏联模式；但绝不存在“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而必然灭亡这个道理，因为其自身也还有肯定的因素。书中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说明这个体制并非到了必然灭亡的地步。书里写道，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是有保障的”；对外则“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无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所以最后做出判断：“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

再如对苏联的评价。这本书认为：“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对苏联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予了肯定，指出这个“由于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能够飞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和许多其他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另一角度对苏联给予了肯定。

书中引用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价苏联解体的话：“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一直存在是现实因素为主（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错误）还是历史因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为主的争论。这本书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执政者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书中写道：在 2006 年戈尔巴乔夫 75 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您上台时不搞后来您所谓的改革，现在会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他仍然会继续“当着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作者的意图不是说不应当对苏联旧体制进行改革，而是证明，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乱“改革”，苏联不会轻易解体。

作者指出：“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书中引用 2001 年俄罗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证明：56% 以上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为国家造成危害，只有 14% 的人认为他的作为对国家是有利的。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也是该书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

这本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功绩，指出“正是在他领导

期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俄罗斯高达47%的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作用给予肯定的评价。所以书中写道：“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但这本书并没有回避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轻工业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农业的落后面貌没有大的改善；该时期一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一方面也极大压制民众，特别是战后确实存在又一次清洗高潮。但不同意把大清洗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不容他人意见等个人品质的原因。该书指出斯大林战后清洗的目标是针对党内统治阶层，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者”的清洗。

这本书是按照战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普京时期几个苏联历史发展阶段，分章节叙述，反映了当今俄罗斯部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近20年来俄罗斯社会思潮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体会到当今俄罗斯社会对谋求“主权民主”等自身发展之路的艰辛探索。

书中除个别地方做技术处理外，全文直译。本书译者分别为：前言、第一章，吴恩远、马晓明；第二章，王晓菊；第三章，陈爱茹；第四章，侯艾君；第五章，康晏如；第六章，尚伟；总译校：张树华、张达楠。责任编辑：王静。吴恩远对全书作文字统稿。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吴恩远　张树华

2008年10月

序　　言

尊敬的同事们！

很久以来，我们的中学生在回答以下问题时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千差万别的答案：什么是世界，人类，宇宙？它们根据什么样的规律发展？人在这个世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人对世界及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的特点是什么？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我们祖国将面临怎样的发展前景？

你们手中的这本书，是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到今天，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悲剧性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周年。我们尝试与你们共同厘清随着五月胜利的礼花绽放以来这段时期历史事件发展的脉络。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呢？

在最近15—20年，俄罗斯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由国家社会体制本身的变化和消除了对世界观的垄断而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后果使其他社会理论和历史观点更为活跃。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社会领域，至今仍对其中许多问题进行争议。

随着社会科学的革新进程，普通教育学校课程中历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也随之出现。现代教育需要对课程设置的教学法进行

本质上的更新（使其更符合时代需求），需要对教学内容的哲学基础和选择原则给予另一种概念化说明。多样化原则，以及对理论和内容可选性的讨论、思考应当成为这项革新的基础。今天在这方面实际上做得还不够。

对那些刚刚开始独立观察周围世界的年轻人来说，能对这些关键问题提供不同答案无疑是今天俄罗斯教学的成就。观点的多样化、对那些似乎早已众所周知的真理进行重新解读的开放性以及把讨论作为普通教学法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成为人文课程教学法的基础。这样的方法才能培养出善于独立思考、发现现实问题并证明自己观点的人。

本书是在国家教育第二套标准方案的框架下写作出版的。这套标准的重点在于确定新的教育目标——就是让普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自身应该拥有的、能为国家所用的和职业的专长。例如，学生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是知道历史事实，而且要能够有效地利用所获得的本领去解决职业问题和社会问题。

目前，在新的教育标准的原则基础上正在编辑一系列的新教科书，其中包括俄罗斯历史的教材。这套新教科书的目的是创造条件使学生获得高质量的现代社会人文教育，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实现接受继续教育和个人求职活动的目标。

这本为中学教师编撰和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只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阶段。出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叙述历史事实，还要揭示其中的逻辑、内在联系和整体的后果。要培养每一个毕业生具有明确的公民立场。作为自己国家的公民，毕业生应当体现本国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作为开放的世界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他应当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和一套足够的知识，以适应正积极展开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书主要的任务在于分析和解释以下问题：

1. 我们 1945 年的胜利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怎样的影响？

2. 我们这个因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如何能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3. 为什么历经几十年迅猛发展的国家会陷入停滞、拒绝创新、否定改革，使胜利者的人民丧失了创造力？

4. 苏联生活发生剧变从而推动国家走向新道路的前提是什么？

5. 苏联为什么以及怎样从世界领先地位走向解体？国家的弱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民族问题没有引起领导人应有的重视？

6. 在苏联遗址上出现的新俄罗斯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它的发展如此艰难，充满了大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鲍·尼·叶利钦总统将治国的重担转交给弗·弗·普京？

7. 俄罗斯在新的21世纪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确定的，是如何确定的，确定的原因是什么，最为重要的是，它前景怎么样？

苏联战后的历史具有一个重要特征——莫斯科在1945—1991年期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是将数十个利益相关的国家包括在内的完整的国际体系的首都。因此我们将特别关注它的对外政策。在这本讲述我国历史的书中，我们也将分析许多发生在国外——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朝鲜和越南，实际上在所有大陆上发生的事件。

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早在1918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证明英国必须立即实行普遍选举权时援引了俄国的例子。按他的说法，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不能立即看到国家社会体制发生好转的情况，他们会效仿俄国的榜样。众多西方国家70多年来对内政做出的有利于人权的调整，就是受到实现了社会革命和打赢了最残酷战争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诸多影响。

现在还健在的人们，其中包括我们和我尊敬的同事们，很多都

是本书所叙述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当代历史的必然特征在于：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触及当今活着的人们的利益和感情。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那些还记忆犹新并激烈争论的事件都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围绕 1945—2006 年的大事件而迸发的激情和争论，很多也是现实政治辩论的一部分。本书涉及的许多话题在社会上和专家中的讨论仍未结束。考虑到本书立场不可避免会引起的争议，我们尽量把自己的评价与事实的陈述分开，并将这些评价放在“观点”专栏中。同时我们在书中尽量多列入一些事件参与者提供的证据，放在文中“实际情况”专栏下。我们从文献资料中选出一些片段放在相关篇章后面的单独栏目“同时代文献资料”里。这些片段资料可用作事实的例证，但如放在正文里就显得太长。

考虑到许多问题的争议性，我们决定在正文中引进一些社会舆论调查的资料。当然，社会舆论是多变的，但是这些社会学家们的资料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活动家、某些事件在人民心中留下的记忆是什么。

新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公民的立场，在此基础上他们自然会渴望发展自己所有的才能和力量，并以此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和我们祖国在当代世界的竞争力。

我们希望本书对历史教师会有所裨益。为了汲取你们的教学经验，我们请求你们将自己的意见、修改、建议和愿望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寄到出版社。

目　录

第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

1. 方针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最富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被击溃，它依靠野蛮力量、搞种族仇恨、蔑视民主的妄想彻底破灭。世界人民充满希望，祈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战争。

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没有影响战争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全部经济和政治实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领导人能够不顾意识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差别达成一致，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有 30 多个国家加入到反法西斯同盟中来。战前同苏联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有 26 个，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国家已达到了 52 个。

战争年代在所有同盟国中美利坚合众国受到的损害最小，它几乎只在其境外作战。美国本土除了太平洋殖民地，既没有经历战斗，也没有受到敌人的侵占。美国也没有遭受过类似给英国带来重大损失的轰炸。在人员伤亡方面美国无法与苏联相比，物质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三大国领导人在德黑兰（1943 年）和雅尔塔（1945 年）会晤期间，苏联与美国显示出互利的盟友关系。但是战争年代的合作实际并不长久。

苏联和美国在对世界格局、传统、习俗和交往上的认识差别相当大。盟国在战争年代对苏联经济援助的作用是公认的。按照租借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达到了 110 亿美元。还在战争进行期间，苏联领导人曾就战后援助问题试探过美国人的立场。1944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政府提出，愿意向苏联提供 60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恢复国民经济。随后美国政府承诺从德国西部占领区拿出价值 100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给苏联。

我们不必高估罗斯福对苏联和他个人对约·维·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的友好情意。作为声望不亚于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家，罗斯福总统关心的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中的削弱让美国人感到称心，因为这使美国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在着手建立联合国的时候，美国担当起非正式领导人的角色并保障了自己对整个西欧的霸权。但是美国削弱苏联的打算当时没有得逞：苏联作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保存下来并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世界已经不能不重视苏联了。

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成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拥有强大的陆军 1140 万人，数量仅次于美国陆军力量 1210 万人。战争结束后，部分军人复员，1948 年底的苏军已经是 300 万人左右。但就作战技能和兵器技术威力而言，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之相比。苏联武装力量拥有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超过 1.2 万辆，大炮和迫击炮超过 10.7 万辆。红军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超过美国 1 倍，几乎超过英国 3 倍。苏军坦克及航空兵的作战能力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军队的一个主要优势是拥有可装多发炮弹的火箭炮（著名的喀秋莎火

箭炮）。

战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在 1945 年 4—6 月的旧金山会议上，以及 1945 年 7—8 月的波茨坦会晤上，几个胜利的大国商讨了战后世界格局。苏联成为在反法西斯同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确定战后苏联边界过程中，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西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卡累利阿等许多欧洲领土转归苏联。在亚洲，图瓦、南萨哈林、千岛群岛并入苏联。根据三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决定，作为军国主义的老巢东普鲁士被波兰和苏联分割。

苏联的实力和它的潜力成为由于战争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首要因素。红军在战斗进程中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收回了满洲的中东铁路和在旅顺口、大连的海军基地，并与苏联共管。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德国和奥地利东部的土地暂归苏联军队占领。

美国的统治集团力图取得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实力增长的苏联成为美国的障碍。严重的对抗开始了。美国政府中也有拥护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人，如副总统亨・华莱士。但 1944 年华莱士的职位由哈里・杜鲁门取而代之，这已经显示出美国方针的改变。1945 年 4 月 12 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更加速了两国关系的转变。在杜鲁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首次会见的前一天，新总统班子举行了会议。会议做出正式决定：转变对苏方针，改走“强硬”路线。

1945 年 4 月 26 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与维・米・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杜鲁门对苏联部长表现得极端无礼。他的要求与在雅尔塔已经达成的协议相矛盾。根据杜鲁门回忆录的记载，莫洛托夫当时就说，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人这样不客气地与他讲话，美国总统对此回答道：“在波兰问题上实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用不那

么粗鲁的方式讲话了。”莫洛托夫听完这话气得脸色苍白（据当时在场的译员博伦回忆，他“面如灰土”）。

实际情况

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哈里曼回忆道：“我为总统这样恶狠狠地攻击莫洛托夫而感到难堪。我相信真的没有一个外国人用过这种方式同莫洛托夫讲话……我对杜鲁门的这种表现感到遗憾：他的行为让莫洛托夫告诉斯大林，罗斯福的政策被废弃了。”



在与莫洛托夫会谈的前一天（1945 年 4 月 24 日），哈里·杜鲁门接见了美国陆军部长亨·史汀生。史汀生报告：“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它的一个炸弹就能摧毁整个城市。目前只有美国有能力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在几年之内唯一能够造出类似武器的大国是俄国。”

实际情况

1945 年 7 月 16 日，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带的阿拉莫戈多，美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原子武器试验。当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听到“超级炸弹”试验成功的报告后大为震撼，因为骤然觉得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他还是副总统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为秘密制造这种强大的毁灭性武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这件事的保密程度特别高。美国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是在荒漠地带实施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人员与亲人通信时要把信件寄到美国军队 1663 号信箱。

从 1939 年开始，德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就开始专心致力于分解原子核以及获取新的原子能源问题的研究。苏联的核物理科学家们，如雅·泽利多维奇（Я. Зельдович）、

尤·哈里顿[①]（Ю. Харитон）和其他人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但是战争爆发，这些科学研究所撤到喀山，就中断了我国制造原子武器的工作。德国拥有强大的物理学派，证明它有搞出原子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必须明确注意到不仅德国，其他国家也在制造同样的武器这个现实。

在美国工作过的德国核物理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由于想制止纳粹德国建造核武器转而与苏联合作。他向苏联方面转交了一系列关于分解原子核和制造原子弹的计算数据。苏联在 1941—1943 年间从富克斯那里总共得到了 7 份相当有价值的资料。

伊·瓦·库尔恰托夫（И. В. Курчатов）是苏联杰出的原子弹科学家，也是设计方案的第一位学术领导人，他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境外情报机关获取的资料。1944 年 12 月 25 日，他在对 1/3/22500 号送件函资料的鉴定中写道："这是一份内容非常丰富、在各个方面都可供借鉴的资料。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945 年 3 月，库尔恰托夫在评价另一份从情报机关获得的关于原子弹的资料时写道："资料具有很重要意义。从中不仅可以鉴定我们正在研究的方法和方案，同时指明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研究的方向。"1946 年 12 月 31 日库尔恰托夫在写给国家安全部长维·阿巴库莫夫（В. Абакумов）的便条手稿中指出："华西列夫斯基（Василевский）同志今天给我看的资料，是关于（1）美国人制造超级炸弹的工作情况，（2）在亨福尔德地区的原子反应堆运转中的一些特点，我认为是合理的，这对我们祖国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是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安全的。在 1945 年任何一个俄罗斯

① 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1904—1996 年），苏联物理学家，最早完成铀裂变链式反应的计算，苏联原子弹工程的第一个总设计师。——译者注

政府（哪怕是君主制政府）都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美英关于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战前政府回国的要求。它们回来就意味着恢复战前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反苏“防疫线”。斯大林力图建立一条伸展在苏联和西欧之间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宽阔地带。

苏联为设置“波兰大门”付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政府实在不能把大门钥匙交给华盛顿。在雅尔塔，当斯大林说出有多少苏联士兵在波兰牺牲之后，关于波兰问题的争论就停止了。

1945年5月22日，丘吉尔的桌子上摆着一份名为《不可预料》的计划。这是第一份仔细研究反对苏联的战争计划。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组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昔日的盟友准备使用原子武器反对那些曾经保护了他们千百万同胞生命的人们。

“强硬方针”获得了新的名称——“遏制共产主义”。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丘吉尔在哈里·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城市富尔顿发表了被视为宣布“冷战”开始的演说。

实际情况

温·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说：“不久前还刚刚闪耀着同盟国胜利的明亮光环的战后的生活舞台，今天已投上了漆黑的阴影。谁也不能预料在最近的将来苏维埃俄国和它所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发生什么，并且它们扩张的意图和将整个世界纳入自己信仰之内的顽固努力的极限是什么，如果确有极限的话……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纵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有千百年历史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都城。华沙和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光荣的都城及其居民，它们周围的城区以及居民，正如我指出的那样，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

围之内……”



丘吉尔批判了战后形成的欧洲格局。他号召在“讲英语民族联合体”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国际反共产主义力量。丘吉尔违背德黑兰会议决议，要求夺回战后转给波兰的德国土地。富尔顿演说表达了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的共同观点。

苏联领导人将这些公开提出的计划视为准备反苏战争的声明。苏联在丘吉尔演说后 11 天就宣布了自己的立场。

实际情况

摘自《真理报》就丘吉尔富尔顿演说对约·维·斯大林的采访（1946 年 3 月 14 日）：

问：“您如何评价丘吉尔先生最近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说？”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其目的是在盟国之间播下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

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给和平与安全事业造成损害？”

答：“毫无疑问，是的。丘吉尔先生现在实际是站在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上。而且这里丘吉尔先生并不孤立，——不仅英国有他的拥护者，而且美国也有。必须指出，丘吉尔先生及其拥护者在这方面的行为令人吃惊地想起了希特勒及其拥护者……事情的实质在于，丘吉尔先生及其在英国的和美国的拥护者正在向不讲英语的民族发出某种最后通牒：自愿地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无可怀疑，丘吉尔先生的方针就是进行战争的方针，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同样清楚的是，丘吉尔先生这样的方针与英苏之间现有的联盟条约是互不相容的。”



昨天还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友之间开始了不流血的“冷战”。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为“冷战”的发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美国毕竟是“冷战”的策动者。杜鲁门政府采取进攻性的“遏制”军事理论，同时把对原子武器的垄断作为政策的基础。美国在对苏联作战计划中把主要赌注放在海军舰队和战略航空兵上。如果说苏联陆军超过美国，那么在上述那些兵种上美国无可争辩地占据优势。华盛顿不无根据地认为，苏联领土对于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打击是不设防的。军事计划就是据此详细拟订的。当时白宫认为，发生战争的时候只有欧洲盟国会冒风险，而不是美国自己。

哈里·杜鲁门政府认为主要的危险是西方左翼潮流的发展。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美国人实际上担心的不是已遭战争削弱的苏联对西欧的进攻，而是西欧经历了苦难的人民自己做出有利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同纳粹德国战争的胜利激起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其中也包括西欧。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进入了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世界各地的左翼政党和运动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甚至在美国，被解职的副总统亨·华莱士创立的进步党在共产党人支持下成功地赢得了选举。西方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加深了。

实际情况

摘自《真理报》就丘吉尔富尔顿演说对约·维·斯大林的采访（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说：“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而且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增长了，无论是法西斯曾统治过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还是曾遭到德国、意大利或匈牙利占领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等）。共产党影响的增长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它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影响

的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统治欧洲的艰难岁月里，共产党人在反对法西斯制度和为民族自由而战中表现出值得信赖、勇敢和奋不顾身的战士本色。丘吉尔先生有时在自己的讲话中也会回忆起那些‘住小屋子的普通人’，老爷式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并装作是他们的朋友。但是这些人可不像第一眼看上去感觉的那样普通。他们这些‘普通人’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且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们，这些千百万‘普通人’，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工党，把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政党选下台来。就是他们，这些千百万‘普通人’，在欧洲孤立了反动派以及与法西斯合作的拥护者，并选定了左翼民主党。就是他们，这些千百万‘普通人’，在抵抗法西斯斗争的战火中考验了共产党人并做出决断：共产党人完全值得人民信任。共产党人在欧洲的影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



千百万人出于对法西斯战胜者——苏联的同情站到了他们方面。当时左翼的观点是思想领域时尚的主流。民族独立和社会公平的思想风靡全球。如我们已经谈到克劳斯·富克斯出于对苏联的好感而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并转交原子计划的情报就是这方面例证。还不只是他一人——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科学家、政治家、艺术活动家出于政治思想目的都帮助了苏联。

实际情况

温·丘吉尔在评论这种情况时说：“在把整个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的我们这边，也有不少令人担忧的情况。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虽然离俄国很远，但是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并完全按照共产主义中心发出的指示工作。这些‘第五纵队’采取的行动惊人地协调一致。唉，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它们的‘第五纵队’乃是对基督教文明日益增长的巨大威胁。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英联

邦国家例外，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暂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任何对东西方现有制度基础的批评都视为是有利于苏联的“破坏活动”。共产党到处被禁止，工会和左翼知识分子遭到强烈迫害。40年代末美国和西欧反“破坏活动”的斗争转变为反对一切异己思想的斗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指示中用令人惊讶的、厚颜无耻的口吻谈到如何在被苏联战胜的地区进行占领控制：“在苏联军队有秩序地撤退后……共产党地方机关将转入地下，就像过去战争时期在德国占领区所做的那样。它大概会部分地以游击和暴动匪帮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下问题解决起来就相对简单；我们只需向任何将要控制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的俄国政权提供必要的武装和军事支持，并让它按照俄国内战时的传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匪帮。”

“冷战”就这样影响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国内形势，也形成了苏联开始遵循的方针。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真理报》1946年3月14日对斯大林的采访

丘吉尔先生现在实际上是站在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先生这里并不孤立，——不仅英国有他的拥护者，而且美国也有。必须指出，丘吉尔先生及其拥护者在这方面的行为令人吃惊地想起了希特勒及其拥护者……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从宣布种族理论开始的，说什么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发动战争也是从宣布种族理论开始的，坚称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负有决定全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理论使希特勒及其拥护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作为唯一当之无愧的民族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理论使丘吉尔先生及其拥护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作为仅有的几个当之无愧的民族，应当统

治世界上其余的民族。

事情的实质在于，丘吉尔先生及其在英国的和美国的拥护者正在向不讲英语的民族发出某种最后通牒：自愿地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但是各民族在五年残酷的战争中抛洒热血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为了以丘吉尔的统治代替希特勒的统治。不讲英语的、同时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不同意遭受新的奴役。这是毫无疑义的。

丘吉尔先生的悲剧在于，他作为一位托利党①老党员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

2. 苏联战后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确定了新时期国家关系的开始，这首先是指前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1945 年 5 月 11 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签署命令，终止向苏联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甚至已经出海的货轮都被召了回去。斯大林称美国政府的决定是“野蛮”的。苏联政府明确指出，它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是美国施压的形式。到 1945 年胜利后的 7 月底，苏联方面明白了，它所期待的战争赔偿是拿不到了。苏联同样明白经济赔偿也只能从东部德国取得。苏联向美国借款或贷款也毫无指望。苏联只有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经济。

战争夺走了 2700 万人的生命。许多工业部门实际上被摧毁。农业劳动力、机械和播种原料严重匮乏。

---

① 托利党——17—19 世纪的英国政党，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译者注

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2.5万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790亿卢布。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30%。占苏联战前45%的国民生产总值和47%的农业可耕土地的苏联人口最稠密、工业最发达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

1700个城镇，7万个大小村庄从地面上消失了。500多万间房屋被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播种面积减少1/4，收成下降1/3。在占领区，被炸毁的工业企业达31850个，其中包括1135个矿井，749个重型和中等机器制造企业。6.5万公里铁路，1.6万个火车头和42.8万节火车车厢被毁。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10—15年。战争年代在国家东部疏散区匆忙发展起来的企业建设是生产军工产品的，不能很快弥补民用产品产量的损失。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的选前会议上发表讲话。斯大林利用对选民的讲话总结了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并确定了未来的政治路线。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看做苏联最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胜利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保障国家的独立，消除新的战争危险，必须不仅要恢复经济，而且要发展经济。斯大林认为即将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要恢复而且要超过战前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水平。为此正式提出的任务是“在工业和国民经济所有领域达到世界现代工艺水平，为推动苏联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我们将会有原子能和许多别的东西”。

国家领导人有意依靠最新科学成就来实现这个任务。斯大林认为，这将牢固地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文化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增长。从1943年起，苏联战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就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Н.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的领导下进行了。1945年8月18日，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

计划的各项指令被提交给新选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审核并于

1946 年 3 月得到批准。

国家 1946—1950 年发展计划规定工业和农业要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预计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超过战前水平。工业生产的产值应当超过战前 48%，农业生产超过 27%。预计要新建 2700 个、恢复 3200 个中型和大型的工业企业。五年计划的支柱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和铁路运输。最后，计划年平均工资要比战前增长 48%，并取消凭证制度。

复杂的国际形势加剧了国内的困难。外部的局势迫使国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发展经济。为了加强国防力量，缩小技术落后的差距，要求从零开始建立一系列工业部门。

1946 年在科学上的支出比 1945 年增加了 2 倍。提出的任务是：工业部门要达到年产 5000 万吨生铁，6000 万吨钢，5 亿吨煤，6000 万吨石油。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

为达到上述目标，预计少说也要花去三个新的五年计划时间。但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样做是应该的。1946 年被称作“水泥年”。

实际情况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弗里尔·哈里曼回忆道：“俄罗斯人疲乏了。他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现在要求他们满腔热情接受当前的五年计划，而这是非常沉重的工作。它意味着在只够维持最低消费品的国家里制造机床和设备。它要求人们以热忱的态度为自己国家付出巨大牺牲。”



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实力并且保证了经济

的进一步增长。

工业生产的恢复

1950 年主要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以 1964 年的 10 亿美元计算）

美　国	381
苏　联	126
英　国	71
法　国	5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49
日　本	32
意大利	29

1946 年基本上完成了从战时工业向民用方向的转轨。所有民用产品的生产部门都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弹药、迫击炮、坦克工业和中型机械制造业等人民委员部的基础上新建立了汽车工业部、仪表制造部、道路建设部、交通部和农业机械制造部。1948 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厂、机械制造厂和采掘厂。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提高工业生产的总体计划。根据正式资料，1950 年工业生产的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 73%。的确，这个成果主要是依靠重工业取得的。轻工业发展则要慢得多。国家领导人没有把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看成如同发展国防实力和资源那样紧迫的任务。在一系列轻工业部门中（例如纺织业）不仅没有完成计划，甚至没有完成战后重建任务。现在对国防已不那么重要的采煤业在恢复时期也落在后面了。

管道运输成为运输发展的一种形式：建设了萨拉托夫—莫斯科、达沙瓦—基辅、科赫特拉亚尔韦—列宁格勒天然气管道干线。恢复和重建了白海—波罗的海和第聂伯河—布格河水运系统。在战

后还建起了现代化的公路干线——辛菲罗波尔公路。从德国东部运来作为战争赔偿的设备增加了国内机床的总数。特别是，在从莫斯科搬走的“奥培尔”工厂的基础上开始制造小排量的汽车“莫斯科人”，在莫斯科郊外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卡尔·蔡司”工厂的基础上开始生产照相机和其他光学仪器。

2.1　创建原子工业

1945 年 7 月，富克斯向苏联情报机关转交了美国人构造钚弹的完整记述，提供了钚弹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草图，并且推算了最重要的比例数据。1945 年 7 月 16 日，在新墨西哥州靠近阿拉莫戈多的沙漠试验场，美国人爆炸了一颗当量为 1.9 万吨的原子弹。人类进入了核武器时代。

原子弹爆炸 8 天之后，1945 年 7 月 24 日，在为确定当时战后欧洲布局而召开的波茨坦（柏林）会议上，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决定将此事通报给斯大林，自然是指望据此在谈判中得到让步。但斯大林对此的反应很平静。

> 英国首相温·丘吉尔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在离开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杜鲁门走到斯大林跟前，他们俩通过翻译进行交谈。“我大概距离他们 5 码远，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这次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想要说什么。特别重要的是想知道这会使斯大林产生什么反响。我看到这个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本来觉得，他会欣喜若狂。新型的炸弹！异乎寻常的威力！这可能是在对日本整个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这是多么走运啊！”过了一会儿，等车的时候，我走近杜鲁门：“谈得怎么样？”我问道。“他一个问题都没有问。”——总统回答。据此我认为，斯大林还不知道这个规模庞大的研制过程。

但是斯大林显然知道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当天伊·瓦·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就接到加速进行核反应研究工作的命令。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核弹爆炸造成 30 多万人死亡，大约 25 万和平居民受伤并受到核辐射伤害。美国获得了彻底破坏均势的武器。

观　点

俄罗斯的核物理学在革命前就有了。1910 年弗·伊·韦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院士向俄罗斯科学院报告说发现放射性现象，可以期望发现"只要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超出所有能量千百万倍的新的原子能量"。俄罗斯科学院的地质学家们在费尔干纳谷地（骆驼脖子）找到了铀矿产地。

苏联情报机关通报了西方正在紧张进行秘密工作的情况。1941 年 4 月，常驻纽约的情报机构头目奥瓦基米扬报告了西方世界最知名物理学家会晤的消息，他们在会晤期间讨论了铀问题潜在的巨大军事意义。1941 年 9 月 20 日，英国政府决定建设"研制铀弹的工厂"。1942 年 3 月，斯大林得到了关于西方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德国移民克劳斯·富克斯（英国核物理学家曾吸收他参加了对德国人在原子领域工作状况的评价）向莫斯科通报说，美国和英国正在制造原子弹。

1942 年 9 月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被认命为苏联发展核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库尔恰托夫走遍全国，挑选了他知道的著名专家。当他回到给他指定的研究地点喀山时，刚好是 1942 年 12 月 2 日。那天，恩里科·费米①在芝加哥最先实现了可控的链式核反

---

① 恩里科·费米（1901—1954 年），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和中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38 年迁居美国，他建成第一个核反应堆并最先实现链式核反应。——译者注

应。国家国防委员会于1943年4月12日着手制订苏联核计划，当时在科学院的范围内建立了所谓的“2号实验室”。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在“莫斯科”宾馆首次会面。有色金属人民委员部接到了采掘100吨纯铀的任务。苏联政府向华盛顿租借法案管理局提出需要10公斤金属铀时并没抱特别的希望。最妙的是，格罗夫斯将军满足了苏方的要求。他害怕拒绝会引起苏联对原子弹研究的注意。

1943年12月，克·富克斯来到美国，参加同位素气体扩散分裂过程的研究，同时与苏联情报人员保持联系。库尔恰托夫召集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直接研制炸弹的构造。尤·哈里顿领导了这个团体，他接到的命令是：“不许失掉时间，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也应该关心国家未来的安全。国外围绕这个问题集中了世界科学史上规模空前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力量。”1945年3月15日，美国人炸毁了柏林（苏联占领区）以北奥拉宁堡的“阿乌艾尔”公司的工厂，这家工厂曾为德国的核计划生产过钍和铀。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首领，格罗夫斯将军回忆道：“我们炸毁奥拉宁堡的目的被俄国人和德国人同时对德军司令部所在地措森的轰炸进攻而掩盖了。”“阿乌艾尔”公司的研究负责人恩·里利向苏联当局透露了美国袭击这个德国小城的原因。在轰炸行动后，格罗夫斯将军从靠近苏联占领区的施塔斯富特的盐矿中找出了1200吨铀矿石。



为了尽快消除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垄断，1945年8月2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第9887号决议确立了苏联核武器计划。当时斯大林对库尔恰托夫说：“请说出您需要的一切帮助，您都不会遭到拒绝。”1945年夏天，爱·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署了苏联政府使用雅希莫夫矿井铀矿的秘密协议。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拉·巴·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领导了苏联核武器计划。同时还平行设立了领导核计划的行政部门——

由鲍·利·万尼科夫（Б. Л. Ванников）[1] 领导的部长会议管理总局。

1946 年 1 月，斯大林会见库尔恰托夫时说："不必注意琐碎的工作，必须拓宽工作领域，要有俄罗斯的气魄，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将竭尽一切力量给予最慷慨的帮助，不需要寻找更廉价的途径……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利用德国的资源。"库尔恰托夫接到制造原子弹的命令，而且要尽量快地造出来。

核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由 25.5 万人发展到 36.1 万人。德国人恩·里利在莫斯科郊外的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市领导铀的提纯任务。第一座工业原子反应堆建在乌拉尔的克什特姆市以东 15 公里的地方，离车里雅宾斯克 80 公里。建在这里的联合企业叫做车里雅宾斯克-40。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德·霍洛韦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在制造原子弹上既没有指望美国的帮助，也没有指望美国会放弃自己的垄断。相反，他们预料到，美国会尽量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垄断，并借此对苏联施压。"

从 1946 年 4 月开始，高尔基州边界上的小镇萨罗夫成为苏联的原子研究中心，并改名为阿尔扎马斯-16。1947 年成立了国家新技术委员会。



观　点

1948 年 6 月初，车里雅宾斯克-40 的铀棒下水了。工作彻夜进行着。6 月 22 日，反应堆达到了希望的 10 万千瓦的水平。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德·霍洛韦所写的那样，"那些参加了这项工作的人们

---

① 鲍·利·万尼科夫（1897—1962），苏联国务活动家，曾先后担任过国防工业副人民委员、武器装备人民委员、弹药人民委员和重型机器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职。——译者注

相信，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只有造出苏联的炸弹才能回应向苏联科学提出的挑战，并且要尽量快。”

一位苏联核计划的参与者写道，“我们能够团结一致，首先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科学工作条件。其次，是内心的感觉，就是法西斯德国被击溃后我们同最强大敌人的对抗仍没有结束。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之后没有得到保护的感觉尤其强烈。对于那些意识到新的原子时代现实的人来说，建造自己的原子武器，恢复均势成为绝对的命令。”

来到阿尔扎马斯-16的安德烈·萨哈罗夫（Адрей Сахаров）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我在这里不仅代表自己的意思，因为这种情况下道德准则似乎是在集体主义心理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的工作作为达到世界均势的手段是绝对必要的。”

那些参与了1949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进行第一次核弹试验的人也证实了这种态度。“产品”被放在高30米的塔台上。所有的设备都是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制造的。夜里2点炸弹被推上升降机。人们从两个地方进行观测：北方15公里处和南方15公里处。在指挥塔上库尔恰托夫、哈里顿、贝利亚、晓尔金（Щелкин）、别尔乌辛（Первухин）、弗廖罗夫（Флеров）、扎韦尼亚金（Завенягин）已经各就各位。库尔恰托夫下达了引爆的命令。哈里顿关上门。随后大家都走出来观察升腾的蘑菇云。突然亮起难以忍受的强光。

哈里顿回忆道：“我们感到了轻松，甚至是幸福——要知道，我们掌握了这样的武器，就使得他人不可能用它反对苏联而不受惩罚”。库尔恰托夫亲手写了报告。

1949年10月29日，斯大林签署了部长会议关于奖励该计划参与者的秘密决议。约·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创造者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么，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试’一下它了。”

又过了不到三年，苏联物理学家成功进行了热核炸弹的试验。为试验建起了30米高的塔台，在塔底下建起一公里长的地铁线。观察站向后推移了20公里。广大地区的居民都被疏散了。库尔恰托夫还是试

验负责人。1953年6月，马雷舍夫接替贝利亚成为该计划的领导。

据一位事件的目击者回忆，1953年8月12日，“光强烈得需要戴眼镜。大地在我们脚下震动起来，隆隆的爆炸声有如紧绷的皮鞭一样猛烈地打到脸上。人们由于冲击波的震荡很难站稳脚跟。尘埃云团升上了8公里的高空。原子蘑菇云达到12公里的高度……白天变成了黑夜。空气中升起了成千上万吨灰尘。庞然大物慢慢地落到地平线后面去了。”

爆炸的威力大约比苏联第一个原子弹高出20倍。



1949年夏天，苏联原子弹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在额尔齐斯河边建起了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21，现在叫库尔恰托夫，试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试验成功，而1948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计划于1950年春季开始实施，当时由科学院院士塔姆（Тамм）领导的物理学家们从莫斯科搬到阿尔扎马斯-16。苏联第一颗氢弹是完全独创的研究成果。1953年夏天，氢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爆炸成功。1954年，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电站在奥布宁斯克启动。苏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功率为1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和步行式挖掘机，在开采石油时开始使用涡轮钻机。

在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结果时，应该考虑到国家现有资源的局限性。同前盟国关系的断绝使苏联几乎只能利用国内资源。唯一的外部资金来源是德国战争赔偿。但是为了支持德国共产党，苏联政府从1947年开始缩减了东德政府的赔偿额度，也停止了拆卸德国企业设备抵作战争赔偿的做法。

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群众热情也有助于弥补战争损失，但从另一方面，战时的劳动纪律实际上还保持着。

利用犯人和战俘劳动同样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不应该夸大他们的作用——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即“古拉格”）里关押人数最多的时候是260万人（1950年），然而同一年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人和职员的总数是4040万人。

如同在工业化时代一样，农村又成为全部工业重建所需工人和资源的主要来源。在农村不断进行“有组织的招工”，然后集中分配到各工业企业。政府1947年7月1日颁布的专门决议授权苏联劳动资源部进行招工。只是到了五年计划结束时，“有组织的招工”才更大限度地依靠对城市居民再分配来进行。这种招工制度为工业生产总共集中输送了至少4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国家允许企业自己雇用的人。此外，有300多万青年人是因为响应号召补充了产业工人队伍。这些技术不熟练的新工人的出现要求对工厂教育系统进行大量投资。

2.2　农业

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预定农业生产增长27%，但是1946年那场席卷东欧许多国家的旱灾扰乱了该计划。苏联西南地区和中央部分均遭受到旱灾的影响。就其破坏力而言，这场旱灾超过了1921年那场当时导致了可怕饥荒的旱灾。而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村庄也遭受了饥荒。受饥荒打击最重的是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州和摩尔达维亚，整个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成。饥荒饿死了许多人，饿死了许多没有饲料的牲畜，使农业遭受更进一步打击。

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支援遭受灾害的贫困地区。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免除了一些法定执行的义务。政府拨给库尔斯克州6.55万吨粮食，摩尔达维亚24.57万吨粮食和饲料，以及上千万元的货币补贴。饥荒到1947年底被克服了，但是其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

东欧国家特别是多瑙河流域也遭受了干旱的影响。这里也闹起了饥荒。考虑到这个时候美国正在制订“马歇尔计划”，苏联的政治形势变得尖锐起来。为了保持防御潜力，苏联需要扩大对新盟友的援助规模。从 1948 年起这种援助真正开始形成巨大规模并越来越带有无偿性质。1949 年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成立后，苏联同新盟友之间新型的相互关系最终确立下来。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后，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当然，中国为这个援助提供的粮食补偿对远东居民也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上看，苏联对新产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在经济上是亏损的，是迫于政治需要做出的投入。

根据官方（数字有所提高）的材料，农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仅达到战前生产规模的 99%。换句话说，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是失败的。战后农庄经济恢复得比莫斯科预计的要慢得多。农村劳动力不足。似乎宣称是最重要任务的农业机械化，经常按剩余原则进行，即最后才轮到它的执行。但最主要的是，为国家工作的集体农庄庄员并没有在物质上得到自己劳动成果带来的利益。

斯大林不打算取消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成果——集体农庄制度。因为集体农庄制度是保障工业需要的可靠手段。后来，他又考虑农业所有制的完全国有化，就是把集体所有的集体农庄变成国有的国营农场。1950 年开始“合并扩大”集体农庄，以提高其管理的集中程度，结果导致出现庞大的管理不善的农业企业。

农业生产只有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 年）期间，也就是 1952 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不带任何夸张地说，工业的宏伟成就是以农业发展不足为代价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的落后和导致的粮食不足都是国内居民最头疼的问题。

1949—1951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扎·萨布罗夫的领导下制定的。直到 1952 年 10 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才最终批准了该计划指令，但是计划按指令的思想

已经执行两年了。计划规定工业生产要整个增长70%。同时也特别指出生产的增长不仅是生产资料，还必须包括消费品的增长。但是优先发展权落在了同其排序一样的第一部类产业，它的年均增长率定在13%的水平上，而消费品生产为11%。国家对工业的资金投入预计比第四个五年计划增加一倍。规定对农业进行技术更新，农业平均产量要提高50%，并扩大牲畜的总头数。再次提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第五个五年计划的许多任务没有完成。这尤其是与农业领域的乐观预测有关。1953年，当1949年开始实行的振兴畜牧业的三年计划失败后，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农产品以每年1.6%的极缓慢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不能保障居民必需的食品供应。

为了走出困境，却制订了更加乌托邦式的计划。第五个五年计划对苏联科学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而对苏联科学万能的信仰铸成了脱离实际的改造自然界的计划。1948年10月通过了“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在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顿河和阿姆河激流上修建水电站，建设周围带灌溉系统的运河综合体（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南乌克兰运河、北克里米亚运河、土库曼大运河），在旱风必经之路种植人工林带。人们甚至认为能够把沙漠和人烟缥缈的雪地变成丰产地。计划实现的某些部分（例如，在各地种植防护林带）对经济具有正面意义。但是总体上这个乌托邦计划险些导致国家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还不算巨大的财政支出。那一时期类似计划的实施以及稍后又不得不回归自然的尝试对自然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战后年代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

· 成功地恢复了工业；

· 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创建了新的、最先进的部门——如原子能和火箭的发展；

· 保障了2500万饥饿的、无家可归者有安身之所。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以整体上的综合损失为代价的：

· 农业仍然落后；

· 住房问题是靠建造简易房和临时房来解决的；

· 工业发展是靠维持低水平的人民生活来实现的。

农业从国家取得了50万台拖拉机，9.3万辆联合收割机，其中包括自动的、更加灵活的、适应非黑土地带小块田地耕作的联合收割机。开始了化肥的生产，尽管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

农业继续成为苏联经济中最落后的领域。国家一长制的、专制的领导越来越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指令”（1946年3月18日）

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它曾一度被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中断……

苏联最高苏维埃规定，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重建遭受破坏的地区，将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

■ 摘自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关于“伊兹梅尔州饥荒后果”的报告（1946年11月25日）

由于食品困难和天气降温上学的孩子人数减少了。在“别萨拉布斯基”国营农场所在的波德戈尔诺耶村，学校的100名学生中每天有30—35个孩子不上学。今年10月，博罗金斯基区有8例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记录。在博罗金斯基区亚历山德罗夫卡村庄登记了20例因饥饿引起的浮肿。



3. 约·维·斯大林晚年时期的苏联国内政治

苏联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对内政策与国家领导人向全国提出的动员任务是相适应的。决定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统治以及集权制度是战前时期的遗产。但是新的趋势也出现了。其主要内容是继续巩固约·维·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他甚至越来越少地顾及意识形态的限制，只要需要就坚决地改变它们。这样做符合权力已得到加强的国家机关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的框框经常束缚国家机关的工作。

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为扩大苏维埃权力而规定的某些措施只是为了简化统一的国家领导体制。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战前环境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不搞非传统的苏维埃选举，似乎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每一个苏联公民都亲身感受到，体制变得更加严厉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运动波及全国，禁止有丝毫不同意见，在宗教生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问题上必须站在党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立场上。对所有潜在不满者继续实行政治镇压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1946—1947 年恰逢镇压的新高峰。正式的解释是惩治叛徒和战后犯罪的高峰期，但这些措施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战后有 500 万以上的人被遣送回苏联。他们在审查营里接受了严格的审查，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过去的战俘，被送往劳改营。

战争年代某些民族从克里米亚、北高加索被整体流放。那些

手持武器同苏维埃政权抗争的人们：如班杰拉分子[1]、“森林弟兄”[2]，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抵制集体化的居民同样被流放到东部地区。约有 250 万这样的人被迁移到西部地区。

如同战前的情形一样，镇压也涉及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精英。事实上，镇压成为淘汰这些精英的手段。那些被提拔到任何一个重要岗位上的年轻工作者面临的任务，经常是要么极难，要么简直就无法完成。

实际情况

1964—1982 年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列·伊·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1946 年这位 40 岁的中将，从军队复员不久就被认命为州委书记。他这样回忆起自己一生中的关键事件：

我记得，播种的时候从别尔江斯克回来，在去年堆的草垛上睡了一夜，早上七点去了波洛吉区。在同区委书记舍尔斯秋克（Шерстюк）谈话时，我问他播种进行得怎样，机器怎么样，可他呢，我看，有点犹犹豫豫的样子。

——你怎么了，亚历山大·萨维奇？请直说吧，你有什么事吗？

——我这儿正常……您早上听广播了吗？

——怎么了？

——您知道吗，《真理报》的社论狠批了我们。因为重建“扎波罗热钢铁厂”的速度太慢。措词非常严厉。

我们都沉默了。这样啊……我说，就是说，斯大林会打电话

---

① 班杰拉分子是指 1943—1947 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西乌克兰组织的军事组织的成员，由其领导人斯·安·班杰拉的名字而得名。——译者注

② “森林弟兄”是指 190[illegible] 年 12 月至 1906 年 12 月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拉脱维亚游击队员——译者注

来。必须得走了。

夜里，约·维·斯大林真的给我打来电话，谈话是严肃的。我们不久前干的以为是成绩的东西，突然间差不多变成了失误。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是我们州里，而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我们准备建立钢板生产的联合企业的预定日期被改到今秋，上面指示要加快建设的速度。我已经说过，这与冷战有关。



那个时期勃列日涅夫是精力充沛的年轻领导，许多人对他评价良好。

不用怀疑，如果他没有做好“扎波罗热钢铁厂”的重建工作，他的仕途结局应该是很不幸的。

最有才能和最有精力的人、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往上”走了，得到了提升。取得了某些成绩的人能有机会在原来位置上继续工作。而那些不胜任工作并暴露了弱点的人常常受到惩罚。被淘汰者给新的接受考验者腾出位子。因此，类似的、经常是带血腥味的“轮换”使官僚们惨遭淘汰。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淘汰锻炼了那些留下来的人。但是到了50年代初，战争前就是斯大林主要支柱的官员们对这种升迁的危险已经明显表现出厌倦。机关工作人员再也不想老是为自己的位子或性命而担惊受怕了。但斯大林的疑心随着时间推移却更加严重了。

实际情况

尼·谢·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回忆道：“我记得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新阿丰休假的情形。那是1951年……他像从前经常做的那样把我叫去……然后他又给在苏呼米休假的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打了电话。米高扬也来了。这样我们两个就住在斯大林那里……有一次，还是午饭前，斯大林起床，穿好衣服走到

屋外。我们俩跟上他，三人就站在房前。突然，斯大林毫无缘由地那样盯着我看并且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谁也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简直惊呆了。无论是我还是米高扬都说不出话来。斯大林也没再对我们说什么。他周围所有人都是临时抽调来的。当他暂时在某种程度上还相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还活着并工作着。而当他不再相信他们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他们’。当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这个或那个人不再被信任时，悲惨的命运就轮到他们，让他们去步那些逝者的后尘。实际上，这种事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身上……然后几乎所有的这些人都被消灭掉了……事情已经发展到斯大林开始认为伏罗希洛夫是间谍的地步！”



一些领导人对新思潮的出现感到不安。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及宗教政策放宽，表明斯大林放弃了以往意识形态和“党的”路线，向“国家强权”路线急剧转变。许多沙皇俄国特有的对外标志——从政府名称（部长会议）到军服的式样又恢复使用了。另一方面，对革命前的俄国历史及其英雄人物——文学艺术家、军事统帅、甚至一些君主部分恢复了名誉。曾经流行一时的文化现代派受到彻底谴责并被宣布是“形式主义”。

许多从前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东西现在受到严厉的批判，被称作“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对西方所有形式的“奴颜媚骨”都遭到否定。事情甚至到了实际上放弃了苏联各民族平等思想的地步。这场运动对某些民族有时带有侮辱性的特点。但是由于战前年代对“国际主义”的强制灌输，运动仍然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

与这场意识形态革新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党机构的权力也受到削弱。斯大林放弃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个响亮的称号。他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委员会全会，并完全没有召开党的代

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同专门召唤来的一些战友的会议，而且不作记录。由于党的无上权力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国家机关的权力得到了加强。第四个五年计划是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的，没有党的代表大会的指导性决议。中央和地方党的机构受到隶属斯大林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严密控制。

在个人权力极度巩固的年代，斯大林越来越远离对国家日常工作的领导。这既是因为他已经身心疲惫，也因为他健康状况不佳——暮年的领袖越来越经常生病。1940—1950 年间斯大林主要的时间都不是在克里姆林宫甚至不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国家领导人的会议经常在斯大林最喜爱的莫斯科郊外的孔采沃别墅召开。

在确定总的政策的时候，斯大林越来越少地参与具体政策的制定。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他不断坚信自己作为理论家，“各门科学的泰斗”的独特作用。领袖醉心于抽象的著作。斯大林当时写的主要作品是关于语言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当斯大林研究理论问题时，国内已经积累起了很多问题，而他的战友们又不敢不通过领袖而擅自决定。也完全没有人敢纠正那些根据领导考虑不周的指示而犯下的明显错误。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争夺权力的斗争，斯大林衰老得越明显，斗争就越残酷。

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的集团。一个是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是斯大林过去党内斗争的战友——维·米·莫洛托夫、阿·伊·米高扬、克·叶·伏罗希洛夫（K. E. Ворошилов）、拉·莫·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安·安·安德烈耶夫（A. A. Адреев）。在复杂的个人关系背景下，对思想革新的戒备和对可能的新镇压的恐惧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个集团是政治局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弱的一个。在战争中出名的“列宁格勒”集团［安·亚·日丹诺夫（A. A. Жданов）、尼·阿·沃

兹涅先斯基、阿·尼·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等等］是政治领域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日丹诺夫是反对“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列宁格勒”集团主张扩大俄罗斯联邦政权机构的权力。逐渐独立起来的另一个集团是主管安全机关的拉·巴·贝利亚和与他关系密切的格·马·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1948年，有影响的日丹诺夫的死使他们与“列宁格勒”集团之间爆发了公开的斗争。至于领导成员中其他斯大林亲自提拔的人［尼·谢·赫鲁晓夫、尼·米·什维尔尼克（Н. М. Шверник）、尼·亚·布尔加宁（Н. А. Булганин）］则采取了观望的立场。

政治局大多数人和斯大林本人的共同任务是削弱胜利后威信极高的苏军统帅。1945年6月24日晚，2500名将军和元帅在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他们穿着用从未见过的金线缝制的阅兵制服，佩戴着在全世界作战所获得的重要勋章。他们是胜利者，这是他们的节日。

在庆祝胜利的招待会上，斯大林的祝酒词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为俄罗斯民族的健康干杯！”但是他没有走上前去向元帅们祝贺（此前莫洛托夫已向他们致了祝酒词）。这种方式已经清楚地指明了他们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声望极高的统帅们成为斯大林的危险人物。正因为如此，格·康·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很快被调到奥德萨军区，康·康·罗科索夫斯基（К. 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被派往波兰，阿·因·安东诺夫（А. И. Антонов）被派往外高加索。一些元帅和将军不久就遭到镇压［炮兵元帅尼·德·雅科夫列夫（Н. Д. Яковлев）、空军元帅亚·亚·诺维科夫（А. А. Новиков）等等］。海军人民委员、海军上将尼·格·库兹涅佐夫（Н. Г. Кузнецов）经过调查后，被撤销职务并降低了军衔。

队伍的清洗也触及了政治局。1949年国家安全部长维·谢·

阿巴库莫夫（В. С. Абакумов）和格·马·马林科夫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宣布“列宁格勒”集团的反党反苏性质。其成员被判决犯有几乎快被遗忘的所谓“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罪行。“列宁格勒”集团的领导——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阿·亚·库兹涅佐夫、米·伊·罗季奥诺夫（М. И. Родионов）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各地区上千数的负责人都经过了同一“列宁格勒案件”的审查。在日丹诺夫的著名支持者中只有阿·尼·柯西金神奇地幸免于难。

但是斯大林情绪的钟摆很快就摇向了另一面。1951年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被撤职并被逮捕。斯大林将他的“案件”作为惯用的约束国家安全机关“做得”过头的手段的第一步，而顺便也是向同伴发起新“大恐怖”的第一步。

在同一时间，有意识的恢复审理始于1948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案件。战争时期成立的犹委会成为苏联犹太人的重要社会活动中心。犹委会引起斯大林的警觉，是因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并有一定的独立于国家机关的自治权。在“冷战”条件下，犹委会与国际犹太组织的联系是令人怀疑和危险的。犹委会领导人提出的在克里米亚建立新的犹太人自治区的精心设计的想法，以及犹委会在苏联支持以色列中所起的作用，后来被公认是错误的并导致立案。

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假借交通事故杀死了公认的犹太人社会活动领袖、犹委会主席、苏联人民演员索·米·米霍埃尔斯（С. М. Михоэлс）。随后很快开始了反对犹委会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运动以及第一轮逮捕行动。“犹委会案件”不仅是反对犹太人运动，而且也反对“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犹委会的主要保护人——老革命家、党中央委员阿·洛佐夫斯基（А. Лозовский）和莫洛托夫的妻子波·谢·热姆丘任娜（П. С. Жемчужина）遭到逮捕。这个案件到此就暂告一个段落。

从 1949 年 1 月起，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转向公开地反犹太人，许多人开始把“世界主义者”和“犹太人”两个词理解为同义词。但是犹委会的工作人员仍在等待开庭审判。审判于 1952 年才开始。以洛佐夫斯基为首的 13 位主要受审人被判处死刑。

1952 年 10 月 5 日，莫斯科在准备新的镇压的背景下召开了联共（布）第 19 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仿佛是对权力斗争进行的总结。大会迟些时候批准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令。从外表看这表示党的机关恢复了从前的地位。但仅仅是表面恢复。斯大林需要党只是作为选择精英的机制，如同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代表大会宣布，党过去的纲领已经实现，但是新的纲领没有开始制定。大会对党章作了修改。其中很重要的是扩大了共产党员义务的部分。新版党章强调党员的义务在于不仅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要支持领导的每一个决定。党的名称的改变成为新党章的标志。在大清洗年代已经把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们清洗出党，现在把布尔什维克的名字也放弃了。党改名叫作苏联共产党（苏共）。这一象征性的决议完成了斯大林对苏联唯一政治力量的硬性“革新”。

最重要的还是党组织的变化。新设立的唯一机构——苏共中央主席团代替了原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主席团在权力上接近于原来的政治局。但是主席团的人员大大增加了——由 25 个成员和 11 个候补成员组成。整个中央委员会现在是 125 名委员和 111 个候补委员。

依靠着提拔年轻人扩大了的领导圈子，为斯大林创建了强大的干部储备队伍，削弱了一些公认的党的领导者的权力。从前独立的党的监督委员会现在从属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样，权力集中的书记处实际担负起党的领导工作。新党章没有提及党的总书记一职，但是所有人都清楚，谁将领导书记处的工作。斯大林在全体会议上用了挑拨性的一招，请求解除他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领

导职务。

实际情况

党代会代表、诗人康·西蒙诺夫（К. Симонов）看到这样的情景："斯大林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厅，谈到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执行托付给他的那些职务了。他可以继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可以像以前一样履行诸如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职责，但是他再也无力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了。因此他请求解除他最后提到的这个职务。斯大林说这些话时，看着大厅，他后面坐着政治局委员们，马林科夫站在桌子后面，他在斯大林讲话时主持会议。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可怕的表情——不是惊恐，不，而是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大祸临头的人才可能有的表情……马林科夫的脸色，他的手势，他举起的双手显然是在央求所有在场的人要立即坚决地拒绝斯大林的请求。于是，听到斯大林身后已经有人说：'不，请您留下来！'或者类似那样的话以后，大厅里顿时嗡嗡地响起'不！不行！请您留下来！请收回您的请求！'……的声音。在这一时刻担任着主席职务的马林科夫负有最大的责任，而万一真有什么事的话就是他的罪过，他马上明白过来，斯大林完全不打算放弃职位，这是一个试探，是摸一下全会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当人们在大厅里嗡嗡地叫喊着，说斯大林应该留下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马林科夫的脸色就是一个刚刚躲过一场致命危险的人的脸色，那危险是现实的，真实的。"



在1952年10月15日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选入主席团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少以前不太出名的人，简直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人。例如，进入新机构的有1947年才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米·安·苏斯洛夫和1950年才选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斯大林提拔的先进工作者中不仅有

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代表。另一方面，对于国内战争时期就是党的领导成员的安·安·安德烈耶夫，大会以生病为借口没有把他选进主席团。斯大林在全会上突然对老布尔什维克们发起进攻。他指责维·米·莫洛托夫和阿·伊·米高扬的反党和甚至亲美的立场，同情“人民的敌人”阿·洛佐夫斯基。由于这个原因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苏共党章没有规定的、而根据斯大林个人指示设立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拒之门外。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1953 年 3 月 5 日，约·维·斯大林逝世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期盼已久了。在那个情形下，领袖的离世似乎给谁也不需要的动荡局势画上了句号。

4. 民族政策和约·维·斯大林晚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状况

苏联战后执行的民族政策仍然是内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将民族政策视为自己专长和权力范围。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稍后他亲自在地图上标出并确定了苏联各共和国的边界。战争和随之实行的国家全部力量的集中限制了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中央和民族地区的关系越来越令人把它和从前单一制帝国体制联系起来。但是谁也没企图毁掉联邦体制的形式，加盟共和国保留了所有的权力，甚至包括退出苏联的权力。

战后民族政策的尖锐问题首先是与苏联西部地区的局势联系起来的——西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和西白俄罗斯。这里在战胜德国后又点燃了国内战争，实际上是当地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国内战争。

在乌克兰西部，战争年代这里就发生过苏联游击队和乌克兰起义军之间的冲突。为数不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战争期间直接

为德国人服务，其中包括为党卫军部队服务。此前由于对占领者态度不同而分裂的班杰拉派和梅利尼科夫派（这些称呼来自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领袖的姓氏）因德国军队的溃败而联合起来。1944年，乌克兰起义军就在新的波苏边境两侧的红军后方发动了武装行动。1945 年以后，乌克兰起义军仍与其头目藏身所在的西方国家保持着联系。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纳粹分子建立的警察和党卫军新编队伍组成了“森林弟兄”支队的骨干，他们继续进行反抗活动。拒绝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归入苏联的西方大国也支持他们。除了“森林弟兄”，在立陶宛和西白俄罗斯进行独立活动的还有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所属的波兰国家军的战斗队员。

1945—1948 年，隐藏在森林中的反苏支队和在居民点开展的广泛的地下抵抗活动给苏联当局及其支持者造成严重损失。但是1946 年，苏联当局在歼灭立陶宛“森林弟兄”行动中取得了某些成绩。1947—1948 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的敌人几乎被消灭。最残酷的战斗是在乌克兰进行的，但这里的镇压与大赦并举，取得了一些成果。1949—1950 年，在新的共和国和各个州开展全盘集体化以后，这里的情形又变得尖锐起来。抵抗强制性集体农庄化的结果是，许多农民成了民族主义者。当局严厉地镇压了“敌对分子”并将其驱逐出境。1949 年，在可怕的饥荒之后实行的农业集体化，甚至在相对安分的摩尔达维亚也引发了暴乱。于是莫斯科又像 20 世纪 30 年代初时一样，在苏联各地区农民的抵抗下，发出了“承认错误”和“纠正过火行为”的指示。

但是所执行的仍然是从前的总路线。1951 年集体化已基本完成，而抵制集体化的主要力量——富裕农民（富农），遭到生产资料被没收或者普遍被流放的命运。这削弱了民族主义者的群众基础。

应当指出，在进行集体化的同时，苏联西部也按照“伟大转

折”时代的模式加速进行了工业化。战争毁掉的企业恢复了，同时建起了新的企业，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950 年的工业生产就达到了战前水平的大约 3 倍，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大约是 2 倍。摩尔达维亚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尽管稍逊一筹）。城市的发展和公共事业的完善，以及从前偏僻农业地区向工业地区的转变巩固了当局的地位。城市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壮大了的职员阶层，成为当局可靠的支柱。

在新的条件下，民族主义者的地下活动失去了基础。1948 年，波兰国家军已经全部被歼灭。1950 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的抵抗基地已被清除。立陶宛和乌克兰起义军和“森林弟兄”的战斗队员到了 1953—1954 年才被歼灭。苏维埃政权对地下活动的打击是严酷的，但是民族主义者也采用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包括用来反对本民族人民。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恐怖手段越残暴，其斗争就越失去意义。杀人与恐怖手段的受害者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军人家属、教师，不少就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1944—1954 年间，苏联西部地区有 4 万平民死在民族主义分子手上，其中 2.5 万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战后苏联军队和苏联内务部队的战斗损失可以同卫国战争的战略行动的损失相比。仅在乌克兰西部 10 年内就损失 3 万军人。乌克兰起义军在这一地区有 5.5 万人被打死，有 10 万多人被判刑。苏联战胜民族主义者既有国家机器实力增强的因素，也有战后改革取得成效的因素。

民族主义运动在失去了居民群众支持后就不复存在了。共产党最终赢得了西部地区国内战争的胜利。

国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族际关系中也有所反映。无限忠于斯大林的谢·杰·伊格纳季耶夫（С. Д. Игнатьев）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取代了被捕的维·谢·阿巴库莫夫。1952 年外高加索开始审查“米格列尔人案件”，矛头实际是指向身为米格列尔族人的

拉·帕·贝利亚。1930—1940 年间，这个小民族的许多代表人物在格鲁吉亚领导层中担任了显赫职务。他们中许多人同一些位高权重的党的领导人有亲戚关系。而现在开始大规模逮捕在党和苏维埃工作的米格列尔族人。他们被定犯了政治罪，以及刑事罪。受审者在审讯时被要求供出他们在莫斯科的保护人。

与此同时，1952 年，联盟国家安全部开始审查“医生案件”。在该案源头的“阿巴库莫夫案件”审理过程中，安·亚·日丹诺夫被误诊一事浮出水面并被提起公诉。基辅和莫斯科医院的医生接着就遭到逮捕，他们被指控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有害性的治疗”。最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被指控谋害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性命，以及与阿巴库莫夫、犹太反法西斯成员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联系。从他们口中简直就是“逼出”来的供词矛头指向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以及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绝大多数被捕的医生是犹太人。1952 年 11 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审理了许多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个诉讼案宣布犹太复国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威胁。1953 年 1 月，《真理报》宣告“害人的医生”是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对“世界主义”的主张夹杂着对“穿白大褂的杀人犯”的普遍恐惧，形成一场猛烈的反犹太主义的运动。各地都开始逮捕犹太医生。犹太知识分子发表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忏悔性谴责。现在犹太民族本身被宣布是虚构的“民族主义分子”了。

实际情况

赫鲁晓夫这样回忆起斯大林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斯大林最大缺点就是对犹太民族态度不友好。作为领袖和理论家，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没有表现出这个态度的一点迹象。绝对没有！……但是在自己人中间，他要说起某个犹太人的时候，他总是着重夸张

地发音。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觉悟、落后的人，鄙视犹太人的人，讲话时就这样故意歪曲俄语语音来突出犹太人的发音特点。”



苏联在长达几十年那样郑重其事地提倡国际主义之后，又转而大张旗鼓地反犹太主义，这引起西方国家社会各界的震动。1952年10月，美国指责约·斯大林对犹太人进行大清洗。当时国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指责。左翼力量开始不再与苏联来往，对斯大林进行批评。西方的共产党人也犹豫不决。甚至忠诚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领袖们也警觉起来。虽说近年来他们之中犹太人出身的人有的被解职，有的遭到镇压，但也留下不少犹太人，例如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拉科西。“医生案件”使本来早已冷淡的苏联—以色列关系完全破裂了。紧接着，以色列报刊发表义愤填膺的控诉和犹太人团体的强烈抗议，1953年2月9日，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发生炸弹爆炸。两天后，苏联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苏联联盟建设的结果是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等级制度。该制度在1945—1948年反“世界主义”第一阶段的斗争期间得到巩固。“世界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将苏联不同民族为共同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合理地均等化。而现在，俄罗斯民族的贡献在同等民族中被认为是占第一位的。这与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显著不同，当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被认为是政权的主要敌人。下一等级是构成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到1953年，除了俄联邦，苏联一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它们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卡雷利阿——芬兰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1945年，约·斯大林甚至为战争受害最深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争取到了特殊席位。苏联民族等级

制度的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自治机构——共和国和州的民族。处在等级制度末尾的是人口少的民族（“小民族”）这些民族中只有少数能在边疆区和州内组成自己的“民族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族因涉嫌在战争年代对政府不忠或与德国人合作全体被“罚”流放。那个时代对这些民族（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干脆就避而不提。

严格确定的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也符合所确定的民族地位。每一个民族的教育都与“规定”水平的文化和科学组织联系起来。所有加盟共和国建有自己的科学院，地位几乎与“大的”全联盟科学院一样。自治共和国没有自己的科学院，但是在每个自治共和国首府，不管现实需要与否，都计划开办一所大学。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受科学干部水平的限制，不仅 1950 年代没有可能办到这一点，就是 1960 年代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大多数州府只好满足于办师范学院。

俄联邦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体系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真正的和假想的）的斗争中，莫斯科当局尽量依靠提拔的俄罗斯族人，把他们派到其他加盟共和国去。另一方面，俄罗斯确实没有那么多加盟共和国所需要的国家一级的人才。

列宁格勒政府设法划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责任范围、区分苏联和俄联邦的行政管理权限的尝试，却变成了对“列宁格勒”集团［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伊·罗季奥诺夫（М. И. Родионов）］的一个指控。斯大林认为这个想法正是要动摇他设计的联盟基础的阴谋。俄罗斯在成为联盟国家成员时就是联邦国家。数量最多的自治机构正是从俄罗斯分出来的。其中包括了最大和最发达的自治共和国（雅库特、鞑靼、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

战后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国家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以及自身提出的任务而定位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应该重建毁于战争的经济，另外一些共和国是经济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后要恢复战前发展速度。所以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发展和从前一样依然带有“赶超的”性质。尽管俄联邦和西部地区工业生产下降和城市衰落，东部加盟共和国仍然落后于它们，主要是农业落后。只有外高加索地区在经济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缩减得相对快些。

不论战后重建，还是“赶超”发展，都需要大量投资。加盟共和国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即现阶段较富有和较发达的共和国成为落后共和国的“贡献者”。只有多方面的经济援助才能使战争受害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地区经常需要紧急援助。1946—1947年的饥荒，促使中央调拨了大量物资支援受灾的摩尔达维亚。1948年，苏联为遭受大地震的土库曼斯坦提供了无偿援助。

接受援助的加盟共和国中也逐渐分出最受优待的群体。它们在发展工业、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方面得到的投资最多。苏联就给了乌克兰很多这方面的优待——不仅为了弥补它的战争损失，而且为了巩固苏联西部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变为独特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橱窗”。新政权努力创造这种最好的、“西方化的”城市生活条件，并以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加以巩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苏联在工业、农业和文化等方面最先进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许多居民从其他地区来到那里，惊叹于那里的富足、清洁和秩序。人们在这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夏季休息的时候住在疗养院和休养所，或者租赁私人住房。这三个共和国与苏联其他州和共和国逐渐形成了广泛的协作制度。波罗的海地区的产品——收音机、电视机、奶制品、轻工业制品需要销售市场，其质量往往比国内其他地区同类商品质量更好，完全能够让苏联人满意。这些产品要出口到西方就困难得多，因为西方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些。同时，波罗的海地区也需要苏联其他地区的机械、设备

和许多商品，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

最后，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从战前就保持着特殊的地位。曾做过格鲁吉亚领导人的贝利亚也给予这个共和国相当多的优惠。

俄罗斯联邦为其他所有共和国发展作出了主要贡献。同时，数百年来，俄罗斯非黑土地带因毫无节制的农业开发已变得贫瘠，也需要好好地治理。

总之，斯大林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既有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政治支持，也有那些对加入苏联不满而可能构成政治危险的民族共和国的物资支持，在这两种支持之间保持平衡就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征。

5. “冷战”：最初的交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国被击溃后，人类社会拥有全部理由期望过上长期和平的生活。1945 年 4—6 月，50 个国家的代表聚集旧金山，来完成新机构——联合国宪章的最终方案。这一进程奠定了新的战后国际合作的基础。1945 年 6 月 26 日，50 个国家签署了宪章，包括这一进程的倡议国——苏联、中国、英国、美国和法国。

五个战胜国组成了拥有最广泛权力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消灭法西斯和军国主义非常重要的后果之一。联合国成立时几乎有 7.5 亿人——占地球近 1/3 的人口——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一大批国家恢复民族独立和这些独立国家形成新的世界体系成为战后时期世界的发展方向。

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转化为另一种战争——“冷战”，其特点是没有军队的直接冲突，甚至不断绝外交

关系。有时它将世界引向全球性灾难的边缘，有时在全球不同地区“点燃”“热冲突”的火花。

全球性的对抗不止一次表现为局部战争。

美国1950年2月对战略航空兵的能力进行的分析表明，假如在核战争的头三天，美国轰炸机在损失56—180架自己的飞机后，仍然能够飞到轰炸目标投掷153—180个核弹。这些数字取决于昼夜时间，航空兵团行动战术和苏联对空防御部队反击能力。

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还根本不清楚，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会引发怎样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5.1 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苏联军事行政机构的协助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掌权的是当地的共产党，有时是左翼的“人民阵线”接管政权。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使共产党掌权的和平政变尤其让西方感到愤怒。在波兰，苏联军队被迫向一些零散的反共产主义的起义力量发起军事行动。在波兰的国内战争中牺牲了大约1000名苏联士兵。

在南斯拉夫，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И. Б. Тито）领导的共产党没借助苏联红军多少帮助就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国家，并靠自己的力量击溃了国内的敌人。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没用苏联红军的帮助就赶跑了意大利占领者并掌握了政权。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渴望社会变革的人们总体上支持共产党上台执政。

美国制订的“马歇尔计划”拟为遭受战争损失的欧洲国家提供援助。但是从一开始起，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夏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率领83名苏联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马歇尔计划”的

具体会谈。现在解密的档案文件表明，“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们极其害怕莫斯科参加进来。斯大林同样预料到了来自西方的打击。

据苏联情报人员、英国外交部官员盖伊·伯吉斯报告，德国东部占领区与三个西方占领区不同，将永远不会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历史学家今天一致认为，在苏联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就会将这项援助变成仅仅是一种纯粹装饰性的东西。在现实中这道“铁幕”把得到“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分开了。苏联方面建议改变提供援助的程序，每个国家提供他们所需的商品清单，在美国与受援国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进行操作。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

1947 年 7 月 2 日，斯大林命令已经讨论过具体计划的莫洛托夫离开法国首都。美国现在可以团结那些经济体制能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了。

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这样就能够改变欧洲力量的对比。的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В. Гомулка）和扬·马萨里克（Т. Масари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这在苏联的压力下是不可能的。波兰政府被迫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苏联方面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声明，参加“马歇尔计划”将被视为执行了反对苏联的政策。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但是美国的领导人对此却有不同看法。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史密斯认为，所发生的这一切“不是别的，而是苏联的战争声明和实现控制欧洲的企图”。

为了协调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1949 年 1 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参加的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仅过了一个月，阿尔巴尼亚加入经互会（一直到 1961 年），1950 年 9 月——民主德国，1960—1970 年——古巴、蒙古，晚些时候越南、朝鲜、南斯拉夫、芬兰、伊拉

克、墨西哥也签署了参加经互会工作的协议。经互会成为第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抗衡的力量。实际上，它的目标与其说是互助，不如说是苏联对小伙伴单向的无偿援助。

5.2 苏联的防御措施

1947年初，苏联总参谋部制订了《苏联领土的积极防御计划》，该计划拟定解决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保证可靠有力地反击侵略和确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国际协定确定的边界完整”；“充分准备反击敌人的空中袭击，包括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袭击”；“海军舰队准备反击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对在沿海地区行动的陆军部队给予保障和支持”。苏联是否还制订有进攻计划尚不清楚，1991年以来，对这种计划的探究暂时也没有结果。

美国的领导人认为必须扩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此需要使美国人相信威胁在日益增长。1947年12月，海军部长乔治·沙利文向总统委员会报告说，“德国人在拥有不到50艘潜艇的情况下就几乎打赢了大西洋战役。而俄罗斯人现在拥有比这多4倍的潜艇。”美国空军委员会的成员斯帕茨将军也指出：1946年苏联武装力量已超过美国98%，而1947年将超过美国134%。这使美国出现了类似恐慌的气氛。

1947年美国和英国有157种各种级别的航空母舰和7700架甲板飞机，但苏联并没有同类级别的舰艇。美国和英国有405艘潜水艇，而苏联173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力量对比36∶11，巡洋舰135∶10；驱逐舰和护卫舰1059∶57。苏联没有登陆舰，当时美国有1114艘登陆舰，加上628艘运输舰。苏联不可能计划发动远洋战略军事行动，因为实在没有必备的力量。

苏联东欧集团怎样应对从前盟国的军事准备呢？1949年10

月，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当上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实行了全民义务兵役制，军队人数达到40万。1950年，1000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使该国军队人数达到25万人。苏联驻东德的军队扩大到8万人。匈牙利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巩固了军队。苏联从1950年起开始扩大自己的海军。远程航空兵装备中增加了图-4型战略轰炸机，但是情况很快表明，使用活塞发动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欧洲的对抗加剧了。1948年6月，双占区（美英两国在德国的联合占领区的名称，当时处于两国共管之下）和西柏林实行了货币改革。曾将同意西方军队驻在德国首都视为是苏联出于善意考虑的斯大林，要求西柏林取消货币改革。在遭到拒绝后，他还之以包围柏林城的西占区部分——封锁了对其交通运输和燃料供应。根据杜鲁门的命令，西方国家开通了西柏林和双占区的航空线，苏联没有予以阻止。

1949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约·布·铁托渴望建立有可能成为东欧新的力量中心的巴尔干联邦，坚持按“本民族”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方式时间会更长些，而主要是会比苏联进行得较温和一些。苏联政府对这些主张进行了严厉批判，结果导致两国关系断裂。南斯拉夫开始对“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1949年莫斯科发表声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了“法西斯党”，并变为“由间谍和杀人凶手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寻求帮助。尽管南斯拉夫制度与苏联的区别并不大，美国仍然同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促使斯大林建立起更为集权的同东欧盟国关系的体制——共产党情报局。同贝尔格莱德关系断裂后，苏联加强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制。苏联向这些国家的政权机构派去数千名党和军队系统以及国家安全机构系统的“顾问”。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遭到严厉谴责，其拥护者作为“铁托集团的

代理人”到处受到镇压。“人民民主”被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但是苏联领导人十分清楚，只用强力手段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因此 40 年代末苏联对东欧国家经济援助的规模急剧扩大。

5.3 德国的分裂、以色列国家的形成和北约的建立

西方大国不愿意听任苏联在德国东部形成自己的势力。柏林危机使德国的分割不可避免。1949 年，连接三个西方占领区的“三占区”管理机构成立，取代了以前的双占区。同年 9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宣告成立，首都设在波恩。西柏林没有划入联邦德国，但是与其保持了最紧密的联系。

1949 年，苏联占领区宣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首都设在东柏林。被分割的德国成为西方和东方之间思想激烈斗争的舞台，欧洲长期紧张的地区。

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英国的委任统治地）未来问题时，一致反对英国的既有苏联也有美国（各怀自己的目的）。美国一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斯大林的领导层是赞成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的，希望犹太人中强大的左翼思潮发挥作用。当时苏联在近东没有其他可依靠的力量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是由亲西方的“封建主”管理的。他们主要的对手——“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当年被莫斯科视为法西斯组织的另一变种形式。因此，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苏联不遗余力的支持，像犹太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从欧洲国家迁移到巴勒斯坦时一样。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正是苏联的外交立场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但是，在“犹太”部分的居民里有大约一半是阿拉伯人。冲突在所难免。1948 年 5 月，以色列正式宣布独立时，这些冲突演变为战争。苏联和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武器、弹药和粮食。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承担起这一使命。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供应物资。1949 年，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以色列战胜阿拉伯邻国而告终。

但是很快，莫斯科与特拉维夫之间的互不理解便露端倪。在认清以色列偏向美国后，斯大林越发坚定了自己很早以来就有的想法，即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本性是有害的。同时，以色列吸引苏联犹太人的问题也困扰着斯大林。在近东，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既胜了苏联也胜了英国。

此时建立反共产主义集团的计划也付诸实施。1949 年 4 月 4 日，几个西方国家组成了军事政治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成员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和葡萄牙。1952 年，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北约成为已建设起来的军事集团体系的中心环节。1948 年，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1951 年，产生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安全条约军事政治集团。1953 年 2 月，南斯拉夫与土耳其和希腊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美国不仅在西欧，而且在土耳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都驻扎了军队。苏联处在严密的军事基地包围之中。

但是斯大林领导层为自己找到了中国这个强大盟友。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内战。西方国家公开支持国民党，苏联则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1945 年战胜日本后，在满洲的苏联部队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可靠的基地。从 1946 年起，苏联以粮食作为交换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工业设备。1949 年 10 月，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分子在美国的支持下只是在台湾岛上固守下来。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发展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转交了中东铁路，提供了年息仅1%的3亿美元贷款，转交了苏联军队没收的日本的财产。随着中国承认苏联忠实的盟国——蒙古独立，苏联于1951年也承认西藏并入中国的事实。斯大林将中国视为第二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共产主义在远东可靠的支柱。为了抗议拒绝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行为，苏联曾一度暂时中止了自己安理会成员国的资格。

因此，美国方面的压力导致的不是苏联的退却，而是其势力范围的扩大。“斯大林帝国”——苏联的势力范围——从其囊括的领土范围上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欧亚大国，甚至成吉思汗帝国。苏联同样成功地消除了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垄断。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转变为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对抗。

按照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顾问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乃是地缘政治家们最惯用的理论的体现：“这是一个既控制大西洋也控制太平洋的世界主要海军大国，和一个是拥有大部分欧亚陆地的世界最大的陆地国家之间的对抗。地缘政治布局已十分清楚：北美反对欧亚这一块去争夺整个世界……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挫败本地区敌人后，对这一当代地缘政治专家称之为‘世界中心’或者世界统治的支点的地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控制。它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的海岸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①]和欧洲中部。只是到了蒙古帝国的斯大林时期的中苏联盟的兴盛时期，对苏联要在毗连领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控制才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竞争对手。”

① 安纳托利亚（Anatolia），奥斯曼帝国时期小亚细亚西部省名，中心为屈塔希亚。20世纪20年代起为土耳其亚洲部分名称。——译者注

5.4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西方集团与苏联之间军事力量的第一场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以占领区形式分割了朝鲜这个前日本的殖民地。在北部苏控地区，政权掌握在以苏联红军军官和朝鲜人金日成为领导的共产党手里。1948 年这个国家划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苏联考虑到左翼思想在广大朝鲜农民中的威信，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独立并撤出自己的军队。为了反对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共产党在南方开始领导起义。1950 年 6 月 25 日，金日成同斯大林商谈之后向南朝鲜派出了军队。

实际情况

尼·谢·赫鲁晓夫回忆道："金日成同斯大林谈话时提出很想用刺刀去碰一碰韩国，还说只要朝鲜一碰那里，韩国就会发生内部冲突并建立起朝鲜这样的人民政权。斯大林没有反驳这些话。要知道这个想法迎合了斯大林的观点和他坚信的东西，何况这里提出的是朝鲜内部问题：朝鲜想向在韩国受李承晚压迫的自己兄弟们伸出友谊之手……斯大林提出了一些疑问，他担心美国是会干预还是会置若罔闻？双方都转向这个话题：是否很快会完成这件事情，而金日成坚定地相信，如果一切都进展得很快，那么美国的干涉就会被排除，美国人就不会武力介入。斯大林仍然决定征求一下毛泽东对金日成建议的看法。……毛回复赞成金日成的建议并表示，美国看来不会干涉，因为这纯粹是内部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我必须明确声明，这一举动不是斯大林的建议，而是金日成的。金日成是倡议者，但是斯大林没有阻止他。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都不会去阻止他这样充满激情地要把南朝鲜从李承晚和美国反动派手中解放出来的行动。这样做会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相抵

触。我在这里不是指责斯大林。相反，我完全站在他的立场上。如果是需要我做出决定的话，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做。”



朝鲜的内战升级为国际战争。1952年10月4日，哈里·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我们之所以在朝鲜作战，是为了不至于在美国的威奇托、芝加哥、新奥尔良或旧金山湾作战。”朝鲜事件开始使西方确认“共产主义威胁”的存在。美国军队进入朝鲜。联合国安理会向他们派出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调解人”以表示支持。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几个月之内摧毁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并打到中国边界。这时中国派出5个师的部队参与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苏联空军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国的请求苏联军队留在了旅顺，苏联有5个师准备派往朝鲜。在1950年11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号召全世界动员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他宣布，指挥美国军队的道·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可能会被授权使用核武器。

1953年美国的军事预算就达到了526亿美元（1950年只是这个数字的1/3—177亿美元）。1950年12月，英国首相克·艾德礼（Clement Attlee）来到华盛顿，要求哈里·杜鲁门总统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到1951年夏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击退了美国军队以及盟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战线定格在北纬38°地区，这里早些时候是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的分界线。一些阵地战继续在打，同时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和谈。实际上，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在“热”战中遭遇失败。

同时代文献资料

关于1949年1月25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建立

194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

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举行的经济会议……

会议确认，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凡赞同经互会原则并希望同上述国家进行广泛经济合作的欧洲其他国家都可以加入。



6. 战后初期的文化和社会进程

对法西斯的胜利使全世界充满对过上更为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那些在战争时期经历了巨大牺牲和艰辛的人们，经受住了考验、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胜利，从而开辟了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人民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和对人有取之不尽能力的信念确定了战后苏联社会情绪的乐观基调。战争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处世态度，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考验迫使人们深入思考全人类价值的意义——友谊、忠诚、爱情。似乎也出现了与过去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友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何况成千上万的士兵——以解放者身份到了欧洲，却看到了另外一种，与战前宣传截然不同的西方人的生活。对宗教态度的变化使人们看到了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变化的征兆。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在文艺和科学创作领域弱化意识形态操纵的希望。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

那些年在古典表演艺术领域工作着一代伟大的音乐家——弗·弗·索夫罗尼茨基（В. В. Софроницкий）、玛·维·尤金娜（М. В. Юдина）、艾·格·吉列尔斯（Э. Г. Гилельс）、达·费·奥伊斯特拉赫（Д. Ф. Ойстрах）、列·鲍·科甘（Л. Б. Коган）等。斯·捷·里希特（С. Т. Рихтер）、姆·列·罗斯特罗波维奇（М. Л. Ростропович）（战后第一届音乐表演家竞赛获胜者）的创

作生涯由此开始，在大剧院，上演着谢·谢·普罗科菲耶夫（С. С. Прокофьев）的芭蕾舞作品，在列宁格勒，伟大的指挥家叶·亚·姆拉温斯基（Е. А. Мравинский）在这里指挥，德·德·肖斯塔科维奇（Д. Д. Шостакович）五部交响乐最初在这里演奏。在造型艺术和文艺界产生了新一代文学家。鲍·列·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小说《日瓦格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他在结尾就“时代精神”进行思考时写道：“虽然战后人们等待的觉醒和解放没有如同所希望的那样与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岁月里空气中已然弥漫着自由的气氛，这个自由的征兆构成了那个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当局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的好转也使人有理由对形势表示乐观。战争年代教会的威望明显升高，信教的人数也增多了（根据1937年人口普查资料，尽管教会遭到了严厉的压制，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信教）。1943年恢复了大牧首的衔位，1945年谢尔吉（斯特拉戈罗茨基）大牧首去世后，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担任都主教的阿列克塞（西曼斯基）被选为大牧首，战争时期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服役。无神论的宣传减少以后，新的教堂开始开放（1947年，1.4万个教堂举行了礼拜活动），恢复了教区生活，开办了东正教的教育机构，大约有100个修道院开展了活动。在著名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恢复了礼拜活动，某些圣物归还了教会，其中包括俄罗斯最重要的圣人之一——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Сергии Радонежский）的遗骨。当局希望利用教会的威望来达到政治目的，以及在欧洲和世界的势力范围争夺中取得胜利。特别是，拟定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自主教会会议以及准备召开1945年春天就开始酝酿的可以抵制梵蒂冈影响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

但这些计划在很快到来的“冷战”条件下注定要落空。国家像战前五年计划时期一样，又重新开始动员国内资源来恢复遭到破

坏的经济，以及打造能够保证与美国及其盟友抗衡的军事实力。在敌对势力包围下，这种动员要求实行新形式的空前努力。为保证动员的实施，国家照例选择了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严格监督的方式。为了使民众达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团结，就一定不能让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下去。这些措施不能不影响到国家与教会的关系：1948—1949 年就已经恢复对无神论的宣传和对神职人员的压制，停止了教区登记，报刊反教会的调子又提高了。

如同战前年代一样，科学和文化领域重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文学、电影、音乐这些直接影响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精神面貌的文艺领域受到特别关注。当局认为有必要向文艺家们认真指明他们在“工作体制中的位置”［按照弗·弗·马雅科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的说法］。为此，党和政府对文化和艺术领域制定了摧毁性的决议并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行所谓的“公开辩论”。

1946 年 8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非苏维埃的作家”安·安·阿赫玛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和米·米·佐琴科（М. М. Зощенко）成为批判的靶子。选择列宁格勒的文学家作为打击对象并非偶然，它间接针对的是列宁格勒市党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切反映了高层领导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他们围绕国家发展优先方向的立场冲突，成为“列宁格勒案件”（1949—1950 年）的序幕。决议揭露了“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卑躬屈膝的习气”——这是在“冷战”战线上意识形态“主要打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其他和这种揭露的调子基本类似的决议有：“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方法问题”，“关于电影《伟大的生活》（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关于瓦·穆拉杰利（В. Мурадел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1946—1948）。电影导演列·达·卢科夫（Л. Д. Луков）、谢·约·尤特克维奇（С. И. Юткевич）、

亚·彼·多夫任科（А. П. Довженко）、弗·伊·普多夫金（В, И. Пудовкин）被指责“缺乏思想性”和“脱离政治”。谢·米·爱森斯坦（С. М. Эйзенщтейн）由于电影《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第二集（第一集 1946 年被授予斯大林奖金）而遭到严厉批评。导演在这部围绕政权的孤独和暴力危害问题的电影中表现出的思想被评价为“在描述历史事实上的无知”。

1948 年，在同“异己思想影响”斗争的运动中关闭了新西方艺术博物馆，20 世纪初期莫斯科收藏家 С. И. 休金（С. И. Щукин）和 М. М. 莫罗佐夫（М. М. Морозов）收藏的印象派艺术家的画作被放进了博物馆的储藏室（后来被分放到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又重新展开。1920 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遗产和脱离生硬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准则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亚·亚·奥斯梅尔金（А. А. Осмеркин）、罗·拉·法尔克（Р. Р. Фальк）等人］的创作被置之不理。批评音乐家谢·谢·普罗科菲耶夫、德·德·肖斯塔科维奇、瓦·伊·穆拉杰利、瓦·雅·舍巴林（В. Я. Шебалин）的作品中“暴露出”“形式主义的畸形现象”。

文艺创作像 1930 年代一样重新被当局置于社会—政治争论的中心。在艺术创作中培植意识形态教条的目的是确立对思想领域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对犹太社会和文化组织的进攻。正如前面所述，1948 年，苏联人民演员、莫斯科犹太剧院领导、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米·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战争时期建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

在开展“同世界主义的斗争”运动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俄罗斯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所有领域的历史优先地位。确定俄罗斯领先地位的思想（这在大量发行的俄罗斯科学史纲普及读物汇编的名字“俄罗斯领先地位的故事”里就有体现），以及强调在国家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仅仅依

靠自力更生的思想——这就是战后初期文化生活的主题。

甚至连苏联第一次核爆炸都有一个经斯大林确认的缩略语秘密名称 РДС，翻译过来就是“俄罗斯自己制造”。

那些年代出版的历史小说，放映的关于祖国优秀的文化活动家的电影都充满了民族优先地位的情感。

从理性看待战争的悲剧性后果这个事实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尽管那些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从参与者视角观察事件的作品，如维·普·涅克拉索夫（В. П. Некрасов）创作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1947 年获得斯大林奖金。描写战争的作品让位于从细节塑造英雄人物的小说。要求文艺作品宣扬正确思想和乐观情绪并为最广大观众所理解。结果产生大量情节相近的作品——比如都是些关于革新家与保守分子之间的冲突，关于苏联人与生产困难作斗争并取得成功的作品等等。简单化的叙述形式使作品像所谓“真实生活”一样苍白无力，文学创作的普遍状况反映了当局的意识形态要求。

美化苏联现实成为艺术创作的准则。但同时，由于社会恢复了和平生活，尽管战后生活物资匮乏，人们还是强烈体验到了对幸福和美的渴求。

斯大林的女儿斯·阿利卢耶娃（С. Аллилуева）这样描述这一时期：“人们渴望……利己的幸福，明亮的颜色、声音、焰火、激情……渴望对于俄罗斯来说生活也最终成为欧洲式的……渴望看到世界各国，强烈地渴望，快些，快些！渴望舒适的生活、精致的家具和服装，而不是农村的箱子和粗呢上衣。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封闭和与全世界隔绝后，这一切是这样自然，难道谁能谴责这一切吗？”

反映这种情绪的作品，像音乐喜剧体裁的电影《库班哥萨克》

（Кубанские казаки）［导演伊·亚·佩里耶夫（И. А. Пырьев），1949］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喜剧一直是苏联电影喜爱的题材。是的，就像《库班哥萨克》或战前大家喜爱的格·瓦·亚历山德罗夫的影片［《伏尔加河—伏尔加河》（Волга-Волга）、《马戏团》（Цирк）］，都是始终不变地、大声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灌输着苏联制度优越性的思想。绘画和庄严雄伟的雕塑特别注重宣扬社会乐观情绪的史诗般的主题。最为普遍的创作题材是反映体育运动、青少年、劳动者的生活和苏联的庆祝节日。战后恢复建设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成为国家成就的窗口。

人为夸大的有关苏联生活方式及其令人神往的光明未来的虚诞故事，也是令人愉快和迷人的。

建成的公共大楼为内部装饰而定制了人物众多的油画，描绘了党的领导人在"普通人"中间的情景，画家们以"工作队的方法"进行创作。基本上所有体裁的艺术，包括绘画和雕塑，都奉行"容易懂的"叙述性手法和体现日常生活真实性的方针［费·帕·列舍特尼科夫（Ф. П. Решетников）的《度假》（Прибыл на каникулы），1948 年，《又是 2 分》（Опять двойка），1952 年；亚·伊·拉克季奥诺夫（А. И. Лактионов）《前线的来信》（Письмо с фротна），1947 年，《乔迁新居》（В новую квартиру），1952 年，等等］。

根据当局"指示"，这些统一风格作品的表现是——熟悉的情节以及精确的细节描绘，隆重的形式和群众乐观情绪的反响。在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实用艺术中采用了追求外表装饰的手法。庄严雄伟的公共建筑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比如莫斯科地铁站入口处的大厅［"共青团环线"站，建筑师阿·维·休谢夫（А. В. Щусев）等，艺术家帕·德·科林（П. Д. Корин）］以及斯大林 1947 年签署决议建设的著名的莫斯科高层大楼。

根据当时在苏联知名度极高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叙述："我在世界其他城市哪儿都没有见过莫斯科的全新建筑。这些建筑物不像美国许多城市的建筑物那样给人压抑的感觉：例如在纽约，摩天大楼使道路变成了阴暗的峡谷。"莫斯科的高楼确实不仅成为斯大林时代宏伟建筑的顶峰，也是我们对美国城市大规模兴建的高层建筑的"反应"。

这些和许多其他工程的实施，是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牢固和人民—胜利者伟大的精神。国家为建设这些关乎国家形象的重要建筑拨出了巨额资金。

严格遵循意识形态指示的做法沉痛地打击了祖国科学的一系列流派。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叶·萨·瓦尔加（Е. С. Варг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列·达·兰道（Л. Д. Ландау），彼·列·卡皮察（П. Л. Капица）等等、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学术领域推行"阶级的"评价。在某些领域（如遗传学、控制论、世界经济研究等）这样的指责导致整个学术流派遭到封闭或者其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

1948年7月31日，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特·杰·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在该院大会上做了《关于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该报告中有一个片段对于说明学术的意识形态化进程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 将生物学家分成两个不容调和的阵营的急剧尖锐化的斗争突然爆发了……斗争围绕那个老问题：植物和动物机体在生存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能否遗传？……米丘林的学说，就其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用事实确定这种从属性。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本质上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不接受这种从属性……苏联生物学家认为，米丘林的观点是唯一科学的观点。否认这种遗传属性的魏斯曼派学者及其拥护者的观

点不应被过多宣传。

多年来苏联同世界学术界的交往实际上是中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断（或者简明解释）被用作毋庸置疑的学术真理标准。像是对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有组织的公开讨论进行总结的斯大林的著作，被看做是对重新审查的课题的指导和研究遵循的方向。

与此同时，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1.5倍，科研部门的威望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

把科学成就运用到工业中去是恢复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的最重要资源，但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干部少得可怜。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改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着手启用“劳动后备军”制度培养工人干部——开办了手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厂办学校。

国家为那些由于战争而没能完成中学学业、但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开办了夜校。为了培养中学教师开办了短期课程培训班。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人可以以优惠条件考入大学，这些优惠条件后来也惠及到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企业开设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分校来培养本生产企业的专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到1960年，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2倍（达到240万人），在经济领域大量需要的工程技术职业最受欢迎。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在列宁格勒出版的文艺杂志《星》和《列宁格勒》办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星》的重大错误在于给作家佐琴科提供了文学讲坛，他的作

品是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星》编辑部知道，佐琴科早就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和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朽的无思想性的、低级趣味与不问政治的习气，想这样来误导我们的青年，毒害他们的思想……佐琴科以丑陋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诽谤地把苏联人表现为粗野的、没有文化的、愚蠢的、带有庸俗趣味和风气的人。佐琴科对我国现实这种恶毒无赖的描绘，还伴之以反苏的攻击……

《星》杂志还千方百计地宣传女作家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她的文学的和社会政治的面目是早为苏联公众所熟知的。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浸透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凝结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诗歌的风味；她的诗歌给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带来损害，因而在苏联文学中是绝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列宁格勒——这个英雄的城市，以其先进的革命传统著称的城市，始终是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发源地的城市——所出版的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竟让那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没有思想和不问政治的作品钻到杂志里来呢？《星》和《列宁格勒》编辑部所犯的错误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两杂志的领导人……忘记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我们的杂志，无论是学术的也好，或者是文艺的也好，都不能不问政治。他们忘记了，我们的杂志是苏维埃国家在教育苏联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方面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应当以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基础即苏维埃国家政策为指针，苏维埃制度绝不能容忍以对苏维埃政策漠不关心的精神、以藐视一切和无思想的精神来教育青年……

因此，凡是宣传无思想性，宣传不问政治，宣传“为艺术而艺术”，都是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都是对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有害的，都不应当在我们的杂志里有存在的余地。①

---

① 本段决议翻译参阅了《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6—659页。

■ 摘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瓦·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1948年2月10日）

这种音乐的典型特征是否定经典音乐创作的基本原则，鼓吹西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颓废音乐的无音调、不协调与不和谐，它似乎要在音乐形式的发展中追求“进步”和“创新”，却放弃旋律作为音乐作品的最重要的原则，表现出杂乱无章的神经病似的组合，把乐曲变成噪音，变成单音的胡乱堆砌。这种音乐散发着当今欧洲和美国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味，反映了资产阶级文化的颓废，是对音乐艺术的完全否定，把音乐推向了绝路。



7. 苏联人的日常生活

战后时期城市居民数量因农村青年大量涌入企业而迅速增长。这些年农村每年失掉200万劳动力。城市需要劳动力，但是远远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房住。相当大一部分住房完全被摧毁。整个城市不得不重新修筑。重建的重点是保证生产项目优先，对住房建设的拨款是按剩余原则实行的。

甚至在首都的城郊地区还保留着半是农村的面貌，在日常生活中则是现代与落后两种生活方式相互交织。

人们生活得很困难，空闲时从狭窄的屋子里走出来，就在大院里，在邻居眼皮底下休闲。人们在院子里建起运动场，年轻人休闲时喜欢体育活动，到体育场，为喜欢的足球队加加油，就是过节了。

1960年代由歌手自己谱曲并演唱的歌曲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尤·约·维兹博尔（Ю. И. Визбор）是这样塑造战后莫斯科庭院居民的典型形象的：

你好啊，你好啊，我的奉献节的庭院，
透过记忆的长河，我回想起：
那些幸免于战争的青年男女，
手支着栅栏站在那儿。
身上的海魂衫洗得发白，
一只靴子被手风琴磨得锃亮。
那些年莫斯科郊区人的制服就是这样。

战后人们的外表穿戴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连官员都渐渐地抛弃了战前引以为时尚的“战士”服，其典型的代表是著名的斯大林式的弗伦奇式军装[①]。军服让位于便服，人们在裁缝铺定制或更经常地在家缝制便服。每个家庭都尽量购置缝纫机，德国运来的“胜家”牌缝纫机特别受欢迎。人们主要是用买得起的便宜的布料——印花布、缎纹布、呢子、斜纹布等做衣服（校服就是用这种布料做的）。

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居民住在公共宿舍里——从简易的棚子、厂房宿舍到几家合住的公用住宅。在城市中心有历史记载的大多数住房就是公用的、公共的，单个家庭不论人数多少，多数情况下在公共住宅里只能得到一个房间。享用单间的城市住房主要是党的干部、搞经济和创作工作的人的特权。

战后初期普通城市居民的口粮也不足。城市里食物缺乏，主要的食物和从前一样凭证供给（只是到了1947年12月凭证制才取消）。例如，规定对每家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供应400克面包。同时，逐渐恢复了一些所谓的议价贸易。议价商店（自然也是国有

① 弗伦奇式军装是以英国元帅弗伦奇的名字命名，军装上衣有四个兜、带扣带。——译者注

的）的价格高达国家固定价格的 3—7 倍，而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则高达 10 倍。许多家庭还经营菜园作为副业——这是唯一能够真正填饱肚子的办法。市郊的小块地分给工厂工人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用作菜园。

当局对人们如何休闲给予很大关注。所有正式的节日都组织群众性的活动。1945 年 6 月 24 日，在红场上举行了胜利阅兵式，日历上出现了新的国家节日——胜利日（实际上，从 1965 年开始 5 月 9 日才成为休息日）。11 月 7 日（伟大十月革命节日）和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这两个国家节日战后恢复了大游行，体育节最流行的是体育大检阅。1949 年大规模庆祝斯大林诞辰 70 周年，在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原先放印象派画家作品的地方办起了盛大的各界人士赠送领袖的礼物展览。

1940、1950 年代之交经常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的极盛期”。这一时期明显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到处都挂着斯大林像，在各种书籍、文章、广播节目不引用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不多次提到他的名字都是不行的。人们给斯大林拍了电影及演出了话剧。领袖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变成了神话。

到 1940 年代末期，无线电广播覆盖了国家主要的地区。从 1945 年起，位于市中心的沙巴洛夫卡电视塔电视转播也恢复了。1940 年代末，开始生产国产电视机。电视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一般都放在公共场合。在住房不够的条件下，文化公园和俱乐部就成了大众休闲的场所。

对人们来说最大众化的和最为普及的休闲方式是看电影。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苏联上演了一百多部新电影。战争题材的电影知名度最高，那个时候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战争电影是国家和一代人英雄经历的再现。当时的《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和《真正的人》（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都是 1948 年出品），是根据亚·亚·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和

鲍·尼·波列伏依（Б, Н. Полевой）在文献资料基础上写的作品拍摄的。

1947 年上演了《侦察员的功勋》（Подвиг разведчика）[是由帕·卡多奇尼科夫（П. Кадочников）扮演的] ——是描写苏联军官在法西斯后方工作的传奇电影——这是战后最有名的一部影片。另外一个受欢迎的题材是和平的生活，反映人的思想和公民意识的成熟，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冲突的作品《大家庭》（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鲁缅采夫案件》（Дело Румянцева），导演是约·叶·海费茨 [（И. Е. Хейфец），1954—1955 年出品] 等等。此外，外国电影——就是所谓的"战利品电影"像汹涌的潮水一般涌向苏联银幕。全欧洲国家和美国出品的最大的电影胶片储藏所就位于柏林郊区，战后，储藏在那里的电影都运到了苏联。电影院上映了其中大量的在当局认为思想上"无害的"喜剧片、音乐片和惊险传奇片。这些电影的译制与出租发行一直持续了十年。

农村的生活比城市要贫困得多。战后初年，在被战争毁坏的土地上，许多农民只是住在临时房里和土窑里。谁也没有认真地从事恢复农村住房的工作。集体农庄庄员主要靠自己种的东西为生。国家只能保障供应农村最必需的东西——粮食、盐、肥皂、火柴，但就是这点供应也不总是能得到保证。农村的外貌从战前以来一直变化就不大，许多地区仍像从前一样主要靠家庭手工缝制衣服，当然对"城市"服装（成衣）的需求量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娱乐消遣照例局限在乡村俱乐部（也就是电影厅）和舞场。人们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舞，只有在最富裕的集体农庄舞会上才用音响设备，即普通的留声机。

1947 年 12 月，政府在社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而且内涵丰富的措施。在货币改革框架内，在保持原来的价格及工资水平基础上，将 10 种老的现存的卢布换成一种新的卢布。严格规定了

货币兑换的期限。只有那些在储蓄所有存款的人占了便宜（3000卢布以下的存款按票面价值兑换，3000卢布以上1万卢布以下按3:2的比例兑换，高于这个数目的按2:1兑换），保存在家里的卢布则大大地贬值了。货币改革，极大地缩减了公民的储蓄，这样在1947年10月取消凭证制后，防止了大规模购买粮食现象的发生。食品实行国家统一价格。对于必需的食品（面包、面粉、米）的定价比实行凭证制时的价格低10%—12%，但是鸡蛋、水果、牛奶等加工食品的定价则高出凭证制时10%—25%。居民的损失逐渐通过1948—1952年期间一系列的降价得到补偿。总体上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但毕竟是在提高，尽管必需品的生产（布、服装、鞋、家具）明显落后于计划完成的任务，农业仍不能满足国家对食品和轻工业原料的需求。

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需要完全动员国家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根据今天"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的调查，经历了1945—1953年的人把这段时期评价为战后最艰苦的时期。

供思考的信息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朱加什维利）这个人乃是我们国家政治和历史上一个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无论在他领导国家期间还是死后，其所受到的评价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俄罗斯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伟大卫国战争的组织者和英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则是邪恶的化身。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最为著名的一个评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丘吉尔所说的话。丘吉尔绝对不是斯大林

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斯大林评价的另一个极端是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А.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的看法，他的父亲是 1917 年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著名参与者，后来受到镇压。他的说法是："血腥的暴君。"

在斯大林生前，对他的第一种评价占主导地位；在他死后第二种评价占上风。这首先是由于斯大林在 1930—1940 年代组织政治镇压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揭示斯大林和他的俄罗斯权力上层的先辈们在政策上的相似特征。

对最近 500 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三种不同形式的俄罗斯国家形态，在外部形态具有本质差别的情况下，其政治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是——莫斯科公国（15—17 世纪）、俄罗斯帝国（18—20 世纪初）及苏联。这些国家特征的相似性是由它们建成时所依据的政治—组织原则的相近性决定的。

这些原则中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以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并使一切政治力量从属于自己。

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那些能够实现这样集中的人被推出来作为国家的第一人。同时应当指出，这种集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统治的变形。主要的变形是——把对强权的现实需要变成对强权最大限度的服从，并逐渐穷尽这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都符合这种论断。早在 19 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康·德·卡韦

林（К. Д. Кавелин）就指出，“彼得的统治是约翰[1]统治的继续”。斯大林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熟知俄罗斯历史并景仰上述历史人物，认为他们是自己的老师，而他也有意识地遵循先辈们处世的“历史规则”。

因此，仅仅从俄罗斯统治者的性格中寻找权力集中的根源是错误的（同样，如果否认国家第一把手的个人品质对形成及行使这种权力所具有的影响也是错误的），仅仅从俄罗斯的大公、皇帝，抑或总书记的人格—心理特征来解释俄罗斯权力传统的稳定性也是错误的。这样就会像著名哲学家布·帕斯卡[2]说的一句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假定式格言：假如克娄巴特拉[3]的鼻子再短点，世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实质上，斯大林内外政策的目标是重建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和地域意义上的帝国。1945年9月，当对日作战结束后，当俄国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中丢失的领土又回到苏联版图时，斯大林所说的一句话意味深长：“这一天，我们，老一辈的人们，等待了四十年。”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革命前的政治活动家帕·尼·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认为，斯大林实际上实现了“白俄运动的理想”。正是这一点促使米留科夫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号召俄罗斯的白俄侨民在战争中站到苏联一边。

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伊·亚·伊利英（И. А. Ильин）坚决反对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这个观点，他对斯大林政策的看法耐人寻味。他写道：“苏联不是俄罗斯。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一点成就……也不是俄罗斯民族的成就。”作为苏维埃主义坚决的反对者和复兴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伊利英认为，实现这种可能要具备三个基础性条件：东正教、君主政体以及在所有加入帝国的民族绝对

---

① 约翰，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注

② 布·帕斯卡（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作家、数学家。——译者注

③ 克娄巴特拉七世（公元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王。——译者注

平等的条件下实行的单一国家体制。正是斯大林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他实际上恢复了个人崇拜形式的君主政体；巩固了信仰——但不是信仰上帝，而是新的，红色的信仰：共产主义在早期苏维埃时代成为具有自己“信仰标志”和拥有自己受难者的一种新信仰。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与列宁民族自治权力思想相对立的近似单一制的国家。

在 1930 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不可避免的对德大战、战争的进程，以及后来加速战后经济的重建，这些事实成为苏维埃时期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这决定了国家战前工业化和战后经济重建需要加速进行。所以外国观察家并非偶然地将 1930 年代称作“争先恐后地同时间赛跑”年代。1931 年 2 月斯大林提出了在缺乏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1941 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

迫于战争威胁而采取的“争先恐后地同时间赛跑”不仅决定了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不够，而且加剧了现代化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无论总体积累还是国防开支在预算中所占份额都注定会高得过分。根据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亚·格·兹韦列夫（А. Г. Зверев）的说法，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也只积累黄金储备，而不曾卖过 1 克黄金。这意味着，如同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一样，在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缺少外部借贷的情况下，为实现发展而动员的力量和资金都达到了极限。

不仅积累定额的数目，而且劳动的强度和被迫处于不断动员状态中的人力资源的使用程度也超乎寻常。

---

①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4 页。

实际情况

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人费·安·谢尔盖耶夫（Ф. А. Сергеев）（阿尔乔姆（Артема））的儿子回忆道，“每个企业的厂长当时都有一个盖了5个火漆封印的袋子。这个袋子又装入另一个也封起来的袋子里。厂长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能打开袋子。里面写着战争状态下该怎么办……这些袋子分别写有，谁在哪里为自己准备好根据地：谁去伏尔加，谁去乌拉尔，谁——到乌拉尔河对岸，谁在战争期间生产什么种类的产品。”他的母亲Е. Л. 谢尔盖耶娃是纺织综合体的厂长，她在1937年就有这样的袋子了。



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特别是在为保障国家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力方面会更加灵活，正如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所做的那样。

因此，通过对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分析便可以断定，苏维埃时期会重复俄罗斯过去所经历的众所周知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严厉的军事化的政治体制就扮演了在解决紧急状态下的紧急任务的工具的角色，而该体制本身也成为在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时期形成的体制的一种变形体。

这为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尼·亚·别尔佳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将俄罗斯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与意义同俄罗斯民族思想联系起来提供了依据。1937年别尔佳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俄罗斯共产主义产生与意义》中写道：“在俄罗斯第三国际成功地取代了第

三罗马，并且第三罗马的许多特征都转移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不是奉行国际主义的思想，而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想。”因此苏维埃国家乃是“约翰·格罗兹内（东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思想的体现，是俄罗斯历史上陈旧化了的国家的新形式……俄罗斯共产主义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传统，是旧的俄罗斯密赛亚思想的变形”。

许多俄罗斯海外的思想家都赞同这种观点。哲学家格·彼·费多托夫（Г. П. Федотов）在描述苏维埃体制形成时期的特征时，认为苏维埃体制和彼得大帝时期国家有相似点，他写道：“……俄罗斯新制度的许多特征都直接使我们联想到”18世纪，认为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及1918年将政府搬到莫斯科就是具有“象征性的举动”。

这种情况可以引用诗人们的诗句来说明：

> 什么改变了？是旧床头的标记。
> 所有道路上刮着一样的飓风，
> 政治委员满脑子专制主义糊涂思想。
> 而沙皇发动了革命。
>
> ——亚·沃洛申

> 如果说在列宁那里存在旧教徒的呼唤，
> 政府的法令里就会反映出修道院长的声音，
> 就仿佛在《苦修者答新修士问》中，
> 寻找崩溃的原因。
>
> ——尼·克柳耶夫

当然，斯大林的个性特点使苏维埃时期具有特别的冲突和紧张感。同时代人的证明和后来政治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一种对事实

非白即黑的理解认识（伴随着对周围人进行非敌即友的分类认识），对周围环境的敌意感、严酷性和要占据支配地位的欲望是斯大林性格中决定性的特征。

但是斯大林个性的心理特征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客观情况所起的作用相比，更准确地说，是处于第二位的。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要求有相应的权力制度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这些因素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斯大林所实现的变革的性质，按其规模，这一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很多观点如此不同的作者，像列夫·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和格奥尔基·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 Федотов），美国的政治学家斯蒂文·科恩和罗伯特·塔克，都一致承认，斯大林的变革完全具有革命性意义，尽管他们从完全对立的立场来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对于此，研究家们指出，斯大林改革的十余年，尽管具有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根源，然而“并不是它的预定模式的继续，而成为有独立特征和进程的革命。”（罗·塔克）

这一革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利用了彼得改革的政治经验。彼得一世的目标是吸收所有阶层的居民来为国家服务，包括世袭贵族（也就是保证一切阶层对国家尽义务），发展和建设本国的工业、军队和海军，以使国家获得大帝国地位，并且保障用唯才是举的标准（即对国家贡献的程度）来组建管理集团。

关于在苏联时期实行一切阶层对国家尽义务的原则，可以这些事例来说明。在卫国战争时期直接参加作战的不仅有平民家庭的子弟，而且还有那些今天被称为“黄金青年”的人们，许多奔赴前线的人们没能再回到家里。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Яков Джугашвили）、米·瓦·伏龙芝（М. В. Фрунзе）的儿子铁木尔（Тимур）、阿·伊·米高扬的一个儿子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尼·谢·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Леонид）、克·叶·伏罗希洛夫的侄子尼古拉·谢尔巴科夫（Николай

Щербаков）和许多其他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弟一样牺牲在卫国战争的前线。А. Ф. 谢尔盖耶夫（А. Ф. Сергеев）对此证实道，“当时住在鲁布廖夫大街的许多家庭都收到了阵亡通知书。”

至于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而使这些任务得以完成，包括使用了政治镇压这一不仅针对普通公民，而且还针对管理层精英的动员手段。

尼·康·巴伊巴科夫（Н. К. Байбаков）的回忆录《在政府工作的四十年》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说明当时是如何采用严厉的手段对待管理精英。1942 年，时任石油工业副人民委员的巴伊巴科夫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他前往北高加索，在苏联军队撤退时炸毁采油场。斯大林下达的任务不同寻常——他是这样指示的：“必须竭尽全力做到不给德国人剩下一滴油……因此我警告您，如果您给德国人留下哪怕是一吨石油，我们将枪毙您。但是如果您毁掉了采油场，而德国人没有来，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也枪毙您……”

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

因此，在党的十七大以后选举产生的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候补成员在 1930 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大量历史证据证实了“大清洗”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老的列宁近卫军这一事实：“首先是列宁一辈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消灭掉了，”——尼·赫鲁晓夫回忆道。据遭受多年监禁的女作家叶·金兹布尔格（Е，Гинзбург）证实，那时人们把参加共产党已经看成是一种“累赘”，并且在 1937 年之前，这种想法“已经在所有人的意识里根深蒂固了”。因此，金兹布尔格在牢房里的邻居，年轻的研究生伊拉，固执地强调自己属于无党派，她认为，同党员相比这一点给了她极大的优势。

战后时期的政治镇压目标的性质是类似的。所以，在 1940 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受害人中有联共（布）第二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А. А. Кузнецов）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伊·罗季奥诺夫；还有一些部长们、一些大党组织的书记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领导。“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人数约有 2000 人，他们中许多人被枪毙。国内和国外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 1930—1950 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统治阶层这一事实。

实际情况

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Р. Медведев）就此写道：“1940 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当然……在斯大林年代的镇压中没有谁是保了险的，并且正是党和国家机构上层人物在那个时代遭受了特别残酷的清洗……‘大恐怖’的性质主要针对共产党，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

必须指出，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开辟的先河，使后人把大恐怖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不容他人意见等等个人品质的原因。正如当时著名诗人达·萨莫伊洛夫（Д. Самойлов）说道：“只有是一个完全的非决定论者①，才能相信，1937 年大清洗唯一的历史目标是巩固斯大林的政权，他贪图功名、追求虚荣和残酷性的力量就能够任意扭转俄罗斯历史的方向，他一个人就制造了 1937 年骇人听闻的现象。”



① 非决定论：非决定论者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的选择、意向、决定、行动等等都不受客观社会关系的制约，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译者摘自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7 页。

当今的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由于企图保障作为主体的领导层能极度有效地动员社会完成任务、获得成就，要注意到这当中使用强制手段的合理因素。斯大林遵循了彼得一世的逻辑：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可能，必须要求执行者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向当时人民委员提出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和具有高强度的工作能力，这并非偶然。据尼·康·巴伊巴科夫回忆，在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的领导时，斯大林简要地说出了对人民委员的主要要求。这就是——保持"斗牛似的紧张状态"，乐观主义和健康身体。

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即无条件忠实于上级领导和在遵守纪律方面无懈可击的管理阶层。使用工资级别评定表（类似彼得一世时期的官阶等级表）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因为根据水平、能力等级的不同而拟定的劳动工资差别相当大。

格·彼·费多托夫写道：斯大林很注重人的素质：斯大林真正的支柱是他称之为"出色的人"的阶级，这是那些凭着自己的才能、毅力或无耻行径投入革命战争浪潮而得以升迁的人。党票和过去的功劳现在没有什么意义；善于做人与政治上的忠诚可靠结合起来——就有一切。加入这个新的统治阶层的是那些凭借无原则性经受住考验的党的精英、红军指挥员、国内优秀的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和艺术家。斯达汉诺夫运动确立的目标是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的上层人物纳入到这一新特权阶层中来，以高薪引诱那些精力最充沛和能力最强的人并把他们放到其同事难以企及的高度。斯大林试探地、下意识地重复着斯托雷平把赌注压在强者身上的做法。但因为非私有的、即国有的经济是新的竞争舞台，于是斯大林造就了一个新的公职阶级，或者说高于纳税人的阶级，重复着更加久远的莫斯科公国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农奴制似的社会主义软弱的一面——缺乏个人的、利己的刺激劳动的动力。斯大林开始寻找与资本主义利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竞争力。他通过全国形成的巨大规

模的报酬差别等级表，通过拉开生活档次的办法，通过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办法，通过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去寻找这种竞争力——最后，在新的等级制度的代表中寻找。“出色的人”这一名词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整个等级阶层的纲领。

在战后主管了几十年苏联外交政策的安·安·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到说明支持“强者”方针的例子。葛罗米柯回忆起，他，一个戈梅利州农村出生的人，明斯克农业学院的毕业生和莫斯科的研究生，是怎样来到苏联外交部工作的。

实际情况

“我在首都没有任何‘后台’，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的。有人说，莫洛托夫是我的靠山。当然，他曾经推荐我去做外交工作。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什么委员会在同样的不多的人中单挑选了我。当我回忆起那次谈话，便确信一个观点，那就是，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我的社会出身，而是对‘您最近读了什么英文书’这一提问的回答。当我马上说出《富人，穷人》时，我已经感觉到，我抓住了这个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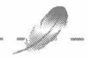
就这样，正如19世纪俾斯麦总理以“铁和血”的手段把德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斯大林也是如此以残酷和无情的手段巩固苏维埃国家。他将巩固国家，包括巩固国家工业和国防实力视为自己的政治原则之一。他的女儿斯·阿利卢耶娃（С. Аллилуева）的回忆录可以用来间接地证明这一点。她说，每当父亲看到她的衣服时，一辈子都是那样满脸不高兴地问她一个问题：“你穿的是外国的吗?”——当我回答说“不，是我们国产的”时候，他才显出喜悦的神情。

斯大林权力高度集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1937 年访问过莫斯科的德国作家利・福伊希特万格看到有那么多斯大林的肖像时曾大吃一惊。

根据利・福伊希特万格以及阿利卢耶娃对此的证实，这些对领导表现景仰的形式激怒了斯大林。

实际情况

斯・阿利卢耶娃写道："父亲一向受不了人群向他鼓掌和大叫'乌拉'的场面，——他气得面孔抽搐着……'咧着大嘴大喊大叫，像一群笨蛋！'——他气愤地说。当我有机会……读到或听到说我父亲生前认为自己好像是上帝时，——我感到奇怪，相信那些近距离了解他的人们会确认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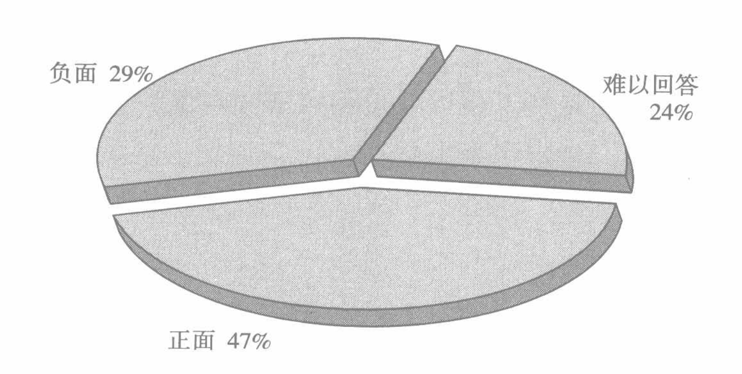


的确，开始的时候斯大林非常实用主义地对待崇拜自己的现象，将群众的支持视作一种政治斗争的资源。他说："要知道……千百年来俄罗斯人民是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人——是皇权主义者。俄罗斯人民，尤其俄罗斯男人已经习惯了，以某个人为首。"但是，众所周知，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从俄罗斯历史得知，一个长久在位的人会变得多么腐败。这一点包括彼得一世和叶卡捷林娜二世这样杰出的统治者的经历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斯大林从开始令他恼怒的个人崇拜到渐渐地习以为常。领袖最亲密的战友维・米・莫洛托夫承认，开始时斯大林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但后来他就喜欢受崇拜了："他在头些年非常克制，但后来……就骄傲起来。"

2006 年 2 月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意测验可以评价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心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您认为：如果从总体上评价，约・维・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由此可见，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相互矛盾的评价都有其明显的理由。一方面，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有另一方面后果。他取得的成就——就连领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个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一些社会阶层整个被完全消灭——富农、城市小市民、神职人员、旧知识分子。而且除此之外，一些完全忠诚于人民政权的群众时而也受到严酷法律的迫害。斯大林年代也谈不到生命安全。生活水平也是低的，特别是在农村。这一切都没有能促进国内精神面貌的改善。

第2章
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4年）

8. 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伴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历史上向经济与社会顶峰突击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全面动员国家力量时期（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终结。这里的动员并不仅仅是征兵。它首先指的是，要求集中人民的一切力量解决过分紧张的、但又是极其需要和极其复杂的任务。这个动员性战略曾保证了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但是这种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效力，导致人民过度劳累。任何民族也不可能为了即使是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而让一代又一代人付出生命。因为这是与人性本身相违背的。

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来说，斯大林的逝世是真正的悲剧。1953年3月5日以后，宣布全国举行四天哀悼。全国各地发来唁电，一些城市举行万人追悼大会。葬礼日，有无数的人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来到圆柱大厅，向送别亲人那样，同深受爱戴的领袖告别。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他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缺乏组织的送殡行列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许多人在特鲁布纳亚广场被人群踩死踩伤。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棺椁与列宁的棺椁并排安放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

斯大林的逝世使党和国家的精英层感到松了一口气。许多人认为，躲过了清洗。斯大林的离去导致国家30年来第一次面临新的

情况——苏联没有了公认的领袖。斯大林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担负起国家命运之大任，甚至于不敢指望得到这一权力——在最高领导人中谁也不会承认新领袖的权力。因此，当时提出了所谓集体领导的思想。

斯大林逝世的当天，三个权力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召开了会议。会议确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分配，集于领袖一人的大权分散开来。在没有明确指定领导人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三位成员——拉·帕·贝利亚、格·马·马林科夫和尼·谢·赫鲁晓夫被推到了前台。在斯大林葬礼的那一天，全国都看到了这三驾马车并听到了他们致悼词。

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马·马林科夫成为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成为其副手的有：拉·帕·贝利亚（重新组建的内务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外交部长）、尼·亚·布尔加宁（国防部长）、拉·莫·卡冈诺维奇（监督工业发展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由克·叶·伏罗希洛夫领导。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人（10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有格·马·马林科夫、维·米·莫洛托夫、拉·巴·贝利亚、克·叶·伏罗希洛夫、尼·谢·赫鲁晓夫（唯一一位不担任国家职务的主席团成员）、尼·亚·布尔加宁、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米高扬、马·扎·萨布罗夫（М. З. Сабуров）、米·格·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

集体领导没能保持长久，因为其中有完全对立的力量，而且一些人显然追求一人执政。机会最小的是尼·谢·赫鲁晓夫，他手中没有强力部门，而他本人又有些土气、文化素质不高。为了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自己，党内“志同道合的人”采取了政治阴谋、暗中斗争和勾结手段。关注此事的观察家、英国首相温·丘吉尔将斯大林逝世至尼·谢·赫鲁晓夫取得政权这一时间段形容为“剑拔弩张”。这场斗争一直在延续，历经了三个阶段。

8.1　第一阶段：1953 年 3—6 月

起初，争夺权力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表示无条件地延续从前的“强硬”政策，相反，新领袖们都谈改革、谈制度缓和、谈制度的人本化。

一开始，拉·帕·贝利亚试图担当改革者的角色，他对许多人来说代表着以往的镇压方针。1953 年 3 月 2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赦免刑期在 5 年以下的所有囚犯。特赦（实际上没有涉及政治犯，政治案件方面的刑期通常在 10 年以上）的主要结果是释放了大量囚犯（1953 年 3—6 月为 90 万），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在城市里制造了导致犯罪的紧张环境。4 月，先后为“医生谋杀案”和“明格列尔案”的全部人员平反。发布了通告，认为过去对他们采取了“苏联法律不准许的和严格禁止的侦讯方式”。在这方面就是期望能获得苏联社会一部分人的同情。同时，这一时期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肯吉尔（哈萨克斯坦）的苦役集中营发生的政治犯骚动遭到无情的镇压，而且为了镇压肯吉尔的起义，当局不得不动用了坦克。

正是贝利亚，这个多年执掌惩罚机构权力的人，第一个提出在过去的时期内这些机关的违法问题；同时他宣称，党应该抓干部和宣传工作，而其他所有工作应由部长会议负责；此外，他提出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必须考虑共和国的民族特点，只任命在该共和国出生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在经济领域，贝利亚批评以往的粗放方式发展经济，指出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效率，必须搞物质刺激的办法。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建议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宣称“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德国，那里有没有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无所谓”。

贝利亚的积极态度引起格·马·马林科夫和尼·谢·赫鲁晓夫

对其“新方针”的警惕。贝利亚过分积极的立场以及要在国内获取威望的明显企图遭到了抵制，并没有得到党和国家干部、军人和国民经济部门负责人的响应。少数人组织了一个吸收军人参加的密谋活动。格·康·朱可夫（别的不说，他同贝利亚也有个人恩怨）负责领导解除贝利亚职务的行动。1953 年 6 月 26 日，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

在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1953 年）上，贝利亚被开除出党，并作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被撤销一切职务。逮捕贝利亚之后，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进行了清洗和侦查。对贝利亚提起的公诉是按照过去年代的“好”传统，贝利亚同样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背叛祖国和试图推翻共产主义制度。1953 年 12 月，贝利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贝利亚对“人民的敌人”所使用的方法用到了自己身上。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与贝利亚关系最密切的工作人员：弗·尼·梅尔库洛夫（В. Н. Меркулов）、弗·格·杰卡诺佐夫（В. Г. Деканозов）、波·扎·科布洛夫（Б. З. Кобулов）、谢·阿·戈格利泽（С. А. Гоглидзе）、帕·雅·梅希克（П，Я. Мешик）和 В. Л. 弗洛济米尔斯基（В. Л. Влодзимерский）。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时代的所有镇压都被“清算”到贝利亚身上。继续进行平反工作的方针得到了支持，“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也正式得到了赞同。

8.2 第二阶段：1953 年 6 月至 1955 年 1 月

现在，尼·谢·赫鲁晓夫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对手是格·马·马林科夫，后者是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斯大林所“提拔的人”和最亲密的助手之一。马林科夫于 1953 年建议并实施了减轻集体农庄庄员生活负担的农业改革，为此而提出的任务是：“……最近 2—3 年内在我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1953年8月军事项目减少了一半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补偿因降低食品价格（1953年底，面包比1948年便宜一半）和日用品价格而带来的财政损失。多年以来，国家还是第一次援助农民。在全会上作报告的是尼·谢·赫鲁晓夫，但在民间却将所发生的事情同马林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马林科夫上了台，大饼天上掉下来。"

然而，也同贝利亚的情况一样，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开始担心这位相对来说更年轻而自负的领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1953年9月，尼·谢·赫鲁晓夫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他依靠自己所控制的党的机关发起了猛烈进攻。在中央一月（1955年）全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指责马林科夫把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指责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够成熟，企图收买人心。

马林科夫在明白大多数中央委员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后，就提出辞去政府主席职务（他被调任电力部部长职务）。新的部长会议主席由尼·亚·布尔加宁担任。当时接近赫鲁晓夫的格·康·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在尼·谢·赫鲁晓夫的倡议下，建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20世纪30—40年代镇压党和苏维埃活动家的所有材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决定在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苏共中央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Н. М. Шверник）、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П. Т. 科马罗夫（П. Т. Комаров）。主持委员会工作的是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П. Н. Поспелов）院士。

1956年2月14—25日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后为被镇压者平反的工作全面铺开。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尼·谢·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指责斯大林犯有大

量罪行和违法行为、背离了“列宁的领导原则”。但是，没有触及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而斯大林的许多无情措施（如集体化或与党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受到了赞扬并被证明是正确的。赫鲁晓夫试图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把大规模镇压看做历史的偶然，这在1956年6月30日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该决议对斯大林体制的罪过所做批判的严厉程度远不如赫鲁晓夫那个激昂的报告。

“秘密报告”被印制了100万份，并且在全国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这样，关于斯大林的罪过问题，向苏联的全体党员作了通报，——实际上也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意味着思想和政治空气发生根本改变。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为革新和人文主义的标志，唤起了整整一代人投入到积极的社会生活之中。十年以后，“二十大的产儿”成为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社会运动参加者的通称。

由于“秘密报告”的原因，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对赫鲁晓夫表示不满。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二十大完全持反对立场。他们中间甚至流传这样的观点，即苏联领导人放弃共产主义道路，并且开始修改（“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来，在中苏对抗加剧时期，在中国的宣传中“修正主义者”这一术语成为苏联领导人的通称。）

在苏联也发生了抗议“秘密报告”的示威活动。在第比利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被看做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

实际情况

电影导演格·达涅利亚（Г. Данелия）回忆说：“次日清晨（群众集会持续了三天），纪念碑前开来一辆卡车，斯大林和列宁在车上拥抱而立——哥里市话剧院将身着西装、化装成无产阶级领

袖的演员送到群众集会上。群众集会的主持人对着麦克风宣布：我们在哥里的支持者派来了列宁和斯大林，好让大家看到列宁和斯大林是相互爱慕的！而且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让列宁握一握斯大林的手！——人群中有人喊。于是列宁握了斯大林的手。让他再吻一吻！——人群中有人要求说。于是列宁吻了斯大林。——让斯大林也吻一吻列宁！——人群中有人要求说。于是斯大林吻了列宁。列宁和斯大林在卡车上站了一整天。列宁有时向前伸出右手［像演员舒金在影片《列宁在十月》（Ленин в Октябре）里所做的那样］并且呼喊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万岁！'而斯大林则不时地吸烟斗，并且慢慢地在卡车上来回踱步［像演员格洛瓦尼在影片《攻克柏林》（Падение Берлина）里所做的那样］。"



集会者要求赫鲁晓夫下台，喊出了民族主义口号，后来开始在第比利斯的主要街道——鲁斯塔维利大街构筑街垒。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曾有人员伤亡。

两年内，也就是1956年和1957年，根据刑法"反苏维埃的"第58条，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从斯大林逝世直到1988年以前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

因"谈话"而受到惩处的人大多是不反对这个制度的人。尽管刑法规定了对反苏的鼓动和宣传要进行惩罚，但没有规定因发表类似的意见而要受惩处，那么在指控中就一定要写上这样的话："在自己周围人中系统地讲述……"因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能够，比方说，在与朋友的节日宴席间、在街坊邻居或同事中间对政策、国际事件、近期的政府决议发表意见，对日常生活（物价高、工资少、商店里什么都没有、排队、得不到住房、在集体农庄里活儿干得多，但生活贫困）发发牢骚。这种谈话的诱因往往是日常生活上的冲突或导致人们情绪激动的偶然性事件，如降职、

官僚主义的办事拖拉、商品短缺（“找遍全城也买不到所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同妻子吵架，——于是，失望了的苏联公民就开始骂当局，并就像官方所指控的那样，诅咒“苏联的物质生活条件”。

然而，总体来讲，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和决议是较为积极地被接受了。被镇压的苏联公民的平反运动快速开展起来了，数百万人从“劳改营”被释放。为斯大林时代被处决的许多活动家恢复了名誉。如，承认对米·尼·图哈切夫斯基（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叶·彼·乌博列维奇（И. П. Уборевич）、彼·约·亚基尔（П. И. Якир）等苏联高级军事官员的判决是虚假的。1956—1957年，撤销了1941—1944年间流放被镇压的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决定。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恢复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车臣人的民族自治。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则除外，50年代也没有给这些民族正式平反。

毫无疑问，停止大规模镇压对苏联所有居民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失去了对精英层不断地施加压力，就导致了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社会高层（党的权贵阶层）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一阶层内人员的升迁开始越来越不取决于人的业务素质，而仅仅取决于他对上级领导的个人忠诚。在苏联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仿等级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党的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中层就越来越多与基本的居民群众脱离开来。

8.3 第三阶段：1955年1月至1957年6月

一部分党的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竟含糊其词地谈到的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能够渐渐破坏并摧毁苏联社会主义。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引起格·马·马林科夫、维·米·莫洛托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不满，因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对20世纪30—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负有责任。

他们需要借口，以换掉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借口找到了。1957年5月22日，尼·谢·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时提出了成为他后来全部活动的一种象征和陷阱的口号：“在三年内，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句口号立刻得到党的宣传机构的支持。这个讲话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1957年6月18—21日的会议上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理由之一。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列举了统计数字，指出该口号完全不现实。莫洛托夫支持他们。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反对赫鲁晓夫。但是，第一书记的反对者接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得以使力量的平衡有利于自己方面，为此他利用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而这个人数要比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人数多得多。在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的帮助下，中央委员们被召集到莫斯科，于是6月22—29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出现在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前，而这个中央委员会也是受赫鲁晓夫操控的。

大多数中央委员站在赫鲁晓夫一边，这并不奇怪，要知道当时他们之中大约60%的人是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党委书记。尼·谢·赫鲁晓夫是第一书记，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靠山。党委书记们不完全信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怀疑这些人会恢复国家安全部门对精英人物的控制系统。党的地方领导人再也不希望经受斯大林时期的那种恐惧。根据195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叛乱者”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由忠实于赫鲁晓夫的人（进入中央主席团的有格·康·朱可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被调离原岗位，并被“荣誉流放”——维·米·莫洛托夫成为驻蒙古大使，格·马·马林

科夫成为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发电站站长，拉·莫·卡冈诺维奇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联合企业经理。列·伊·勃列日涅夫、弗·罗·科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叶·阿·福尔采娃（Е. А. Фурцева）等那些没有过分的权力野心或个人忠于赫鲁晓夫的人得到了国家的重要职位。

不久，赫鲁晓夫就甩开了过于强大的盟友——格·康·朱可夫。1957 年 10 月，当时朱可夫正在南斯拉夫访问，赫鲁晓夫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来自格·康·朱可夫方面的“波拿巴主义危险”。对于该不该等元帅返回莫斯科这个有道理的疑问，尼·谢·赫鲁晓夫回答说：“少数服从多数。”撤换国防部长的决议通过了。该决议还需要苏共中央全会的批准。

在 1957 年 10 月 29 日的中央全会上，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讲台，于是主要的指控和主要的担心的轮廓就被描述得越来越清晰了：创建了培养破坏者的学校，知道这所学校的总共只有三个人：国防部长朱可夫、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Штеменко）和学校校长马姆苏罗夫（Мамсуров）。那些曾经帮助赫鲁晓夫上台的军人们现在被他看成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危险人物。

对朱可夫的所有其他指责（搞个人崇拜、无礼和傲慢）都不过是添油加醋。谁也不想听朱可夫的解释。1957 年 11 月 3 日，《真理报》上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议。决议通报说，朱可夫元帅是倾向于冒险主义的、没有政治作为的活动家，因此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新的国防部长是罗·雅·马利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元帅。

这样，赫鲁晓夫没有进行大规模镇压、没有处决政治对手便得以成为苏联的唯一统治者。这个政权也就正式地归他掌控——从 1958 年 3 月起，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之外，他得到了政府首脑的位子。“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促使赫鲁晓夫在党内交锋中取得成功的是，他集中体现了大多

数党员干部害怕镇压和痛恨斯大林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苏联共产党之上的权力体制这种愿望。在解除了莫洛托夫及其战友的职务，以及消除了来自朱可夫元帅方面的力量威胁以后，赫鲁晓夫建立了一种有限的民主。尽管党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正是在党内出现了建立在中央及地方争夺权力的联盟和派别、院外活动的可能性。这种体制较斯大林的直接专政统治要灵活得多，但在最“顶层”的控制力要弱得多。结果，正是逐渐落实党内民主原则，使赫鲁晓夫丢掉了第一书记和苏联领导人的职位。

同时代文献资料

■ 1953 年 12 月 23 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法庭查明，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产阶级卖力，组织敌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阴谋家们的罪恶目的在于，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政权，消灭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统治。约·维·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指靠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全面活跃，开始加紧行动，以实现其反苏背叛阴谋，这使人们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揭穿拉·帕·贝利亚及其同伙，并制止他们的罪恶活动……1953 年成为苏联内务部长后，被告人拉·帕·贝利亚，在准备夺权的过程中，开始积极地将阴谋集团成员提拔到内务部的中央机关及其地方机构的领导职位上。贝利亚及其助手迫害那些拒不执行阴谋家罪恶指示的正直的内务部工作人员。

■ 1953 年 12 月 23 日关于拉·帕·贝利亚之死的证明文件

今日 19 时 50 分，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主席于 1953 年 12 月 23 日签署的第 003 号命令，在苏联总检察长、司法部门一等官罗·安·P. A. 鲁坚科（P. A. Руденко）和陆军大将基·谢·莫斯卡连科（K. C. Москаленко）在场的情况下，由我，特别法庭警

备长帕·费·巴季茨基（П. Ф. Батицкий）上将，执行了特别法庭对犯人的死刑判决——处决贝利亚·拉夫连季耶·帕甫洛维奇。签字：帕·费·巴季茨基、罗·安·鲁坚科、基·谢·莫斯卡连科。

■ 摘自195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报告

目前，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全体人民的支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实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以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党内生活中恢复列宁主义准则，消除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扩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发扬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巩固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则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持久的和平；正当这个时候，即在所有这些方面已经取得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的重大成就的时候，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却公开反对党的路线……

近三四年内，党实行了纠正个人崇拜所产生的错误和不足的坚定方针……现已暴露并被彻底揭露的反党集团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苏共二十大所赞同的这一方针。这个集团实际上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这一列宁主义方针，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苏联与世界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及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这个集团顽固地反对并且力图破坏像工业管理的改组和在各经济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为全党和人民所赞同的重大措施。

■ 摘自1957年10月29日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

要知道，贝利亚也有反革命破坏团伙，就在逮捕贝利亚前，贝利亚还召集匪徒，他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哪些人要掉脑袋了……国防部长也正在以他的性格干这样的事情……记得在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里两个朋友这样唱道——我们不是早已成为朋友了

吗？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和朱可夫不是早就在克里米亚的大海里一块儿游泳了吗？但就是在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去打鹿的时候，我在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你：我看着你，观察你并对你的居心险恶感到惊讶。你会说，为什么我没告诉你？朱可夫同志，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谁说这件事。然而如果你说了，你就是一个傻瓜。我不想当傻瓜，如果我对你讲了，朋友，这没有好处，你就会小心谨慎，并做完事情，而你是有能力做的。我打算召集中央委员会来研究。说起来的话，我从克里米亚到基辅去打猎不是偶然的。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打死，我是在那里猎捕政治猎物。我想同军区司令员们见面，想听一听他们怎么说，同他们谈谈，然后在发言时抛出难对付的人。我想，司令员们多少正确地理解了我。应该承认，我很满意，你当时没有在场，因为你不是按照党员的标准在行事。



9. 经济政策与“建设共产主义”的方针

由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加速发展，苏联变成了能够战胜欧洲工业大国德国的强大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苏联经济正在形成。这种经济的特点在于，其所有部门都服从于国家，其管理则以行政命令体制为基础。1953年以后，苏联经济仍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经济中的强制手段减弱了，而应有程度上的物质刺激尚未出现。斯大林的遗产也表现在轻视农业和对待农民的态度上。斯大林说过：“一个农民只要卖掉一只鸡，就可以活下去。”摆在新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寻找刺激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新方法。新的时期需要有新的生活条件、新的增长动因。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农业

状况问题。该报告分析了农村的现状，指出了在战争过程中忍受困苦的农村所面临的困难。农业灾难的最重大问题被揭露出来——对农民持续数十年的“掠夺”，也就是通过集体农庄按极低的价格、实际上是无偿地向国家义务提供产品的体制，从农村不仅夺走所有剩余产品，而且夺走部分必需品。

实际情况

对 1953 年 9 月以前农业所面临的状况，尼·谢·赫鲁晓夫是这样评价的：“我举一些数字。1940 年粮食收购量为 22.25 亿普特，而 1953 年仅为 19.5 亿普特，也就是减少了 3.75 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实际工资的提高，谷物产品的消费量年复一年地增多……无论是粮食谷物，还是谷物饲料作物，出口需求量都在增加，但是由于粮食不足，1954 年的出口量只好定为 1.9 亿普特（312 万吨），当时的出口需求量为 2.93 亿普特（480 万吨）。”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尼·谢·赫鲁晓夫列举了农业落后的原因：

·集体农庄庄员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缺少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收购价格低；

·违反了将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表现是压制个人副业，对副业征收高额税；

·农业计划的高度集中（集体农庄每年要完成 1 万项指标）。

报告中提到，对农业来说最好的一年还是 1928 年。1949—1953 年的谷物总产量只比 1909—1913 年的水平略高一些。畜牧业的状况非常严重。许多农户将因饲料不足而变得虚弱的母牛拴上，以防它们跌倒。从板棚顶上取下干草来喂牲畜，也是常有的事。

1953年农业歉收之后，情况很明显，不进行深入改革，要提高农业效率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困境影响着全社会。在城里，为了买面包要排很长的队。赫鲁晓夫清楚地看到，解决粮食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无论如何都要去养活曾经受过难以置信的考验的人民。

提高农业生产率需要化肥、灌溉、技术装备，也就是所有那些不可能在短期生产的东西。因此，1954年2—3月的中央全会决定，在最短的期限内开垦出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荒地。这样，农业继续以粗放方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荒地上，实际上取消了1953年9月关于向苏联其他地区增加农业投资的决定。

为了开垦荒地，最初几年就向那里派遣了30多万名志愿者，基本上是年轻人。他们必然遇到的困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置信的，有时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帐篷里睡，在地里吃饭。

实际情况

列·伊·勃列日涅夫在《垦荒地》（Целина）一书中讲述了第一批垦荒者的事情，其中包括利沃夫建筑学院函授大学生瓦西里·拉古佐夫："他是第一批来到'基辅'国营农场的人之一，开始做施工员的工作。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好同志，快乐的、好交往的人，很快就在第一批垦荒者当中赢得了威信、尊重和喜爱。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拉古佐夫随一支队伍从站里运送用于农场第一条街道的装配式房屋。不料，一场罕见的暴风雪突然袭来，后来持续了几天几夜。队伍无法前行。瓦西里决定去寻求帮助。他一个人走了，迷了路，牺牲了。这是一位勇敢的、意志坚强的人。这就是在他的衣兜里发现的一封信：'给发现这个小本子的人！亲爱的同志，烦请将这里写的东西转交至利沃夫市冈察洛夫街15号1号住宅的拉古佐娃，谢拉菲玛·瓦西里耶芙娜。我亲爱的西莫奇卡！不

要流泪。我知道，你会很痛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赶上了这样的事。周围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我在乱碰着走。暴风雪在消退，但看不到地平线，无法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我不在了，请把儿子们培养成人。哎，生命，多想活着！热烈地吻你。你永远的瓦西里。'他意识到自己将要牺牲了，又补充了几句话——用已经冻僵了的手指：'我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拉古佐夫和亚历山大·拉古佐夫，我亲爱的孩子，伏乌什卡和萨顺卡！我去垦荒，是为了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美好。我希望你们继续我们的事业。最主要的是应该在生活中成为真正的人。热烈地亲吻你们，我亲爱的。你们的爸爸'。"



五年间，第一批到达的垦荒者开垦了4200多万公顷土地。初期，这带来了不坏的结果，但后来问题出现了。由于违反科学使用方法、急切而草率地开垦荒地，原本很高的土壤肥力迅速降低。其结果是土壤侵蚀：遭受1960年和1965年的数次风沙之后，哈萨克斯坦约有400万公顷土地丧失殆尽，而且还有1200万公顷被毁坏，这些加起来几乎占荒地的一半。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便很清楚地看到，收成最好的年份只有1956年。同时，由于开垦荒地，谷物生产区距离消费区越来越远，从而加剧了苏联本来就很尖锐的交通发展和道路建设问题。1954—1965年间，用于开垦荒地的费用为85亿卢布，其中包括建设铁路和公路、学校、医院等，而国家通过利润和流通税所获得的总收入为138亿卢布。

尽管垦荒运动总体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它还是保证了粮食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并且因此保证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得以在全国各地进行农业改革。况且，农业能够把相当有限的国内资金的大部分吸引进来，成为国家政策所关注的中心，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事。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开支为215亿卢布，第五个五年计划为640亿卢布，1956—1958年为674

亿卢布。征购价格和采购价格有所提高。集体农庄庄员从劳动成果中获得的物质利益有了提高。1958 年农民的实际收入为 1950 年的 184%。在集体农庄里，人们开始掌握经济核算、成本、利润、工资等一些经济学概念。尼·谢·赫鲁晓夫开始要求农庄领导人将收支平衡结合起来。集体农庄在制订计划、制定章程方面的经营独立性有所扩大。1956 年集体农庄获得了更改章程的权利。对经营宅旁园地的税收大大减少，宅旁园地产品的义务交售制被取消。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尽管存在严重问题，但在 1953—1958 年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5 年间，农业生产增长了 34%。集体经济从未有过这样的发展速度。

斯大林之后的时期，通过行政命令方法刺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减小，因此国家领导人在寻找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种令人鼓舞的思想，需要指明增长的前景。1959 年，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提出了最大胆的、而且是当时自己思想中最冒险的设想：到 1970 年前，人均工农业产值赶上和超过美国。他的乐观主义期望基于对两国和平时期工业的年平均发展速度的简单比较。有时，苏联的这些速度比较高。但是这一预期没有考虑到美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1958 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使苏联社会注意到，在与西方的科技竞赛中本国工业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令人痛苦的事实，尽管同前几个五年计划相比，苏联的建筑材料工业、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化学、石油化学、电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产量增加了 3—4 倍，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 62%。总体上，苏联工业生产大约年均增长 10%。同时，国家需要民用品，需要轻工业、食品、木材加工、纸浆造纸工业产品。

基本投资具有很大规模。数千家大型企业建成并投产，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的索科洛沃—萨尔巴伊采矿选矿联合工厂和利萨科夫斯克采矿选矿联合工厂、切列波韦茨金属冶炼厂和鄂木斯克石油加

工厂、新西伯利亚重型机器制造厂。科学成就带动了无线电电子学、导弹制造业这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总体上，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我国工业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其中大约有 300 个生产部门和种类。由于物力和人力高度集中于个别方向，苏联取得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原子动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在历史上原子能首次用于和平目的：1954 年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在奥布宁斯克投入运营，1956 年在杜布纳创办了核研究所，1959 年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下水。

建造了古比雪夫水电站（1958 年）、斯大林格勒水电站（1960 年）、布拉茨克水电站（1961—1964 年）和许多具有地方意义的水电站和热电站。

一些新的能源产地得到快速发展：西伯利亚马尔科沃产地的石油（1962 年）、秋明州的石油和天然气（1963 年）。新兴工业部门——天然气工业和金刚石工业出现并获得初步发展。电力产量从 1954 年的 1560 亿千瓦/小时增加到 1965 年的 5077 亿千瓦/小时。在此期间，石油开采量从 5270 万吨增加到 34730 万吨，炼钢量从 4140 万吨增加到 9100 万吨，采煤量从 34710 万吨增加到 57770 万吨。

在掌握了人造材料的技术性能后，化学工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赫鲁晓夫将列宁提出的口号做了补充，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和国民经济化学化”）。结果，1958—1963 年化学工业投资年均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 2 倍。接下来的几年内，计划增加化学部门的投资。结果，同 1950 年相比，1965 年矿物肥料生产量大约增加了 5 倍、合成材料和塑料产量增加了 12 倍、化学纤维产量增加了 16 倍。

在铁路运输方面，蒸汽机车让位于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赫鲁晓夫克服了坚持在铁路运输中保留蒸汽动力的保守者的反对意见，指出电气动力比蒸汽动力能节省 3/4 的资金。他于 1956 年建议通

过了 15 年内铁路电气化的总体计划。计划成功地实现了，1967 年蒸汽动力在铁路运输中的比重仅占 7.6%。苏联的航空业在积极地发展。1955 年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图-104 升空。1959 年 9 月尼·谢·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乘坐的就是刚刚建造好的图-114 飞机。在纽约机场的停机坪上，他骄傲地在机舱出口处站了一会儿，因为迎接者一时间没有找到足够高的舷梯。

宇宙火箭技术的建立成为最重大的科技成就。当时建立了三个火箭制造中心：莫斯科火箭中心（由谢·巴·科罗廖夫领导）、乌拉尔火箭中心（由科罗廖夫的学生维·彼·马克耶夫领导）和乌克兰火箭中心（由米·库·扬格利领导）。为了追赶美国人，到 1960 年底以前，苏联建造了 44 种洲际导弹。建造了短程、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军用火箭发动机的巨大功率为着手开发宇宙空间提供了可能。为此，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建立了拜科努尔人造卫星发射场。

1957 年 10 月 4 日，从这里发射了重 80 公斤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后，航天器将动物送入太空、绕月球飞行并拍摄了月球背面照片。1959 年，苏联宇宙飞船第一次到达月球，在那里插上了苏联的旗子。1961 年 4 月 12 日，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号”被送入绕地轨道。宇航员是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实现了——苏联人进入了太空，它标志着全人类的成就和新文明时代的开始。此次飞行明显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

这一成就也决定了接下来的一些航天发射：很快，苏联第二位宇航员格尔曼·季托夫（Герман Титов）被送入太空；随后，在 1962 年进行了安·尼古拉耶夫（А. Николаев）和帕·波波维奇（П. Попович）的多人航天飞行；1963 年 7 月，第一位妇女瓦·捷列什科娃（В. Терешкова）进入太空。无人驾驶的宇航技术同样也取得了许多令人自豪的成就——一些航天器被顺利地安置在月球

上，1962 年 11 月向火星发射了“火星 1 号”探测器。

征服宇宙需要巨额费用，但效益是巨大的、持续性的。人们越来越相信，苏联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长期而稳定的领导者。

然而，那个时期的一切成就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苏联的许多工业部门所走的依然是惯常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动员式计划无论如何都没有触及规模如此庞大的经济管理的经营机制本身。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如果说 1940 年生产资料（A 类）生产的比重为 61.2%，那么在必需品（B 类）生产份额相应减少的情况下，1960 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72.5%。这多半是由于拒绝采纳格·马·马林科夫提出的优先发展 B 类的方针造成的，1955 年尼·谢·赫鲁晓夫将这一方针斥之为“机会主义”和“右倾表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重大经济实验是从五年计划过渡到时间更长的七年计划。1956 年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在一年后就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于是制订了新的发展计划，也就是 1959 年 1 月在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七年计划。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结论：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早在 1955 年马林科夫就声明，在苏联只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但苏联领导人当时认为这一思想是“谋反”，马林科夫被迫“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则宣布，苏联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七年计划（1959—1965 年）包括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和接下来的五年。计划方面出现急剧转变，原因被认为是向区域性经济管理体制过渡、科技进步的需要、同经互会国家协调计划的必要性。

七年计划的结果总体上给人深刻印象，国民收入增加了 53%，工业生产增长了 84%。建设了 5400 多个大型企业，其中包括卡拉干达和古比雪夫金属冶炼厂、克列缅丘格水电站、别洛亚尔斯克和新沃罗涅什原子能电站。

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技的光辉成就（卫星、加加林的飞行）、经济的高速增长激发出人们的高涨热情，同时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在最近时期内苏联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艰难困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苏联人觉得，美国的福利水平完全足以做到无偿满足全部人口的需求，只因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而无法实现。同时，反抗情绪的加剧要求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于是尼·谢·赫鲁晓夫提出了口号："现在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新纲领之中。

并且国家承诺，到1980年前，建成"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所有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完全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在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同时，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力也会增长，社会财富的一切资源都将源源不断地得到利用，并且'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伟大原则将得以实现"。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

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的财富；苏维埃社会将紧紧地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并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共拟定工业产品的产量增加如下：

——在最近十年内，大约增长1.5倍，并将超过美国的工业生产水平；

——在二十年内，不低于5倍，并将远远超过美国目前的工业总产量。

为此，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十年内必须提高1倍以上，在二十

年内必须提高3—3.5倍。二十年后，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美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1倍左右。



10. “解冻”的失败

10.1 频繁的行政改组

那一时期，经济政策的典型特征是积极进行各种行政改组。尼·谢·赫鲁晓夫把行政改组看做是提高社会生产的最重要杠杆之一。这些改组的原因是多部门经济管理的困难。对远离莫斯科的企业进行管理尤其困难，而这样的企业有几十万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是放弃过分集中的管理模式。

1957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建立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设想，以加强对经济的领导。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和原料资源、消除个别地区的部门壁垒。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一个经济行政区都设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有70个、哈萨克斯坦9个、乌克兰11个、乌兹别克斯坦4个，其余的共和国各有1个）。按照新管理体制制定者的设想，从部门（垂直的）管理原则向地区（横向水平的）管理原则的过渡，使管理最佳化，最终加速苏联的经济发展。

应该承认，这些措施确实部分地改善了个别地区的经济状况。但是，在加强国内某些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同时，这项改革在许多情况下破坏了地区之间的联系。1957—1958年建立的一些国家委员会没能纠正这一状况。结果，改革只是官僚机构的改组。1962年国民经济委员会合并（105个变成了43个），设立了苏联全联盟

国民经济委员会，1963 年设立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隶属于该机构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及其他一些经济方面的国家委员会。

这场改革显然缺乏充分的考虑。改革初期，由于管理权下放和地方主动性的提高，生产中呈现出某种生机，但其实这是以降低生产技术水平为代价的。应该承认，取消中央各部，在许多情况下使苏联丢掉了自身最重要的优越性，即国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集中资源发展科学和技术、实行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以及通过部委的渠道向密切相关的各生产部门推广优秀成果。

10.2 食品危机

赫鲁晓夫的下一个创新是将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可怕的主张（几乎导致建立两个党）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

当政府首脑向国人郑重承诺无偿满足人们一切需求的时候，农业中的问题又开始尖锐起来。20 世纪 50 年代末，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开始回到旧的经济体制上。依靠农村资源保证国家潜力增长的习惯性期望取代了给予农村帮助的愿望。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农村像以前一样，仍是一个实验场和大量廉价资源的储存库。对集体农庄的行政命令管理方式又具有了很大的规模。

尽管有各种承诺，农村像以前一样仍然需要技术设备。集体农庄没有技术设备，因为所有设备都由机器拖拉机站掌握。机器拖拉机站按照集体农庄的需要向其“出租”设备（后者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1958 年 3 月，政府决定加强集体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拖拉机修理站。建议集体农庄在一年内买下机器拖拉机站的全部设备，实际上是立即买下这些设备。机械设备的购买与维修给集体农庄带来了额外的财政负担。1961 年集体农

庄因购买农业设备而欠银行的债务超过20亿卢布。

机器拖拉机站的许多工人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因为集体农庄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社会保障令他们无法接受。集体农庄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设备，却往往没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因而在设备使用上面临困难，设备经常被损坏。拖拉机修理站在掌握垄断地位之后，也开始操纵集体农庄设备的修理价格，这使得农村的状况急剧复杂化。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1958—1961年间，苏联首次出现了农机的减少。

不能说赫鲁晓夫没有看到农业问题。他寻找一个又一个新办法，以使农业摆脱危机。有一段时间，他废除牧草轮作制，全部种上了小麦，而从1959年（受美国之行的影响）开始了“玉米的光辉历史”，到处种植“田间皇后”。最高潮时，1962年播种了3700万公顷玉米。并非所有的气候条件都适合这种作物生长，所以只有700万公顷的玉米长熟了。赫鲁晓夫由此得出结论说，集体农庄主席和党的地方工作人员搞破坏，他们“自己待着不动，使得玉米枯死了”。在寻找合理方法摆脱危机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得到的答案是，农业发展的主要环节应该是扩大大豆播种面积、“整个国民经济化学化”、灌溉农业、更大规模的集体经济。

1958年，又进行了一场合并集体农庄的运动（1955年有8.3万个、1960年有6.8万个、1967年有4.5万个），想以此建立实力强大的“集体农庄联盟”的组成，并使之成为对农业实行真正工业化管理的开端。所谓农业城的思想在农村地区广为传播。

能够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给农民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将土地转交给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所有，然而这一办法不仅没有着手实施，甚至从来没有讨论过。领导者始终坚信，党和国家机关严格监管之下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体制具有绝对优越性。

不仅如此，20世纪50年代末，对农民个人副业的打击随之而

来。那一时期，个人副业提供了肉乳产品、蔬菜、水果、浆果的40%—60%，其占地却不足农业用地的10%。然而，这并未阻止通过相应的决定。紧接着，向农民个体经济发起了第二次（在集体化之后）进攻。其动因是，副业似乎阻碍“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最终胜利，助长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和情绪，耗费休息时间和个性获得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时间。”

1958—1964年，农户宅旁园地的面积在集体农庄减少了12%（减少到0.29公顷），在国营农场减少了28%（减少到0.18公顷）。赫鲁晓夫号召农村居民不要饲养牲畜，首先是不养牛。他建议将牲畜卖给集体农庄或国家，从它们那里购买肉制品和乳品。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这里援引了库尔斯克州加里诺夫卡村自己老乡的实际经验，他们卖掉牛以后好像生活得更好了，不再在公共经济和个人宅园之间忙来忙去，有了休息和提高精神文化修养的时间。

苏共中央全会委托国家机关在2—3年内收购归国营农场工人所有的牲畜。建议集体农庄进行类似的工作。后来，也同样禁止城市居民和工人新村里的工人个人饲养牲畜。

结果事与愿违。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个人副业几乎被消灭，这给城市、特别是城郊食品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20世纪50—60年代著名乌克兰喜剧演员塔拉蓬卡和什捷普谢利的流行滑稽表演反映了这一状况。一人问：“你在哪儿购买食品？”另一人回答说：“我把食品袋挂在收音机上！”

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经常说，农村劳动者在人均肉类和牛奶产量方面正在赶上美国，一系列指标已超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正在赢得同全世界的竞赛。但此时，商店里的食品却越来越少。可就是广播电台里说越来越多的那些商品——肉和奶出现了脱销。随后，植物油、面包、米也突然间成了紧缺货。城里的面包铺里排起了长队。正式表述尼·谢·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是

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肉品、乳品价格的决议。

国内许多州早在1962—1963年就对大多数种类的食品重新实行凭票购买。1963年，不仅是肉类、牛奶、食油，而且还有面包，在供应上时有时无。人们从夜间便在店外面排起买面包的长队，这诱发了反政府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采用商店顾客登记、消费者名单、粮票等办法，甚至打开了战争时期保留的国家储备粮仓。1963年，由于粮食低产、国家粮食储备减少，苏联领导层不得不通过了关于从国外大量采购粮食的决定，为此拨出了372.2吨黄金——苏联黄金储备的1/3以上。当时，苏联领导人认为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是一种屈辱，而且是大自然变幻莫测所导致的偶然性事件。在1963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尼·谢·赫鲁晓夫说："我们在7年之内每年都应该有足够一年的粮食储备，苏维埃政权不能容忍这种丢脸的事情再度出现。"

从1962年起，苏联开始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进口谷物，从联邦德国进口面粉。所有这一切都以黄金支付，每年输出达500吨。实际上，苏联的黄金储备用于支持、加强和发展了国外资本主义农场，当时苏联农民的经营受到排挤。经济发展的七年计划（1959—1965年）在农业方面是失败的，计划增长70%，实际只增长15%。

10.3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新的价格没有增加肉类产品的数量，反而引起了居民的骚动。公民与政府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

党中央决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再组织一次运动。实际上，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大约减少10%。苏共罗斯托夫州委员会表现得特别积极。1962年4月，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向其他企业

的工人发出减少生产费用的号召。响应者中就包括新切尔卡斯克的企业。新切尔卡斯克市委担负起“每个工人一年内储蓄 100 卢布”的义务。

1962 年 6 月 1 日，广播电台里宣读了党和政府关于肉价上调 30%、食油价上调 25% 的决议。就在同一天，出现了政府部门未曾意料到的一个巧合，以谢·米·布琼尼命名的电气机车制造厂将计件工资减少了 30%。锻造车间和冶金车间的工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所发生的事情。出现了自发性的群众集会。

集会的工人们提出：“现在我们靠什么生活?”对这个问题，电气机车制造厂厂长库罗奇金挖苦地回答道：“没有肉馅包子，现在就吃果泥馅饼!”工人们被激怒了，库罗奇金被迫逃跑。快晌午的时候，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的 1.1 万名工人举行罢工。他们打出了“给我们面包、黄油!”“我们要住房!”等标语，并把这些标语从工厂里带走，挂在铁路的电线杆上。

尽管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派来的代表对其他企业的工人们进行劝说，但其他企业的工人还是没有支持罢工。当时，一群工人开始拆掉在附近经过的莫斯科—罗斯托夫铁路线的轨道，并开始设置路障。妇女们坐在钢轨上，试图挡住火车的去路。工厂的建筑物上出现了一些“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

6 月 1 日傍晚，军队和警察集结到事发地点。市内交通被禁断。夜里逮捕了大约 30 名领头闹事的工人。6 月 2 日，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加入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的罢工队伍。城里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群众集会。演讲者在卡车上发表讲话。

工人的游行队伍朝着市中心、街心花园及苏共市委和市执委会所在的广场前进。在莫斯科大街，示威游行者试图冲破市警察局的大门，解救被捕的同志，但遭到手枪射击后撤退了。政府大楼和广场被军队、军车包围。士兵们试图挤开示威者。但人们没有散去。冲锋枪手开始射击，先是朝天开枪，无意中打死了坐在树上的一些

孩子，随后转向人群开火。

人们开始跑，但是没有停火：士兵们向人们的后背开枪。广场和街道空了。死者（几十人）和伤者被装上卡车。过了一些时候，人们再次拥进广场，枪声再起。苏共市委书记巴索夫得知动乱的消息后便立即逃往罗斯托夫。以阿·伊·米高扬和弗·罗·科兹洛夫为首的事件处理领导小组，从莫斯科飞抵新切尔卡斯克。人们要求米高扬到猛烈射击的地方看看，要知道街心公园的树和长椅还血迹斑斑，柏油马路上的血泊还没干。“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看一看这里的血！”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在看望青年工人代表团的时候，许诺查明情况并严厉惩处罪魁祸首，但要求示威游行者各回各家，并停止闹事。人们没有散开。6月2日傍晚，派出了由冲锋枪手护送的坦克来驱散人群。曳光弹飞入夜空。当时，人渐渐地稀少了。

政府对这次事件报以严酷的惩罚。共有112人被判罪。伤者及被运往军队医院的人无一回家，其家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事件的参加者（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在示威游行时给他们拍了照片）设立了许多禁止旁听的法庭和两个公开的法庭，有9名男子被判死刑，2名妇女被判在劳改营监禁15年。

同时代文献资料

摘自苏联总检察长尼·特鲁宾关于196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通报

由于内卫部队军人出于自卫而动用武力，6月2日在广场上和市警察局附近打死22名、打伤39名参与暴乱的人。另有两人于6月2日晚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被打死。



11. 对外政策：从“日内瓦精神”到加勒比海危机

11.1　军备竞赛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制造了洲际弹道导弹，结束了美国领土不受攻击这一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特点。起先，美国人基于自己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认为，苏联迫于国内的困难即使不垮台，至少也会同西方和解。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领导人采取了同苏联进行“思想战”的方针。在对苏联及其盟友施加思想压力的过程中，主要武器是 50 年代初在西欧建立的无线电台——“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

与此同时，展开了军备竞赛。当人们向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国家工业每年能生产 400 枚“民兵”级洲际弹道导弹时，他回答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地疯一次，不去着手组建拥有 1 万枚导弹的力量呢？”而在 20 年后，在美国的武器库里所拥有的战略核导弹恰恰是 1 万枚。

美国军人继续制订消灭苏联的核战争计划。艾森豪威尔时期，国防部的预算继续增加。在共和党执政的 8 年间，预算增加了 72 亿美元。到 1955 年前，能打击苏联的轰炸机数量达到 1350 架。艾森豪威尔时期，战略航空兵的一架标准轰炸机所携带的原子弹的破坏力相当于二战期间盟军飞机投掷到德国的所有弹药的总和。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战略计划——国家安全委员会 162/2 备忘录，在同苏联或中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合众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可以使用核武器”。

1954 年春，美国人曾建议法国人对在奠边府地区包围法国远

征军的越南军队使用原子弹。

尽管苏联成功试验了许多新式原子武器（例如，1961 年在新地岛爆炸了 5700 万吨级超能量氢弹），其核力量明显赶不上美国。苏联所拥有的核弹头总量少得多，运送工具方面处于落后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在美国边界地带或沿岸地区没有军事基地，而当时美国人就在苏联的边界地区设立了许多基地。因此，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号召彻底销毁核武器，甚至全面裁军。

由于西方断然拒绝这些建议，苏联核力量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之一便是制造能从太空打击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开始发展战略潜水舰队和战略轰炸机。

11.2 缓和紧张局势的最初尝试

“冷战”过程中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复杂化要求用新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斯大林时期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只是在他逝世以后，苏联新的领导人（首先是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的理论。该理论带有赫鲁晓夫世界观的明显印记，他大概是所有苏联领导人当中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赫鲁晓夫狂热地相信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形成那样一种局势，即让地球上大多数居民看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1955 年 7 月 19—23 日，“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会谈在日内瓦举行。这一事件产生了人道主义战胜两大政治阵营意识形态的希望，产生了所谓的“日内瓦精神”。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摆脱隔绝的过程。

苏联领导层在缓和欧洲的军事对抗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苏联从奥地利撤出全部军队，1955 年 1 月 26 日又签署了关于将波卡拉半岛的海军基地提前还给芬兰的协议。几乎同时，芬兰延长了同苏联的友好条约，并竭力强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中立。

1955年1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单方面通过了关于结束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1955年5月15日，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同奥地利签订了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国家条约。1955年夏，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声明。

美国领导层的态度也开始逐渐缓和。最终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宣布，战略领域的技术进步会引起这样的局面出现，即核武器的使用难以想象——它将使整个世界毁于一旦。这种理解的结果之一是德·艾森豪威尔决定同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

1959年9月，赫鲁晓夫正式访问美国。按计划，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将回访苏联，其间就核裁军问题进行一些重要谈判。然而，1960年5月1日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拦截导弹击落。飞机驾驶员加·鲍尔斯被捕，后来在法庭上供认了自己的间谍罪行。这一事件在苏联报刊及西方报刊上引起了相互间的猛烈攻击。苏美关系再度降温，艾森豪威尔的访问化为泡影。

在196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的好冲动以及他的捉摸不定和不讲外交手腕使得苏联代表团很难堪。先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联合国代表们面前讲话时许诺，要埋葬帝国主义国家。随后，在菲律宾代表团的代表发言时，赫鲁晓夫误以为他是西班牙的代表，这位苏联领导人开始用拳头敲议席的桌子，随后就干脆从脚上脱下皮鞋，用它去敲打椅背。西方的宣传机器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种粗鲁行为，再一次把俄罗斯人描述为“不文明的粗野人”，同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正常交往。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许多行为打击了“冷战”思维。如果说像一些人认为俄罗斯人阴险狡猾、只看重实力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自愿地允许奥地利统一并从那里撤军，离开罗马尼亚，将汉科半岛和旅顺口的基地转交给芬兰人和中国人？所有这一切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

11.3 中欧和东欧

苏联领导人没有将和平共处原则推广到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上，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有权为了维持现行社会制度而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苏联是想无论如何在其边界线周围保有一个友好国家地带。这是在意识形态上以支持社会主义事业为名而进行的自我辩解。

斯大林给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外交遗留下来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仍然是德国分裂问题。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德国合并计划很显然遭到了失败，此后苏联领导人希望西方承认存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事实及它们之间的边界不可破坏。西德的复仇主义情绪、定期出现的有关彻底改变二战后形成的局势的建议，令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深感不安。

西柏林的特殊地位被当做在“德国问题”上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工具。这个受西方大国控制并且位于民主德国中心的飞地已经成为1947—1948年尖锐的政治危机之根源。1961年，非法离开民主德国的大量难民加重了西柏林周围的局势。他们在东柏林接受免费教育之后，便跑到生活水平高得多的西部。东德的一些领导人、而后是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国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禁止接受经济难民（使民主德国削弱的难民），他们以全面封锁西柏林相威胁。当美国人及其盟友拒绝苏联建议的时候，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1年8月在西柏林周围筑起了围墙。然而，如此乖戾的解决办法没有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产生影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改变。

1955年赫鲁晓夫亲自促成了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为此，苏联被迫做出许多重大让步，并完全承认在40年代发生的

冲突中苏联方面的错误。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约·铁托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并未改变南斯拉夫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南斯拉夫不同意成为苏联的军事盟友，继续同“社会主义阵营”保持距离，实行独立的政策。它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起领导了“不结盟运动”，其成员国既不加入苏联军事集团也不加入西方军事集团。

苏联现在准备准许盟国实行比较独立的政策，1955 年 5 月 14 日建立的华沙条约组织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以前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毫无约束地受苏联的控制，那么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则依靠专门的条约来调整。

但是，对苏联各盟国来说，这种独立性毕竟是有限度的。在严峻的对外政治形势下，苏联继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领导者，要求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忠实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在波兰出现了人民骚动，共产党内开始了关于党的生活民主化的复杂争论。以前具有反对派名声的瓦·哥穆尔卡（В. Гомулка）被推选为党的新一任领导人。

莫斯科惊慌地注视着波兰事态的发展。危机终究得到了解决：1956 年 10 月 19 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飞往波兰进行谈判。他们不得不同意哥穆尔卡的关于“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甚至波兰的军队也从苏联的直接控制下解脱出来，波兰国防部长康·康·罗科索夫斯基（К. 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卸任，并且回到了莫斯科。这样，波兰便相对迅速地消除了危机，并实现了向明显不同于斯大林式的、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匈牙利的情况则复杂得多，那里爆发了真正的反共起义。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

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地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拉科西，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由于长时间的群众运动而被迫辞职。著名的反对派和改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伊·纳吉成为匈牙利党的新领导人。执政以后，纳吉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苏联军队从布达佩斯撤离，但是没有从匈牙利全部撤军。就在那时，人们开始自发地夺取政权。1956 年 10 月 29 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匈牙利其他城市的旧政权也被取缔。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 月 31 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在危机不断加剧的条件下，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极端措施。1956 年 11 月 1 日，苏联军队开始了重新部署和进入匈牙利的代号为“旋风”的行动。11 月 4 日，一些不满于伊·纳吉政策的共产党人建立了称之为革命的工农政府。该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当时，苏联军队已经在匈牙利领土上采取了军事行动。匈牙利军队几乎没有对苏军以任何反击，只有非正规部队进行战斗。11 月 11 日，苏军最终占领了布达佩斯。临近 1957 年初，匈牙利全境已经被完全控制。伊·纳吉辞职，新的国家元首由工农革命政府领导人亚·卡达尔担任。参加军事行动的有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个机械化军。26 人因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 13 人是死后追授的。

起义的参加者遭到了大规模镇压。包括伊·纳吉在内的 229 人被处决，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但是后来，也同波兰的情况一样，卡达尔开始实行较为自由的国内政策。由于这个原因，匈牙利后来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最明亮舒适的简易木屋”的滑稽绰号。

11.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56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被解散，该组织实际上是缩小和简化了的共产国际。在各不同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商定在定期召集的会议上协调政策和思想观点。也正是在这些会议上，暴露出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政策与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国的活动之间的重大矛盾。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次会议，64 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尽管表面上看，此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甚至通过了统一的《和平宣言》，但实际上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即继续同西方保持不可调和的对立，尽管有核战争威胁。在会上发言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号召不要害怕原子弹的威胁，因为即使死掉一半人，活下来的人也会建成共产主义。另一条道路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陶里亚蒂提出的，即准许每一个共产党拥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其中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其他政治力量和平共处的道路。

苏联领导人面临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方针同陶里亚蒂的观点相符合。而另一方面，拒绝中国坚持的革命精神和准许其他共产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会导致苏共丧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共产党会议，表面上看，甚至更具有代表性，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 81 个党。然而，此次会议的成果比不上第一次会议。当时只是通过了一个前后不连贯、内容相当空洞的“共同声明”。因此，在一些非公开的会议期间已经很明显，中国真的打算逐渐取得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接

触，论述了“修正主义和对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列宁思想的歪曲”。这种意见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恩·霍查的外交行动支持。他不赞同苏共的新立场，表示抗议地退出了会议。

大多数共产党代表支持苏联领导人及其方针，其中包括同批判斯大林的过去有关的方针，但是也有代表团支持中国的立场。显然，苏联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解之后仿佛出现的共产党联盟的统一正在结束。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向则发生在晚些时候，即苏联历史上的“赫鲁晓夫时代”终结之后。

11.5 苏中关系的危机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该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决定持否定态度。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掌握着台湾岛，有关该岛的事件也使中苏关系复杂化。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当时的）台湾政府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共领导人想把台湾置于控制之下，为此在岛屿与大陆之间的海峡集中了武装力量。1958年8月23日，中国向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金门岛发动猛烈炮击。1小时内，大约发射了2万枚炮弹。8月24日，在继续炮击的同时，中国的鱼雷艇袭击运送国民党士兵的运输船。到8月28日前，向台湾岛发射了10万枚炮弹。美国支持蒋介石，并表示准备为沿岸岛屿建立防卫。大约130艘美国军舰集结于台湾海峡，其中包括6艘携带原子弹和氢弹的航空母舰。远东出现了新战争的威胁。

1958年9月7日，尼·谢·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信中说：“进攻我国的伟大朋友、盟友和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对苏联的进攻。我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将全力以赴地同人民的中国一道捍卫两国的安全、远东的和平利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对美国方面的类似警告也包含在9月19日苏联政府致美

国总统的第二份信件中。1958 年 10 月 6 日，赫鲁晓夫再次声明："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遭遇外部侵略，具体地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的话，苏联将帮助中国。"

苏联的警告起了作用，结果在外交谈判中局势得到缓和。然而，危机期间，无论是苏方还是中方，对对方的强烈刺激依然存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关于批判歪曲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文章。1950 年代末，赫鲁晓夫对中共给予了严厉批评。1960 年夏，出人意料地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这使中国工业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而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1960 年 11 月）上，苏中两党代表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中共领导人开始将莫斯科领导人的政策当做不友好的、甚至几乎是敌对的政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正式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但在中国的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历史研究"的资料，借以说明俄罗斯和苏联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了总面积为 15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60 年代初，苏中边界地区开始发生一系列冲突。

总体上，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是在同一个阵营相当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甚至没有包括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所有国家。一体化是十分矛盾的，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策及其对世界发展的估计。正是这一点有时引起了尖锐的危机。具有巨大资源和军事力量的苏联领导人把在东欧国家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压制了下去。但是，对中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11.6　发展中国家当中的苏联盟友

与约·维·斯大林不同，尼·谢·赫鲁晓夫指望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能够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20 世纪 50—60 年代，许多前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宗主国的统

治。1954 年在越南、1962 年在阿尔及尔结束了持续多年的解放战争。苏联通过提供武器和军事专家来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1957 年，加纳成为黑非洲（热带非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1960 年被称为“非洲年”，有 17 个国家在这一年获得独立。苏联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之一仍然是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1954 年日内瓦协定签署后，在国家北部出现的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想吞并越南南方，为此向南方秘密派遣了进行破坏活动的小组和军队，建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苏联积极支持北越，以为通过这条途径可以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到越南南方，乃至整个东南亚。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贯是苏联的盟友。这两个国家积极抵抗美国霸权。苏联同它们建立了相当牢固的经济联系，促进了两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1955 年尼·谢·赫鲁晓夫和尼·亚·布尔加宁访问印度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和关于在比莱建设金属冶炼厂的协定，1957 年签署了关于同印度合作建设一些重工业企业和苏联提供大笔贷款的协定，1958 年签署了关于在孟买建设工学院的协定（苏联的馈赠），1959 年签署的关于帮助印度勘探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协定，1961 年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

与叙利亚的合作也获得同样的发展。1955 年签订了贸易和支付协定，1957 年签订了关于无线电报通讯、关于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协定，内容包括长期优惠贷款以及在铁路与能源建设、桥梁建造、耕地灌溉和牧场引水方面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成就是同埃及“苏联集团”的亲近。1952 年在这个国家发生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国家政变，法鲁克国王被推翻，以加·阿·纳赛尔上校为首的青年军人组织“自由军官”取得政权。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纳赛尔渴望埃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也渴望重建强大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此，纳赛尔所采取的一个步骤是宣布以前处于英法联合公司控制下的苏

伊士运河国有化。

其结果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企图推翻纳赛尔的统治。1956 年 10 月 29 日，以色列的坦克攻入西奈半岛，11 月 5 日和 6 日英国军队在塞得港登陆、法国步兵占领了富阿德港。纳赛尔向苏联和美国请求帮助。苏联政府要求侵略者从埃及撤军，否则苏联准备动用武力。声明中指出，苏联拥有导弹核武器。美国不支持英国和法国，因为削弱英国人对美国人有利。苏联领导人支持埃及，是希望在近东获得盟友。1956 年 11 月中旬，英法两国军队从埃及的港口撤离，而以色列人则向自己的国境线退却。

为感谢支持，纳赛尔同苏联建立了特殊的同盟关系：包括军事顾问在内的数百名苏联专家被派往埃及，埃及大学生开始在苏联的大学里学习。在埃及的国内政策中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例如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合作社”）；苏联工程师积极参加阿斯旺大坝、尼罗河水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工作。这座大坝的修建将会增加埃及农用地的数量，有助于解决这个贫穷而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粮食问题。埃及同苏联建立的特殊关系导致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结果，在 1960 年代末阿以冲突不断激化的情况下，苏联站在埃及及其盟友一边，这险些导致同美国在近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依附地位以后，也宣布自己的“社会主义方向”。例如，加纳在克·恩克鲁玛担任总统时期以及革命家帕·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宣布自己为苏联盟友。但是，1961 年卢蒙巴被推翻并被杀害，此后，国家长期陷入国内战争的深渊。

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已解放国家的积极支持及其坚定的反殖民主义原则立场，在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同时，这种政策加深了殖民地国家和正在解放的国家的人民以及西方反殖民主义者对苏联的好感。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历史进

步和正义的一方，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是苏联对外政策中完全出乎意料的重要成就。以菲·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新领导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即刻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但是，由于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有失考虑，古巴人便向苏联寻求帮助。渐渐地，卡斯特罗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宣布要在古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推翻他的统治。1961年美国人借古巴侨民之手进行的行动失败以后，美国着手准备利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1.7 加勒比海危机

尼·谢·赫鲁晓夫支持古巴的盟友。1962年，苏联军队被秘密调往古巴岛，其中包括装备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部队（“阿纳德尔”行动）。此外，在古巴安置导弹成为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在苏联周边——土耳其、意大利和英国部署中程导弹（“宙斯”导弹）的回应。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还没有完成，美国人借助侦察机便知道了它们的分布情况。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引起美国政府部门的严重不安。其结果是1962年10月发生的所谓加勒比海危机（古巴危机）。

实际情况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顾问T. 索伦森是这样评价当时局势的：“毫无疑问，在能够猛烈攻击我们的苏联全部百万吨级核爆炸力的背景下，单就部署在古巴的这些导弹而言，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战略平衡……但是，在民族意志和领导世界的能力问题上，这种平衡可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这个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C.

阿巴罗斯所写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仅仅是在一个假设会出现的问题上爆发的。由于事关威信的问题，世界走到了全面毁灭的边缘。"



肯尼迪总统认为，对如此公然的威胁不能不做出反应，否则的话，他可能遭到弹劾（丧失总统的职位）。1962年10月22日，美国宣布封锁古巴。这意味着美国海军舰队将拦截前往古巴的所有船只。显然，这首先指的是向古巴运送苏联导弹的舰船。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华盛顿表现出自己已做好一切准备，应对苏联舰船如不屈服就可能发生的核冲突。当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苏联潜水艇将准备击沉实施封锁的美国舰艇。

观　点

肯尼迪当局之所以做好了经受核战争危险的准备，大概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这些导弹的部署使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发生改变。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中程导弹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总体战略平衡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两国的战略武器库不取决于土耳其或古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召集的"执行委员会"得出结论说，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没有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

归根结底，加勒比海危机是个开端，它使人们能稍加清醒并能理解，在现代核冲突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冷战"外交应该铭记，它的错误可能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1962年10月遭遇核灾难的威胁后，肯尼迪意识到，一种非理性的局势形成了。美国总统得出结论，在世界各地保持绝对的优势可能将美国带入自杀性的核冲突，导致民族灾难。对白宫来说，很明显的是，将敌意激化到军事冲突的程度，绝对不可能永远服务于美国的利益。相反，它只能促使人

心不稳的中立国的疏远、受到类似行动恫吓的盟友的离去、民族意志遭受破坏。



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苏联的导弹部队进入了战备状态。世界处于核战争的边缘。在最后的时刻，双方开始频繁地交换意见和进行谈判。局势得以缓和。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对正常外交实践来说不可思议的步骤。为了将苏联的观点立即传达给美国，10 月 27 日莫斯科时间 17 点，通过普通的无线电广播网播发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信。

美国政府在回应时也打破常规。肯尼迪回信的全文通过报纸转发。原因也同赫鲁晓夫的广播讲话一样，就是希望尽快转达，缩短将外交电报译成密码和译解密码的长时间过程。

在交换这些信件以后，紧张局面开始迅速地缓和。苏联政府允诺将导弹撤出古巴，而美国人则保证不进攻古巴岛，并将自己的导弹撤离土耳其。然而，位于古巴南海岸关塔那摩的美国军事基地却依然不可侵犯。但总体上，加勒比海危机的结果成为苏联在两个体系对抗中的又一次胜利。赫鲁晓夫达到了主要目的，即保证了古巴神圣不可侵犯，阻止了美国对古巴领土的进攻，也防止了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导弹。这一好处所带来的结果甚至在 21 世纪初也可以看到：古巴保持了独立，土耳其领土上没有核导弹。

同时，第一次核对抗表明，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准备把在第三国的信息战和对抗转变为真正的武装冲突。原子武器的摧毁力实际上是迫使一些大国及其领袖更加坚定地寻求政治妥协途径的威慑因素。1963 年，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安装了直通电话线。

美国方面迈出了没有先例的一步：同苏联一道在联合国支持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决议，签署了关于向苏联出售谷物的协定。

美国开始以条约限制核武器试验。1963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该条约在改进核武器的道路上设置了现实障碍，使生态环境免受危害，并在总体上服务于缔约三方——苏联、美国和英国相互信任的目的。尔后，只准许通过地下核试验来实现原子武器现代化，美国在内华达的试验场、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进行核试验。

西欧各国意识到，要是碰上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欧洲就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因此，这些国家先于美国走上了与东欧缓和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美国在越南作战的时候，法国总统戴高乐加强了缓和政策，很快西欧各国的其他领袖得到了比美国更多的同东方联系的经验。他们开始珍视这些联系，于是美国破坏这些联系的企图只能引起盟国之间的分歧。

新的苏联领导人在各个方面实行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打破了与主要对手美国之间关系的僵局，保持和巩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复杂的、有时具有爆炸危险的政治形势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苏美关系中的任何偶然性事件都足以撕毁几个月甚或几年间所达成的协议。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56年5月14日苏联政府关于裁减军备问题的声明

鉴于目前条件下原子战争对人民具有特别的危险，苏联政府认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氢弹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曾经建议并且正在建议立即通过有关全面禁止原子武器和氢弹、停止生产该武器和销毁该武器现有储备的决议，以使原子能这一人类的伟大发现只用于和平目的。

■ 摘自军事历史学家B. 福明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回忆

1956年11月2日，华沙条约组织联合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И. С. Конев）……下达作战任务："肃清布达佩斯的反革命暴乱。"为此，集团军通过增加坦克、炮兵部队和空降部队而得到加强。作战行动是根据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的。他们是应匈牙利共产党人……中国、南斯拉夫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领导人的请求作出决策的。

■ 摘自1962年10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信

您希望自己的国家免受危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古巴也希望这样；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自己免受危险。然而，我们苏联、我们的政府该怎样看待你们的行动呢？你们用军事基地包围了苏联，用军事基地包围了我们的盟国……在那里部署了自己的导弹武器……你们的导弹部署在英国、部署在意大利，并且指向我们。你们的导弹部署在土耳其……古巴使您感到不安。您说，这是因为古巴距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岸线只有90海里。可是，要知道，土耳其同我们毗邻，我们两国的哨兵在巡逻时彼此相望……您将您称之为进攻性武器的破坏力很大的导弹武器就部署在我们近旁的土耳其……我提出建议：我们同意从古巴撤走您认为是进攻性设施的那些设施。我们同意做这件事情，并向联合国声明我们所承担的这项义务。你们的代表也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不安和忧虑，将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同类设施。让我们商定您和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长的期限吧。

■ 摘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给尼·谢·赫鲁晓夫的回信

读了您的信后，我得出您的建议基本上可以接受的结论。据我理解，您所提建议的关键部分是：

1. 您同意在联合国的适当观察和监督下从古巴撤走这些武器，并承诺在应有保证的条件下停止向古巴运送这些武器。

2. 我们同意（在通过联合国就履行承诺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立即取消目前所采取的检查措施；（2）保证放弃入侵古巴的行动。



12. 精神生活中的“解冻”：文化界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机关

斯大林逝世后开始对文化界的严格思想控制有所减弱，国内外政策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是以“解冻”这一名称载入祖国历史的。1953年3月以后，苏联社会的精神氛围发生变化，“解冻”的概念作为描述这一变化特征的隐喻被广泛使用。是年秋，《新世界》杂志发表了评论家弗·波梅兰采夫（В. Померанцев）的《论文学的真诚》（Об искренно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一文，文章中谈到要把人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提出真正的现实问题，将日常生活中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冲突引入长篇小说当中”。1954年，好像在对这些想法做出反应，该杂志刊登了伊·格·爱伦堡（И，Г. Эренбург）的中篇小说《解冻》（Оттепель），它也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整整一个时期的名称。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十分惊人的印象。以此为界限，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分为二十大“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把人划分为彻底揭露个人崇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革新者”和“守旧者”。赫鲁晓夫所表达出来的批判，被许多人理解为重新思考国家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信号。

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层对文化界公开的思想压力开始减弱。

“解冻”时期大约十年时间，但前面提到的过程随着紧张程度的不同发展着，而且出现了很多背离自由化制度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就发生在1956年秋，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变化的征兆是许多活到这一天的被镇压者从劳改营和流放地回来。斯大林的名字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他的许多雕像和画像从公共场所里消失，他的大量著作从书店和图书馆里消失。城市、集体农庄、工厂、街道开始改名。但是，揭露个人崇拜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旧制度直接继承者的国家新领导人对大批人死亡及滥用职权现象负有责任。如何带着对过去的责任的负担继续生存，如何改变生活，如何不出现大规模镇压、严重剥夺人和对人们生活各个方面严格控制的悲剧重演，这些问题成为社会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А. 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在改革年代才得以发表的“关于时代和关于自己”的自我忏悔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По праву памяти）中，以一代人的名义表达了这些痛苦的思索：

> 孩子们早已成了父亲，
> 但我们仍然要为
> 国父承担责任，
> 数十年的审判还在继续，
> 依然无尽无头。

苏联的文学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自由的政治辩论，并且在缺少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文学作品就处于了社会争论的中心。“解冻”年代，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和关注的读者群，他们声明自己有独立评价、选择好恶的权利。弗·德·杜金采夫（В. Д. Дудинцев）的长篇小说《不仅仅为了面包》（1956年）（Не хлебом единым）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反

响——该书主人公富有朝气、不装腔作势，有着进步的观点，是一位反对保守思想和因循守旧的斗士。1960—1965年，伊·格·爱伦堡在《新世界》上发表了被检查机关审查后大量删节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Люди，годы，жизнь）。这部作品提及了那些被官方遗忘的"俄罗斯先锋派"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界活动家的名字。1962年，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在这部小说中亚·伊·索尔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根据自己在劳改营的亲身经历，对因斯大林的镇压而牺牲的人们进行了思考。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关于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个政治性决定。批准发表该作品的最高领导人（中篇小说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发表的）不仅承认镇压这一事实本身，而且也承认必须注意苏联生活中这个尚未成为历史的悲剧性的一页。索尔仁尼琴随后的两部作品［《玛特辽娜的家》（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和《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речетовка）］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领导的杂志赢得了吸引民主创举支持者的中心之声誉。从1961年起，《十月》杂志站到了批判"解冻"文学的阵营里，成为保守政治观点的传播者。探索民族起源和传统价值的支持者聚集在《旗》和《青年近卫军》杂志的周围。作家弗·阿·索洛乌辛（В. А. Солоухин）［《弗拉基米尔的乡间小路》（Владимирские проселки），1957年］和当时成为著名俄罗斯古典作品插图画家的伊·谢·格拉祖诺夫（И. С. Глазунов）的创作即表现了这方面的探索。围绕文学、戏剧和电影问题的争论是反映社会主流情绪的一面镜子。聚集在杂志周围的文化人士之间的对立也间接地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国家今后发展道路的意见斗争。

"解冻"散文和戏剧作品越来越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人生活。20世纪60年代，在那些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大型文学杂志上开

始出现青年作家关于年轻的同时代人的作品。同时，明确地划分了“乡村散文”［瓦·伊·别洛夫（В. И. Белов）、瓦·格·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费·亚·阿布拉莫夫（Ф. А. Абрамов）、早期的瓦·马·舒克申（В. М. Шукшин）］和“城市散文”［尤·瓦·特里丰诺夫（Ю. В. Трифонов）、维·弗·利帕托夫（В. В. Липатов）］。另一个重要的艺术题材是战争中的人对处世态度、对胜利的代价的思考。这些作品的作者是那些经历过战争并从曾经深处事件之中的人的立场重新思考这一经历的人（因此这种文学作品经常被称为“尉官散文”）。描写战争的作家有尤·瓦·邦达列夫（Ю. В. Бондарев）、康·特·沃罗比约夫（К. Д. Воробьев）、瓦·弗·贝科夫（В. В，Быков）、鲍·利·瓦西里耶夫（Б. Л. Васильев）、格·雅·巴克拉诺夫（Г. Я. Бакланов）。康·米·西蒙诺夫（К. М. Симонов）创作了三部曲《生者与死者》（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1959—1971 年）。

“解冻”初期的优秀影片也同样展现了战争中“人的面貌”［根据维·谢·罗佐夫（В. С. Розов）的剧本《永生的人》（Вечно живые）改编、由米·康·卡拉托佐夫（М. К. Калатозов）导演的《雁南飞》（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格·纳·丘赫莱（Г. Н. Чухрай）导演的《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根据米·亚·肖洛霍夫（М. А，Шолохов）的中篇小说改编、谢·费·邦达尔丘克（С. Ф. Бондарчук）导演的《一个人的遭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但是，当局对反映社会情绪的文学艺术过程的注意力并没有减少。书刊检查机关在细心地寻找并消除异己思想的任何表现。这些年，《斯大林格勒特写集》（Сталинградские очерки）和长篇小说《为正义事业而斗争》（За правое дело）的作者瓦·谢·格罗斯曼（В. С. Гроссман）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作品描写的是被卷入战争的人民的命运、牺牲和悲剧。1960 年，稿子被《旗》杂志编辑部拒绝，并被国家安全机关从作

者手中抄走。只是在改革时期，这部小说才根据保存下来的两份副本在苏联发表。作者在总结伏尔加河战役的时候，谈到自己全力描写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与“人性的价值”。格罗斯曼两部曲的哲理和艺术手法（1952 年经删节后出版的长篇小说《为正义事业而斗争》在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之前）接近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按照格罗斯曼的想法，赢得这些战役胜利的是统帅们，而赢得战争胜利的只是人民。

“斯大林格勒战役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是胜利了的人民与胜利了的国家之间的无声争论在继续。人的命运、他的自由取决于这场争论”——长篇小说的作者这样写道。

20 世纪 50 年代末，出现了文学方面的私自出版物。这里指的是未经检查的外国作家翻译作品和国内作家作品的副本，其中有打字稿、手写本或照相复制本。通过私自出版物，少部分读者有机会认识一些著名作家以及青年作者不准备正式发表的作品。在私自出版的副本中，马·伊·茨维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安·安·阿赫玛托娃、尼·斯·古米廖夫（Н. С. Гумилев）及许多年轻的现代诗人的诗歌很流行。

了解不经过检查的作品的另一个来源是“境外出版物”，也就是在国外出版的国内作家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历经辗转才同国内读者见面。鲍·列·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正是这样，该书从 1958 年起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读者当中流传。在苏联，这部长篇小说准备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但被作为“充满不愿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气息”的书被禁止出版。被帕斯捷尔纳克视为一生事业的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激流中的命运。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展现近四十五年来俄罗斯的历史面貌……”表达自己“对艺术、对福音书、对人在历史中的生活以及对其他许多事物”的看法。

1958 年因“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散文的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绩”而授予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之后，苏联开展了对作家的迫害活动。然而，正如赫鲁晓夫晚些时候所承认的那样，他没有看过这部长篇小说，这也像绝大多数愤怒的“读者”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一样，因为书到不了广大的读者手中。谴责这位作家并要求剥夺其苏联国籍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了政府机关和报刊社；许多作家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帕斯捷尔纳克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作家断然拒绝了当局提出的离开苏联的要求，但被迫放弃接受诺贝尔奖。党最高领导层中的保守力量对这部小说组织的挞伐大概是想明确指出创作“许可”的界限。《日瓦戈医生》获得了世界声望，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和更严的书刊检查标志着人们所期待的政治自由化“终结的开端”，并且成为二十大以后国家政权机关与创作知识分子关系中初露端倪的脆弱性和可逆性的证明。

这些年，开始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代表的见面会。实际上，在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中很少有什么变化，就连赫鲁晓夫在一次这样的见面会上也曾不失时机地指出，在艺术问题上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共产主义建设的精神保障”被当做艺术创作的主要任务。成为政府亲信的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完全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在各类创作者协会里占据领导职位。也采用了直接压制文化人士的手段。1962 年 12 月，莫斯科艺术家协会举办周年展览会期间，赫鲁晓夫粗鲁地对一些不按“明白易懂的”现实主义标准创作的年轻风景画家和雕塑家发起责难。加勒比海危机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认为必须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能和平共处，并指出苏共新纲领通过之后文化在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中所起的作用。在报刊上，展开了批判“异端势力”和“个人主义意愿”的运动。

这些措施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还因为一些新的艺术潮流及随

之而来的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从西方向苏联渗透。1955年，刊载国外“进步”作家作品的《外国文学》杂志第一期面世。1956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了毕加索画展，这是苏联第一次展示20世纪最著名艺术家之一的绘画作品。1957年在莫斯科举办了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苏联青年对西方的青年文化、对国外的时尚有了最初的了解。艺术节期间，还组织了苏联人实际上很陌生的西方现代艺术展。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彼·伊·柴可夫斯基比赛。美国青年钢琴家万·克里本的获胜成为“解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正是在苏联产生了非官方艺术。出现了试图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严格标准的艺术家小组。其中的一个小组工作在埃·米·别柳金（Э. М. Белютин）的“新现实”创作室，也正是这个创作室的画家（同该组织的“左翼”代表以及雕塑家恩·涅伊兹韦斯特内）在莫斯科艺术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遭到了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

另一小组联合了聚集在莫斯科郊外利昂诺佐沃的住宅里的艺术家和诗人。“非官方艺术”的代表们在距首都一百余公里的小城塔鲁萨搞创作，一些流放归来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居住。1962年马涅什画展上的丑闻之后，在报刊上对臭名昭著的“形式主义”和“缺乏思想性”展开了严厉批评，迫使这些艺术家转入“地下”，也就是搬到住宅里（从这里产生了“住宅展览”这一术语和“另类艺术”这一名称——俄文андеграунд来自英文Underground，意为地下）。

尽管私自出版物和“另类艺术”的读者基本上是由人数有限的创造性职业的代表组成（人文与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一少部分大学生），这些“解冻的燕子”对苏联社会精神氛围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人们对受官方检查的艺术作品出现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个人自由创作探索的权利正在确立。当局的反应基本上是对这类作品进行严厉批判以及将被批判的对象同读者、观众和听众隔离开

来。但是，也有过一些比此更为严重的情况：1964年对被指责为“不劳而获”的诗人约·亚·布罗茨基（И. А. Бродский）进行了审判，结果他被流放。

大多数从事创作的青年社会积极分子无意于公开反对现政权。人们仍然普遍坚信，苏联历史发展的逻辑要求无条件地放弃斯大林时代的政治领导方式，重新找回革命理想、循序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尽管赞成这些观点的人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直接政治继承人）。具有这种情绪的新一代代表人物通常被称作60年代人。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960年12月《青春时代》（Юность）杂志发表的斯·拉萨金（С. Рассадин）《论青年作家、他们的主人公和读者》的文章标题中。对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苏联政治制度可以革新的坚定信念将60年代人联结在了一起。这些情绪反映在所谓严肃风格的写生画中，也就是青年画家的有关同时代人日常劳动生活的作品，其特点是稳重的颜色层次变化、特写、宏伟壮观的形象[维·叶·波普科夫（В. Е. Попков）、尼·伊·安德罗诺夫（Н. И, Андронов）、泰·泰·萨拉霍夫（Т. Т. Салахов）等]，也反映在青年团体“现代人”和“塔甘卡”的戏剧演出中，特别是诗歌当中。

进入成年生活的战后第一代人认为，自己是神秘高峰的第一发现者和征服者的一代。有着乐观意义和漂亮隐喻的诗歌是“时代的共同创作者”，而青年诗人本身［叶·亚·叶甫图申科（Е. А. Евтушенко）、安·安·沃兹涅先斯基（А.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罗·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Р. И.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贝·阿·阿赫玛杜林娜（Б. А. Ахмадулина）］也是自己作品的最早读者的同龄人。他们对待当代人和当代问题都是精力充沛和据理力争。诗歌仿佛是用来大声朗读的。在大学教室里、在图书馆、在体育场，人们都在朗读他们的诗歌。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诗歌晚

会，礼堂里座无虚席。1962年，在卢日尼基体育馆里有1.4万人参加了诗歌朗诵会。

青年读者群对诗歌语言的浓厚兴趣决定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时的精神氛围。“弹唱诗”——歌手自行谱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的繁荣时期来到了。自编自演者那种信任的语气反映了新的一代对交往、坦率、真诚的渴望。布·沙·奥库贾瓦（Б. Ш. Окуджава）、尤·约·维兹博尔（Ю. И. Визбор）、尤·切·基姆（Ю. Ч. Ким）、阿·阿·加利奇（А. А. Галич）的读者群是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他们经常就令所有人激动的科技进步和人文主义价值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从官方文化的角度来看，由歌手自己谱曲并演唱的歌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歌曲晚会通常是在住宅里、在室外、在心气相近的友好伙伴中间进行的。这种交往成为60年代人的典型标志。

自由交往远远地超出拥挤的城市住宅。道路交通成为那个时代的明显象征。整个国家仿佛都开动起来了。人们到垦荒地，到七年计划的建筑工地，参加考察和地质勘察。那些发现未经探索的事物、征服高空的人们——垦荒者、地质工作者、飞行员、宇航员、建设者们——的劳动被看成是一种即使在和平生活中也存在的功勋。

人们简直可以到处去游览、去长途旅行和短途旅行，并且愿意选择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原始森林、冻土带或大山。道路被看成是精神自由、交往自由、选择自由的空间，就像那些年的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这个空间是不为生活琐事和日常忙碌所束缚的。

但是，在“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的争辩中，胜利看来仍旧属于代表科技进步的那些人。“解冻”年代的特征是我国科学的突破与设计思想的卓越成就。

科学幻想作品成为该时期最流行的文学种类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学者的职业充满着为国家和人类的幸福而建功立业的高昂激

情。献身科学、才干和青春适应时代精神，《一年中的九天》（Девять дней одного года）［米·米·罗姆导演（М. М. Ромм），1961年］这部关于青年物理学家的影片中便刻画出这样的形象。丹·亚·格拉宁的主人公们成为生命燃烧的典范。他描写的从事大气电子研究的青年物理学家的长篇小说《迎着雷电》（Иду на грозу）（1962年）很流行。苏联学者［列·达·朗道（Л. Д. Ландау）、帕·阿·切连科夫（П. А. Черенков）、伊·叶·塔姆（И. Е, Тамм）、伊·米·弗兰克（И. М. Франк）、尼·根·巴索夫（Н. Г. Басов）、亚·米·普罗霍罗夫（А. М. Прохоров）］获得三次诺贝尔物理学奖，[①] 这说明苏联科学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获得公认。

一些新的科学中心相继建立——新西伯利亚科学城，设在杜布纳的核研究所，普罗特维诺、奥布宁斯克和特罗伊次克（物理学）、泽列诺格勒（计算机技术）、普希诺和奥博连斯克（生物科学）。许多年轻的工程师、设计师在科学城居住和工作。这里有沸腾的科学和社会生活。举办展览会及由歌手自己谱曲并演唱的歌曲音乐会，上演一些不面向广大观众的艺术学校排练的戏剧。

我国的科学和技术成就被作为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而加以广泛宣传。“原子用于和平与进步”的思想是尤为普及的（而当时西方的形象，尤其是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和1964年越南战争开始之后，在报刊的宣传运动中就与侵略和“腐朽”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在宇宙和原子能开发的一系列标志性领域取得突破的同

---

① 列·达·朗道（1908—1968年），由于创立了凝聚态理论，特别是液态氦理论，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帕·阿·切连科夫（1904—1990年）、伊·叶·塔姆（1895—1971年）和伊·米·弗兰克（1908—1990年），由于发现并解释了切连科夫辐射，获得了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尼·根·巴索夫（1922—2001年）和亚·米·普罗霍罗夫（1916—2002年），由于他们从事量子电子学方面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导致了基于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原理制成的振荡器、放大器，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

时，在决定科技进步的其他许多关键领域（例如，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却很落后。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对创作过程的无礼干预，决定时代精神氛围的自由创作浪花逐渐消逝。

当局认为，“共产主义建设”前景的现实威胁还在于，尽管宣布了“培养新人”的目标，在苏联却无法根除宗教的自我意识。“解冻”时期的一个标志是，反宗教宣传再度活跃，俄罗斯东正教会遭受粗暴的行政压力。关闭了许多教堂（到 1965 年前，教堂的数量减至 7500 座，也就是同过去十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和修道院，取消了许多教区，对愿意接受宗教教育的年轻人施加粗暴的压力，禁止教会从事各种慈善活动，神甫必须对洗礼和婚礼进行登记，然后把这方面的材料送交克格勃。

为了公开信仰宗教观点，需要有不小的勇气。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即战后人们对宗教生活、对历史精神遗产的兴趣出现了第二次浪潮、它们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种选择。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圣像画、古罗斯雕刻和水彩壁画的遗迹，发表了描述这些作品的学术著作。1960 年，安德烈·鲁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ев）诞辰 600 周年之际，在莫斯科的斯帕索—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开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那里的陈设中有大量圣像。

1966 年出现了全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但是，大多数党的最高领导人认为，民族自我意识的复苏是社会政治思想统一的危险。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 1958 年 10 月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

认为，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一部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



13. 从公共住房到单独住宅："解冻"时期的日常生活

苏共新纲领（1961 年）以加速经济发展为方针，提出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必须使人们相信苏联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限潜力，并找到代替斯大林时代全面控制的硬性行政方法的东西。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国家领导人不准备采取很大的经济刺激，那么在没有经济刺激的情况下，如何激发主动精神，如何鼓励人们对劳动成果的高度关切。方法之一是在劳动集体之间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竞赛。竞赛的刺激因素是精神性的：优胜者得到的是流动红旗、流动三角旗和奖状。1958 年 10 月，在"莫斯科编组车站"机车库工人们（1919 年在该集体中产生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倡议下，组织了争创高生产指标的共产主义劳动队运动。

"解冻"时期，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宣传苏维埃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但是，精神鼓励措施对于保持高生产率显然是不够的。社会领域的发展严重落后于人们的需求。苏联在宇宙开发方面跑在前面，但就生活水平和质量而言，却远远地落在西方的后面。这种脱节必须立即消除，或者至少要在社会中保持一种信念：它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且将在基本社会指标方面很快赶上西方。

最现实的需求是解决住房问题。住房严重不足，城市里有很多家庭几十年居住在公共住房里，而且不论家里有几口人，都挤在一个房间。在费·谢·维索茨基（В. С. Высоцкий）的《童年之歌》（Баллада о детстве）一诗中很好地描写了笼罩在那里的气氛：

> 大家都活得平等、过得俭朴——
> 共用一条走廊。
> 三十八间房子——
> 一个公用厕所。
> 这里冷得上牙打下牙，
> 连小棉袄也不保暖，
> 在这里，我确确实实明白了，
> 一个戈比，它值多少钱。

人们继续从农村流入城市，特别是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身份证（1958年）以后。1962年，城市居民数量（1.112亿人）在国家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数量（1.086亿）。大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迅速增多，1959年苏联有89个这样的城市（战争前夕有47个），基础类工业企业附近的许多新建城市以及一些科学城发展起来。

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开始了真正的“住房革命”。1956—1964年间，城市住宅总面积增加了80%，结果大约有5400万人（苏联人口的1/4）得到新居。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设，用的是标准化的设计图和廉价的建筑材料——“没有多余的建筑装饰”。人们按照排队次序从国家那里获得免费住宅，而进入“排队者”名单的必须是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5平方米的家庭。到处都在建“赫鲁晓夫楼”小区，这种小区是按照典型住房建设的“第一只燕子”——莫斯科切廖穆什金的住宅式样建

设的。

这种住房很拥挤，房间通常是被一个简单的隔断墙分割，浴室和厕所为一体，厨房的平均面积为 5—6 平方米。为了给这种面积不大的住宅布置家具，需要采用新的工艺设计方法。出现了第一批大批量生产的本国式样的室内家具，折叠沙发取代了床，小碗柜取代了餐橱，壁橱取代了书柜。家具的实用和简朴符合“年轻的”时代精神。60 年代，时尚的室内布置中必不可少的标志物有：细腿儿茶几、悬挂书架和高 2.5 米天花板下的塑料盘形吊灯、电视机和录音机或放唱片的电唱机，当然，还有吉他。

新住房的装饰物也压缩到最低限度：常见的是墙上的印制版画或木刻画（以前是从《星火》杂志上翻印的绘画）、美国作家埃·海明威的照片。海明威的书和他的生活方式是与时代相适应的，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充满了浪漫的神秘气息，并且与他的蔑视日常生活礼仪的勇敢而独立的主人公、真正男子汉大丈夫的生活融为一体。人们常常试图模仿“海姆”的外部形象及其主人公的行为方式。

虽然 60 年代的标准住房无形之中很快就变得陈旧了，而且不再能够满足不断增多的家庭的需求，建筑质量往往很差，但大量家庭搬入单独的住宅这一事实本身的社会意义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住房问题的尖锐性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到缓解，还因为恢复了 1937 年停止的合作社建设。住房合作社吸引人们的个人储蓄，这些人可以通过 15 年内分期付款的方式得到住房。这种住房同“赫鲁晓夫楼”相比在设计上有所改进。

住房领域的国家政策并不局限于建廉价的五层楼。当时，还开展了学校、幼儿园、诊所、日常服务中心等“社会文化生活项目”的建设。然而，在数十年间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该领域长期拨款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严重不足。学校里，两班制上课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规。而且，个人休闲服务领域的缓慢发展不能满足

青年人的需求。别说中小城市，就连首都也几乎找不到可以“随便坐一会儿”的便宜咖啡馆。1960年代，出现了“一分钟”、“微笑”、“微风”等这类名字轻松的店，还有许多室内布置简朴、菜谱简单的饺子馆和羊肉馅饼铺。

事实上，公共食堂的服务质量和品种有待改善。最可以享用的消闲场所仍然是电影院，进剧院看流行戏剧是不可能的，人们要预约登记，并且站上几个小时来买票。

大众化的休闲方式仍然是体育运动。冬季运动项目尤为普及，这些运动是与振奋精神、克服困难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城市，成群结队的人兴致勃勃地从事“冬泳”活动——在冰冷的水里游泳。到郊外滑雪场或滑冰场是年轻人及家庭的休息方式。

对这些运动项目的浓厚兴趣也是受到了一些苏联运动员的优异成绩的鼓励，他们是1956年、1960年和196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滑冰运动员利·斯科布利科娃（Л. Скобликова）和叶·格里申（Е. Гришин）、“滑雪之王”В. 库津（В. Кузин）。体育运动被看做是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协调发展的个性”这一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体育运动设施严重缺乏。为了大众健康，广泛宣传大家容易学会的早操（无线电广播里，一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和工间操，也就是建议在工作日的专门休息时间做的一套保健操。为中小学生编创了专门的体操，人们在休养所和疗养院里做保健操。

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联欢节和展览会，许多新的风尚和日常文化潮流渗透到苏联。1950年代下半期，一些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穿奇装异服的人”——在穿着和举止上故意模仿西方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外国新影片中获得的。这是对全国人民“千篇一律”的一种可以做到的反抗形式。“穿奇装异服的人”的形象使人联想起对所有外国的、特别是风行美国的爵士乐队的崇拜。“穿奇装异服的人”成了

讽刺性出版物中挖苦嘲笑的对象，但到1950年代末，这些非难就开始平息了。

日常生活的某种民主化逐渐改变着苏联人的外貌，对时髦感兴趣不再被认为是“不配苏联人的”和不道德的。工业是按照规定的标准运行的，不能满足对时尚物品的需求，尽管当时安排了布匹的生产。衣服在服装店里定做、在家里照纸样子缝制，或者，如果走运的话，可以在寄卖店里买到，这里的东西来自于少数在国外居住过的本国人。化妆品开始流行起来。城市日常生活的色调变成另外的样子，出现了明亮的招牌、花布。当大量生产合成材料制品的时候，城里人的外表和日常生活开始有了特别明显的根本性变化。

“让化学走进生活”口号下的国民经济化学化被宣布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人们开始普遍喜爱化学，好像化学能实现科技进步时代人的创造才能。预计，未来的住房也将使用重量轻的合成材料来建造，这些材料很快并将永远取代天然材料。鲜艳的塑料玩具、餐具、尼龙服装等塑料制品，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50年代末，苏联的工厂开始大批生产合成材料做的尼龙长短袜、尼龙衬衫。这些东西最终为普通购买者所享用。轻薄的人造毛皮大衣开始取代常见的那种用普通布做的厚实的冬季大氅。用进口尼龙防水布做的雨衣是人们特别渴望得到的穿戴类物品。

人们的货币收入逐渐增加。实行了新的退休法，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以后有权退休。退休金增加了一倍，而且取决于工龄和年龄。为科学工作者、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保留了特殊的退休制度。工业部门低工资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在主要商品和服务的国家价格水平稳定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从1957年的40—45卢布增加到1960年代中期的60卢布。从1964年起，第一次对集体农庄庄员实行了退休金制度，当然这是在他们继续生

活在集体农庄的情况下。退休金的额度定在12—15卢布之间，其他的资金可以从副业中获得。除此之外，跟城市相比，集体农庄的退休年龄晚5年。与此同时，在消除“旧时代残余”的运动中，又一次展开了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副业的进攻。这些措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很快被废除，因为它们有加重城乡生活水平之间极不协调状况的危险。

城市居民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是国家通过非货币支付办法进行再分配的，其中不仅包括免费住房和一套社会性公用设施，而且包括免费疗养治疗、子女在少先队夏令营的休养和免费的国内旅行证明。最好的社会项目都处于那些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自身社会机构网络的大工厂的管辖之下。像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或“季纳莫”工厂等这样的一些企业，就附设了广泛的社会设施网，从食堂、少先队夏令营和幼儿园到体育场、俱乐部和疗养院，企业职工可免费或象征性地交一点钱利用这些设施。

由于1956年最终废除了1940年颁布的将工人固定于生产部门的法律，企业社会环境的发展成为工业部门吸引业务熟练干部的重要刺激因素。尽管专家与非熟练工作者在劳动报酬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这种再分配建立了大部分城市居民收入保持在相对同等水平上的机制。除了个别小群体（党、国家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最高层领导人、报酬很高的创作工作者）之外，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同样的。

1957年，国家不再发行公债券（内债除外，其债券可以自由买卖），在第二年则通过了冻结公债偿还20年的决定，这种偿还对预算来说已成为沉重的负担。社会上对冻结债券偿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一方面，有数百万人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积累了大量债券，而公债的大奖成为一项额外收入。另一方面，停止认购公债意味着每年都有资金节余。只是在1975年公债偿还才得以恢复。通货膨胀的增长导致1961年的货币改革。当时进行了货币改值，也

就是以 10:1 的比例以及按比例地改变价格和工资的情况下，将 1947 年版的旧纸币兑换成新纸币。发行了一直到苏联时代结束前都在流通的新硬币，其中包括 2 戈比硬币（用它可以拨打城市自动电话）和 5 戈比硬币（莫斯科地铁的票价）。但是，价格由于货币改值和“化整”而有所提高。

生活水平比战后十年提高了，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却遭受严重的失败。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没有足够数量的消费品作保障，“弄到”这一概念取代“买”这一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字眼。许多国产品无形陈旧了、质量明显低下，而且无可选择。为了组织经济中的“突破”并取得迅速的结果，当局试图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借助引人注目的口号和大规模宣传运动来获得精神力量，尝试实现这些措施。例如，有名的“玉米运动”就是这种冒险的创举。

“等着瞧吧，衣阿华州的母牛！”——在这样的号召下提出了短期内肉类、牛奶和食油的人均产量赶上美国的任务。但这也是一句没有现实经济基础的空洞口号。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上没有根据的行动计划（罢免赫鲁晓夫以后，它们被称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使得那些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思想受到贬低。口号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在 1960 年代中期被搬上银幕的喜剧剧本《欢迎，或者闲人免进》［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или Посторонним вход воспрещен，导演埃·格·克利莫夫（Э. Г. Климов）］和《“Ы”行动及舒里克的那些奇遇》［“ы”и другие приключение Шурика，导演列·约·盖达伊（Л. И. Гайдай）］中得到极好的反映。

由于有了新的生产需求和必须运用现代工艺，为工业部门培养高水平熟练干部变成了优先任务。根据 1959 年人口普查资料，43% 的人口受过高等、中等和不完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被视为提高生活水平和职业自我实现能力的一种保证，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高等教育。工人职业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学校毕业生不愿意到生

产第一线工作。学校教育体系以获得基础知识、而不是应用知识为方针，并把培养学生上大学作为目标。

但是，大学不能录取所有想上大学的人。那些有工龄的人、党和生产部门做出优秀鉴定的人和（对于青年人来说）在军队里服过役的人可以优先上大学。能够把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的夜大和函授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有 60% 以上的大学生在这一系统内学习。工程技术专业方面的培训具有优先地位。受大众欢迎的职业是工程师、教师和医生职业。领导者竭力使工人职业对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更具有吸引力，便提高这类职业的地位，其中包括采取增加劳动报酬的办法。为了使学校接近生产部门，开始进行了中等教育体制改革。1958 年 12 月，全日制十年制教育和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被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所取代。为了获得完全的中等教育，要么念完职业技术中专或中等技术学校并获得工作特长，要么在青年工人夜校（函授学校）学习。然而，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般低于普通中学。在普通学校里设立了 9—11 个年级，同时强化生产实践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这些倡议的物质技术保证很薄弱，并且学校中所建议的职业是随机拼凑的，因此不能使人们获得现代生产所必需的教育。1964 年罢免尼·谢·赫鲁晓夫以后，全国恢复了十年制教育。

14. 罢免尼·谢·赫鲁晓夫

到 1960 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政权仍然没有成为一套完整的自我发展体系。它的形成过程一直在继续，而且这过程是复杂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这首先是与组成这个政权机构的等级制度问题没有解决、缺少有目的地选拔最有才华和最精力充沛的人

有关。

尚未解决的最重大问题是“社会流动性”——领导干部的轮换（更迭）制。1960年代前制定的轮换机制是极为原始的：官员们或者因为退休，或者因为高升，或者作为由于以前工作令人不满意的一种特殊惩罚而调任其他职位时，才放弃自己的职位。建立明确的选拔标准、使轮换系统化的尝试是短时间的和没有实际效果的。官僚效率的主要指标依然是官员无可指摘的忠诚。

由于缺少能理顺的政权组织体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的唯意志论，另一方面是密谋、甚至政变的经常性危险。守住政权有时变成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尼·谢·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明显地证明，为了解决这一任务，常常要不由自主地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考虑到苏联的世界意义，也包括牺牲整个国际的稳定性）。

比方说，赫鲁晓夫的一项主要改革——管理权下放——其动机不仅是完善经营机制，而且是必须削弱苏联部长会议——苏共机关的主要竞争者（经常是B角）的政治地位。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可是被赫鲁晓夫视为自己主要支柱的苏共地方官员的影响却增强了。

地方分权的政策在当时尚不明显、但对苏维埃国家以后的命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果是，一股新的执政力量——地方党和经济部门的精英开始在个别地区（首先是各民族共和国）迅速壮大，对这些地方精英，莫斯科为了让他们听话，而没有去动他们。

在许多方面，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残余作斗争，是由赫鲁晓夫的个人动机预先决定了的。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前领袖的主要战友、现领袖的政治对手（维·米·莫洛托夫、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克·叶·伏罗希洛夫、尼·亚·布尔加宁等）的信誉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二十大路线”就意味

着苏联社会整个生活的民主化、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均衡发展、放弃同西方的对抗、建立和平共处等。实际上，也发生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尽管其中的许多变化具有某种赫鲁晓夫式的“乖戾”、即兴发挥、迷信于做出简单决定的特征。

尼·谢·赫鲁晓夫的功劳在于，他在隔离时期之后打开了面向西方、通往西方思想、情感、感知世界的“窗口”。大量地翻译西方文献，其中包括同时代的文献。大批苏联居民得以到西方国家旅行，其人数如果没有数百万、也有数十万。在二十大的讲台上，赫鲁晓夫号召苏共“认真地研究西方经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够提供的那些最好的东西，以利用世界技术进步的成就”。赫鲁晓夫重申了列宁在1902年阐述的思想：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里能自动运行的一切，在俄罗斯就必须借助于组织和自觉的努力才得以完成。1956年以后，庞大的国家惩罚机器的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但是暴力仍然是发展的手段之一。在诸如“科学共产主义”这样的新学科全面“繁荣”和赋予苏共中央作为国家分析——组织司令部职能的条件下，没有了国家这个杠杆，“科学方法”是不起作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强调重工业是基础，仍然要求居民做出不少牺牲。粮食价格上涨、商品短缺、数十万军人复员、1962年6月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由加勒比海危机导致的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同不久前的朋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破裂，这些远远不是“二十大路线”引起的困难甚至失败的全部。应该补充的是，在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作斗争的背景下，明显形成了新的（实际上不如说滑稽的）赫鲁晓夫崇拜的征状。

结果，无论是“斯大林路线”的支持者，还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改革的拥护者，对赫鲁晓夫不满的理由都很充分。这些人普遍确信，必须撤掉唯意志论者赫鲁晓夫——来自下层的普遍不满暂时

还不具有比新切尔卡斯克更严重的形势。1963 年下半年，党的中央委员们就开始在非正式场合议论当前的改革——将党的机关分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的荒谬甚至危害性的问题。

1964 年夏，赫鲁晓夫着手将许多农业科研机构从莫斯科搬到省里、再次缩减军队、实行八年国民经济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益处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其行政的、经营管理的和社会的费用却显而易见。当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再度勃发时，一系列的不满爆发出来。所有这一切加速了组织真正密谋的准备工作，加之在夏末赫鲁晓夫多次离开莫斯科相当长的时间。

最先提出罢免尼·谢·赫鲁晓夫的是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亚·尼·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积极支持他的人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德·斯·波利扬斯基（Д. С. Полянский）、苏联克格勃主席弗·叶·谢米恰斯内（В. Е，Семичастный）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尼·维·波德戈尔内（Н. В，Подгорный）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到 1964 年 10 月前，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其中大概也包括一些赫鲁晓夫最密切的朋友（如从 1964 年 7 月起主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工作的阿·伊·米高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密谋者的计划。显然，甚至对这次密谋是否合适或能否成功表示怀疑的那些人也没有持反对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对其发出危险信号的赫鲁晓夫本人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自信和平静。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到皮聪大度假之后，以讨论八年计划为由，召集了中央全会。1964 年 10 月 13 日，密谋的发起者邀请赫鲁晓夫速往莫斯科参加全会。还在机场上，赫鲁晓夫就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下级的陪同下来迎接他。赫鲁晓夫被直接送到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的现场。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与会者就向他劈头盖脸地发出种种责难。只有米高扬试图平息这种激烈批评的紧张气氛，但是由于其他发言人的坚决和一致，赫鲁晓夫不再反驳中央主席团的决定，自己

提出签署辞职声明。中央全会听取了米·安·苏斯洛夫的报告，没有经过讨论，便“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解除尼·谢·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

供思考的信息

关于“解冻”和尼·谢·赫鲁晓夫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争论

关于“解冻”时期在我国历史中的历史意义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很难找到比新圣女公墓里那座有名的墓碑能更直观地反映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政治作用的矛盾评价的东西，这个以白色和黑色大理石为背景的青铜头像是恩·涅伊兹韦斯特内，也就是赫鲁晓夫在著名的马涅什展览会上严厉批评的那位雕塑家创作的。

宣布有关苏联伟大成就的代价、关于政治镇压规模方面的情况，以及从劳改营中释放许多囚犯和给死者平反的重大使命落在了赫鲁晓夫的肩上。可以认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被流放的北高加索民族重返故土和恢复名誉也是赫鲁晓夫的功劳。赫鲁晓夫时期，对待工人的许多严酷法律被废除，集体农庄庄员获得了身份证，赋税减轻了，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改善，在大城市广泛开展了住房建设，居民所必须购买的公债被取消。

按照一些正统的观念，斯大林体制的反对派应该产生于居民当中。然而，情况却相反：改变斯大林体制的改革的推动因素来自上层——正如赫鲁晓夫自称的那样，是来自这种体制的一种“产物”。斯大林的主要清洗对象是党的领导人员，这种情况正是他们首先把斯大林的死看做是一种轻松这一事实的原因。

实际情况

作家康·米·西蒙诺夫这样描述过自己对斯大林最亲密战友因斯大林生病的感觉的印象的："我当时的感觉是，从那里，从后面那个房间来到主席团的那些人们，那些中央政治局的老委员们，当他们走出来时都有某种隐于内而不溢于表、但是却可感觉到的轻松感。这不时地隐现于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嗓音中、在他们的举止中，有某些东西并不符合于他们因斯大林生病所发表的讲话时的那些开场白，以及表示哀悼的结束语。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在那里，在主席团里，人们摆脱了压制他们的、钳制他们的那些东西。他们像是被松了绑似的。"



斯大林所提拔的人在他逝世之后出现反抗行为，其原因是他们已经疲于无休止的过度紧张、无所不包的军阀化和恐惧，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免于受镇压。尼·谢·赫鲁晓夫回忆说："这样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促使赫鲁晓夫实现制度自由化的复杂的综合因素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动因是渴望稳定的局势和安全。

就在斯大林葬礼之后过了几天，赫鲁晓夫就对西蒙诺夫大加责难，原因是后者于1953年3月19日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将反映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赫鲁晓夫要求撤掉西蒙诺夫的《文学报》主编职务。

批评赫鲁晓夫的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在制度自由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带有表面性和前后不一致的特点，这成为温·丘吉尔把赫鲁晓夫的政策比作想"两跳就跨越深渊"的依据。特别是，实施自由化过程中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表现在，尽管揭露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政治镇压，但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

治罪行，即表述了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而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清洗，首先触动的是这个系统的低层人员；而该系统范围内的高级职位仍由贝利亚的亲信所担任：谢·尼·克鲁格洛夫和伊·亚·谢罗夫将军在赫鲁晓夫时期成为内务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改革家本人，据他自己承认，曾经“手臂沾满了鲜血”。

实际情况

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时，直接号召镇压“人民的敌人”：“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



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回忆录证实了赫鲁晓夫积极参与了镇压活动。安·安·葛罗米柯证明，赫鲁晓夫很害怕揭露自己在镇压时期的作用。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大清洗时期，赫鲁晓夫不是消极的观望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在1935—1938年担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在1938—1939年担任乌克兰领导人期间，他都直接参与了镇压活动。费·米·布尔拉茨基（Ф. М. Бурлацкий）在其关于赫鲁晓夫的书中指出：“毫无疑问，他是大锤，而不是铁砧。”

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不仅在他生前而且在其身后，不止一次地认为这样的事实是赫鲁晓夫的过错：在他的反斯大林行动中，夺权并不是末位的因素。在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赫鲁晓夫不得不清除在政治阴谋方面富有经验的人，像他那些经验丰富的战友和同事，——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在三驾马车连续更换的过程中，他得以胜过他们。于是，在这场斗争中，“非斯大林化”并

不是最后的一张王牌。

赫鲁晓夫的情况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的政治升迁完全归功于斯大林。1930年代初，他同斯大林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登上国家权力的高层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推荐。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书记、后来又作为最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之一——乌克兰的头号人物而进入苏联最高领导集团。

由于他是自己那个时代的真正儿子，由于相信自己的统治权力（“我是世界上的头号共产主义者”），他完全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同斯大林遗产作斗争：就像斯大林一样，他也是从政权的性质具有绝对性这个概念出发的。

实际情况

费·米·布尔拉茨基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的红色、黑色、白色谋士》一书中写道：“也像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坚信，正是国家以及从上面下达计划、命令、指示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刺激因素。他是一个‘主张国家强力政权的人’，较之斯大林他不逊色，但较马克思和列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赫鲁晓夫领导参与下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从方法和模式上看同斯大林时代的代表大会没有多大区别……尽管表面上所有的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实际上，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他不容别人反驳，最重要的决定是他一个人做出的……在赫鲁晓夫和历代所有领导人的头脑中宗法制农户的传统模式是根深蒂固的……当然，赫鲁晓夫同自己周围最亲密的人商议，但就像是将军同中级军官商议那样。”



赫鲁晓夫的政治成就在许多方面是由他的性格促成的。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1946年与赫鲁晓夫见面之后，在自己的日记

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他的魅力在于纯粹的人民性。他的智慧也是人民的——开阔、讲求实际和富于幽默……而且，虽然他是俄罗斯人，却很难为乌克兰找到另外一位这样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与他在俄罗斯帝王宝座上的前任们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同人民打交道的风格。卡卢加的居民C. 波塔波夫回忆说："人们嘲笑赫鲁晓夫，斥骂他。但是，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心目中，他不是被嘲笑的对象。他们对他不怀恶感，更谈不到仇恨。而最主要的是，人们不害怕他，他也不害怕他们……在他们看来，他是人民自己的领导人。尽管他性格乖戾，但还是自己的领导人。在某些地方，人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把赫鲁晓夫称为'人民的沙皇'的。"这就是普通公民对赫鲁晓夫的印象。

如果说，在普通公民的认识中斯大林是类似于神的人，很少到被控制的人民那里去，那么取代他的赫鲁晓夫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对普通人来说是容易接近的领导人。

实际情况

阿·谢·切尔尼亚耶夫（A. C. Черняев）（苏共中央工作人员，20世纪80年代担任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助手）这样回忆在公共浴场第一次看见赫鲁晓夫时的情形："他头上缠着一块不像样子的布头，腰上戴着粗大的救生圈……令我惊奇的是，这个人（'领袖'）全然不为自己的那副样子而觉得难为情。肥胖的、松软的，而主要的是几乎完全裸露的，穿着紧身的白色棉布游泳裤。他一点儿也没有想过，他可能显得怪诞、可笑，至少有失体面。"



然而，赫鲁晓夫外表的俭朴和"人民性"并不排除他首先是一个历经斗争锻炼的政治斗士。

实际情况

1950年代末经常见到赫鲁晓夫的费·米·布尔拉茨基写道："那时，赫鲁晓夫已年过六旬，但看上去很结实。他活泼好动，又很快乐，甚至很顽皮……只有那双小眼睛、褐色的小眼睛时而充满幽默，时而愤怒。只不过我要重复的是，这双有时闪烁着善良、有时闪烁着威严的小眼睛，透露出他是一个历经水火考验和大风大浪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并且有能力应付最急剧的转变，这无论是在谈话中、在正式的讲话里，或者在国家的决议中……在平常的人际关系中，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在政治上，他就不是善良的了。"



赫鲁晓夫易冲动、脾气暴躁、容易激动，这往往在他的政策中起着负面作用。赫鲁晓夫本人的阴晴无定和暴躁的性格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的许多事件产生了影响。如果他对某种想法（类似积极推行种植玉米）着迷到忘我的程度，他就准备实行了，不去考虑任何障碍和常理。曾多次与赫鲁晓夫见面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回忆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一个好冲动的人，这在他身上同永不枯竭的精力结合在一起，这也使他很有魅力，但是经常导致可悲的后果……"

总体来讲，如果谈到赫鲁晓夫政策的客观结果，那么他是得到了居民的普遍支持，因为释放了大量囚犯、开始了大规模住房建设，数百万个家庭得以从公共住房搬进单独住宅，为莫斯科的交通要道——新阿尔巴特大街（当时的加里宁大街）以及为卢日尼基体育馆和代表大会堂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使他辞职，究竟为什么并没有对苏联公民产生任何影

响？与克格勃的担心相反，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完全得到赞同，甚至令人高兴。

赫鲁晓夫的女婿、记者阿列克谢·阿朱别依后来回忆道：尤里·加加林的星际飞行好像将“赫鲁晓夫的十年”拆成两部分。政治、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下滑变得越来越明显。

反对赫鲁晓夫的密谋看来是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进行的，当时他的所有反对者都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留下来的几乎都是赫鲁晓夫自己一手提拔的人。问题在于，他们这些人或早或迟地都会遭遇到赫鲁晓夫的唾弃。对进入最高领导层的人的回忆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赫鲁晓夫提拔的人都没有逃脱一时的或最终的失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成了批判的靶子。

著名电影导演米·伊·罗姆参加的一次中央全会按惯例邀请了2000多位来宾，会上赫鲁晓夫对某些苏共中央委员喊叫，而且是毫无理由的喊叫，罗姆对此感到惊异：“我甚至觉得心情沮丧。老实说，我没有想到，对中央委员也可以像对小孩子那样喊叫。”

历史学家证实，赫鲁晓夫在他辞职之前的一年内，当时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十分准确地预断了自己所提拔的一些人的未来。1963年10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提出有关能继承其权力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的问题，赫鲁晓夫在回答时说出了列·伊·勃列日涅夫、阿·尼·柯西金和尼·维·波德戈尔内。然而，这并未妨碍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给予如此严厉的批评，以至于在1964年下半年他们认为自己不可避免地将辞职。而且，这种批评通常是有伤尊严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发生在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场合。

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导人中间的地位不断下降，能证明这一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300多名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吸引

到反对赫鲁晓夫的密谋当中，但其中只有一个人试图向赫鲁晓夫预先通报即将发生的事件。而且，甚至从密谋者中的一位警卫人员那里获悉正在准备之中的政变以后，赫鲁晓夫都没有在意，似乎他还觉得自己具有无限权力。

“赫鲁晓夫鸟巢里的雏鸟”之所以团结一致地出动，其原因是干部的频繁更迭和最高权力层的改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业领域。众所周知，这一部门是赫鲁晓夫独自领导的一个领域。他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指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席播种什么、怎么播种、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赫鲁晓夫在执政时期撤掉了五位农业部长，每一次撤换新提拔的人都是以不胜任本职工作为由的。

对赫鲁晓夫的辞职普遍表现出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他虽然有着美好的意愿，却无意中引起了各类居民对其政策的不满。几乎人人都有这种不满的理由。正如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那样，上层官僚们对取消部分特权和经常不断的干部改组不满；把州委员会分成城市委员会和农村委员会引起特别的不满。最高军事指挥人员对急剧缩减陆军、海军和国防开支感到不满，所有的军人对减少按工作年限而发放的退休金不满。外交官们指责赫鲁晓夫在将国家置于核战争边缘的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不成功策略、与中国关系破裂以及其他一些同样具有极大危害性的外交行动。取消工资和养老金方面的优待也未能提高赫鲁晓夫在内务部系统内的威信。赞成文化领域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认为言论太受限制，并且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赫鲁晓夫跟文化人士关系的严厉风格又不能不把知识分子推向一边。在科学界，人们记得在选举李森科的追随者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时的公开施压，以在选举失败的情况下解散科学院相威胁。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居民们由于附加工资被无理取消而受到伤害，全国的居民因造成价格上涨、商品短缺的卢布改值而蒙受损失。集体农庄庄员们不满于对

宅旁地经营的再次进攻。信教的人们因压制东正教会和关闭大批教堂而被深深地激怒。

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倦。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对外政策上这种乌托邦主义表现的程度也不小。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其主要阶段恰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将它看做是资本主义最终崩溃和共产主义提前来临的标志。这促使他开展了一系列对获得解放的国家进行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非资源性计划。

赫鲁晓夫向全国提出的任务是巨大的，大部分是完成不了的。赫鲁晓夫的难以捉摸、他的源于激情而不是实际计算的渴求，使人们有理由指责他“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实际上这就是冒险主义、就是使党和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愿望。

在赫鲁晓夫的垮台中，他的个人崇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获得讽刺性模拟形式的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离奇般地代替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

赫鲁晓夫的主要功绩是停止了大规模镇压、制度自由化。辞职前，他对反对自己的人声称：“难道有谁能想象，我们可以对斯大林说：我们对他不满意，并建议他辞职吗？那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的。”1964 年十月全会上被免去一切职务后，回到家里，他对家人说：“也许，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用一般表决的方式撤换我，如果是斯大林的话，就会下令把他们所有人都逮捕。”

第3章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

15. 新领导集体政治方针的形成

在解除尼·谢·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之时，避免了异常情况的出现，而罢免程序本身从形式上看既没违犯宪法，也没违犯党章。罢免是在执政的上层人物和普通公民的意向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赫鲁晓夫签署了1964年10月14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的辞去所有职务的声明。米·安·苏斯洛夫（M. A. Суслов）作了关于主席团决议的报告，他关注的仅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但回避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失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本人没有发言，对报告的争论也没有公开。后来，赫鲁晓夫认为，撤换自己仅仅需要中央全会的决议而不是像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这就是自己的功劳。

全会选出了新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他们既不像斯大林那样有威望，也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令人难以琢磨。列·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勃列日涅夫的军人生涯对其当选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参加了卫国战争中最英勇的一次战役——争夺新罗西斯克战役，获得了战斗勋章。勃列日涅夫已经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几年了，尽管就性格气质来讲他不是当领袖的料，而是个负责任的可靠执行者。

观　点

“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或赫鲁晓夫不同，他没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很难称其为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他是个机关办事员，就实质来讲，他是机关的仆从。”（亚·鲍文）

“勃列日涅夫与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锐意创新和改革的赫鲁晓夫截然不同。”（费·布尔拉茨基）

“如果考虑到人品，那么勃列日涅夫总体来讲是个不错的人，他善于交际，有固定的爱好，是一个亲切、好客的当家人。他喜欢打猎、玩多米诺骨牌，喜欢看‘警匪’片，津津乐道于他能享受到的各种生活乐趣。

在日常生活方面，他是个善良的人。在政治上则未必……他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知识水平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如果在屠格涅夫时代他会是个拥有大宅院的慷慨好客的声望好的地主。”（亚·鲍文）



勃列日涅夫不具备卓越的国务活动能力并没有令国家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感到不安。相反，正是资质平平使他几乎成了别无选择的竞争者，因为这使各个集团有望操纵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可以取而代之。因此把勃列日涅夫推上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实际执政者的岗位，首先符合不受党内某些代表的思想和政治偏好束缚的党的权贵们的要求和意向。在这样的情势下提高国家生活水平的任务仍处于第二位。

阿·尼·柯西金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是属于最为出色的“斯大林时代的人民委员”那种人——是一位意志坚定、有头脑、坚决果断、精力充沛的工业领导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则由尼·维·波德戈尔内（Н. В. Подгорный）担任。

掌权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实际上只是对赫鲁晓

夫政策的否定态度把他们联合在了一起，这甚至在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十月全会上作的报告中都可以看出。在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风格和民主工作准则、指责他的唯意志论和建立新的个人崇拜的报告中，改革的拥护者们［阿·尼·柯西金、尤·弗·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бов）］的情绪得到了反映。当时，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新措施的突出缺陷就是削弱党的新闻检查制度："真是令人难以设想，早上我一打开《消息报》都不知道在里面会看到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普通成员（或许可以称为普通的党的工作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提出的带有某种无足轻重的批评腔调的发言也令保守派愤怒——似乎传统和党纪都遭到了破坏，尽管这样的言论从形式上讲并非党章所不容许，相反是得到赞成的。

15.1　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

对赫鲁晓夫的相互矛盾的评价导致无法制定一个统一的、始终一贯的国家发展纲要，甚至都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班子"。1964 年十月全会之后，改革派和保守派展开了争取影响党的领袖的决定性的斗争（尽管对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成员来说这种斗争是暗中进行的）。

在中央机关里，主要是在它的中层干部中，"二十大方针"的拥护者不少，其中大多数认为，之所以要罢黜赫鲁晓夫正是为了避免歪曲这一方针。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的活动是同已经展开的同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后果进行的斗争相联系的，也是同强调发展市场关系的经济改革的开端相关联的。1965 年 9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各个专门的部，而且还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工业党—国家组织和农业党—国家组织的合并。

同时，在新领导集团中，推翻赫鲁晓夫的主要组织者阿·尼·

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很出色，他是一个相对年轻、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克格勃的头头弗·叶·谢米恰斯内（В. Е. Семичастный）和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尼·格·叶戈雷切夫（Н. Г. Егорычев）支持他。1964年底，谢列平向勃列日涅夫递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回归斯大林政策的纲要，其中包括采取镇压手段。谢列平的意见，也可能是他的自负，得到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有影响的活动家的支持。完全实施保守派的行动计划就意味着对新更换的政权造成现实威胁。

为斯大林模式恢复名誉的计划不是秘密。"二十大方针"拥护者的不满表现在，由一批著名的科学和文化活动家签名的个人和集体的抗议信纷纷寄给苏共中央。这些活动完全合法，但在以前完全不可能。反对一部分政治领导人计划的公开抗议呼声的出现，实际上对苏联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这一切迫使勃列日涅夫在相互对立的派别之间采用密谋和随机应变手段时极其审慎，而这些手段是勃列日涅夫在官运亨通时大量熟练地使用的。

1965年5月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时，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偏好显露出来。在十年间，作为胜利组织者的斯大林的名字被首次从正面提到。全体听众的反应是出乎预料的——热烈欢呼持续了几分钟，这突出地反映了党的权贵们的情绪。一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莫斯科共产党的领袖叶戈雷切夫已经公开表达了对揭露"虚构的斯大林主义恐怖"的不满，大厅再次出现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斯大林时代的现实的回归是羞羞答答地进行的，而且主要是以象征的方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被更名为中央政治局，而党的领袖开始（像斯大林那样）被称为总书记，而不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称第一书记。但是，保守派的激进要求中只有一项得到了满足——即在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从党章中删除了有关党的干部的更换规则的指示。这一措施实际上保证

了整个书记处成员始终掌权。这种情况的后果在十几年后不可避免地表现了出来，当时苏联最高层出现了著名的“老人掌权”现象（老人政权）。

勃列日涅夫的优柔寡断越来越令亲斯大林派气愤，而党的上层的情绪激励着亲斯大林派采取积极行动。1965年秋，谢列平的战友、克格勃的头目谢米恰斯内（Семичастный）竟敢按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做法精神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逮捕了作家西尼亚夫斯基（А. Д. Синявский）和达尼埃尔（Ю. М. Даниэль），引发了指控他们从事反苏活动的司法审判。这不仅是对国内外自由主义思想的挑战，也是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挑战：出现了以夺取全部权力为目标的斯大林分子在政治上不受监督的先例。但是，克格勃的行为引起了令发起者始料不及的反应——知识分子的公开抗议。除了致信苏共中央外，出现了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1965年12月5日，苏联的宪法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了群众集会，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和“我们要求审判公开”。这是1927年11月7日之后，苏联的第一次公开的政治性游行示威。

抗议者的活动完全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因此，运用刑法典有关反苏鼓动和宣传的条款（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是根据这一条被定罪的）对付他们是不可能的。1966年9月刑法典中加入了3个新的条款——190条第1款（“散布明知是捏造的诋毁苏维埃制度的谣言”）、190条第2款（“侮辱国旗或国徽的行为”）和190条第3款（“粗暴破坏社会秩序的结伙行动”）。可以把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比作连锁反应：对那些最积极抗议者的镇压，对这些镇压的抗议，新一轮的镇压和相应的新一轮的抗议……抗议运动的参加者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而运动本身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些抗议的规模比较小（譬如，反对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最积极的保护者定罪的信有738人署名），但是它们在国外报

刊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成了苏联知识分子中间积极讨论的题目。

另一个事件，外界很少知道，但是逐渐消解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严重威胁，该事件也是与谢列平的一个志同道合者——叶戈雷切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67 年 6 月，在中央全会上，叶戈雷切夫对国家的国防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体来讲，这也是表达对勃列日涅夫政策不满的一个借口。

15.2 勃列日涅夫的方针

政治自保的本能要求勃列日涅夫把斯大林主义者清除出国家的领导层。勃列日涅夫非常巧妙地完成了这件事。借口特工机关工作效率低，没能及时防止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逃往西方，撤掉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随后，把领导中有较强影响的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组织的叶戈雷切夫调去做外交工作——任命他为丹麦大使。1967 年 9 月，谢列平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一职。他被任命担任苏联工会主席这一不起眼的职务。

现在，勃列日涅夫才感到完全放心：他非常熟悉并完全信任的人取代了从领导岗位上撤下的活动家。

当权的上层人物情绪的捉摸不定，客观来讲是整个苏联社会相互矛盾的一些期待所引起的。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苏联迄今为止获得了史无先例的顺利发展，并且期待着这些成就变得更大。但与此同时，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明白，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个人对国家意志的绝对服从、对各种艰难困苦做好毫无怨言的准备，都是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

可以大胆地说，在 1965—1985 年这段时期，共产党本身已经使自己的特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党员人数达到 1900 万。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公民都已经加入共产党。入党不再像是

参加革命组织。

但是，没有清楚明确地提出的、为大多数人理解和赞同的高尚目标，想要采取新的动员式的跃进方针是不可能的，因为高尚目标的重要意义就是可以证明所付出的忘我努力是值得的。赫鲁晓夫尝试把在单独一个国家直接建成共产主义宣布为这样的高尚目标，然而这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党的领导集团就这样把苏联的整个意识形态引入了死胡同。半个世纪来的不断苦干，造成的结果是使动员方案根本不得人心。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开始，正是以探寻能够减轻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压力这样一种战略为标志。新的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的主要思想很简单：在不过分紧张的条件下按既定的构架发展，什么都不改变。稳定成了国家方针的主要口号，这种政策在“发达社会主义构想”中找到了意识形态包装，而这一构想的提出也就揭开了勃列日涅夫本人执政时代的阶段。

同时代文献资料

■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简历

勃列日涅夫 1906 年出生于一个冶金工人家庭。少年时代，他在革命后到一所劳动学校的一个中学学习，后来完成了库尔斯克土地规划中等技术学校的学业，刚 25 岁就入了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就开始了政治生涯。1937 年 5 月，勃列日涅夫成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 1946 年前，任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方面军和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后来勃列日涅夫转到地方从事党务工作，1946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1947 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后来的晋升得到了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后来的联共（布）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最积极支持。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当选苏

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去世后进了苏联陆军和海军总政治部。1954年2月，他先当选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二书记，而后是第一书记。1956年，勃列日涅夫重新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1958年，在从政治舞台上铲除掉了赫鲁晓夫的所有对手之后，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随后，从1960年5月到1964年7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从6月起同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这样，到中央委员会十月（1964年）全会前夕，勃列日涅夫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这当然使他很容易地就攫取了政权。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

■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简历**

柯西金生于1904年。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1938年，他已经担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工业运输部部长，从1939年开始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从1941年秋开始及整个1942年，担任疏散委员会副主席。

柯西金同因捏造的“列宁格勒案件”而被捕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阿·亚·库兹涅佐夫、米·伊·罗季奥诺夫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往甚密。但柯西金幸免于难。

1953—1960年，柯西金任轻工和食品工业部部长。1960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他是苏联工业生产和计划的整个系统的实际领导人。1964年到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0年，因健康原因卸任后很快去世。



16. 经济政策：改革的尝试和拒绝根本性变革

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探寻新的经

济模式。这一意图的实质是，通过把市场刺激因素纳入统一国家计划的僵化体制内的方式使统一的国家计划的僵化体制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主要任务在于：提高生产者与自己劳动成果的利益关系。衡量工作成效的关键性指标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生产总值，而是销售生产的商品所获得的利润。因此，企业和每一个企业员工都只一心生产能满足消费者的产品，而不是生产市场上经常无人问津的商品。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势曾被认为是建立起对各个生产部门和产品分配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计划的方法，不允许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突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的发生。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的思想——这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本公理。至少认为，只有通过实行对所有生产资源的国家垄断（动用各种资源）才能达到稳定地向前发展，而理想是彻底消灭市场因素的任何表现形式，比如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大量的投资集中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面，而且这么做，通常不考虑短期经济效果。这一点在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候的极端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明显。

观　点

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监控系统，显示了自己的效力，并保证了工业化进程中、战争年代和战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就。这之所以成为可能，第一，是因为监控的客体本身相对简单——几乎所有的经济任务都这样或那样地归于一个主要任务——国家的国防能力问题。第二，监控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没有限度——对所有的国家机构，其中包括护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都进行监控，而且以这些机关本身所特有的方式进行。第三，整个这个系统都是超级中央集权化的，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受斯大林亲自监控的。

但是，在胜利之后出现较长和平时期的前景条件下，经济发展

的任务变得较为多样。它们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规律”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成效的主要标准被认定为——它满足每个人的个人需求的能力。但是，应该看到，对这些需求的考虑与动员工作的逻辑是完全矛盾的。

当时，随着斯大林主义成为历史，整个监控系统逐渐地失去了无孔不入的中央集权性，这也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国家安全部门和机关进行斗争的结果。最后，监控手段本身也变得温和多了，已经不能使人们处于过去的恐惧和紧张状态了。因此，劳动成就的主要动因，第一，是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第二，对职工不断增长的物质刺激。



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一个庞大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工厂”，这个“工厂”按计划运转，是公有制。

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础，正如苏联宪法所宣布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集体农庄是苏联农业企业的主要形式。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在苏联是不允许的。

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区别。除了属于国家财产的土地之外，集体农庄的财产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区别在管理的方式上。国家管理机关（各个部委）任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而集体农庄的主席是集体选举。

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所有制，还是管理方式，不存在任何原则性区别。集体农庄主席的选举，像苏联所有的选举一样，徒具形式。其候选人由苏共区委提出，而集体农庄庄员只是在会议上对候选人进行确认。实际上始终都是确认。集体农庄主席和工业企业的厂长都进入苏联共产党相应的委员会的花名册，并完全

受党支配。

苏联经济是按指令性计划的程序进行管理的。首先是每五年召开一次的苏联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然后是最高苏维埃例会批准五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的那些指标，联盟和各共和国的部委、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应该在未来的五年里完成。

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特殊的管理机关，为企业准备五年计划并在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各个年度的计划。企业必须要达到计划的指标。企业各种必需的资源的供应，也是通过另一个管理机关——国家供给委员会统一进行供应。

苏联的企业相互间进行贸易，并把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居民。但这不是市场贸易。国家确定产品的价格，国家也决定生产规模和商品流向。简单地说，某种用途的产品卖给谁、卖多少都由国家决定。

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同，苏联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不是获取利润。苏联的企业完全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并促使其完成计划。尽管完不成计划有可能影响到劳动者获得奖金的数额，但领导者认为其主要后果是会威胁到自己的晋升。

不仅苏联的各个部委，就连苏联共产党设立的与部长会议各个部委相对应的委员会都关注计划完成的进展情况。每一个地区的党委必定设有负责完成计划的工业部和农业部。既然绝大多数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是苏共党员，那么完成计划就不仅被看做是行政责任，而且也被看做是党的责任。指令性经济造成的极为不利的影响之一是能够促进生产采用科技成果的科技革命的滞后。在战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世界发达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毫无例外地发生了劳动生产率急速飞跃的增长。集约经营不仅能为生产提供更为完善的技术装备，而且还表现在使用新材料和改善产品质量上。整个生产过程都在发生彻底改变，变得更加灵活，能够不断更新。

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况表现得很差，而且仅限于低水平上。原因绝不在于缺少科技成果。相反，当时苏联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震惊。但是，要把这些成就运用到大规模的生产中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因素——劳动者出于个人利益的投入。斯大林时代那种对惩罚的恐惧的特征已经成为过去，期待着在未来能使自觉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那种建立在动员体制原则上的个人利益不可能成为导致苏联经济发生质变的因素。

计划经济实际上既不激励单个劳动者，也基本上不能激励企业开展有效的工作。尽管因工作出色而发给奖金，诸如这样的经济杠杆盛行，苏联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限制经济不平等程度为取向。尽力不让赚比该赚的钱更多的钱，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但这导致苏联公民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法地大幅度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他的工资和可能得到的奖金的数额都有明确的规定。他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对他的收入的影响都很小。

因此，新的政治目标、建立在物质刺激基础上的经济方针和任务、庞大经济机器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原有的劳动刺激因素不够有效，此外，“不再挨皮鞭但并未得到蜜糖饼干”的社会出现的消极发展趋势，总体来讲，这一切都促使苏联新的领导人进行触动命令式经济基础本身的大规模改革。在世界性竞争中的落后地位也迫使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

16.1 “柯西金改革”

新领导人在指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时，宣布对经济采取科学的态度。这时，利用经济（市场、经济核算、企业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手段和利用行政（改善经济机制）手段两条路线发生了冲突。1965年的经济改革成了这两条路线之间的妥协。

工业上恢复了部门管理，但同时也拟定在实行经济核算制基础上的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筹资金）成为生产的主要环节。企业的固定资产仍属国家所有，企业应该为使用这些资产付给国家租金。企业需要购买燃料、能源和原料。这就促使厂长节省燃料，销售产品的数量是效率评定的主要指标，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企业的利润，用利润支付了税款和其他给国家的扣除款之后，形成生产发展基金、物质奖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房建设基金。这些基金由企业经理处支配。这样，生产者的利益直接受其所生产产品的供求支配。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取决于此，工作人员可以从物质奖励基金中得到货币奖金。

现在生产计划要求“从下面”开始：企业经理处自己拟订计划指标、产品名录（清单）和工资基金，但是这些指标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更进一步确定和批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五年计划的决定后，这些指标就变成了企业必须履行的。计划指标的数量缩减了。现在“从上面”提出的只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产品的总量、最重要产品的清单和工资基金总额。计划不许更改。

在农业领域也提倡有依据的科学态度。1965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一次例行会议上讨论了《关于今后农业发展》的问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国家任务的框架内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经营独立性。国家计划本身定得很低，且宣布今后 10 年不变。采购价格被提高了 0.5—1 倍，而超出国家计划的供应必须按照提高了的价格采购。此外，取消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债务，而农业机器技术设备和配件的价格降低了。农场和农庄据以向国家报告经济工作的指标数也大大缩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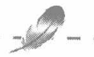
为了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利益，以每月有保障的按国营农场规定的标准发放货币和食品取代劳动日记工的方式。

观 点

水利工程设计院详细制订了规模宏大的计划：把北方河流（北德维纳河、伯朝拉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水量调到南方，建新运河（多瑙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恰格拉伊河、额尔齐斯—卡拉干达）以灌溉南方新的适宜耕种的土地并增加牧场的蓄水量。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由于这个计划需要巨额开支并有可能引起不可预测的生态后果，先是被冻结，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完全放弃。

1969年11月末，第三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在章程中宣布扩大集体农庄的经济自主性。但是，这些举措太迟了，15年中有8年歉收：1969年、1972年、1974年、1975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4年。歉收的原因不仅仅是自然灾害：霜冻、可怕的旱灾、南方过度开垦土地上的“沙尘暴”等等，还有劳动组织陈旧的因素。

繁重的手工劳作占去了农业中70%的劳动力。农村劳动人手仍旧不足。197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不足，制订了新的农业生产集中化的计划。决定取消20万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农村”。关闭了这些农村的学校、小商铺、俱乐部。这些农村中居民的命运没有让当局感到太大不安。从1972年开始恢复从国外越来越大规模地采购谷物。



经济改革进行的过程非常小心谨慎，并考虑到了意识形态里的障碍：1966年只有43家企业转为经济核算制，次年——7000家，它们总共生产国家工业品的40%左右。直到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末期（1966—1970年），新办法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施行，并波及运输业和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部门。

尽管犹豫不决和保守主义不允许改革者的计划得以彻底的实

现，但到1960年代末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66年新措施在农业中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入增长了15%，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总体来讲，第八个五年计划是作为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载入苏联历史的：农业产量增长21%（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12%），工业增长50.5%，居民收入增长了0.5倍。

建立苏联统一的能源系统工作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为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集约化经营创造了重要前提。在国外市场上，苏联明显提升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国产汽车、建筑技术、农业技术、客机、一些消费品（手表、业余爱好者使用的照相器材）及很多其他商品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需求。

16.2　行政命令体制的保留

同时，苏联经济发展的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它的发展仍旧主要不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集约化经营）来保证的，而是通过把所有的新资源都投入到生产中（粗放性经营）来保证的。柯西金改革难于实施的主要原因是持保守态度的领导人对改革的抵制。可以以1967年在图拉州晓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开始的实验为例：企业允许裁减多余的员工，而被裁减的人员的那部分工资在剩下的人员之间进行分配。结果是，在两年的时间里，职工人数由6000人减到5000人，而产品的产量相反却增长了80%。尽管如此，但是实验仍然被终止了，因为，第一，它使人对可能出现的失业现象感到担心；第二，它使人对不受监督地使用国家资源感到恐惧。

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改革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希望在国家垄断条件下使市场成为优质生产的绝对刺激因素，这是不合理

的。很多企业很快就学会了，可以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比如，人为地提高价格，节省原料，以生产合理化为借口简化生产工艺，等等）提高利润。结果，在一些情况下，产品的质量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常常更差，同时还引起了损害劳动者消费利益的通货膨胀。

改革的缺陷还体现在各经济集团的利益矛盾日渐加深。资源成了不和之因，资源的所有权是国家垄断，但在资源的使用上，为从经理、各个部门（部委）的官僚、地方领导集团、最后是党的机关方面支配资源提供了更大的（常常是自私自利的）可能。作为一种后果，发生了“减轻”使用国有财富责任的事情，也就意味着，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体制的有效性全面降低，影子经济发展的土壤出现。

诸如建设超大型工厂方针这样的非常典型的改革行为，可以说考虑极为不周。报刊和人民“关心”的大型工业企业很快就变成了抵制替代性生产的垄断者，造成不可能出现优质商品的竞争。结果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仅仅这种情况就提出了继续进行市场改革的问题，因为没有竞争的市场是难以想象的。

鉴于这些情况，“柯西金改革”已经无法克服196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中出现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客观存在的消极势头。实际放弃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外部理由是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因为，在这些国家当时在市场改革的背景下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本身的实际威胁。从这些事件来看，改革的命运已经被最终决定了，尽管谁也没有正式取消改革，但谁也没有再重新考虑改革的主要原则。

经济改革失败的影响首先在于，社会改革的思想再一次遭到败坏。以稳定为特征的政治方针的优势地位（此时得以最终确立），几乎排除了任何其后果有可能威胁到习惯状况改变的措施。

16.3　“停滞”

苏联经济的巨大潜力、它在不久前取得的成功让人们坚信，出现困难是暂时的。同时，在苏联境内发现了为粗放型发展提供可能的新资源，即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储量巨大。这一切都注定了1970年代国家的社会经济“停滞”。

宣布“完善经济机制”方针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表面上看，这一方针与原来的方针差别不大。提出的还是那些任务——发展经济核算制、发挥物质刺激、生产转向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等等。但是，实际上这是强化统一管理并向追求生产数量的提高，而不是质量提高的指标回归的表现。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和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中，已经不提加快发展速度的任务了，只是要求增加产品总额。结果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3%，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了24%，农业相应的为13%和9%。与此同时，五年计划的计划任务都没有完成：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完成计划的91%（农业68%）；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完成计划的67%（农业56%）。因此，在1970年代，苏联经济下降到简单再生产的水平，最多只能满足业已形成的居民的需求。

当时，人们的需求逐渐增强，与国家的经济能力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其结果是工业品和食品的经常性短缺，而且经常是生活必需品短缺。在远离中央的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地区——西伯利亚、北部、乌拉尔和远东，商品供应情况更差。这些地方，在197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只向某类居民（哺乳的母亲、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重病患者等等）凭票出售某些种类的食品的一些尝试。在1980年代初，对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和国来讲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准则。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

首都和一些其他城市，包括被称为科学城的一些城市（如莫斯科近郊的加里宁格勒，即今天的科罗廖夫等等）和致力于国防工业的“保密”城市——阿尔扎马斯-16、车里雅宾斯克-40 等等，是相对富足的“一些孤岛”。

与加紧军备竞赛相关联的苏联经济的比例失调，在造成这种局势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世界稳定的必要的、起抑制作用的因素，但是，国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常常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投入生产型号过时的武器或者促进核潜力的过多积累。这一切挪走了用于“民用”生产的集约化任务的人力和物力资金与力量。

拒绝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按照旧办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开始靠不断增长的进口来补足优质商品和自己生产粮食的缺乏，开始靠不断增长的进口来补足。苏联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谷物进口国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参见下表）。

苏联和日本的谷物进口

单位：百万吨

	1970	1975	1980	1983	1984	1985
苏　联	2. 2	15. 9	29. 4	33. 9	46. 0	45. 6
日　本	15. 8	19. 0	24. 7	25. 5	27. 2	26. 9

到 1980 年代中期，每 3 吨粮食加工产品中就有 1 吨是用进口粮食生产的。畜牧产品的生产是建立在谷物进口基础上的。苏联不得不签署供应谷物的长期协定，承担每年必须从美国购买不少于 900 万吨、在加拿大购买不少于 500 万吨、在阿根廷购买不少于 400 万吨的粮食。

靠黄金储备、外债和出口换汇作为在国外采购的资金来源。只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动用黄金储备还是相当罕见的现象。主要靠

提高外贸的利润率。靠燃料和矿物的出口也可以非常容易地在国外市场上获取一席之地。

在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由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19倍，原料价格提高了7—9倍，苏联获取了巨额收入。用卖燃料和原料的进款购买大众消费品及其生产设备。

采掘综合体、首先是燃料—能源采掘综合体成了1970年代工业发展的优先方面。在西西伯利亚，早在1960年代就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从1969年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专门决议开始加快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在10年间这里的石油开采量增加了9倍。同时，其他原料生产领域——煤炭、森林工业、有色金属的采掘和加工领域也出现了迅速增长。用于维持这些优先发展方面的费用在不断提高，因为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地区需要建立可供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而最主要的是发展交通运输系统。1974年开始了持续10年的贝加尔—阿穆尔干线的大规模建设。所有这些措施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和积极的措施，与此同时，遗憾的是那些决定科学技术进步的部门——电子、机械制造、机器人制造技术等仍然处于落后的状况。

因此，"停滞"时期的政策使得解决苏联经济向集约化发展过渡这一客观任务变得极端复杂了。除了原有的问题外，还积累了大量的新问题，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年老的苏联领导人似乎认为不搞清所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更好一些，并越来越歪曲地理解现实本身。

17. 内政：稳定的方针与"长老掌权"（老人政治）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册干部名录》（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表上

的干部阶层开始在苏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起初，这个社会阶层十分有限——《在册干部名录》表上的国家干部一个不差地按名字被列入这个专门名单，就意图来讲，只有最受尊敬的人才能进入名单。这个名单也被称为《在册干部名录》表。实际上，进入这个名录的很多人的任命或罢免是取决于做出决定的党的机关是属于哪一级：中央政治局的干部名录（通过政治局的决议任命其职位），中央书记处的干部名录以及直到区委一级[①]的干部名录（再往下就没名单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录上的干部越来越像传统的官僚，其代表的人数在急剧增多。某个职位正式列入干部名录就意味着，要按照政治（而不是什么别的）素质挑选担任该职务的干部，对党的忠诚是政治素质中的主要素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党的忠诚”实质上就意味着个人对某个党的领导的忠诚。结果是挑选干部不是根据职业素质和成绩，而是根据候选人是否善于处理好同高层人物的关系，是否善于在党的各级机关建立人情关系。

《在册干部名录》就成了领导层的通用名称。在册干部有特殊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经常是既与国家的客观利益不相容，也与社会其他部分人的利益不相容。

共产主义理想（按照这种理想政权的代表是“人民公仆”）与现实之间日渐增大的矛盾，在斯大林时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由严重地触动了在册权贵的“清洗”部分地帮助解决了。结果是，只有有了“公正的”领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原则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国家机构的发展和巩固客观上又导致了整个苏联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官僚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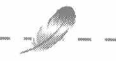
① 按照 1977 年《苏联宪法》第 79 条，每一个加盟共和国下辖边疆区一级（краевое）、州一级（областное）、自治区一级（окружное）、区一级（районное，高于市辖区）等几级组织。——译者注



观　点

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广为传播的概念基础上的，即靠人类理性的力量就可以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正的社会。私有制和国家是万恶之源，国家就其本质和使命来看就是暴力机关。在理想社会里，生活方式应该主要靠联合成一种村社——即公社（共产主义由此而来）的人们的利益来决定。因此，通向理想之路应该是逐渐消灭国家的各种暴力特征（军队、警察和监狱），还要完全废除为国家政权服务的那个社会阶层——官僚。

但是，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不可避免性的基本结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调和这一矛盾的各种尝试迫使列宁及其继任者做了大量的补充说明，把苏维埃国家描绘成基本上是一个“新型”国家，其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经济问题。在这个国家不像所有已知的各种类型的国家那样，少数人要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强制，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结盟（“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强制。此外，这种形态将暂时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进入“完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就这样成功地得到了明显的缓和，而且这种“新型”国家的“公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工人和农民构成。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在册干部名录》的干部阶层由为国家政权服务的“服务阶层”，变成试图完全控制这个政权的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最后障碍消失了。情况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按不同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形成了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之间为争夺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权展开了斗争，这种斗争以阴谋、倾

轧和组建各种派别为表现形式，常常以个人利益和野心为基础。甚至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苏维埃国家更多的不是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官僚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1960 年代下半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蕴涵的能量最终到了枯竭的边缘。这表现为民众劳动热情的明显下降，社会冷漠情绪增长，“思想上的异己”现象等传播得越来越广。树立劳动大众对苏联制度创造奇迹能力的信心成了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允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思想被用来解决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消亡的基本观点重新得到了发展。这意味着，官僚们的日子屈指可数，劳动人民很快将从享有特权的在册干部手中获得完全的自由。

同时，建设共产主义的方针要求采取涉及很多普通公民生活的这样一些措施：取消副业、同宗教进行新一轮的斗争、恢复对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严格监控等等。其结果是意识形态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掌握国家权柄正是党的官僚们的安排。

17.1 发达社会主义

1966 年 12 月在苏联的主要报纸《真理报》上登载了费·米·布尔拉茨基（Ф. М. Бурлацкий）的《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文。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束（这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的、持续较长时间的一个时期——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到来。进入共产主义被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期限。宣告发达社会主义——这是合乎规律的必要阶段，在实现发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充分体现。1967 年，在关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讲话中，关于在苏联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本人已经说到，最终，这一论断在1971年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

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被用来解决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问题。第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就”现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保留着社会的阶级划分、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商品—货币关系，最后，还保留着国家及其官僚机器本身。第二，论证了放弃原来的傲慢的计划（“柯西金改革”就是其中之一），转向更为平稳发展的理由。第三，向公民灌输这样一种意识，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是能够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满足感和自豪感的、是非常值得他们珍视的。以上所宣扬的这些思想都符合官僚上层的利益，首先是符合党的上层人物的利益。它们的实现使上层人物有权认定其在苏联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合法的。这样就推卸了由于消极因素的加强而要承担的政治责任，而这些消极势头的加强最终导致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停滞”。

17.2　新宪法

新的发展概念影响到国家法律。1936年宪法不能以相应的方式反映社会状况。例如，苏联国家的类型仍还被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宣布的发展“真正的”民主联系起来。况且，到1970年代，在已经定型的国家政权的形象中，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无产阶级”的特征了。重新界定苏联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民族关系发展的性质及很多其他东西都是必要的。

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决定着手实际准备通过苏联新宪法。准备工作是打着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进行的，1977年5月组织的对草案的全民讨论是对此进行的实际确认。宪法草案在报纸上发表，公民获得了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建议的机会。寄来的修

改建议很多，尽管它们未被采纳，但民主程序的形式却得以遵守。宪法的最后文本于 1977 年 10 月 7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获得批准。第 6 条是宪法中最重要的一条——从法律上确认已经形成的党的官僚的无限统治权的必要性已经成熟。这一章宣布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使苏联共产党的实际作用合法化了。这就更加强化了党的机关在整个权利金字塔中的作用，最终把党员资格变成了任何晋升的必要条件。

这样，1977 年宪法完全实现了苏联上层集团独自地、不受监督地对苏联公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要求，同时对所有人都看到的各种矛盾置之不理。宪法第 6 条宣布：“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的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为人民存在并为人民服务。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确定社会发展的总前景，决定苏联的内政外交路线，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赋予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以计划性和科学依据。所有的党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框架内活动。”

国家被宣布为“全民国家”，也就是说现在国家要同时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这一规定应该成为“真正”的民主在苏联胜利的论据。

对苏联已经定型的社会结构，它的“社会单一性”进行重新解释。阶级仍旧存在——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及“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但是就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受社会和法律保护程度、享受社会财富的程度、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看，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彼此间差别并不大。但对于这种论断，那个时期观点中已经明显有了对当时苏联隐约出现的社会进程的发展特点的不同解读。

实际上，苏联社会不仅不是单一的，而且它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具有官位等级性，就像一种社会金字塔。某个公民相对于政权处于

什么地位，越来越成为他社会地位的主要证明。

新宪法中关于民族关系的状况和发展问题在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宣布，由于民族和部族的接近，在苏联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与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解读完全一样，在各民族间的关系领域，强调的是统计出来的能够证明所取得的团结一致的纯形式上的特征：俄语（作为各民族间交往的语言）的推广，通婚数目扩大，各民族社会文化水平的接近，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和相互渗透的各民族间相互移民的加强。

但是，这当中并没说明，根据什么标准一些民族获得了宪法上的民族地位，而另一些民族却是部族地位，为什么允许一些民族拥有加盟共和国形式的国家组织，而另一些民族只是自治共和国形式的国家组织，而第三类甚至连自治也没有。

对一些民族而言，把他们同胞居住的区域归入其他共和国的版图的问题是痛苦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亚美尼亚人构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人口的3/4，但该自治州却归入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版图。

所有这些问题要解决起来都是复杂的，但是在制定新宪法时它们却被忽略了。

17.3　政治“停滞”

进入政治“停滞”时期，不仅仅是由权力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这一事实本身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这一新的官僚政治的特征决定的。如果说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公务人员和经济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那么，1960年代，特别是1970—1980年代，精英的增补是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未来领导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和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

外交学院进行的，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不仅高层，实际上各个层面对有潜力干部的可用性的评定都是这样进行的。评价直接取决于领导们的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而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在“帮派”斗争和倾轧的条件下，好处只提供给有用的、忠诚的、准备在需要的时刻支持自己“老板”的那些“受庇护的人”。在国家的很多地区，首先是位于亚洲的各共和国，除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干部政策实际上排除了任何挑选干部的方法。

精英培养也是通过“自然再生产”进行的：1970 年代，真正世袭的“负责工作人员”的人群开始形成。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从步入独立生活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他们在有声望的大学学习，然后，担任一些有前景的职务，几乎是自动晋升。譬如，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总书记的连襟（妻子妹妹的丈夫）领导着用于畜牧业和饲料生产的机器制造部。

“停滞”时期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由很老的人组成。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达到 68 岁。他们中的很多人患有重病，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他在 1976 年患过中风。根据主治医生叶·恰佐夫（Е. Чазов）的证明，勃列日涅夫在自己执政的最后年代变成了一个孱弱的老人。

衰老和孱弱妨碍了勃列日涅夫履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权，妨碍他完整地参加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妨碍他出国访问、接待来宾、在各种集会讲话等等。电视报道和无线电转播无意中就会播放出因他的健康状况导致的滑稽可笑的情节。在国内确立了真正的“长老掌权”（老人政治）。医生们想出的各种巧妙办法将老态龙钟的领导人的工作量缩减到最低限度（比如，政治局会议通常是不超过 15—20 分钟）并没有挽救局势。

实际情况

鲍·尼·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当时任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讲述自己同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一次工作会面：“我们要争取解决建地铁的问题——毕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已经有120万人，而且这需要政治局的决议。因此我决定去找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联系。‘好，来吧！’—他说。我知道他那个时期的工作作风，给他准备了份报告，以便他在上面作个批示。我进来以后，我们逐字地交谈了5—7分钟——这是一个星期四，通常是他一周工作的最后一天，按照惯例，星期五他去自己的扎维多沃，在那里度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因此星期四他急着快点结束所有的事情。决议他自己不能拟。他对我说：‘口授吧，我该写什么。’当然，我就进行口授：‘让政治局了解情况，准备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地铁的政治局决议草案。’我对他说的他都写上了，签了字把文件给了我。因为我知道，甚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件以后还是会在什么地方丢失或见不着，我对他说‘不，您叫助手吧’。他叫来助手，我说：‘把任务交给他去办吧。让他，第一登记文件，第二正式执行您的任务：在政治局分发。’这一切他也都默默地做了，助手拿走了公文，我们告了别，很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收到了有关建地铁的政治局决议。”



这就是反映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苏联精英状况的主要特征。无行为能力的统治者不可能保障丝毫有效的国家管理秩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护法机关，经济、科学和教学机关的迅速腐化。受贿行为、侵吞国家财产、伪造完成了所承担的计划任务情况的报表、政权代表同犯罪团伙勾结——所有这一切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至于要防止这些可耻的事情都已经不可

能（比如，1980 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所谓“鱼肉案件”说的就是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人）。此类事件非常明显地证实，指望在现任总书记时期发生积极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17.4 “老人政治”时期结束

1982 年 11 月列·伊·勃列日涅夫逝世。尤·弗·安德罗波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从 1967 年开始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国家领导层的威信，首先是因他在任职国家安全机关领导时获得的影响而确立的，因为在停滞年代，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异常活跃；其次是他个人的品质：聪明、很高的文化水平（加之他对各种不同政见的专断和不能容忍的态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安德罗波夫的个性符合中央和政治局内各个小集团的利益。他明确地确定了新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尽管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纪律，但就应该从抓纪律开始。”（1982 年 12 月）1983 年上半年，好久都没有过的加强劳动纪律的运动开展起来。特别是，在电影院、浴池、商店进行大范围检查，目的是弄清楚谁在工作时间还待在那里。令苏联公民感到气愤的是，已经被查出的大规模的舞弊行为，比如，在“蛛网”行动中证实，在贸易中存在数百万起侵吞行为，使侵吞行为具有大规模的特点。

刑事案件牵涉到 1.5 万负责人，其中有 2500 多人是大贸易机构的领导人，包括莫斯科贸易总局的领导人。像暴露了多年来大规模棉花欺诈的“乌兹别克事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腐败）、牵涉到了部长尼·安·晓洛科夫（Н. А. Щелоков）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

（Ю. М. Чурбанов）的“内务部领导层案件”，这类调查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一批有影响的领导人都受到了严厉惩处，有些人自杀。反腐败斗争伴随着干部的重大改组——大约30%以上的党的工作人员都被迫辞职。

长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对苏联社会状况的客观评价，即承认矛盾和积累的各种问题。安德罗波夫说的“我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这句话，唤起了振兴国家、使国家政策走上合理决策轨道并对人民负责的希望。这可能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按“发达社会主义”精神提出的令人虚幻的引导，致力于改革。但是安德罗波夫执政还不到一年半。1984年2月，患很多种慢性病的尤·弗·安德罗波夫去世。

安德罗波夫努力的主要结果是推动了苏联社会在意识和思想上去克服“停滞”。

新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是一个与安德罗波夫完全相反的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和战友，对改革持批判态度。

这样的人掌权表明，在安德罗波夫的进逼下让出了自己部分阵地的党的官僚们，幻想着进行报复并消除对自己平静生活的威胁。斯大林主义者也对契尔年科寄予希望。但是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短暂而平淡的执政最终也没能使这样的愿望得以实现。1985年3月，康·乌·契尔年科去世。

参加“军备竞赛”和缺乏与科技革命条件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导致苏联在绝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能给大多数居民提供社会保障这个主要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也丧失了。“影子经济”和领导人及机关干部的特权从内部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公正性的信仰。

同时代文献资料

■ 尤里·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履历

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库尔萨夫斯克地区纳古特村。1930年在机械作坊做钳工，后来当报务员、伏尔加河轮船公司水手。1936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州雷宾斯克市河运专科学校。1938年当选为共青团雅罗斯拉夫尔州第一书记。1940年6月被派往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作，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地下区委和秘密小组。1944年9月3日被任命为联共（布）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年1月10日任卡累利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高级党校，1946—1951年在卡累利阿—芬兰国立大学历史哲学系上夜校。1951年，被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1953年进苏联外交部。1954—1957年任苏联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57年任苏共中央部长。1962—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从1967年5月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82年11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4年2月9日去世。

■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履历

契尔年科1911年9月24日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村地区大捷西村。1931年在红军部队服役期间加入联共（布）。1933—1941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地区党委领导宣传鼓动部部长。1941—1943年契尔年科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的区委书记。1943—1945年在莫斯科联共（布）中央下属的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奔萨任州委书记（1945—1948年）。在摩尔多瓦契尔年科继续升迁，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1948—1956年）。此时，他结识列·伊·勃列日涅夫。1956—1960年开始在苏共中央工作。自1984年2月13日开始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从1984年4月11日开始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

席。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6年、1981年、1984年）。列宁勋章获得者（1982年）。1985年3月10日去世。



18. 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与民族政策

苏联的民族关系直到“改革时期”前通常被认为是在党和国家政策中令人感到骄傲的部分。各民族通婚数量的增多是苏联各民族融合和民族宽容政策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的记录显示，各民族通婚的数量占婚姻总数量的10.3%。到1970年，民族成分混合的家庭占13.5%，1979年占14.9%，而1989年占17.5%。这同时表明了由经济因素和干部资源的流动决定的苏联国内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也可以把作为民族间交际语言的俄语的普及看做是新的共同体形成的证明。比如，根据1926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把俄语作为自己的语言的非俄罗斯族的公民的人数为640万人，1959年为1020万人，1979年为1300万人，1989年为1870万人。

人口普查也显示，除自己的民族语言外，流利地使用俄语的人数持续增长。1970年，在苏联生活着46.6%的非俄罗斯居民，到1989年时，其比重增至49.4%。同时，把俄语认定为母语并流利掌握的人占苏联人口的81.4%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的88%。



观　点

实际上，1960年代至1970年代官方宣布的新的人民的历史共同体绝不是神话。在最近二十年深入人心的针对“共同的苏联人民”

的冷嘲热讽，或者干脆对“苏联人”的冷嘲热讽，完全不能消除一个事实：即在大众意识层面上存在着苏联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感觉。苏联历史提供了不少可以显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民族、文化、种族差异可以被忘记的例子。要达到这一点，主要是要有参加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的体验。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在开垦荒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是这样。各民族的人们都把苏联科学家、运动员、文化活动家以辛勤劳动取得的成就当做是自己的成就，各民族的人们都为自己的军人、极地考察人员、飞行员、宇航员取得的史无前例的功勋感到自豪，而不在意他们的民族属性。国家各个地区突然发生的灾难和不幸都会引起来自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同感，得到来自他们的竭尽全力的救助。举例来说——1966年塔什干地震，使整个城市完全消失，数万塔什干居民丧生。仅仅过了一年，在废墟上就出现一座全新的城市，新城的各条街道大多是靠无偿的劳动和苏联各个共和国的资金建成的。

苏联各民族团结的程度和相互接近的努力在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比较中得到了特别鲜明的表现。比如，在美国三K党类型的种族组织几乎公开活动，时不时地发生基于种族和民族基础上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在一些州的法律中，直到1970年代还保留着对黑人、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歧视性条款。波及美国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的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就是对此的反映。苏联那些年却没有发生任何类似的事件。



所有这一切让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所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的基础仍旧是达到各个民族和部族事实上的平等，“全面考虑到各个民族的利益，特别关注国家那些需要迅速发展的地区”。这一思想起源于列宁的观念，即“大”民族的族际主义，除去其他方面，应当体现出：“在现实生活中业已形成的、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压迫民族、大民族需要补偿这种不平等。”换句话说，俄罗斯人，作为最大的民族和过去的“压迫”

民族，应该为苏联各民族的发展承担责任，为此付出特别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俄罗斯族的这种“供血”，从克服少数民族对其不信任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苏联的中亚、高加索、西伯利亚各民族能够很快地感受到自己生活中的积极变化，特别是在同那些生活在苏联边境外的与他们同源的民族的状况的比较中。少数民族的身份在升入国家最好的大学、录用工作、提供多种社会优惠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在各民族共和国，有针对性地造就了大批的本民族的党和国家的工作干部，培养出了民族知识分子。各个共和国的高层职务，除极少数例外，都由“有封号”（共和国以该民族名称命名）民族的代表担任。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助手以及当地居民不感兴趣的那些职业（比如工业工人、建筑人员、工程师、军人）的角色都归俄罗斯人担任。

而且，事实上平等的方针实际上带来的不只是所预期的结果。俄罗斯的“供血”尽管对其自身没有造成明显损失，但也不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国家划拨用来加快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金，主要由归入全联盟国库的各个共和国收入的税务扣款构成。但是，如果这些扣款100%返还给中亚各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预算中，那么返还给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平均为70%—80%，返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平均为50%—60%，而返还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只有40%多一点。此外，为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能够得到补贴（额外援助）。位于亚洲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得到这类补贴的数额常常可以同其整个国民收入的数额相当。类似的情况在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也存在。不过，对它们的补助不是经常的，尽管有时达数十亿卢布。从来没有得到过额外援助的唯一的共和国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1970年代末开始，白俄罗斯被归入“被供血者”之列，由于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发展，燃料资源丰富的阿塞拜疆和土库曼也被归入“被供血者”之列。

在援助其他共和国的同时，俄罗斯却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关心自身迫切问题的解决。非黑土地区的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枯竭，在1960 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自身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简而言之，就是说包括俄罗斯联邦近 30 个地区的一个很大的边疆区逐渐变得空无人烟。比如，1920 年代中期，普斯科夫州居民总计只有战前的 60% 多一点；诺夫哥罗德州、斯摩棱斯克州、沃洛格达州——约 80% 左右，而同期苏联人口总数增长了 0.5 倍多。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边远地区居民的社会和日常生活长期安排不当，尤其是农村。这就促使很多人离开故土，到幅员辽阔的国家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寻找幸福。1974 年通过的非黑土地区发展纲要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原因在于纲要的侧重点是发展经济领域，而不是社会领域。而且，在这个纲要的框架内宣布了消除“没有前景”农村的方针，这就加快了某些地区空无人烟的进程。从 1959—1979 年，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非黑土地带的农村和乡村人口从 29.4 万缩减到 17.7 万。

在俄罗斯族“老大哥”的照顾和大公无私的援助下，将苏联各民族发展水平拉平和拉近的政策，也带来了很多其他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这些后果对民族问题的总体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对待俄罗斯人的态度以及俄罗斯人在那里所处的状况。在当时，有关平等理想的观念，要求所有的共和国不仅在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方面应该一样，还应当使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相似。换句话说，到处都应该按照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共和国的范例建立大工业、造就工人阶级、从事科研和创作的知识分子，以便使一体化进程（联合成一个整体）更为简单和自然地进行。巨额资金投入到了中亚、外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的工厂建设中。但是，从一开始就产生建设这些企业的干部极度紧缺的问题，然后是保证这些企业运转的干部紧缺问题。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解决干部紧缺问题的途径几乎主要靠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往各个共

和国迁徙劳动力和专家（开始他们都被称为俄罗斯人，后来更经常被称为讲俄语的居民）。结果是各共和国的首都和大城市变成工业中心，成为多民族的城市，而且，“有封号”民族的代表在有些情况下同俄罗斯族相比处于少数。

苏联领导人认为，这种状况是各个民族事实上的接近、它们的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繁荣的证明。实际上，除此之外，还产生了一些很尖锐的矛盾，铸成了后来的冲突。

观 点

在一些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西部——俄罗斯人不断增多被看成是故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同化政策。在其他共和国——主要是在各穆斯林共和国——不满的理由是外来者的不合这些地方传统的行为。责怪俄罗斯男人酗酒、说脏话、对年长者不恭敬，责怪俄罗斯妇女轻浮、放荡。此外，1960年代前夕形成的以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精英把俄罗斯人看成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实现狭隘民族利益的障碍。对当地俄罗斯人的态度常常扩及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文化和全体俄罗斯人民，反过来，对莫斯科政策的不满也在对本国的俄罗斯族同胞的态度上得到了反映。比如，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领袖之一T. 马杰在1980年代中期公开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俄罗斯族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中央政策的工具。”



与党的思想家们的预料相反，各加盟共和国多民族性的加强远不是始终促进了它们之间一体化，这里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乍一看，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结构与俄罗斯的范例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但通过更精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共和国，社会集团的划分都是按严格的民族特征进行的。“原住民”更喜欢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农业、服务业、商业，他们在科学、教育、艺术领

域和护法系统领域也强烈追求官职和指导地位。通常，俄罗斯人构成了工人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要骨干，也就是那些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从来也不特别高、而在“停滞”年代还急剧下降的那些阶层的主要骨干。此外，在日渐加剧的粮食紧缺的条件下，生活水平同农村有联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各民族共和国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几乎都同农村没有联系。这样，客观的社会差别使大多数民族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已经定型的态势导致了各个共和国的精英们得出没有必要考虑俄罗斯族（讲俄语）居民利益的结论。

作为这种情况的后果，从 1960 年代末开始，在一些加盟共和国中就出现了“排挤”俄罗斯人的势头。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力求通过吸引来自农业地区的人进入首都和大城市的方式人为地提高“自己”民族的代表在首都和大城市的比重。在获得住房、相应的工作方面这些人具有优势，在推行干部政策时，他们构成了主要支柱。结果是，比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巴库的居民中，阿塞拜疆人的比重从 1969 年的 40% 增加到 1985 年的近 70% 。不过，在外高加索的其他共和国以及中亚、摩尔达维亚，同样的进程规模要小得多。所发生的人口变化对这些共和国的民族间关系的整个特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些进程触及的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而且还包括几乎所有其他“没有封号”的各共和国的居民。文化和社会差别尖锐地表现出来，出现了民族隔阂现象。比如，双亲中一方是俄罗斯人的混合婚姻生的孩子的民族属性，在民族共和国更经常地被定为非俄罗斯族，这一事实证明了，在这种氛围下俄罗斯人过得越来越憋气。主要的是，一旦有可能，俄罗斯人都努力争取返回俄罗斯。

以勃列日涅夫、此后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根本没有注意到民族政策执行中这些令人痛心的代价。

他们更喜欢一字不差地阐释列宁遗嘱中提出的忠告：“在这种

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① 实际上，这往往直接掩盖了"停滞"时期的政治家们真正要解决民族矛盾方面的不乐意态度和不具有的能力。

受惩罚民族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要求恢复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撤销的自治。麦斯赫基土耳其人、希腊人要求允许他们返回原来的居住地。那些希腊人、德意志人以及犹太人组织了争取迁居"历史故乡"权的社会运动。

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在苏联是一个独立的问题。1967年6月，由于六天战争，苏联中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在六天战争过程中以色列开始了同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作战行动。联合国安理会第247号决议确认以色列为侵略国。苏联报纸上开始了强有力的反以色列宣传运动。但是，以色列的胜利引起苏联犹太人中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

同时，在苏联也爆发了人民反犹太主义运动。导致苏联犹太人提出争取离开苏联返回"历史故乡"的权利。

同以色列断交一年之后，1968年6月1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仔细研究了经由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安·安·葛罗米柯签署的信，信中克格勃和外交部建议允许苏联的犹太人从国内迁出。把家庭团聚看成是移民的唯一理由。但这没有减少希望离开苏联者的人数，相反促进了移民的进程。但是在苏联很多与从事机密工作有关的、又希望移民的人遭到了拒绝。这产生了反作用。

起初，争取移民权的主要方式是向官方机构递交请愿书、呼吁书和申请书。这一活动通常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1970年夏，在列宁格勒逮捕了12名犹太人，他们打算劫持从列宁格勒飞往普里奥焦尔斯克的安-2航班让它飞往国外。空中恐怖主义行动的组织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者和参加者被判有罪并受到严厉制裁。“飞机事件”导致来自西方的支持犹太人移民权的运动。苏联政府不得不逐年增加签发外迁许可证的数量。从1971年到1986年，从苏联迁移到国外的总计有36万余人（约占总人口的0.15%）。

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历史的这个阶段正值苏联大多数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之时。

但是，缺少来自中央当局对此相应的反应，以及社会经济和思想危机促成了这一进程发展成蒙昧无知的民族主义，各个民族彼此“竞争”，迷恋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天堂”的幻想。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选自尤·弗·安德罗波夫1982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的报告

60年的时间里民族关系发生的真正实质性的变化证明，剥削制度留给我们的那种形式的民族问题已经成功解决，已经彻底地、坚定不移地得以解决。国家的多民族构成在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衰弱的根源变成了强大和繁荣的源泉。

■ 摘自1977年克里米亚鞑靼人致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舆论界的呼吁书

……在人民致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清楚地讲述了与40年代的事件及其后果相关联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运。在文件中也详细讲述了争取返回自己的故土的民族运动的历史、法律、意识形态和经济理由，这一运动有明确的要求：

1. 不设任何限制，组织返回克里米亚——返回自己的民族故乡。

2. 归还被剥夺的一切。

3. 恢复被毁坏的一切……

从命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7年9月5日发出的《关

于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族公民》命令——作者注）发出到苏共二十五大已经过去9年了。在这段时期，数万个家庭都想办法要离开流放地、摆脱流放制度，并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在克里米亚，不是执行苏联的法律，而是为这些家庭备下了：再度强迫迁出，夜里撬开门窗进行大洗劫、施行暴力、挑拨离间和审判。



19. 苏联的对外政策：1960年代下半期至1980年代初期

19.1 军备竞赛

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的影响下，苏联开始迅速加强自己的战略潜力。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之时，美国在提供的核武器数量上比苏联多9倍，那么，到1960年代末这一优势逐渐消失。1968年前后，苏联的核装备数量达到了1054件（相当于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特点——战略均势。

美国丧失了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对方无力反抗的打击而不会遭受报复的可能。苏联的防御学说开始时提得相当笼统："苏联任何时候都不会首先发动战争，不会首先使用原子武器，但会以致命的打击回应任何侵略者的进攻，以便彻底打败侵略者。"后来，苏联军事理论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入侵国拥有陆海空战略核力量（陆基导弹、海基导弹和战略航空兵）的情况下，为了战略防御的目的对准备发动核导弹进攻的侵略国实施先发制人的密集的核导弹打击就丧失了任何意义。它不能解决国家的战略防御任务，只会导致国家间的彼此毁灭。对已经发动了

核导弹进攻的侵略国实施密集的核导弹回击，但如果在它的弹头到达我们的领土之前，同样不能解决战略防御任务，也会导致国家间彼此毁灭。

此外，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尽了苏联的经济潜力。

苏联和美国几乎是同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全球核战争没有意义，根本无法赢得核战争。两国争取战略优势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双方达到了高水平的对等。

19.2 中苏关系

苏联新的领导人倾向于认为，同中国关系的恶化仅是尼·谢·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冲突引起的。这就产生了参照斯大林去世后得到了解决的苏南冲突的解决方式进行调解的希望。

在免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后，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立刻来莫斯科参加例行的十月革命的周年庆祝活动。但是，中方提出的条件（放弃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原则等等）对苏联来讲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苏联领导人倾向于把谈判的失败解释成是克里姆林宫节日招待会期间的不愉快事件造成的，因为当时国防部长罗·雅·马林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元帅建议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按照苏联的方式罢免毛泽东。仍然存在着一种幻想，即共同援助成为美国侵略牺牲品的北越将使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只是在1965年2月，鉴于柯西金访问河内和北京的结果，才得出恢复原来的中苏友谊是不可能的结论。

1960年代下半期，中苏之间的边界争论异常激烈。中方认为，尽管根据“历史调查研究”的结论，沙俄占领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坚持“准确说明边界”这个事实，并不指望归还这些领土。同时要求“确认”总面积为

3.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应当转归给中国（做个比较，比利时的面积是30500平方公里，库尔斯克州的面积是29800平方公里）。边境冲突发展成武装冲突。最大的武装冲突是乌苏里江上的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注）上的战斗。1969年3月2日，在达曼斯基岛上，中国边防军向边防哨所长官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和七名苏联边防军猛烈射击。在展开的战斗中，32名苏联边防军人被打死，但是中国人也没能在岛上站稳脚跟。3月15日，中方开始了夺取达曼斯基岛的新尝试，也被击退。后来，参加双方战斗的不光是边防军，还有正规军，大炮、坦克、火箭炮都用上了。达曼斯基岛成了“冰雹”齐射火力系统的第一次战斗试验场。在这次冲突中，苏方58人身亡，94人受伤。中国人的伤亡达数千人，这迫使他们停止了对苏联领土的侵犯。1969年9月，在柯西金同周恩来进行的谈判中达成维持中苏边境现状的协议。但是，整个1970年代，边界的挑衅行为持续不断。后来，1976年毛泽东逝世，使尖锐的冲突略有缓和，但关系并未改善。

19.3　越南战争

“冷战”使整个世界发生分裂。1960年代中叶，美国展开了保留自己势力范围的坚决斗争。这一点在越南表现得最明显。1964—1965年，美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派到东南亚沿岸地区，目的是镇压南越（越南共和国）的在组织上已经发展成南越人民解放阵线的民族解放运动，然后消灭北越的共产主义制度（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解决越南问题，美国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遭到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到1965年前夕，不算舰队和战略空军，驻越南美军的总人数达到54万人。

苏联以北越盟国的身份表明了态度，并宣布准备向它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反击美国的侵略。1965年12月，在莫斯科签署了有关经

济和技术援助的协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从苏联得到必要数量的高射炮、导弹和现代喷气式歼击机。苏联专家帮助越南人掌握作战技术。特别注意训练火箭炮手和飞行员。

拥有明显技术优势的美国没有打垮北越的反抗，北越广泛地使用游击战术。北越部队成功地包围了沿海地区的美国驻军。此外，他们实际上占领了 3/4 的南越领土。美国军队伤亡惨重。

1968 年 5 月，在巴黎开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和美国原贸易部长 A. 哈里曼之间的双方会谈，会谈在复杂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之后，最后以达成从 1968 年 11 月开始美国完全无条件地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的协议告终。还达成了一项有关在巴黎举行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人民解放阵线、越南共和国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谈的协议，以寻求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途径。1968 年开始的和谈进行得非常艰难。已达成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行动的协议，在 1972 年因美国人恢复轰炸而被破坏。1973 年 1 月 27 日，在巴黎签署了在越南停战及恢复和平的协议。1973 年 3 月 29 日，最后一个美国士兵离开了越南。失去了美国的支持，1975 年 5 月 9 日南越西贡政权投降。1976 年 7 月 2 日宣布成立统一的越南国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　苏联和中东

1950 年代苏联开始调整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在构建同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非常关注他们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依靠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并通过这种活动发展政治关系来维持。苏联向该地区提供设备、技术和农业机器。返回来的物品是磷酸盐、食品、石油和天然气。

苏联向该地区出口的特殊项目是提供武器。1966—1970 年期间，向阿拉伯国家供应的武器的总额接近 32 亿美元。苏联的军事专家积

极参与近东国家军队干部的培训和国防体系的现代化。该地区特有的地缘战略地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海路和航空线路都汇集于此，使这一地区对美国和苏联都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美国的第六舰队长期驻扎在地中海，并组成了北约强大的南欧陆地集群和地中海海上集群。正是因为这一点，苏联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带有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抑制和监督的功能。

19.5 苏联—以色列的关系

1967年6月开始了以色列反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战争（六天战争）。以色列人给数量占优势的阿拉伯力量以毁灭性打击，并占领了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属于约旦的约旦河西岸。苏联中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向阿拉伯国家输送了大批武器和一些军事顾问，向地中海派出军舰，并准备一旦冲突扩大就使用核武器。在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向美国总统发出包含“出自强力部门立场”的直接威胁的呼吁之后，战争停止。

实际情况

波·阿科波夫（П. Акопов）回忆说：“苏联经常被塑造为这场战争的拥护者，甚至倡议者。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想举一个没有人说过、没有人写过的典型例子。1967年5月，以色列军队向叙利亚边境集结，准备侵犯叙利亚领土。叙利亚领导人哈费兹·阿萨德向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在即将发生的以色列入侵前给予援助的请求。埃及军队此时已经驻扎在西奈，这自然是抑制以色列进攻叙利亚的一个因素。纳赛尔决定进行商议，并就对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征得苏联朋友的同意，为此，在5月底，他把自己的军事部长沙姆斯·巴德兰派往莫斯科。

苏方进行会谈的是阿·尼·柯西金，外交部副部长和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参加了会谈。我是作为顾问参加的。会谈的主题是征得苏联同意对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便不让它入侵叙利亚。巴德兰摊开地图，详细讲述了局势。柯西金立刻就果断地宣布，我们不能作出这样的许可，因为苏联不能支持任何形式的侵略，军事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第二天，巴德兰重申纳赛尔谋求苏方许可的请求，并再次得到‘不’的果断回答。第三天，巴德兰转达了夜里从开罗发来的纳赛尔的答复，即如果苏联朋友坚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就不进行袭击……”



19.6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如果说越南战争使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个国家中也遭到了政治道德失败。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经济困难、围绕着非斯大林化和民主化的争论，以及国家的联邦体制问题相关的各种内部矛盾日渐增多。这一切导致了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在1968年1月3—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亚·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此前，他是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并宣称要革新党的政策。国内就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展开了争论。放松了新闻检查限制，出现了新的报刊和社会团体，其中包括非党人士俱乐部。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关于民主、自由化、新思想和新观念笼统的言论外，实质上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而在其内部进行着重新分配部长职位的“地位之争”。共产党丧失了时机，把政治空间让给其他的非党力量。

3月底，诺沃提尼被解除总统职务，卢·斯沃博达将军成了捷

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国内的气氛异常紧张，主动权逐渐转到了非官方的政治力量手中，他们通过大众传媒并且完全在官方机构的框架之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同时，社会舆论狂热地支持杜布切克及其拥护者（“进步派”）。接着是自由化的新举措，特别是，取消了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同时并行的还有另一个进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华约盟友——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对此的不信任和怀疑在增强。1968 年 8 月 20 日夜，华沙条约五国的坦克（约 7000 辆）和 30 多万官兵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同时，苏联军用飞机开始在布拉格机场空降人员。克格勃军官逮捕了以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19.7　缓和国际关系紧张状态时期

中东危机紧张时期，美国的领导人不得不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后来在格拉斯堡进行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美国总统约翰逊之间的会谈（1967 年 6 月），为两个超级大国在放弃建立国家反导弹防御系统和限制战略性武器构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已经开始的双方谈判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期仍在继续。1972 年 5 月，尼克松（美国领导人中第一位）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5 月 26 日签署了两个重要条约：无限期的《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ПРО）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ОСВ-1）。两国放弃沿着自己边境建造耗资巨大并且不稳定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在稳定苏美军事平衡中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首次放弃扩充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双方同意只拥有两个局部的反导弹防御圈——首都周围和主要战略导弹中心周围。很快，双方又得出只“允

许”一个导弹防御圈的结论。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周围建立这样的圈，而美国——环绕怀俄明州的地下战略导弹基地。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效力一直持续到2002年5月，2002年5月根据美方的要求废除。

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是第一个限制核武器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对固定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和潜艇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的数量进行了限制。条约和临时协议（与条约同时签署的）从法律上确认了在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同等安全原则。

对抗政策的结束导致了缓和局面的具体化：签署了数十项有关贸易、航运、农业、运输及和平使用核能等问题的协议。似乎出现了具有更令人鼓舞的前景的新世界。

19.8 赫尔辛基进程

在缓和的形势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召开。1972—197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就举行会议进行了协商。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73年7月3—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了外交部长级会议。33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73年9月18日至1975年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阶段会议。这一轮谈判从3个月持续到6个月，是参加国委任的代表和专家级会议。在这个阶段，就会议议事日程逐项进行了仔细研究并达成了协议。

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三阶段会议，这是会议参加国最高政治和国家领导人率领本国代表团参加的最高级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列·伊·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首脑签署了会议的《最后文件》。这个文件至今仍有效。

它包括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应当完全履行的下列协议：（1）欧洲安全；（2）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3）人文

及其他领域的合作；（4）会议之后的举措。《最后文件》包括确定相互关系和合作准则的十项原则：主权平等、尊重主权；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边界的不可侵犯性；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各民族平等及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国家间进行合作；履行国际法义务。《最后文件》保障承认战后的欧洲边界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正合苏联之意）。并且责成所有参加国遵守人权（这成了利用人权问题反对苏联的根据）。

19.9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

“水门事件”（1974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对其所推行的旨在反对继续进行“冷战”的政策造成了打击。美国精英的对苏政策因右翼力量的压力而开始动摇，右翼力量认为缓和是一个虚假的构想，它只能促进（而不是阻挡）美国在世界的阵地的崩溃。1974年2月参议员贝雷·戈德华特（也可译作“高华德”）表述了反对改善对苏关系者的观念：“我们的情况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糟……在每一个军备领域苏联都正在超越我们……我们被愚蠢地拖进了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和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这一切将把美国置于弱势地位。”

尽管如此，1979年夏天前夕，苏美双方在1979年6月18日维也纳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中还是达成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妥协。它确定了双方战略性武器的载体数量。

苏联在作出像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这样的妥协之时，放弃了很多东西。首先，苏联同意把自己的战略性力量缩减10%，放弃了一系列处于各种研究阶段或者已经展开的计划。但对美国而言，条约变成了重要的障碍。比如，美国不得不限制可分离弹头式弹道导弹（不超过1200枚）和巡航导弹（不超过3000

枚航空巡航导弹）的数量。核武器载体的总数量规定为2250件。按附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上的议定书的规定，禁止发展射程超过600公里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苏联和美国双方宣布，在对立方破坏该条约的规则之前，它们将遵守该条约的规则。

毫无疑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的签署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意味着，美国认为对军备竞赛进行某种限制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限制，也使美国认识到：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迫使苏联因为美国的战略优势而修正自己的外交方针。但是，美国同伊朗关系的复杂化、苏联出兵阿富汗使缓和及条约关系受到了冲击。

19.10 苏联出兵阿富汗

1978年4月，在与苏联毗邻的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发生了军事政变。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袖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首的军官派取得政权，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以苏联为目标，力求在本国建成社会主义。

塔拉基获得了苏联的经济和财政援助。数千名苏联顾问到了阿富汗。颁布实施土地、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法令。但是这种加速前进的计划并未实现。政府在居民中间没有打造出一支可依靠的力量。1979年3—4月爆发了反对新制度的起义。塔拉基政府请求苏联出兵，但遭拒绝。阿富汗新政府成员之一哈菲祖拉·阿明，把惩罚机构的领导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但毫无成效。1979年9月11日，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塔拉基会晤，在会晤中，苏联领导人建议撤换仇视人民的阿明。但1979年9月14日阿明刺杀塔拉基未遂（塔拉基的副官被打死），而9月15日，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塔拉基被解除职务，

开始被拘押在家中，之后被关进监狱。阿明成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总理。1979 年 10 月 8 日，塔拉基在囚室中被勒死（官方宣布他死于心力衰竭）。

这些事件改变了苏联领导人对阿富汗的态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四名成员列·伊·勃列日涅夫、安·安·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德·费·乌斯季诺夫（Д. Ф. Устинов）（国防部长）和尤·弗·安德罗波夫作出了出兵的决议。在对局势进行了长时间的分析之后，他们得出结论，破坏阿富汗革命的力量将来会对苏联构成威胁。1979 年 12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根据一年前签订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作出了“以苏联部队进入阿富汗境内的办法”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决议。1979 年 12 月 24 日，在喀布尔以北 50 公里处的巴格拉姆机场，105 近卫空降师部队空降着陆。1979 年 12 月 27 日，苏联空降部队突袭占领了阿明宫，阿明被打死。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早些时候曾任驻布拉格大使）担任国家领导人。“有限的”苏联军队（达 10 万人）进入阿富汗。

但是，军队的进入，尽管保障了苏联在中亚的安全，但是并没有使阿富汗的局势正常化。

实际情况

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回忆说：“1979 年 7 月 3 日，总统卡特签署了秘密援助喀布尔的亲苏制度的反对者的第一份指示。就在当天，我为总统写了份报告，在报告中我向他解释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援助将导致苏联的军事干涉……我们不是迫使俄国人采取行动，我们简直是在有意识地加大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样的秘密行动是非常好的主意。其目的就是把俄国人诱入阿富汗陷阱。在苏联人正式越过边界的当天，我简短地对卡特总统写道：‘现在我们有可能让苏联打一场他们自己的

越南战争’。”

喀布尔政府的伊斯兰反对者（他们称自己为“圣战者”① 或者如合法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拥护者称他们为“匪徒”）得到了巴基斯坦（在其领土上设有基地和训练营）、沙特阿拉伯（为“圣战者”提供资金）和美国（提供武器、弹药、装备、派教练）的援助。苏联军队陷入该国的内战持续了十年。



19.11 新一轮“冷战”

1981年里根总统上任，美国政府采取了对苏联形成战略优势的方针。战略均势的打破和美国取得的军事优势应该成为有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的前提。美国政府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军事潜力，试图解决几个任务：

——在军事领域的主要指标上取得优势；

——在同苏联的双边协商和多边会谈中巩固美国的外交阵地，以便实现美国依靠对手的让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的，有针对性地强化自己的立场；

——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以便把资源引向非生产领域，削弱苏联经济，增大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联系的难度，为给苏联施加经济压力创造条件。

美国领导人走上了探寻新的反苏空间之路——把军事行动转向宇宙空间。美国武装力量面临的任务：第一，保卫美国领土免遭来自宇宙的攻击，建立“宇宙盾”；第二，制造“迷惑”对手的机会并迅速毁灭苏联的太空联络系统。这一计划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① 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反对派武装分子。——译者注

里根军事建设的最主要方向，是把以前三位一体的战略武装力量变成由五个部分构成的战略系统。对以前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武装力量（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弹道导弹和战略飞机）又增加了海基、陆基和空基巡航导弹及为执行战略职能而设的中程导弹。

美国战略追求的目的是改变两个大国的核导弹均等状况。反卫星武器计划就是要研究和部署这样一些系统，即可以消灭太空中潜在敌人的跟踪设施，使它不可能观察到美国武装力量的变更部署，不可能校正自己的防御系统。1982年9月，在美国的空军中建立了专门的太空指挥部。1983年6月，在美国海军中建立了太空指挥部。1984年开始试验ASAT反卫星系统——太空技术上的一个质的新发展阶段。ASAT是一种从升到一定高度的歼击机F—15上发射的武器。这是带有专用实弹头、用来摧毁卫星的导弹。里根政府认为，在这条道路上美国能够远远地超过苏联，瞄准苏联的导弹，使自己的进攻手段无懈可击。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选自安·德·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公开信（1980年）

……在苏联国内，消耗巨大的国家超级军事化在日渐加强（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对国家是毁灭性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没有进行非常重要的改革，有可能失控的镇压机关的负面作用在日渐加强……

■ 塔斯社关于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声明（1968年8月21日）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进一步激化，触犯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触犯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利益。对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同样是对欧洲和平基础的威胁。

兄弟国家坚决、果断地反击任何对自身牢不可破的团结的威胁。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谁都不允许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的任何一个环节。

■ 摘自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1975年8月1日）

Ⅵ．和平解决争端

他们（国家）将本着自愿的原则和合作精神进行努力，以国际法为基础，力争在短期内使争端得到公正解决。

为此目的，他们将使用诸如谈判、调查、居间调解、调停、仲裁、法庭审理或者他们自己选择的其他和平方式，包括对抗各方发生争端前认可的任何调解程序。

■ 摘自安·德·萨哈罗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公开信（1980年）

……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7个月了。上千苏联人和上万阿富汗人——不仅是游击队员，主要是和平居民——老人、妇女、农民和市民，死亡或者伤残。

毫无疑问，阿富汗事件使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事件使缓和受到了冲击，不仅对这一地区的和平，而且对各处的和平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一事件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的批准变得困难……



20. 文化和精神生活状况：1960年代下半期至1980年代初期

从19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发生了变化。

对约·亚·布罗茨基（1964 年）、安·多·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马·达尼埃尔（1966 年）的公审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反响，很多著名作家都为被告人辩护。对创作自由的追求也产生了发展自由个性的需要。公民责任问题对很多人来讲成了道德、伦理选择问题。1965—1968 年，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知识界，“解冻”情绪发展成对现制度的警惕性的批判的态度。当局表现出的是无能力、也不愿意就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同社会进行公开的对话。出现了回归过去的一些征兆，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主题从出版物上消失。出现了新的重新审视对斯大林态度的问题，而且，这样的观点在创作圈是有拥护者的，这些人以《十月》杂志为中心集结在一起。尽管没有发展到公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地步，但是对那些积极表达不同意重新审视“解冻”政治遗产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970 年，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А. 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不得不离开《新世界》编辑部。对杂志主编粗暴施压的直接借口，是自行非法出版史诗集《凭借记忆的权利》，该史诗集反对斯大林的制度并在西方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离开之后，《新世界》失去了民主情绪载体的声誉。

《十月》同样因出版工作“走极端”和发表的作品的低劣质量而遭到批判。在取消“走极端”的同时，当局力求恢复思想、观点的统一。大型文学杂志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对它们出版活动的监督是影响人们意识的有效手段。

自行私下出版物范围继续扩大，对一些创作知识分子来说，自行私下出版是同读者进行接触的唯一机会。许多不能在苏联出版作品的著名作家，在当局的压力下不得不到国外去。1974 年，公开批评当局的亚·伊·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他是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中，索尔仁尼琴思考的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他深信：“你一旦开始写作，以后也就永

远逃避不了这样的法则：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应当对他的祖国或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裹在作家脸上……拯救人类就只能让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东方的人要始终关注着西方人在做什么，而西方的人也要始终关注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最为含蓄、反应最为灵敏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日益加强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本人的行动，我对全世界作家的呼吁正是建筑在这个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法则的荒诞想法上。”

在国外的作家还有瓦·帕·阿克肖诺夫（В. П. Аксенов）、安·多·西尼亚夫斯基、弗·尼·沃伊诺维奇（В. Н. Войнович）、谢·多·多夫拉托夫（С. Д. Довлатов）、雕塑家恩·涅伊兹韦斯内（Э. Неизвестный）、诗人亚·阿·加利奇（А. А. Галич）和约·亚·布罗茨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早在 1970 年代末，一批作家就试图将未受检查的出版物——文学丛刊《大都会》（Метрополь）公开出版——遇到了当局和作家联盟首脑的严厉抵抗。“解冻”年代交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生活领域分歧越来越明显。在文艺领域，在习惯性思想框架内工作的人和那些寻找在创作中表现自我的新方式的人之间的分界线很分明。创作自由被后者视为个人自由的最高体现。内心自由的表达成了可以调出“真正”（即自由）艺术之声的音叉。

尽管有严格的检查限制，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文艺生活依然是鲜明的、内容丰富的。大型文化事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现代文学的读者群以百万计，他们在文学中寻找对那些令社会躁动不安的问题的解答。诗歌作品逐渐让位给思考当代人精神世界和人对自己的道德选择应负责任的散文。大型杂志上发表的著名的、受

人喜爱的作者的作品，被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书刊即使印刷了好几千份，在书店里也买不到。

不夸张、清醒地描写苏联农村的繁重生活的作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作者被统称为“乡巴佬”。这是一些才能各异的人，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是——瓦·拉斯普京、瓦·别洛夫、瓦·舒克申、维·阿斯塔菲耶夫（В. Астафьев）、鲍·莫扎耶夫（Б. Можаев）、谢·扎雷金（С. Залыгин）、费·阿布拉莫夫（Ф. Абрамов）、弗·索洛乌欣（В. Солоухин）——这些人在俄国文学中都留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痕迹。他们遵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的作品贯穿着高尚的道德情怀。作为对都市化和农村消亡的回应，他们号召揭示农民世界昔日的价值观，尊重前辈的记忆，代际继承。

尊重祖国历史，力求回归民族之根，表现为保护历史和文化遗迹的运动的成就。其源头可以上溯到 1950 年代下半期，当时大力开展的城市建设，导致很多有价值的建筑物被大量毁掉，破坏的规模可以与 1930 年代的毁掉的历史建筑相提并论。祖国最著名的修复家之一彼·德·巴拉诺夫斯基是运动的发起人。1964 年，根据他的倡议建立了“祖国”俱乐部，“祖国”俱乐部的成员为修复莫斯科的克鲁季茨基庄园无偿地工作。

1965 年在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馆下成立了“俄罗斯”俱乐部。两个俱乐部开展积极的教育活动。艺术家谢·季·科尼奥可夫（С. Т. Коненков）、帕·德·科林（П. Д. Корин）、作家列·马·列昂诺夫（Л. М. Леонов）、弗·阿·索洛乌欣、歌手伊·谢·科兹洛夫斯基（И. С. Козловский）、阿·阿·列昂诺夫（А. А. Леонов）、记者瓦·米·佩斯科夫（В. М. Песков）等人都积极地加入了“俄罗斯”俱乐部。2 月，召开了全俄保护历史和文化遗迹协会成立大会。五年之后，该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约 600 万人。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之交，保护历史和文化遗迹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与院士德·谢·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德·谢·利哈乔夫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概念——“文化生态学”。利哈乔夫提出的任务是，不仅要小心地保护某些遗迹，也要保护人的“先人和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他的书《俄国人札记》（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м，1981 年）、《故土》（Земная родная，1983 年）、《美善书信》（Письмо о добром и прекрасном，1985 年）是专门针对年轻一代的，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文化生态学”的关注。

1976 年在《各族人民的友谊》杂志上发表了尤·特里丰福诺夫（Ю. Трифонов）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讲述被斯大林时代摧残的一个人的命运——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里丰诺夫讲述市民日常生活和处世态度的中篇小说［《欺骗》（Обмен）、《初步总结》（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长期别离》（Долгое прощание）］都成了重要的社会事件。对当代文学来讲，题材本身就是新的。

继承“解冻”文学和电影传统的有关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和公民立场的电影搬上了银幕［斯·约·罗斯托茨基（С. И. Ростоцкий）导演的《我们能活到礼拜一》（Доживем до понедельника），1969 年；谢·阿·格拉西莫夫（С. А. Герасимов）导演的《湖畔》（У озера）和格列布·潘菲洛夫（Г. И. Панфилов）导演的《开端》（Начало），两部都是 1970 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 1970 年代初的社会气氛，吸引了大批的影视观众。

市民大规模地向独套住宅搬迁，导致家庭藏书规模很大。很多家庭都收集这样一些藏书，其中一定有俄国和苏联作家［马·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弗·弗·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阿·尼·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米·亚·肖洛霍夫，康·格·保斯托夫斯基（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都在被大量阅读的苏联经

典作家之列］的文集。

国内对好书存在着真正的“饥荒”。每天（!）出版430万册书籍和小册子（每年15亿多，1971年的数据），十年下来，书名的数量达到8.5万个。但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是社会政治书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苏共领导人的纲领性讲话、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对这些东西的学习，被列入中学的高年级、大学、大部分成年居民参加的提高社会政治素养的专门的组织系统的必修计划之中。应该有助于“正确”世界观形成的这些措施，当局视为监控人们头脑的有效途径。很少有谁敢公开批评党的方针和意识形态教育体制本身，但是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在表面上遵守“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对当局的这些宣传努力所持的怀疑态度在稳步增强。正是在这些年，在知识分子圈里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状况——内心不同意意识形态方针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却对现实认同或容忍，当时人们不得不采取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对很多人而言，沉浸于私人生活（也就意味着自愿地放弃快速晋升职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成为一种公民立场。

阅读范围和读者喜好的特点——是这个罕见现象鲜明的例证。文艺类书籍、教学用书和儿童用书严重不足。尽管印刷的份数不断增加，但对书籍的需求也在增强，任何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出版物都脱销。特别是当时出版数量不大的安·安·阿赫玛托娃、马·伊·茨韦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奥·埃·曼德尔施塔姆（О. 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诗；米·阿·布尔加科夫（М. А. Булгаков）、米·米·佐琴先科、安·普·普拉托诺夫（А. П. Платонов）等的散文。尽管如此，他们的书或者文本的机打复件还是列入了很多家庭藏书之中。为了缓解书荒，作出了宏大的出版创举。1967—1977年，《世界文学丛书》（200卷）出版了30万册，其中收录了从古苏美尔国的《吉利伽美什史诗》

到当代的最好文学作品。《世界文学丛书》出完之后，开始出版《经典丛书》。科学出版社“古代文学文献”系列的出版是书籍出版活动的最高峰。1947 年，根据科学院院长谢·伊·瓦维洛夫提出的出版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作品的倡议而确立的系列，最初主要是针对学院派圈子的。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之交，这一丛书变成真正的大众丛书——书出版了十几万册，部分书籍出了袖珍版和软皮版。“古代文学文献”系列的编委会主任是德·谢·利哈乔夫院士。在这些很难订阅到的大型杂志上发表了众多现时代作者的作品，在图书馆里要排长队才能借阅到这类出版物。在外国作家中最受欢迎的是海明威、雷马克①、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亨利·特罗亚等等。谈论阅读的新书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喜爱的作品的引用，成为性情相近的人们交谈礼节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成为认出“自己人”的方法。艺术口味和评价形成了交往空间，它在志同道合者的圈子里是一种通行证。

对与话语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非常强烈的兴趣，多多少少是对缺少公开的政治争论的补偿。剧院出现在社会关注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剧院艺术经历了真正的腾飞。鲜明的政论性是著名的莫斯科塔甘卡剧院演出的特色［塔甘卡的戏剧是在尤·彼·柳比莫夫（Ю. П. Любимов）的指导下进行的］。

列宁青年团剧院［以列宁共青团命名的莫斯科剧院，自 1973 年开始由马·阿·扎哈罗夫（М. А. Захаров）领导］是另一种风格。1970 年代，在它的舞台上出现了面向青年观众的音乐喜剧，而 1981 年，出现了苏联第一个摇摆歌剧《尤诺②和运气》（Юноно и Авось）。这样的演出对传统的舞台准则提出了挑战，它成了剧院和观众忘我创造性发挥紧密结合的象征。列宁格勒大歌

① 德国作家，《西线无战事》的作者。——译者注

② 尤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掌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译者注。

剧院经历了真正的繁荣，在列宁格勒大歌剧院剧团里，在导演格·亚·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召集下，优秀演员荟萃。青年戏剧制片厂的剧目和剧院自己搞的创作很受年轻观众欢迎。

所谓的哲理（职业作家的）电影成了知识分子们文化知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安·阿·塔尔科夫斯基（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的警世电影［《安德烈·鲁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ев），1966—1971年；《索里亚里斯》（Солярис），1972年；《镜子》（Зеркало），1974年；《潜行者》（Сталкер），1979年］向细心的观众展示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邀请观众对这个世界进行哲学思考，“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旅行。格尔曼（А. Ю. Герман）、穆拉托娃（К. Г. Муратова）的电影展现了全新的艺术方法和理解过去（通过过去看现在）的新态度。一些电影长期不能出租，拷贝的发行量也很有限，而且有检查机关的删节，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忠实观众。

对在“新社会”的人的面前展现出的潜力的真诚态度和乐观态度，在1970年代下半期逐渐地被另一种调子的情绪替代。个人的责任和道德选择问题处于“70年代人”关注的中心。社会情绪变换的最鲜明的例证之一是讽刺文化调子的改变。1960年代幽默成了朋友交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年轻人圈子里，常常对严肃的事情表露出不严肃的态度，愉快的心情伴随着共同的创举。短小的幽默作品在报纸上发表，滑稽剧（幽默竞赛）在俱乐部上演。著名的“快乐者和机智者俱乐部”，就是由这样的倡议而在电视上成长起来，成为1960年代最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并以大学生业余文艺活动的形式在全国开始成功巡回演出。1971年节目停办。具有破坏性的讽刺开始快速地排挤幽默，而后是对体制的无效性的公开嘲弄，用的是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带有社会潜台词的喜剧能成为苏联电影观众喜爱的体裁并不是偶然的。对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和日常生活艰难的潜在的、日积月累

的不满，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苏联体制优越性的不信任。当局把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和日常生活艰难时而说成是“资本主义的遗毒”，时而说成是地方领导的错误，时而又说成是不利的天气条件。喜剧记录了人们的缺点和社会恶习，但是展现苏联现实的调子和表现手法的特点渐渐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导演达涅利亚（Г. Н. Данелии）创作风格的变化：成为“解冻”信号的电影《我阔步在莫斯科》（Я шагаю по Москве，1964年）和喜剧《不要悲伤！》（Не горюй，1969年）反映出作者轻松讽刺的特点，而后他又创作出具有强化讽刺成分的社会作品《阿福尼亚》（Афоня，1975年）和《米米诺》（Мимино，1978年），最后创作出具有辛辣讽刺性的《秋天的马拉松》（Осенний марафон，1979年）和对社会表面上慷慨激昂情绪具有揭露性的作品《金—扎—扎》（Кин-дза-дза，1986年）。

社会是需要对自身的缺点进行嘲讽的。阿·伊·赖金（А. И. Райкин）的滑稽表演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欢迎，在他的滑稽表演中嘲笑各种人的恶习——“达官、伪君子、不劳而获者的恶习”，但随后，逐渐地开始越来越鲜明地流露出对体制缺陷的讥笑。一些滑稽剧《遵命！》（Бу сделано）、《我已经笑了》（Уже смеюсь）、《在希腊大厅里》（В греческом зале）的主人公独白中的一些句子成为流传的名言。

在舞台上，或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播出了讽刺演员尤·特·季莫申科（Ю. Т. Тимошенко，艺名塔拉蓬卡）和叶·约·别列津（Е. И. Березин，艺名什捷普谢尔），以及卡尔采夫（Р. А. Карцев）和伊利琴科（В. Л. Ильченко）的双人演出。没有这些代表人物的出场，联合演出很少能取得成功。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讽刺作家日瓦涅茨基（М. М. Жванецкий）、扎多尔诺夫（М. Н. Задорнов）取代了那些写点消遣性讽刺作品的作者。哈扎诺夫

（Г. В. Хазанов）表演的《外表独白》（Монологи в образе）成了1980年代之交不断变化的情绪的具体体现。电影院不断预告讽刺性新闻短片《灯芯》（Фитиль）的上演，带插图的讽刺画报《鳄鱼》（Крокодил）拥有大量的读者。讽刺小品栏成了中央和地方报纸必设的专栏。在日常交往中，生活性的和政治性的笑话始终是人们谈论的一个主题。

“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形象，同诗人、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歌曲的作者和演奏者弗·谢·维索茨基（В. С. Высоцкий）的创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诗人遗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活现象的范围。维索茨基的完全大众化的作品，受到各个阶层的欢迎，苏联社会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写的作品的题材都是回忆战争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育、百姓生活、友情、爱情，还有海员、登山运动员和地质队员这些以战胜困难和同自然作斗争为生活目标的人们。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现实是借助于一些简单明了的隐喻表现出来的，而这些隐喻背后是所有人都明白的社会潜台词。维索茨基不仅再现了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还再现了“60年代人”及他们的接班人的口气。对很多人而言，喜欢维索茨基的作品，是公民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是批判性地认识现实的一种形式，是对生活和思想上的随波逐流般的一致的反抗。诗人活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诗没有出版，就连他在各个俱乐部和科学研究所向人数不多的听众发表演说的磁带数量也是有限的。

维索茨基同时在受检查的文化领域（他是塔甘卡剧院的演员，他参加过电影拍摄并给影视片和戏剧写歌词）和非官方文化领域工作。1970年代，这两个领域的题材和创作的自我表现形式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造型艺术和青年音乐文化中表现得特别鲜明。摇滚是苏联最后十年最明确的非官方艺术流派，受到了苏联青年的普遍喜爱。早在1960年代初，在苏联就出现了最早的

一些摇滚乐队，但他们演奏的是外国音乐，宣传的是自己偶像——“披头士（甲壳虫）”、“滚石乐队”的作品。在 1960—1970 年代之交，著名的苏联摇滚乐队诞生［“时间机器”（Машина времени）、“鲜花”（Цветы）、“江湖艺人”（Скоморохи）、“水族馆”（Аквариум）］，歌手们演奏自己创作的歌曲。在年轻的苏维埃摇滚文化中，歌词（符合祖国文化传统）承载着表达人们沉重思想的功能，这与西方摇滚乐不同，在西方，节奏起主要作用。在歌曲中提出了哲学和社会问题。当局企图通过正式注册俱乐部的方式把摇滚乐队置于监控之下，但没有成功：音乐家和听众都不准备放弃所获得的自由。尽管本国最好的乐队名气很大，歌曲磁带在居民中发行面很广，但是像原创歌曲并没有列入受检查的文化作品之列。摇滚会演在莫斯科近郊新建的物理学家城切尔诺戈洛弗卡（1978 年）和第比利斯（1980 年）举行过，但是，音乐家们偶尔进行的演出主要是在学校、俱乐部、科学研究所和公寓里。当局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措施限制首都的乐队的演出；在这些年里，列宁格勒的检查机关的限制相对比较宽松，摇滚文化更自由些。“时间机器”乐团在莫斯科的首场合法演出，是在 1985 年第十二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会上才得以举行。

在禁止选择艺术创作形式的情况下，尽管直接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绝不是“另类艺术”的艺术家们活动的主要目的，但是他们的言论带有社会政治意义。1974 年 9 月，根据当局的命令，用推土机捣毁了艺术家在莫斯科伊兹梅洛沃的空地举办的画展。这次捣毁行动在西方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对苏联的世界形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苏联的文化生活问题同西方进行公开对抗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在这些年里，苏联公民移居以色列的权利问题已经成为与西方尖锐分歧的话题。同时，在 1970 年代，苏联领导人宣布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是对

话中的有力论据，它反映了官方准备做出某些当局看来不具有原则性的妥协。同时，在西方的大众传媒上热烈讨论苏联的创作自由问题，这支持了国内日益高涨的对文化选择的兴趣，外国的无线电广播（“广播之声”）把争论的意见传给了苏联的听众，助长了民众的批判情绪。当局认为允许非正式组织成员的艺术家［拉宾（О. Рабин）、涅穆欣（В. Немухин）、Л. 克罗皮夫尼茨基（Л. Кропивницкий）和 В. 克罗皮夫尼茨基（В. Кропивницкий）、马斯捷尔科娃等等（Л. Мастеркова）］举行小型的作品展览是可以的。在“推土机捣毁展览会”几个星期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首次举行了这样的展览。这一展览 1975 年在苏联国民经济最高成就展览馆的“养蜂业展厅”举行，为了避免那些想参观展览却没有邀请函的人们涌入，展览会由骑警保护。

报刊上严厉批判“思想上异己的艺术”。为了监督这个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创作领域，随之建立了一些官方联合会（在莫斯科线条画画家委员会的庇护之下），它们举办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展览。在“另类艺术”圈里，产生了被称为莫斯科概念主义的新流派。艺术家伊·卡巴科夫（И. Кабаков）、埃·布拉托夫（Э. Булатов）、德·普里戈夫（Д. Пригов）、И. 崔可夫（И. Чуйков）的作品成了苏联最后十几年的另类艺术的“名片”。

莫斯科艺术家追求的是在油画的画布上和概念中表现出思想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而且主要是自由思想。他们在建立自由空间时，广泛地使用反映人力求冲破“非自由”空间的文字和熟知的时代象征（标语、领袖肖像、国家的标志）。

新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与西方的通俗艺术相同，它以讽刺的、怪诞的形式描绘苏联的象征。

约有 100 人参与了莫斯科先锋派艺术的创立。但是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他们的活动成了很多人关心的对象。

先锋派的创作实验成为少数观众的财富，然而，这些实验以自己的出现这一事实和当局对此的反应，对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施加了明显的影响。除个别例外，另类文化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政治反抗，它传递给世界的最主要的是，确立创作自由，摆脱固定的思想标准这一诉求。相反，很多通过检查的文化作品却鲜明地表达出批判的声调，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广大观众对其饶有兴趣的关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代表成了公开不赞同体制的代表者。广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概念——是指不同意现行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和人权保卫者是这个概念的同义语。确实，正是以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和反对压制这种自由的制度的这样一种理念把苏联的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各种政治取向的代表（在他们当中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流派的拥护者，有俄罗斯“乡土派作家”，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联合在一起。在1965年为保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而举行示威游行和征集签名之后，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出现了各种有抗议意向的组织团体和保卫人权组织。从1968年4月开始，出现了印刷版的《时事纪要》，《纪要》系统地报道了苏联捍卫人权者的行动及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人权保护运动的口号是：遵守苏联法律和苏联签署的国际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有关遵守和保护人权的规定。

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的新条款，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处散布诋毁苏联制度的“造谣惑众”罪名。其中最活跃者被驱逐出国。一些能自由出国巡回演出的文化活动家，因批判性言论而失去了苏联公民的身份不能回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是知名学者、氢弹之父，也是《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1968年6月）的作者，安·德·萨哈罗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伊·索尔仁尼琴。1973年，索尔仁尼琴写

了一封《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在信中他建议领导人放弃导致俄国灭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局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1974年2月把他驱逐出境。萨哈罗夫首先是被解职，然后是在1980年被剥夺了荣获三次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市。

围绕保卫人权运动对加重苏联体制政治危机的影响的评价，至今仍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持不同政见这一现象本身对苏联最后十几年精神状况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持不同政见者本身的数量和他们组织的运动的规模。

苏联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精神状况，以知识分子圈中的批判情绪的增长为标志，由于经济工作中的严重混乱和社会领域里的困难，这种批判情绪不断强化。

文化发展的整个“后解冻”时期充满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各种事件。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细致地、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了精神上人们相互影响的共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创作圈中形成了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观念和价值观，它成为广大观众的共识。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75年8月1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Ⅶ.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参加国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的所有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他们将鼓励和发展公民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其他权利和自由，使它们得以有效地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来源于人类个体所固有的尊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这一框架内，参加国要承认并尊重个人的自由，承认并尊重人内心所需要的个人或者与其他人共同的宗教或信仰。



21. 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

到1960年代中期已经非常清楚，在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赶超”美国以及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就“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公共场合张贴的可以归为赫鲁晓夫时代遗产的各种标语：“前进，奔向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一定会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仍在提醒人们想到这一前景。目标官方没有放弃这一目标，为了国家向前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得到保障，必须使宣布的优先发展方面更现实，同时又不丧失诱人的历史前景。1966—1971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采用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未来的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具有不确定的长期性。完善苏联体制的社会经济、道德和意识形态与协调社会关系被列为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没有确立解决这些任务的具体机制和日期。最前沿的科学和技术的突破仍旧是作为成就的标准。但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光明的明天”到来的前景中，要求对劳动的动机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发达社会主义所确定的稳步发展目标的条件下，靠非常手段或空喊口号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种提高是要证明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及其发展前景，让人们对明天充满信心。尽管在“解冻”年代出现了人们福利待遇提高的势头，但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仍然非常急迫，因为苏联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宣

布“提高人民的福利……是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这种提高首先通过增加实际工资来保证。

根据俄罗斯近几年的社会舆论调查资料（苏联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调查）来看，1970 年代，是作为国家发展最顺利的时期而载入史册的。老一代人在对那个时代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指出稳定感和生机勃勃的前景是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向前发展的明显结果——是苏联军事实力的加强，生产、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的增长，这使人们产生了对明天的信心。人们的衣食得到了改善，谷物产品和土豆的需求减少，而肉、奶和水果的需求逐渐增加。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明显加大。到 1980 年前夕，1 亿多人得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几家合住的公共住宅原来是绝大多数居民的必然归宿，现在合住居民的数量在急剧缩减。标准住宅示范建筑的质量比人们住惯了的五层楼提高了。

独门独户的免费住宅最终变成了一种标准，这导致了日常生活的个性化。院子作为交际空间失去了意义，伴随着合住公共住宅中邻居们每天不得不进行的交往的消失，还有从农村带来的守旧落后的生活方式，它们一起从城市生活中消失。交际圈逐渐地缩小到“根据兴趣”聚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想什么说什么。

这对知识分子来讲是重要的——现在可以随便在哪里聚会并相互信任地交谈，甚至涉及“危险的话题”；在斯大林时期的合住公共住宅里和公共厨房里这是不可能的。出现了“知识分子聚会”活动。非常有特点的是，家庭图书馆成为新住宅必不可少的装饰。

1970 年代大规模的建设越过了原来城边的工人宿舍区进入郊区。合住公共住房的住户从市中心迁到这里，各种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变成了同楼道的邻居。“亲密的”邻里关系逐渐成为历史。生活方式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一差别超越了日常生活安排方面差别的增大。尽管靠农村人口补充的城市人口数是持续增长（平均每年

增长 70 万人），但是，所谓的睡眠区基本被外来人口迅速住满。同类型号的高层楼房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每一个城市里都出现了新的稠李区[①] ［在埃·梁赞诺夫（Э. Рязанов）的电影《命运的作弄，或“祝你轻松愉快!”》（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или С легким паром）中曾提到过稠李区，该电影于 1975 年首次放映发行］。

住宅的家具、陈设基本上大同小异，因为，工业出产的是同类样式的家具、家电产品。出售的进口家具和耐用消费品，通常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很难买到，这样的商品主要在大企业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分配。

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开始取代 1960 年代初流行的最低生活标准。比如，地毯或壁毯成了室内装潢的标志性物品。

临近 1985 年的时候，100 个家庭中的 90 个家庭拥有电视（1970 年代初期只有约 30 个家庭拥有电视）。看电视晚会成了大家最喜爱的休闲方式。在苏联的电视节目中也对人们进行积极的启蒙教育，并力争满足不同层次民众的需求。像《电影旅游俱乐部》（Клуб кинопутешествий）、《全景电影》（Кинопанорама）、《看到的——难以置信的》（Очевидное-невероятное）、《国际纵横》（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анорама）这样的节目拥有数百万观众。这些节目弥补了信息的不足，包括有关国际报道方面的信息的不足。

每日新闻的主要节目《时间》，在格·斯维里多夫（Г. Свиридов）悦耳声音“时间，向前!”中开始播出，伊·基里洛夫（И. Кирилов）、阿·希洛娃（А. Шилова）、阿·沙季洛娃（А. Шатилова）、В. 巴拉绍夫（В. Балашов）是每个家庭的自己人、亲密朋友。

全国都在收看《蓝色篝火》（Голубой огонек）——综合演奏

---

① 稠李区——俄罗斯大城市市郊新区的传统名称，因莫斯科市郊的一个叫“稠李”镇的小镇而得名。——译者注

会，著名演员和“国家最优秀的人”——宇航员、先进生产者、最受欢迎的电影演员和运动员参加这些综合演奏会。在消遣娱乐节目中，领先的是《13 张椅子的小酒馆》（Кабачок 13 стульев）：受人欢迎的莫斯科讽刺剧院的演员把当时居民生活的对话进行改编，并伴着录音演唱歌词美妙的社会主义各国歌曲，主要是波兰歌曲。

苏联电视节目缺乏思想性引起了转播的特别关注。毫不夸张地说，全国人民都收看花样滑冰和冰球的国际比赛的转播，在比赛中，我们的运动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苏联冰球联队［阿·菲尔索夫（А. Фирсов）、瓦·斯塔尔希诺夫（В. Старшинов）、亚·马尔采夫（А. Мальцев）、三人小组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彼得罗夫（Петров）—哈尔拉莫夫（Харламов）、守门员弗·В. 特列季亚克（В. Третьяк）］和花样滑冰运动员伊·罗德尼娜（И. Роднина）、亚·扎伊采夫（А. Зайцев）、柳·帕霍莫娃（Л. Пахомова）、亚·戈尔什科夫（А. Горшков）、切特韦鲁欣（С. Четверухин）成了全民族的骄子。《世界之窗》成了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夏天，很多人离开住宅去别墅。1970 年代，大规模地分发种植果蔬的地块，被看成是一种既简便易行又快速提高人们福利的方法。在免费获得的 6 公亩地块上，园主可以种植自己需要的水果和蔬菜。

在分配一块地段的同时，当局不仅指望着保证“对劳动人民的餐桌给予补充”，而且还指望着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打发空闲时光。别墅主人—菜园主人是当时的符号性人物，出行旅游者退而居其次。大城市的郊区成了民众出去休假的地方，人满为患的城郊电气火车——是 1970 年代的一个典型特征。

与此同时，私家车逐渐成了越来越多家庭可以买得起的交通工具。直到 1960 年代下半期，私家车还非常少见（1967 年前夕，每 1000 个家庭仅拥有 12 辆私家车）。1970 年代之交，汽车制造业出现

了真正的飞跃，1971年前夕，苏联每年生产的汽车总数在祖国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辆。在随后的十几年里，轿车的产量增长了3倍。莫斯科和伊热夫斯克的工厂经过改造之后，“莫斯科人”轿车的产量急剧上升。但是，陶里亚蒂的大型汽车生产厂开足马力，直到1970年代之交才实现了真正的突破。这里曾致力于生产“民用”汽车。

实际情况

当时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总设计师B. C. 索洛维约夫（B. C. Соловьев）证实：“我们这些工程师和能工巧匠，首先要努力想象出未来车主的形象。这是一个一家之长。他度过‘五天’之后，想带着自己的家人到郊外过星期六和星期日。也就是说，汽车的座位应该比‘莫斯科人’的宽大……家庭‘乘员’的司机远不是公路上的行家，尽管他常常认为自己是行家。因此操作系统应当最大限度地简化。司机当然也不是很有经验的机械师，也就是说，要把那些需要扳子触及的点的数量降至最低。自然，还必须考虑到干燥的气候、各种路况和司机的性格。哪一个俄罗斯人不喜欢开快车呢？<……>

实用思想——这是主要的。买主也有不对的时候。比如，就拿汽车颜色这样一个‘小事’来说。根据我们款式中心的资料，大多数买主喜欢买外表是深色的汽车。而交通事故统计认为，深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比率比浅色汽车高9倍。总之，新汽车应当同时满足买主的全部需求，包括审美需求，并对这些需求进行进一步的发挥。”



在很短的时间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开发生产出BA3—2101款——著名的“戈比”轿车，苏联仿制的意大利菲亚特-124款。这样的汽车在国内最流行，购买“戈比”的队伍排了好几年。1973年12月，工厂制造了上百万辆汽车。1977年，批量生产越野

非公路汽车“尼瓦”（BA3-2121），这是陶里亚蒂汽车制造厂最著名的产品，这款汽车在世界汽车生产中成为最新款产品。

数百万人毕业于工程技术专业，他们的设计思想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是呀，远不是所有的新产品都能够投入生产。官僚们的商谈过程漫长，研发和实验模型投产之间的脱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这种滞后，同日用消费品生产拨款不足一样，无法完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

新的消费品生产增长缓慢，其质量通常较差，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但是，在其他方面，首先是科教领域，这些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75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让所有人都读完中学。到1970年代末，80%的15岁以上的城市居民都受过中（完全和不完全的）、高等教育。国内总计有500万大学生。最难考入的是医科大学和各大学的人文系。

录取时，要对在军队服过现役的人和在生产一线工作过的人给予优惠政策。1973年开始实行“毕业证书比赛”，即大学录取时开始参考中学的成绩。这一举措的目的是提高对中学教育成就的关注。继续投入大量资金为工业培养干部，——在一系列热门专业，首先是工程技术专业，出现干部过多现象。在科研和学术部门工作的人数是450万人，其中包括直接从事科研活动的150万人。这证明，科学工作正变成一种大众化职业。用于科研的费用支出份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74%（1985年）。

军事研究领域的科研仍旧最有效率。在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国家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发展军事部门，这就减少了对民用领域拨款的机会。

同时，工资水平开始提高：1970年平均工资是122卢布，到1970年代末变成169卢布。专业性不强的技术劳动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特别明显，这与生产领域的劳动人手严重不足有关。有毕业

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开始迅速接近不要求很高专业技能工作的工资水平。结果是，产生的平均主义降低了像工程师、教师或者医生这类大众职业代表的劳动积极性。同时，非专业技术劳动的信誉降低。企业有权根据“限额”从农村招募工人，并把他们的户口落到工厂宿舍。工作基本上都是重活，自动化水平明显落后于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尤其是农业部门。

该领域劳动效率低、干部经常流进城市、特别是粮食在运输和保管阶段的大量损失（达到收获量的40%）导致无法畅通无阻地供应优质食品。为了战胜困难，广泛地使用“支援性帮助”：在城市（工厂、科研院所）工作的人、尤其是大学里的学生，以尽义务的方式定期来参加收割庄稼和蔬菜储藏工作。这种无效的、劳动生产率低的劳动，成了大家都感到亲切易懂的大量笑话和讽刺作品的主题。“颠倒”的次序（“国家需要土豆，科学等等吧”）在弗·谢·维索茨基歌曲主人公的独白里反映出来：

> 学者同志们！副教授和副博士们！
> 你们被爱克斯（X）折磨得要命，担心一无所获！
> 你们坐在那里把分子分解成原子，
> 可是忘掉了土豆烂在了地里。
> 要是你们带着铁锹在这里展现你们的爱国主义，
> 你们就可能驰名整个欧洲。
> 否则你们就是乱哄哄地去攻克肿瘤的一群人。
> 用刀子给狗开刀——这是强盗行为。
> 我们坐着公共汽车来到坦波夫，
> 可在那里就是小跑也没有哀怨！
> 恐怕我们大家都敬爱土豆，
> 当洒上盐把它碾成土豆泥的时候。

中亚各共和国的义务农业劳动实践的范围特别广，这里年年都存在棉花收割的问题。中学生和教师们要在集体农庄里度过好几个月，结果是教育水平明显下滑。

普通食品——肉、奶、黄油——在1970年代末开始从柜台上消失，尤其是在小城市和农村。国家统一供应也不能保障足够数量的各类优质食品。国家没有出现饥荒，第一部类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人人都能得到。从1961年开始，它们的价格就是稳定的：面包的价格是：一个长面包值13戈比到25戈比（取决于面粉的质量），一个大黑面包的价格是18—22戈比，一升牛奶32戈比，一公斤肉2卢布，一公斤高级黄油3卢布60戈比。

苏联居民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

单位：公斤

	1961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肉	39.6	43.7	48.6	60.5	60.1	65.2
奶	157.5	147.8	194.4	194.7	171.4	173.0
蛋	7.0	6.7	8.8	11.8	13.5	14.6
油类	7.6	8.4	10.5	11.3	14.0	15.8

尽管消费增长了，但是很多食品买不到。通常不得不做的不是购买，而是“搞到”它们。搞到需要的东西要花费不小的力气。全国的人都到大城市购买，通常是到莫斯科，莫斯科的供应是无比地好，人们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尤其是耐用品，特别国外产的耐用品。国家对它们的定价比国产的同类产品明显高出许多，但是需求明显超过供给。这种情况就是计划经济的代价，尽管1960年代下半期开始尝试改革，但也没能克服这种状况。苏联轻工业品种类更换得太慢，它们在无形中逐渐老化，而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尤其是服装、鞋、家具不符合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越来越积极地推行特权制度：给领导们提供高级舒适的房

子、内部供应商店、疗养院和休养所。特权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孩子在声誉良好的大学学习到获得“特殊书单”上面的图书和出国的机会。

到1980年代初，全国货币存量的增长与商品价值总量的增长不平衡。结果是储蓄所的货币存款快速增长，人们存钱是为了在今后一旦需要的情况下花这些钱。商品紧缺和服务严重不足是1970—1980年代日常生活难以摆脱的特点。这导致国家没有关注的、不纳税的“影子经济”蓬勃发展。

早在1950年代末期就萌生的影子经济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交易从国家手中弄到的备用资源，用这些物资在国有企业或者地下车间生产国家没有关注的产品，接着，在缺少必要手续的情况下，通过国有商店进行出售，靠免税商店“小白桦树”的网点和“邮购交易”系统的商品证明书和发票进行交易，而免税商店和“邮购交易”本是为驻外的苏联公民开设的。城市里，40%的汽车维修、30%的家电维修都是影子经济，住宅修缮、服装缝制方面的服务也占很大比重。

“黑市”盛行，需求大的商品在“黑市”流通，还有实物交易。受欢迎的戏剧的门票可以交换医疗服务，不用排队就能买到汽车的能力可以换取孩子入大学。

紧俏书成了某种“硬通货”。用20公斤收集的废纸（报、书、杂志）作为交换条件，不仅可以“搞到”紧俏书，而且还可以获得图书购买权。这种方法在图书极度紧缺的情况下，曾被广泛使用。大仲马的长篇小说《玛尔戈王后》就是第一本“废纸”出版物。

人们对消费的兴趣明显提高。尽管各类可满足需求的商品仍旧很有限，但是，住房、衣服开始具有更加个性化的特征。时髦来自于西方，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为常去那里出差、旅游。赶时髦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尽管商店的柜台里缺少喇叭裤、迷你裙和长裙，缺少套服和高跟鞋，但是1970年代每一个讲究衣

着的人都有这样的衣服和鞋。出国为日常生活尽可能多样化提供了可能，出国也多少提高了日常生活的质量。因此，与出国相关的职业——外交官、翻译、海员、飞行员和国际航线的服务员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宣传机构不知疲倦地批判“追求物质享受”和“高消费”，但是宣传机构的努力对人们的追求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方针明显不一致。意识形态方针把苏联人民看做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而把国家的政策看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正思想的最彻底的体现。不同居民群体的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水平的不同，还由于获得社会福利的机会不同。

发达社会主义，特别是它的“后期”阶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变得一点都不像共产主义建设的过渡阶段。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但是苏联社会流行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标准与“教育新人”的任务不相适应。官方意识形态仅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它们已经不能操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原有的与集约化生产相适应的劳动成果分配形式，已经不可能再维系下去了。日常生活的个性化加快了思想意识个性化的过程，而经济体制的混乱不能保证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供思考的信息

“停滞”时期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在祖国历史上的作用

“苏联的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在我国居住了

很多年的、著名的意大利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苏联历史》这部巨著的作者朱塞佩·博法提出的问题。在寻找这个从各个角度来讲都不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时，他指出了一个准确的日期。这就是 1964 年 10 月 14 日——尼·谢·赫鲁晓夫被罢免的日子。研究者认为，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了我国发展中的缓慢衰退。我们更加倾向于认定另一个起算点。这就是 1975 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那一年。该事件标志着苏联实力的最高点。我国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实力。

但是，根据辩证法，发展势头的顶点通常是其衰落的开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如此：在名望和势力极盛时，它开始缓慢地衰败，随后为崩溃和解体所取代。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不能不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两个日期都同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64 年 10 月 14 日，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1975 年他代表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会议的文件。帝国的衰落怎么会是从这个人开始的呢？为什么常常被界定为“黄金时期”的他的执政时期后来竟变成了解体的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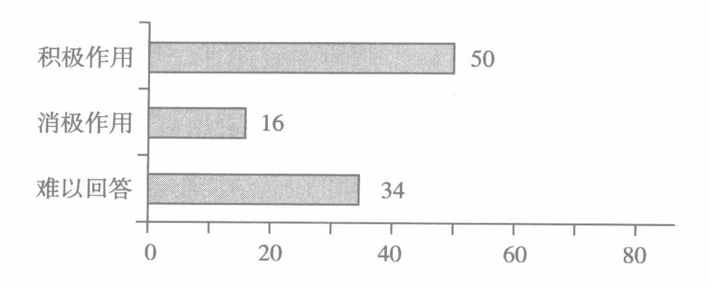
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在他去世后的最初头十个年头，关于他所写的和所说的，似乎都是这位政治活动家的消极面。但是，2006 年 12 月，自他诞辰满 100 周年之日起，公开发表的及电视节目播出的关于他的一切，如果不是直接颂扬，那也是极其善意的。政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帕夫洛夫斯基（Г. Павловский）在评论这些出版物和电视节目时，把列·伊·勃列日涅夫称为“已故的人中最幸福的一个”。

我们的大多数同胞基本上对列·伊·勃列日涅夫持肯定态度。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于 2006 年 12 月进行的问卷资料来看，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俄国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

您认为，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我国历史上起的是积极作用还

是消极作用呢？

50%的被询问者认为起了积极作用，16%的被询问者认为起了消极作用，34%的被询问者认为难以回答。



几乎所有回忆起他的人，——乃至政敌——都指出了他令人尊敬的人品。

实际情况

费·米·布尔拉茨基（Ф. М. Бурлацкий）列举了如下一件事："尼·叶戈雷切夫（Н. Егорычев），原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过大的政治野心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以苏联驻丹麦大使的身份度过了自己仕途生涯的剩余时光，他回忆说，他被从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以后，勃列日涅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并说了大致是如下的一些话：'实在对不起，结果成了这个样子……你有什么问题吗——家庭方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叶戈雷切夫有一个女儿在此前不久出嫁，苦于没有住房，他就把这件事对勃列日涅夫说了。您猜怎么着？过了几天，小家庭就分到了住房。勃列日涅夫不想招致任何人的憎恨。"



很多了解勃列日涅夫的人都谈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帮助别人。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原顾问亚·鲍文写道："如果指人品，那么，据我观察，勃列日涅夫总体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人。他是一个善

于交际、对自己喜好的事情矢志不渝、热情周到、殷勤好客的人……”

这是一个由于命运的安排而走上政治顶峰的人吗？祖国史上有过这样一个例子——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勃列日涅夫却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特例。他常表现出真诚和善意待人的姿态，但他仍然是一名政客。列·米·扎米亚京（Л. М. Замятин）回忆道：“不能说他是个善良人，他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是一个狡猾、阴险的人。尽管容易同他交谈，但是大家都警告我，这样做不值得。”

“勃列日涅夫非常清楚他是哪方面的行家里手，因此，他能够耐心地等待皇袍披到自己身上。在这方面，他没有竞争者。而且他做得不露痕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逼宫行为”——布尔拉茨基证明说。

勃列日涅夫不是政治“铁腕”的崇拜者。但是正如斯大林时代的人民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所说的，他也不是“软弱的马尼洛夫”。[①] 他很快就轻松地发展起来，但是，正如他的政敌不止一次证实的那样，丝绒手套掩盖了强硬的手腕——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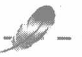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政客勃列日涅夫的问题不在于政治意志和政治艺术不足，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首先是干部的稳定性。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经常的、各个不同层面调动的思想被干部终身制口号取代——这就是著名的稳定。

实际情况

安·安·葛罗米柯回忆道：“对干部的独特兴趣是勃列日涅夫

① 果戈理《死灵魂》中的人物，喜欢不着边际地空想。——译者注

强有力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与赫鲁晓夫在干部问题上的态度截然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经常不断地把人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上去，但是，这同时也经常造成一些工作部门杂乱无章的状况。勃列日涅夫恰恰相反，甚至那些为了事业、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拿掉并用新干部取代的工作人员，仍然留在原岗位上。”



在本书的以上各部分中指出，在苏联早期，实现加快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纲领，直接取决于干部的素质，这决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努力保障管理精英发挥有效作用。为了发挥这种有效作用成为斯大林“清洗”的目的之一。年轻不是任命担任高级职务的障碍。德·乌斯季诺夫于1941年被任命为武器装备人民委员，时年33岁，尼·巴伊巴科夫（Н. Байбаков）1944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时年33岁，阿·柯西金1939年未满35岁时当上了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一年后当上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海军元帅尼·库兹涅佐夫35岁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弗梅尔库洛夫（В. Меркулов）34岁成了副人民委员，维·阿巴库莫夫（В. Абакумов）34岁领导军事反间谍机关（除奸部），阿·兹韦列夫（А. Зверев）37岁成了财政人民委员，而尼·帕托利切夫（Н. Патоличев）30岁（1939年）就成了雅罗斯拉夫尔州州委第一书记，32岁（1941年）成了联共（布）中央委员，37岁（1946年）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后来，赫鲁晓夫的癫狂行为取代了斯大林的“清洗”，对干部的重新审查成了他最喜欢干的事。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不能知人善用，而且不择手段，因此他成为被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密谋倒台的牺牲品。同时，在册干部心怀对斯大林时期的恐惧和对赫鲁晓夫的不断审查深感疲惫，他们渴望安宁，希望稳定。勃列日涅夫成了这些情绪的表达者。结果是，一批曾经年轻的人民委员和年轻的党委书

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长老掌权”。但是，这发生在后来，在1980 年代。而在 1960 年代中期，这一群人追求的是稳定。勃列日涅夫正是作为稳定和集体领导的保证人被推出执政。他登上权力的奥林匹斯山靠的是提拔而不是夺取：“不论从前的领导人写过什么，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他平平稳稳地得到权力，好像是有人早就将皇冠在其他人的头上试来试去，最后却选中了他。”（费·米·布尔拉茨基）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招人喜欢，正是由于他具有众所周知的，善于妥协和灵活、不喜欢强硬管理的名声。妥协和集体领导是稳定的重要的补充条件——称勃列日涅夫为“见风使舵的领袖”，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情况

费·米·布尔拉茨基回忆道：“勃列日涅夫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每天至少先用两个小时给其他高层领导人、有威望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州委书记打电话。他打电话往往都是一个腔调——譬如，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问题我们正在准备解决，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想象出，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会感到多么的自豪和激动。这样，勃列日涅夫的威信也就提高了。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稳健和态度温和的领导人，他在没有同其他同志商量并没有征得自己同事的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从不采取任何行动。”



感受到这种集体领导风格有什么不好了吗？时间证明，干部稳定的优越性同给整个体制带来致命后果是相关的。因为，这种稳定对在册干部非常适合，对社会而言，就变成了拒绝现代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到 1960 年代中期，1930 年代苏联形成的动员型政治经

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

这种体制作为非常情况下解决紧急任务的手段，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条件下，曾十分出色地表现出它的有效性。但是到196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求在增加灵活性、减少集中、从粗放型经营方式向集约型经营方式过渡方面改进，主要的是，要求在作出决策时，思路从政治转向经济。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建议改革苏联经济的目的就在于此。由于最高权力集团已经形成的“分工”，继续推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一把手——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赞同改革方案。但是，新制度也正是断送于此，尽管改革除了威胁稳定之外，对方方面面都有好处。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国家领导人对解决如此重大的任务没有做好准备。

首先是客观情况的作用——西西伯利亚油气田及雅库特天然金刚石矿的发现，大大缓解了苏联经济问题的尖锐程度。但是，主要矛盾在于，改革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当时，勃列日涅夫恰恰没有提出国家发展纲领，他的智慧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一位熟悉情况的同时代的人指出的那样，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非常不喜欢读书，也十分讨厌写作”。

安·安·葛罗米柯写道：“勃列日涅夫的知识水平肤浅。”他不喜欢谈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理论话题，这不是偶然的。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他几乎什么都不读……”

勃列日涅夫谈到自己时说，意识形态——不是他的管辖范围。“我的强项——是组织和心理学。”甚至在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时候，也不可能从概念上理解改革管理方式问题的根本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格·阿·阿尔巴托夫（Г. А. Арбатов）的证实，他提醒发言稿代写人的指示很典型：“写简单点，别把我搞成理论家……谁会相信，勃列日涅夫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列·伊·勃列日涅夫不准备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亲自采取果断措施，也不准备支持那些了解改革必要性的人们的建议，首先就是柯西金的建议。研究人员认为，在对待改革的这种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尽管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不能证实柯西金有任何政治野心，但是，高官们对柯西金的嫉妒并非起着无关紧要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对待柯西金关于改革管理体制的建议的反应是："他想出了什么？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这个？要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些年间直接参与研讨国家经济状况的苏联国家计委主任尼·康·巴伊巴科夫回忆道："他不让我说下去，并说：'尼古拉，去你的吧！你的数字把我们都搞晕了。我已经什么都弄不明白了。我们休息一下吧，我们去打猎'。"

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花费了几年时间，准备了有关经济危机加重和急需向具有优势的集约化经济过渡的报告，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报告不仅遭到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否定，甚至遭到柯西金的否定，甚至都没有给党的领导人看。结果是，发展不平衡，修订计划变成经常性的：如果说早些年计划制订之后很少修改，那么，在第十个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断地修订计划成了计划的顽疾。命令式经济的严格限制，成了经济发展效率降低和管理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甚至在政治管理的最高层面，管理机器也表现出自身的无效性：在通过决议时，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就早已知道，其中的很多任务将完不成。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或许，将来这种态度会被更合理、更健全的态度取代，但是，接下来，勃列日涅夫在1974年开始患的疾病起了毁灭性作用，病后，领袖的工作能力不断下降。

疾病把勃列日涅夫的执政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是个精力充沛、善意的、随机应变的、总体来讲称职的领导人，谙熟各种政治斗争手段，但是，使用的只是"柔韧的技术"。安·萨哈

罗夫院士的遗孀邦纳（E. Боннэр）回忆说，萨哈罗夫原先经常同主管军事工业的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见面，他总能发现勃列日涅夫很内行，具有技术上的职业判断力。

第二个时期，他是一个病人，按照同事们的要求，继续坐在“沙皇的宝座”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加“游戏”的主要玩家没有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根据葛罗米柯提供的证据，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提出因健康状况辞职的问题，但是每一次都被战友们劝阻了。

安·安·葛罗米柯回忆说：逝世前的2—3年“他实际上处于不能工作的状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待上几个小时，但是已经不能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给一些同志打打电话……”

疾病使人的弱点强化，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对奖章的嗜好。美国国务卿亨·基辛格描写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的情形：“……他以孩子般的自豪向我们展示剪报和各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授予他列宁和平奖章发来的贺电的合订本。拥有几乎是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在夸耀自己下属给予的奖赏和那些仕途和政治生涯完全取决于他的人们的祝贺的时候，似乎没有看到任何的不合适的地方。”

这些以及类似这样的情节，是勃列日涅夫近20年的执政时期后来被确定为“停滞”时期的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没有发展？不应该使用广义的“停滞”一词，因为经济持续增长：在1966—198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固定资产增长了6倍。尽管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70%，居民的实际收入也以同劳动生产率大致一样的速度增长。它们增长了2.2倍；居民人均日用品生产和零售商品的流转增长了近2倍。换句话说，“停滞”这一术语首先意味着国家最高领导层健全的干部更新过程被破坏，意味着管理上的长老掌权化，这是实施稳定方针的必然结局。因此，勃列日涅夫的20年就成了坐失机会的20年。

至于对这一时期主人公的历史评价，那么，亨·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的看法是极其准确的："我认为，他真诚地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喘口气。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他准备为此付出的代价。"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积累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潜力耗尽了，苏联的制度惯性地存在的同时，耗掉了这些潜力。国家无法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适应科技革命。在影响社会意识的苏联知识分子的眼中，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和活力。

苏联领导人宣布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美国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裁军问题走出"僵局"，"冷战"演变成公开冲突的危险变小，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对抗思维压在苏联领导人心头，迫使他们仍旧在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世界对抗的背景下分析任何事件。这种矛盾始终也没能克服。

第4章
改革时期（1985—1991年）

22.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逝世，当天，政治局元老、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与苏共中央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ев）——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举行了短暂会晤（半小时），他们商定好要“相互配合”。3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提议让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一职，所有政治局成员都表示支持。当天，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党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面临一大堆内政外交问题的国家：搞得国家精疲力竭的阿富汗战争还在进行；国家全部资源的近40%都被用于维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苏联经济已经好几年都靠大量卖原料来维持。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一个关键环节。

在战后第一个十年里，苏联经济的增速是每年大约10%，第二个十年里，放慢到每年7%，但在工业国家里，这种增速仍然是相当惊人的。到80年代前夕，形势已经面临危机。当戈尔巴乔夫收到最近的五年计划规划的时候，其中确定每年增速仅为2.8%。戈尔巴乔夫将加速发展——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思想作为政策基础。在十五年内，预计在将生产潜力翻番、劳动生产率提高

1.3 倍到 1.5 倍的情况下，让国民收入翻番。国家领导人还承诺，将推行建立在社会公平原则上的社会政策，特别强调了两个首要问题：粮食问题和住房问题，并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期限。粮食问题预计在 1990 年前解决，住房问题将按照“给每个家庭都提供一套单独的、设施完善的住房”的原则，在 20 世纪末之前解决。

22.1 “加速发展路线”

新上任的总书记立即否定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该提法在此前早已不符合实际。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审定了苏共纲领，并制定了新党纲，由苏共二十七大（1986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6 日）批准。与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不同，新党纲没有规定党对人民负有的具体社会经济义务，并彻底卸掉了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作为自由、有觉悟的劳动者的组织性很强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其实现被推迟到不能确定的遥远未来。主要基点是：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苏共新领导人在确定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路线后，向人民承诺要将经济急速地“面向人”，制订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 年）。

与战前的几个“五年计划”相似，“十二五计划”包括广泛的建设计划，是一个“二次工业化”计划。该计划得到苏共二十七大的赞同，并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此后就成为法律。“十二五计划”特别重视重工业，而机械制造业被认为是重建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从生产车床转向生产成套生产设备、工业机器人，在国民经济中采用新一代机器，使国民经济加速——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Н. И. Рыжков）（1985—1990 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5—1986 年度的总路线，实现这一路线要求大量投资以及劳动者的热情。1985 年 9 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与

“斯塔汉诺夫运动”老兵和年轻的先进生产者会见时，号召不要把事情都归结到卢布，并动员青年们用自己的刚毅精神去解决党提出的任务。希望年轻一代将热情用于推动潜力增长，不等技术设备更新，马上就完成加速发展。

提出要利用如下潜力：（1）使现有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普及多班轮换工作制；（2）加强劳动纪律，向先进工作者的经验学习；（3）以各地合理化生产者和发明者为榜样，推行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最后还提出，要提高产品质量。

行政领导部门还沿用习惯的方法行事。苏联政府确信，通过颁发国家优质奖章对高质量产品进行精神鼓励的办法并不会产生预期效果。于是，1986年5月12日，仿照国防企业中存在的、由军事主管部门代表验收制成品的办法，引入国家验收制度。

改革初期笼罩着许多可怕的灾难：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在新俄罗斯港附近发生海难，这些灾难无一例外的都是由于具体负责人纪律松弛、玩忽职守造成的。

但是，对于“加速发展战略”的命运来说，关键因素是1985年石油价格下跌，苏联的外汇储备立即减少了2/3，仅此一项就足以引发经济危机；而紧随石油价格下跌，又要花钱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不久，亚美尼亚又发生地震；还要对机械制造业增加投资；酒类贸易下降，导致预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汇不足，导致从国外采购消费品数量减少。

这样，到1987年的时候，“加速发展路线”已经面临失败的威胁，因此，决定转而改革经济体制，作为实现加速发展的主要手段。在1987—1988年间，这项改革其实是部分地回复到1965年经济改革的原则上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加强利润的作用。从现在起，加速成了目标，而改革被当做实现加速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意识到改变经济形势的唯一途径不能是计划，而是市场关系。苏联

领导人倡导的经济变革从三个方向实现：

1. 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自主性；

2. 发展私人的主动性，在那些“能得到社会认可”的领域发展私人企业经营；

3. 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吸收外资。

1986 年秋，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个体劳动法》，这部法律很小，却是揳入苏联宪法确立起来的制度中的一个楔子，是私有制支持者们的首次胜利，但是部长会议《关于加强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1986 年 5 月 15 日）却阻碍了该进程的发展。

经济改革的第二步是 1987 年通过的《国有企业（联合公司）法》，给企业及其劳动集体以很大权利。企业必须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不是由中央而是自己独立选择伙伴、采购原料、销售产品。但是，国家没有敢把作为社会政策的最重要杠杆——价格放开，从而也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济自主性。

企业获得了建立对外经济联系的权利——包括建立合资企业和在国外市场上销售部分产品的权利，这样，国家就削弱了从 1918 年开始实施的外贸垄断。同时，大部分产品都不得自由销售（而有时国家把全部产品都纳入国家订货），剥夺了企业自筹资金的自由；但是答应逐渐减少国家订货，将企业纳入经济核算关系中。劳动集体获得了选举各级领导人的权利（1990 年被废除）和工人监督行政部门活动的权利。

观　点

企业经营自主的思想很简单，从 1960 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就已提出。每个企业不论大小，都有权支配自己的产品和资金，而不必等中央的指令或态度。按照改革派的思想，企业自主经营必须导致两个效果：每个企业都尽力设法以增加现金储备为目的来组织生

产；每个企业都更加主动地开发市场，联系（而不是由上边强加）最合适的承包单位，几乎自动地使生产者的地区内关系和地区间关系合理化。

想是这样想的，但并没有成功。首先，经济工作者只是简单地靠强制的办法提高了产品价格；其次，他们开始寻求与地方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领导人取代了联盟的部长们）的最佳联系，而不是寻求与经营者或共同生产者的最佳联系。一方面，工业部门对中央的依赖性削弱了；另一方面，企业领导人（相应的企业本身）对政治经济方面的直接领导人（区、市、州一级的，以及边疆区、自治共和国一级的，而最主要的是加盟共和国一级的）的依赖性加强了。



变革涉及整个管理体制。在争取管理自由化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反对设立庞大的联盟各部，并认为该斗争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二级部被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散，一级部则被大幅削减。在一年之内，中央部门职员从170万人裁减到70万人。宣传表明了：大幅裁减在管理国家方面表现确实很糟糕的管理机构，乃是使勃列日涅夫时期盲目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的表现。必须指出的是，在一段时期内，这个庞大的、难以扭转（当然，也是不够有效的）的国家管理机器还会按照惯性继续下去。但是，个别部门最初的一些严重问题导致了整个体制的危机。



观　点

神经系统可能确实很糟糕，但是如果将其切断，生命活动就会停止。涵盖全国的各部，与党的机构一起组成国家的神经系统。大幅缩减各部的规模和功能，使苏联失去了能够将经济空间和其他空间连接起来的神经系统。如果说，中央政府让经济去自由地航行，那这还并不意味着各共和国党委马上失去力量。戈尔巴乔夫的决定

使不可能之事变成可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企业领导人根本没有追随莫斯科的实验者的步调，而是在基辅、明斯克以及其他地区的首府寻求对自然管理进程的仲裁法官。现在，在某加盟共和国首都有后台，比与莫斯科的关系重要得多。

国家在转瞬间面临分裂为14个大世袭领地的事实。第十五个最大的世袭领地——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党委。她比其他共和国更不好过，在经济机制的工作中感到致命的不协调。这里存在着荒谬的俄罗斯"分离主义"的根源，和在苏联经济相互依赖性加剧的条件下"不与别人来往"的离奇愿望的根源。



《合作社法》于1988年3月由最高苏维埃根据雷日科夫的报告予以通过。1988年3月，在第四次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该法律草案的同时，强调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创造性和技能，吸收每个公民管理社会事务。戈尔巴乔夫正式谴责了那些公然主张实行私有制的政治家。1988年11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他就此问题还批评了"来自爱沙尼亚的同志"，"……众所周知，私有制是人剥削人的基础"，他说，"而我们发动革命正是为了消灭这一基础，将一切转归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就意味着倒退，这是严重的错误决定"。

然而《合作社法》成为恢复私有制的最重要一步。合作社向国家纳税，而国有企业，除了交税外，还要自动将部分利润上缴给国家。合作社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它可以向职工支付比国有企业高1—2倍的工资。与此同时，生产着同样的产品，还可以利用国家的生产资金。这样的政策造成劳动集体走向分裂。

此外，合作社还成为将支票变现的主要渠道，迫使政府大大增加印钞机的生产能力——即多发行纸币。此前，国有企业账户上数十亿非现金卢布仅仅用于相互结算，不能买任何东西；现在，大批资金吞掉大批商品，在一年之内，商店货架和仓库里都变得空空如

也，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紧迫。

最后，合作社打破了企业对外经济活动权的垄断，1987年，按照《国有企业（联合公司）法》，企业获得该项权利，可向国外输出资金和商品。

1989年开始在土地部门推行社会经济改革。1989年3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放弃对土地工业综合体的过分集权的管理，解散1985年成立的苏联国家土地工业综合体，中止1986—1987年间展开的同个人副业的斗争——该项斗争是在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旗帜下进行的，极大地损害了农产品生产。从现在起，五种土地经营形式——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土地联合企业、合作社、农户（农场）经济——被认可为是平等的。承认建设农场经济（农民脱离集体农庄）的合理性（随后也承认其必要性）表明：国家领导人已经承认，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因为到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很明显，"一个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任务"——粮食计划——已经崩溃了，其完成期限推迟到1990年代末。各类农业组织、市民、喜好种植的人都参与解决该问题。

1989—1990年间，显而易见，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除了国防和重工业之外）都必须向市场过渡，但是，国家不急于放弃对经济管理的垄断地位，为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的折中方案：宣布要过渡到"可调节的市场"模式，即计划和市场必须结合起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份相关决议——1990年6月通过的《关于向可调节的苏联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规定实现这一过渡。该构想的基础是"经济租赁化"计划（主要制订者是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预计从1991—1995年实现该计划。将20%的工业企业转为租赁；并规定，在第一阶段（1990—1992年）既要运用指导性管理方法，也要运用经济杠杆，而且经济杠杆的作用要逐渐增大；到第二阶段（1993—1995年），经济性领导方法将占主导地位。

该计划的制订者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苏联经济危机的规模，他们不明白，任何经济改革都必须快速推行，不能旷日持久。1990年7月，苏联总统谢·米·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的时候，商定：制订一个备选的计划。

成立了由沙塔林（С. С. Шаталин）院士和俄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格·阿·亚夫林斯基（Г. А. Явлинский）领导的委员会。

观 点

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委员会起草了全苏“500天计划”。作为决定性的第一步，规定要稳定金融货币体系。主要食品和商品的价格拟保持不变，卢布逐渐稳定后，在保持对其他商品价格的控制下，一批商品的价格才能“下滑”。计划中还规定了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措施，经济结构、外贸活动、货币政策、对公民的社会保护政策的改革问题，等等。还决定在阿巴尔金计划和沙塔林—亚夫林斯基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个统一的折中方案，尽管这些计划在概念上互不调和。结果，因为“500天计划”规定剥夺国家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地位，该计划就被废除了。



经济改革的新目标要求制定新法律，苏联最高苏维埃很快就通过了这些新法律。这些法律触及苏联经济关系的基础，包括所有制问题、土地问题、苏联企业的活动、地方自治、地方经济等问题。新的市场法律必须能够调节所有制的非集权化、非国有化进程，消除大工业垄断，成立股份公司，发展小企业，能够对扩大经济活动和企业经营自由有所促进。到1991年夏天之前，已经就经济问题通过了100多项法律、决议、命令，但是由于捍卫自己主权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力机构加以抵制，大多数法律都没有生效。

如果说，1986—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很慢（但却是在增长），

那么，从 1989 年起已经开始下滑，居民的实际收入在减少，国内所有商品的短缺情形加剧，商品价格上涨。大众与自己的劳动成果脱节的情形也在增长。从 1987 年开始，由于宣布了公开性路线，人们更加尖锐地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劳动者走上街头喊着抗议的口号，罢工潮在全国蔓延。1990 年 12 月，苏联政府领导人雷日科夫承认经济已经崩溃，“改革遇挫”，提出辞呈。同时进行了政府改革。

经济改革走入死胡同，在很多方面是由于苏联政府在价格政策问题上优柔寡断导致的。1986 年，雷日科夫提议，在苏联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中，通过放开价格（首先放开农产品价格）、放弃对农业生产的国家补贴，对价格形成机制实施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在 1986—1987 年间持另外的立场。他同意必须提高粮食产品的价格，同时他也提出要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推行平衡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但是，1988 年，戈尔巴乔夫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观点，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承认必须同时提高粮食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答应通过提高工资和社会补贴来推行改革。但是，到 1991 年春天之前，苏联领导人仍然不敢改革，担心引发社会动荡——而实际上，由于商品短缺加剧，社会动荡早已开始了。

1991 年，苏联新总理帕夫洛夫（В. С. Павлов）进行了货币改革。1991 年 1 月，更换了面值 50 和 100 的卢布。更换卢布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消除国内外造假钞者的基础，因为造假钞者仿造最多的正是这两种面值的卢布；其二，将“影子资本”置于控制之下，并部分地使其贬值，因为“影子资本”储存的主要是这两种面值的纸币。1991 年 4 月，商品多次涨价，该措施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消除商品短缺问题，减少公民的储蓄额（到 1991 年为止，银行存款已经达到 4000 亿卢布）。“熄灭”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人为地降低国民的消费能力，这种想法在苏联左派和右派的领导人中都很受欢迎。“帕夫洛夫涨价”的同时，也给予存款者

40%的补偿，但是，这些补偿从1991年底才可以用。同时，居民在银行的存款也被冻结：限制提款和销户。一年之后，正是因为冻结存款导致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公民将无法挽救自己的存款。

但是，采取的措施已经不能挽救局势。苏联国民对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更有好感，因为他们许诺不用人民的钱、而是为人民的福利而推行经济改革。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对导致人民贫困化的苏联政府反对最为积极。“帕夫洛夫改革”被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作为口实，指责联盟中央推行反人民的经济政策。

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行政方法已经不起作用，而经济方法苏联政府还不曾掌握，苏联领导人越来越需要运用新的政治手段。

同时代文献资料

■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履历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业；1967年毕业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学院。1978年11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继列宁之后的第二个有大学文凭的党的领导人，新领导人的当选被寄予厚望。1990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他宣布自己下台。1992年之后，成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

■ 1987年1月2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节录

……改革，就是要果断克服停滞的进程，摧毁障碍机制，创造

出苏联社会经济可靠的、有效的加速发展机制。我国的主要构想，是将科技革命的成就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的全部潜力运转起来。

23.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米·谢·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的失败源于官僚阶层的抵制，这就促使他试图依靠群众的积极性。这样一来，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国家领导人就转向了政治改革。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1988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启动了宪法改革进程，成为政治改革的中心环节。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原则写入了两项决议中：《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关于实施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措施》。会议做出决议，改革作为苏联政治基础和国家机构基础的苏维埃体制。保证苏维埃拥有全权，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方向。

但是，会议的主要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写入《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的原则：自下而上，各级苏维埃的主席和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应由一个人兼任。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一决定——党的领导人普遍地兼任苏维埃领导人——具有关键意义。他说，如果该决定通不过，他就不会对关于民主化的整个决议投票。该决定也允许戈尔巴乔夫自己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整个垂直体系。

1988 年 10 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1988 年 11 月 29 日，按照他的报告，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

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以及《关于选举苏联人民代表》两部法律。遵照这两部法律，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就被彻底改变了。

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是由 2250 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成员中选出 544 人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立法、管理和监督的常务机构（最高苏维埃由人数相同、权力平等的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取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保留，其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与旧的最高苏维埃不同，新的最高苏维埃无权修改法律、发布规范法令，无权在休会期间代替最高苏维埃工作。

宪法还补充了通过建立一个新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体现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司法权分开的思想。宪法监督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活动只以《宪法》为依据，任务是监督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是否符合《根本法》。但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不受该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也无权废除这些法律（哪怕这些法律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而只能确认存在抵触的事实。

修改后的选举制度不仅规定从地域选区和民族选区选举代表，而且还从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中直接选举代表——苏共首先就属于这样的社会组织。宪法还确认了差额选举原则（从若干个候选人中选举）；并建立了通过选区选举会议代表的淘汰机制，以初步遴选各选区的代表候选人。

新规则中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对选举办法民主原则（得到 1936 年宪法和 1977 年宪法确认的）的背离：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直接选举被两级选举取代，且必须每年更换其成员的五分之一，这就造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刚刚获得经验，就要被新人取代。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成员（主要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工作人员）比普通选民有更多的票数。

1989 年 3—6 月，依据新通过的法律开始政治实践，选出了苏联人民代表，并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89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9 日）。代表大会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А. И. Лукьянов）为第一副主席，批准尼·伊·雷日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代表大会对《宪法》未做补充和修改，但是涉及发展宪法改革的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谢·戈尔巴乔夫提醒代表们不要急于修正现行宪法，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太重要的政治文献，宪法文本可以适应新出现的各种局势”；同时，米·谢·戈尔巴乔夫也表示，必须将一些“革命性变革”在新《宪法》中固定下来，但戈尔巴乔夫又立即解释说：“现在正在改革的紧要关头，我们还不可能考虑所有必须反映在新《根本法》中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解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奇怪逻辑：同时要解决两项任务，既要对现行《宪法》做出补充，还要紧锣密鼓地筹备一部新宪法——“民主社会主义宪法”。

代表大会成立了由 107 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主席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副主席是阿·伊·卢基扬诺夫。55% 的“宪法委员会”成员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苏共中央书记、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州党委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及其机关成员；还有 40% 的成员是学术界和创作知识分子代表；还有一名主教和两名工人。委员会中有四名反对派领袖［鲍·尼·叶利钦、加·哈·波波夫（Г. Х. Попов）、安·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安·亚·索布恰克（А. А. Собчак）］，组成了跨地区代表小组。

萨哈罗夫院士提议准备两份备选的《宪法》草案，并对其进行同等审议，代表大会没有支持这个建议。不过，萨哈罗夫作为“跨地区代表小组”的共同主席，主动承担在 1989 年 12 月之前起草自己的《宪法》草案。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包括许多知名法

学家在内的“宪法委员会”的领导下，还有许多院校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但好几年都没能制定出一份宪法草案。

1989年12月，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跨地区代表小组”提交了一份激进的《宪法》草案——“萨哈罗夫宪法”草案，主张彻底改革民族国家制度，消除苏联的等级结构（“结构性组成部分”），将当时所有50多个民族国家构成体和民族行政构成体都变成联盟主体。将俄罗斯联邦的所有自治地区都分离出去，剩下部分划分为四个区：欧俄、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而且“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尽管“萨哈罗夫宪法”在形式上保留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但在实际上，苏联的这种演化尝试必将使苏联解体更快。

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了许多问题，对苏联现行《宪法》细化、修改、补充，并通过了三部宪法法律：（1）对苏联《宪法》（《根本法》）中关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相关机构的活动程序问题的某些原则的细化；（2）对苏联《宪法》中选举办法的修改和补充；（3）对苏联《宪法》第125条的修改和补充。除上述法律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就某些宪法问题授权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宪法委员会》的决议。

遵照上述法律，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行解决成立人民代表大会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有权对苏联政府表达不信任；中专学校和高等院校的集体有权提出人民代表候选人；社会组织无权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宪法监督不仅推及各种法律草案，而且还推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他法律、法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责成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系列宪法法律，并向人民代表大会例会提交与此相关的、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提案。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完成了苏联宪法改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权力从党逐渐转向苏维埃，从苏共中央逐渐转向苏联最高苏维埃，老广场（指苏共中央）让位于克里姆林宫。第二阶

段的权力斗争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展开，是在国内社会经济形势急剧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苏联政府在1988年确定的经济政策在1989年有了初步效果：经济崩溃了，一切都短缺。各加盟共和国间、各边疆区间、各州之间、各市之间都因商品储备而爆发了“经济战”。

1989年头7个月，500多个劳动集体爆发了罢工。从1989年7月开始，罢工潮蔓延到国内一些重要的产煤地区——库兹涅茨克、顿涅茨克、伯朝拉煤矿。随后，在各城市中定期爆发罢工。这些罢工起初只是提出一些经济要求，但是，到1990年6月，顿涅茨克成立了“矿山工人独立工会”，并决定宣布政治总罢工。10月、11月间，沃尔库塔矿工发动总罢工，要求切实地将权力交给苏维埃、将土地交给农民、将工厂交给工人。

苏联第三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重大修改。1990年3月12日，阿·伊·卢基扬诺夫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以及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报告，提出改变1917年后苏联国内形成的国家制度形式，大大限制苏维埃的权力，将权力转交给新设立的苏联总统，总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权力代表机关。

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谢·谢·阿列克谢耶夫（С. С. Алексеев）论证了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认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与分权思想相矛盾，只会导致专政；对于政治改革路线的转变（从苏维埃制度转向总统制，从全民政权转向一人专权）还有其他一些理由：首先，急需稳定国内政局；其次，必须加强对改革的个人责任制。戈尔巴乔夫及其志同道合者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比抗议设立总统职位的激进民主派更激进。

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该法律在政治方面的一些主要原则可以归结如下：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废除关

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 6 条；实行多党制原则。

苏联最高苏维埃丧失了行政功能，只保留了立法和监督功能。法律将总统并入到行政权结构中，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总统有立法倡议、批准法律和其他大多数法规的权力（权力之大，堪与美国总统相比）。总统必须普选产生，苏联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监督其工作的形式，仅仅是听取有关国情的年度报告。1990 年 3 月 14 日的法律没有在苏联建立起总统治理形式，而仅仅是提出在苏维埃政权的范围内、并在其基础上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一些特征结合起来，即实行一种混合型的治理形式。但是，这种趋势很快就向“强总统”、“弱议会”的趋势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保障将私有制合法化。

代表们破坏了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选出第一任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举行差额选举的尝试遭到抵制。自我推举的候选人安·奥勃伦斯基（A. Оболенский）还在编订候选人名单的阶段就被取消资格，而候选人尼·雷日科夫和瓦·巴卡金（В. Бакатин）则选择了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1990 年 3 月 14 日通过的法律为所有制关系体系方面克服国家的垄断地位准备了条件。在所有制形式的清单上，排首位的就是公民所有制。法律确认了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租赁制和股份制，这就简化了“影子经济”同官方经济勾结的手续。取消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独占权”的概念，代之以“居住在该领土上各民族的不可分割的财产”的新概念；而国家财产则分为全苏财产、加盟共和国财产、自治共和国财产、自治州财产、各区和各行政疆域单位的财产。

在 1990 年夏天各加盟共和国权力机关改革之后，支持实行总统制的人们的激进情绪进一步加强。1990 年 9 月 24 日，苏联最高

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的法律，在 1992 年 3 月 31 日之前，把本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的问题授权给总统进行立法。该法律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制的历史性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

1990 年底，鉴于行政权瘫痪、宪法危机加深，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加强了苏联总统的权力，废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以及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设立了部长内阁作为行政命令机关。内阁由总统组建，直接隶属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仅限于参与表决部长内阁领导人的问题。

代表大会延续了组建总统治理机构的路线：设立了苏联副总统一职，成立了隶属总统的国家最高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由一个总统下属的咨询委员会变成总统领导下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最高管理机构的活动，保证其遵守即将制定的《联盟条约》。1990 年 3 月，阿·伊·卢基扬诺夫取代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他指出：从现在起，“苏联总统将对法律以及其他极为重大的国家决定的全面推行产生积极影响”。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到了《联盟条约》，证实了宪法改革的新的急剧转向。在这种转向过程中，宪法问题已经偏离了改革的轨道，到 1991 年，谈的已经不是联盟国家《根本法》的命运、而是联盟国家本身的命运问题了。米·谢·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在业已开始了的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实现从一种激进革新（设立总统职位）向另一种激进革新（签订《联盟条约》）过渡是必要的。戈尔巴乔夫认为，“立即准备新《联盟条约》，是能够阻止苏联崩溃的唯一手段”。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90年10月9日通过的《苏联社会团体法》**

第一条“社会团体”的概念

社会团体是根据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公民自由表达意见产生的自愿组合的团体。

被认可为社会团体的，是政党、群众运动、工会、妇女组织、老兵组织、残疾人组织、青少年组织、科学技术组织、文化教育组织、体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成立的协会、创作同盟、同乡会、基金会、协会等公民团体。



24. 民族运动与民族冲突

改革暴露了苏联体制长期潜伏的矛盾，包括民族问题的难以解决以及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中民族精英地位的加强而引发进一步激化的民族问题。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加速发展政策导致国家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经济以最低速度增长，自然，这也消极地影响了普遍的生活水平。

实际情况

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分析当时局势的时候，说：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对民族主义的能量估计不足。



随着中央领导的削弱，就在民族基础上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其中第一场民族冲突是 1986 年 2 月雅库茨克的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青年因在滑冰场上打架而出人意料地爆发了，显然，这还只是比试力气——至少还没有酿成严重后果。1986 年 12 月 16—18 日，阿拉木图的一些大学生对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Г. В，Колбин）取代哈萨克族人丁·阿·库纳耶夫（Д. А. Кунаев）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提出抗议；抗议活动遭到镇压。

从 1987 年夏开始，民族运动具有有组织的性质，首先爆发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恢复其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自治地位的运动。

1988 年，爆发了争取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归并亚美尼亚的运动，亚美尼亚坚持应将纳—卡地区划到亚美尼亚，纳—卡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占该自治州人口的 80%）也表示支持；而阿塞拜疆人则反对变更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冲突发展为流血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阿塞拜疆人急于离开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人则急于离开阿塞拜疆。到 1989 年，外高加索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 30 万，其中大多数都是恐怖活动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联盟中央在冲突中显得很无力，该处的冲突已经变成未来全苏冲突大爆发的策源地。1990 年 1 月初，军队开入了正在发生暴乱的巴库（冲突双方在楼顶上对射），冲突导致近 200 名平民被打死。

1989 年 3 月，在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民族冲突，乌兹别克族和梅斯赫廷—突厥人都有大量伤亡。在梅斯赫廷—突厥人的坚持下，有 16282 人从费尔干纳州临时迁往俄罗斯联邦的斯莫棱斯克、奥尔洛夫、库尔斯克、贝尔格罗德、沃罗涅日等州。

从 1989 年 4 月起，格鲁吉亚争取脱离苏联的运动开始活跃。格鲁吉亚公开宣称：1921 年 2 月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对格鲁吉亚国家的占领。该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公然的分离主义和反共的性质。1989 年 4 月，由于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们鼓动群众与军队

冲突，在第比利斯动用了军事力量，结果有 20 人被打死。

美国总统布什在与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一次会晤时提醒说：美国从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他宣称，如果莫斯科对那里采用暴力，美国的反苏情绪就会上升，就会抵制美苏双边关系的改善。从 1988 年春天到秋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民阵线”成立，他们称 1940 年夏天的事件是武装占领，要求共和国政府通过决议，退出苏联。游行集会者广为人知的口号是：“俄罗斯人，滚蛋！”“夏至，出发，火车站，俄罗斯！”1988 年 11 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主权宣言》，对共和国宪法做出补充，中止苏联法律的效力。1989 年 5 月和 7 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相应地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和法律。

乍看起来，这些决定并无任何不同寻常之处。

遵照 1977 年苏联宪法，苏联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有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一起组成苏联；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通过其最高国家机构确定了加盟共和国法律对苏联法律的优先地位，是与苏联宪法相矛盾的。

1989 年 12 月，又发生了新的、令人担忧的事件。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通过退出苏共的决议。这就意味着作为苏联国家管理机构基础的统一的共产党的解体进程开始了。苏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采取武力，保持党的统一。米·谢·戈尔巴乔夫说服苏共中央委员会，将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局势的问题推迟一段时间，先派一个代表团到维尔纽斯，“听听理性的声音”。1990 年 1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 40 人的代表团的陪同下，飞往维尔纽斯，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直接走上街头，走向人群，与他们争论；但是，却不能说服任何人。戈尔巴乔夫称，即使获得了期待中的独立，立陶宛公民也无处可去。但是，多半正是从那时起，他容忍了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可能性。

1990 年 1 月，摩尔达维亚爆发了大规模游行。1 月 11 日，苏

军开往各波罗的海共和国。3 月 9 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谴责 1921 年对自己国家的占领，以及随后将其归并苏联的事件。

1990 年 3 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鲁赫”在选举中展示了实力。

1990 年 2 月，立陶宛的选举过程中，在议会的 140 席中，反对派联盟“萨尤迪斯”占了 90 席。反对派也在拉脱维亚获得胜利；在爱沙尼亚，反对派也获得近半数席位。1990 年 3 月 11 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宣称：“被偷去的东西应该归还的。”瓦·兰兹伯吉斯当选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作为回应，3 月 18 日莫斯科中止立陶宛的石油供应。

1990 年 6 月 12 日，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与兰兹伯吉斯会晤。此前，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拒绝与其见面，他宣称：“他们是在同国外的强国谈判……维尔纽斯的这个举动是非法的、有害的。”稍后，对立陶宛的能源供应又恢复了。

1990 年 5 月 4 日，拉脱维亚宣布，希望成为独立国家。

25. 各共和国的“主权”大阅兵与苏联解体

1990 年 3 月，俄罗斯联邦举行人民代表选举，1990 年 1 月 20—21 日成立的选举集团“民主俄罗斯”表现得极为活跃，其创始人是俄罗斯联邦 22 个地区的人民代表候选人，而其实际领导人则是苏联人民代表“跨地区小组”代表鲍·叶利钦、加·波波夫、亚·索布恰克。在选举中，“民主俄罗斯”获得大量投票。

1990 年 5 月，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工作（5 月 16 日至 6 月 22 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选举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角逐俄罗斯议会领导人职位的有三人（按照法

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应该在最高苏维埃成立之前，在代表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戈尔巴乔夫推荐了两人：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代表波洛兹科夫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民主俄罗斯”集团则提名叶利钦作为候选人。斗争实际上是在波洛兹科夫和叶利钦之间展开的。

5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发言，指责叶利钦“使俄罗斯背离了社会主义”，试图瓦解苏联，“蔑视列宁确定的原则”。米·谢·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代表们讲话时，宣称：“同志们，如果认真分析他（叶利钦）说过的话，就会发现，有人在号召我们在恢复俄罗斯主权的旗号下瓦解苏联。”然而，1990 年 5 月 29 日，实质上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而戈尔巴乔夫却飞往华盛顿。

1990 年 5 月 29 日，叶利钦在第三轮投票中以 4 票的微弱优势（规定必须达到 531 票，而叶利钦获得 535 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是在机舱吃午饭的时候得知这一结果的，当时，飞机正好飞越大西洋。

实际情况

沉思半晌，戈尔巴乔夫对助手们说：“应该和他达成协议。我没有对他不满。”可是，他在公开场合对叶利钦赢得选举却煞有介事地表示担忧，称：考虑到叶利钦的活动具有“破坏性”，他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将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



5 月 25 日，作为候选人，鲍·尼·叶利钦发表施政纲领，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最主要的方向只有一个：巩固苏联。”但是，在其发言仅仅两周之后，1990 年 6 月 12 日，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鲍·尼·叶利钦就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代表大会表决。

《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改革后的苏联内”拥有国家主权，按照《宣言》精神，主权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每个人都有过上体面生活、自由发展和使用母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证每个民族都在它选择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形式方面有自决权。宣言还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在俄罗斯境内是至高无上的，俄罗斯联邦有权在本国境内中止那些与俄罗斯联邦主权权利相矛盾的苏联法律、法规的效力。

代表大会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发生分裂，而在通过《主权宣言》的时候，这种分裂却得到克服：917 人赞成，13 人反对，9 人弃权。《主权宣言》成为重新选举产生的俄罗斯人民代表们的主要决定。

俄罗斯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为了通过《主权宣言》，自由派和共产党员、世界主义者和爱国者在表决中联合了起来。

前两种人蓄意摧毁“邪恶帝国”苏联，而后两种人则不希望俄罗斯“养活”其他共和国，认为独立后的俄罗斯将更加富强；但所有人都希望推倒国家的“围墙”，这个国家的疆域是在几百年里由许多代俄罗斯人开拓形成的，而其基础却在改革进程中被苏联领导人“砍掉”了。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推行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的过程中，于 1990 年 10 月 24 日通过一部法律，如果苏联法律、法规破坏俄罗斯主权，俄罗斯权力机关有权中止其效力；该法律还规定，只有在得到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之后，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苏联总统的命令和其他法规才能生效。

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法律，导致联盟国家爆发宪法危机，此外，还在俄罗斯的民族自治地区的领导人中间造成了“闹独立的情绪”。



主权宣言在国内产生了遵守法纪与合法性之间的冲突。“合法性”概念常常只是被理解为“遵守法纪”的同义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合法性是社会对权力的批准，并同意服从权力，承认其统治地位。遵守法纪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绝不是唯一来源。独立宣言破坏了苏联宪法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这些宣言又得到了宣布主权的加盟共和国内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又具有合法性。



紧随俄罗斯议会之后，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也通过了独立宣言；6月23日，摩尔达维亚通过独立宣言；7月16日，乌克兰通过了独立宣言；7月27日，白俄罗斯通过了独立宣言。接着又开始在加盟共和国内部爆发宣布主权的洪流。8月10日，卡累利阿宣布了主权，随即，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布里亚特以及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都宣布了主权，各个民族自治地区都将各自的主权宣言寄给苏联总统，苏联总统称赞了这些运动，认为俄罗斯各自治地区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将成为未来改革后苏联的主体。这一立场起初反映在1990年4月26日通过的一部名为《关于苏联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基础》的法律中，其中谈到，要让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这样，在1990年夏、秋，俄罗斯就挑起了苏联解体进程的爆发，而苏联中央也推动了俄罗斯内部的离心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鲍·尼·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对俄罗斯各自治地区提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去拿多少主权。”

1990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会晤，他们商定共同

实施经济改革。

在匆忙制订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竭力形成与叶利钦之间的政治上的两人联盟。匆忙地成立了一个以沙塔林院士为首的经济学家小组，加入该小组的，有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委员会成员，如尼·彼得拉科夫（Н. Петраков）院士，有来自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格·亚夫林斯基和鲍·费奥多罗夫（Б. Федоров），其共同工作的基础是“500 天计划”。

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同盟为期短暂。1990 年 10 月 16 日，俄罗斯领导人否决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草案，宣布将在俄罗斯联邦选用“沙塔林计划”。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的所有经济计划都成为空想，因为戈尔巴乔夫一提出计划，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就加以否定。

1990 年 12 月召开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第二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关于俄罗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各民族自治单位在俄罗斯的法律地位问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就签订四方协议、成立一个国家联合体以取代苏联的事宜进行磋商。为此，四个加盟共和国还派出代表前往明斯克准备相关文件。

但是，苏联总统阻挠这一计划的实现，想通过签订新联盟条约，将该进程纳入改革和保留苏联的轨道。

俄罗斯联邦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也赞同保留苏联——但却是改革后的国家联盟，并提出由各共和国自行制定联盟条约，但并不马上签字，而是分成几个部分（先成立经济联盟，然后签订其他协议）。

在代表大会上，对于俄罗斯的法律基础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宪法委员会主席鲍·尼·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宪法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鲁·伊·哈斯布拉托夫

（Р. И. Хасбулатов）之间的分歧凸显出来。叶利钦认为，1978 年以后生效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宪法》是对共和国发展的现实制约，主张应该首先起草、讨论和签署《联邦条约》，作为俄罗斯国家的法律基础；而哈斯布拉托夫则没有提出彻底修改《宪法》的任务。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从而巩固了俄罗斯的主权。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涉及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财产的至高无上性。自然财富和生产性固定资产都被宣布为俄罗斯的财产，这些财产只有在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未来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上，才能提供联盟使用。

与此同时，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90 年 12 月召开）赋予苏联总统新的非常权力：可以直接领导改为“部长内阁”的政府；主管联邦委员会和苏联安全委员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设立了苏联副总统一职［在戈尔巴乔夫的坚持下，根纳季·亚纳耶夫（Г. Янаев）当选为苏联副总统］，负责完成苏联总统委托的个别任务和在总统不在或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代为履行总统职责。代表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否保留苏联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尽管苏联领导人试图挽回危局，但是，无论用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都不能克服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1991 年 1 月，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开展了武力镇压活动。在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上，俄罗斯民主派指责戈尔巴乔夫促进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反民主政变图谋。

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以及随后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武力镇压活动，成为 1991 年 2 月 19 日叶利钦在中央电视台讲话的口实，他宣称：“苏联总统将国家引向专政”，要求他立即下台，将权力交给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

叶利钦的讲话首次在俄罗斯领导人中间导致分裂。1991年2月21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六名人民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斯·彼·戈里亚切娃（С. П，Горячева）和鲍·米·伊萨耶夫（Б. М. Исаев），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弗·鲍·伊萨科夫（В. Б. Исаков）和拉·哈·阿卜杜拉季波夫（Р. Г. Абдулатипов），两院副主席 А. А. 韦什尼亚科夫（А. А. Вешняков）和 В. Г. 西罗瓦特科（В. Г. Сироватко）］发表声明，指责叶利钦专制、追求扩大个人权力、经济政策垮台，要求立即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讨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活动。

作为对"六人声明"的回应，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同一天的会上还发表了一个"十一人声明"［十一人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鲁·哈斯布拉托夫（Р. Хасбулатов）、谢·沙赫赖（С. Шахрай）、马·扎哈罗夫（М. Захаров）、В. 尤金（В. Югин）、Ф. 波列诺夫（Ф. Поленов）、谢·克拉萨夫琴科（С. Красавченко）、弗·卢金（В. Лукин）、亚·鲁茨科伊（А. Руцкой）、С. 科瓦廖夫（С. Ковалева）、А. 扎科佩林（А. Закопырин）、В. 波洛辛（В. Полосин）］，谴责"六人声明"试图使叶利钦威信扫地，意在"分裂和抵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工作。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设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在巩固俄罗斯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为此，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在1991年3月17日就是否保留苏联的问题举行全苏全民公决的同时，也就是否应设立共和国总统职位的问题在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俄的全民公决。

尽管叶利钦的最激进的支持者们号召人民在全民公决的时候对保留苏联说"不"，但是，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说了"是"（占71.3%）；同时，他们也对设立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说了"是"（占参加投票者的69.85%，占登记在册的、有投票权的公民总数

的52.4%）。

1991年3月28日至4月5日，召开了俄罗斯联邦第三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3月28日夜间（即大会召开的前夜），按照苏联总统的命令，军队开入莫斯科，将首都中心包围起来。这不仅让民主派感到愤懑，也让共产党员觉得屈辱。

在与哈斯布拉托夫会谈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同意撤出军队——但是必须等到第二天；作为回应，代表大会停止工作，直到3月29日军队撤出之后才恢复。

该事件更加损害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以及整个苏联领导层的威望，造成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产党员的分裂。以鲁茨科伊上校为首的170名共产党员代表宣布，成立一个“拥护民主的共产党人”的议员团，支持叶利钦。叶利钦发言，激烈反对“在更新的联盟的招牌下，对单一制国家进行现代化”；赞同将苏联改革为“主权国家联盟”，该联盟具有各共和国赋予它的功能。

代表大会扩大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的权力，并通过决议，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总统的全民大选。总的来说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俄罗斯与苏联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妥协。一方面，代表大会使反对俄罗斯领导人推行的路线的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另一方面，俄罗斯领导层中的激进成员也不再敦促苏联总统下台。

临时妥协的结果是，1991年4月23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通过了关于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共同声明，该声明开始了所谓的“新奥加廖沃进程”，并被称为“9+1声明”而载入史册。在《声明》上签字的，有苏联总统以及参加过3月17日全民公决的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外

高加索的两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没有参加该进程。

《声明》被认为是保留更新的联盟、稳定国内局势的现实途径，给俄罗斯的独立路线划定了界限，同时也承认：更新的联盟各主体有权推行自主的政策。《声明》宣布，必须在签署《联盟条约》之后6个月内，准备并通过新的《联盟宪法》。

1991年5月21—25日，召开了俄罗斯联邦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遵照最高苏维埃立法委员会主席沙赫赖所做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总统》的法律，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加入了关于总统是行政权力首脑的新章节。总统有权任命政府成员。

1991年6月12日，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登记在册的选民人数是1.065亿人，参加投票的有7950万人（占74.66%），选民的选票在6名候选人之间是这样分配的：瓦·维·巴卡金得票3.42%，鲍·尼·叶利钦得票57.30%，弗·沃·日里诺夫斯基（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得票7.81%，阿·米·马卡绍夫（А. М. Макашов）得票3.74%，尼·伊·雷日科夫得票16.85%，阿·古·图列耶夫（А. -Г. М. Тулеев）得票6.81%，拒绝投任何人票的占1.92%。

15万"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将叶利钦获胜视为自己对苏共的胜利：苏共提名了4名候选人（雷日科夫、图列耶夫、马卡绍夫、巴卡金），却只获得30%多一点的选票。

但是，鲍·尼·叶利钦避免直接与"民主俄罗斯"联系，他希望担任全民总统的角色。

与总统大选同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还选出了市长：著名的民主派领袖加·哈·波波夫和安·亚·索布恰克；同时，列宁格勒还就城市更名的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大部分选民都赞同恢复该城市的旧称：圣彼得堡。

1991 年 7 月 10 日，在庄严的俄罗斯联邦第五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首任俄罗斯总统宣誓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捍卫其主权，尊重和保护每个人、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尊重和保护俄罗斯联邦各民族的权利，认真地履行人民托付的职责。叶利钦总统这样概括自己的立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正在冉冉升起。我们必须将她变成一个繁荣、民主、热爱和平、法治、主权的国家。”总统承诺，要在俄罗斯贯彻一条“神圣原则”：“国家因公民幸福而强大。”

7 月 11 日，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着手讨论最高苏维埃主席人选，但是，由于问题激化［鲁·哈斯布拉托夫与谢·巴布林（С. Бабурин）之间展开斗争］，代表大会被迫停止工作——直到 1991 年 10 月才恢复。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之后，俄罗斯总统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非党化”令）。继 1990 年 3 月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废除作为国家领导和凝聚力量、体制核心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之后，“非党化”令是对苏共在社会和国家中地位的第二次严重打击，削弱了苏共对俄罗斯和苏联政治进程的影响。“非党化”令还削弱了身兼联盟国家元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两职的苏联总统的影响。

但是，在因“非党化”令而紧急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米·戈尔巴乔夫号召大家不要“陷入恐慌”，说：“宪法监督委员会会弄清楚的。”总书记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这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环节。

与此同时，在新奥加廖沃，从 4 月份业已开始的、就新联盟条约最终方案的谈判还在继续。1991 年 7 月 29 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不公开的单独会晤，还讨论了干部问题。

实际情况

鲍·尼·叶利钦回忆道：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会晤具有原则性意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要去福罗斯休假，等他从克里米亚半岛回来后，要立即在新《联盟条约》上签字。现在，我们有机会再次讨论一些最尖锐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会谈在一所私邸的大厅中开始。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当涉及一些秘密话题的时候，我突然不吭声了。“你怎么了，鲍里斯？”戈尔巴乔夫感到奇怪。我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在那一刻我的内心感受，但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似乎有人站在你身后寸步不离地偷窥。当时我说：“我们去阳台吧，我觉得好像有人在偷听。”戈尔巴乔夫不太坚定地回答说：“得了吧你”，但还是走在我身后。我们说到了要说的事。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打算成立一个更新的联邦，各共和国加入联邦只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必须撤换哪怕一部分身边最危险的亲信。如果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主席（他对立陶宛事件负有责任），谁会相信新《联盟条约》？没有一个共和国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再说国防部长亚佐夫，难道新的联合体能容忍这样年迈老朽的“鹰派人物”吗？

显然，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会谈并不轻松，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Н. Назарбаев）支持我……我们三人一致决定：在签署新《联盟条约》后，必须撤换当时的政府总理瓦连京·巴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认为谁应该担任这一职务？”我提出，应由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新联盟的总理。起初，戈尔巴乔夫很吃惊，但随后很快就对这一方案做出评价，说他同意这个方案；“8月20日之后我们再讨论其他人选”，——他最后说……

不用多久，我就会亲眼看到对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谈话监听记录。在八月事件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厅领导人博尔金的办公室，检察院的侦查员在两个保险箱里找到厚

厚的一堆记录了叶利钦的谈话内容文件夹。在好几年时间里，我的谈话都被记录了下来：从早上、白天、晚上到夜间——包括一天中的任一时段；而这次谈话也记录了下来。

或许，这份记录也就成为引发1991年八月事件的“扳机”。



1991年7月31日，苏联总统助理格·沙赫纳扎罗夫（Г. Шахназаров）与叶利钦协商后，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份分阶段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计划表：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签字；9月3日，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签字；9月17日，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签字；10月1日，土库曼和吉尔吉斯签字；大约在10月22日由乌克兰签字——或许，还包括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以及联盟代表团。在签署过程的最后，苏联总统也应该签字；在这之后，联盟条约就开始生效。所以采用这种奇怪的、分阶段签署联盟条约的办法，是必须给乌克兰时间，让它决定应在何种条件下加入更新的联盟。

鉴于所规定的程序，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俄罗斯何必在8月20日与哈萨克斯坦一起签署条约——如果该条约不生效？戈尔巴乔夫应该以什么身份参加条约的签署仪式——观察员、统计员还是担保人？苏联总统也意识到自己地位可疑、不稳固，但是，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宣布：8月20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开始新《联盟条约》的签署程序，随后，他就去克里米亚（福罗斯）休假了。

实际情况

鲍·尼·叶利钦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不仅仅是‘文明的离婚’——如媒体称新奥加廖沃条约那样。我和戈尔巴乔夫突然间都清楚地感到，我们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一致的，这样的角色对于我

们大家来说都可以接受：戈尔巴乔夫保留了自己的‘老大’地位，而我则保留了自己的独立。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是最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条约的最终方案直到8月16日才见诸报刊。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联盟条约》的主体有一百多个，其中每个主体都可以中止该进程……

25.1 1991年八月政变

就在《联盟条约》签字前夕，1991年8月19日，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形式上领导该“委员会”的是苏联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他发布命令：鉴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由他临时代为履行。

“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总理瓦·谢·巴夫洛夫、国防部长德·亚佐夫（Д. Т. Язов）、内务部长鲍·卡·普戈（Б. К. Пуго）、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В. А. Крючков）、苏联总统下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德·巴克拉诺夫（О. Д. Бакланов）以及国家工业、建设、交通和邮电企业协会主席兼“加里宁机械制造厂”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亚·伊·季贾科夫（А. И，Тизяков）、苏联农民协会主席兼集体农庄主席瓦·亚·斯塔罗杜布采夫（В. А. Стародубцев）。

8月19日早晨，亚纳耶夫、巴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签字的《苏联政府声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宣布：从8月19日起，在苏联的个别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结束“对抗、无序和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国家的最高权力转交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手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苏联境内的所有

权力机关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承诺在苏联全境建立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最高地位。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致力于消除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的分离主义。

为此，还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之前，在8月18日夜里，它就下达指示，逮捕身在莫斯科郊外别墅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克格勃反恐特种分队“阿尔法”包围了别墅，只等决定性的一声令下就完成行动；但是，命令没有到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就下令收兵了。

在八月叛乱的日子里，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得团结、积极并主动反击，相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却不果断，非常消极。

实际情况

鲍·尼·叶利钦后来指出，密谋者们的逻辑中根本没有料想可能会遇到反抗：“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事件一样。1956年，布达佩斯流了很多血，但那是战后欧洲的第一次外国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早就没有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快，而且‘很好’。要知道，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981年在波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不体面的和平。克留奇科夫似乎选择了波兰方式。他沿袭了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是本国的，因此不应当有抵抗。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民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闹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正是因为这些坦克是我

们自己的！”



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福罗斯，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回莫斯科。代表团以阿富汗战争的英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上校为首，主要由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组成。悲剧中还包含着某种半喜剧的色彩：与鲁茨科伊同时飞往克里米亚的，还有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目的是获得戈尔巴乔夫的接见，解释一下，求得谅解；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接见他们。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全部被捕（内务部领导人普戈自杀）。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总统对俄罗斯公民在反击“一小撮反动的、身居高位的叛乱分子”中对俄罗斯领导人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从福罗斯回来后，苏联总统在中央电视台讲话，指出“俄罗斯总统发挥了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阴谋和专政的核心”。8月23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不顾他的反对，签署了《关于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的命令，理由是共产党支持国家政变的图谋。实际上这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禁令，因该命令，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陷于瘫痪。为进一步巩固8月23日命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和苏共莫斯科市委大楼也被侵占。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号召全党自动解散。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

8月25日，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坚持下，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苏联部长内阁，成立了一个以俄罗斯联邦总理伊·谢·西拉耶夫为首的国民经济事务管理委员会，取而代之。

9月2日，苏联总统和10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发表声

明，实际上是停止了苏联《宪法》的效力，宣布过渡时期开始，以便能够通过新《宪法》；并确认，成立一个以苏联总统和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为成员的国务委员会。苏联第五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1991年9月2—5日）通过了两份文件：《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法律和《关于依据苏联总统和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而采取的措施》的决议。在苏联总统及其支持者们的压力下，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停止活动，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解散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是一份摧毁苏联的法律决定。

9月6日，国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承认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独立。在当月，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代表都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回，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也因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捕。苏联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俄罗斯境内，权力集中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手中。苏联总统试图恢复新奥加廖沃进程，修改并签署联盟条约，不仅遭到俄罗斯抵制，而且还遭到乌克兰的抵制。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策划的拯救苏联的措施、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实际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领导人充当了法律捍卫者的角色。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关于苏联停止存在的声明，没有遇到反抗。



观　点

1991年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也步其后尘。8月24日，叶利钦承认两国独立。美国总统老布什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独立，戈尔巴乔夫答应在

1991年8月30日之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9月2日，美国已经率先承认了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直到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才承认三国独立，这就为其他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开了一个先例；显然，中央已经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到9月底，所有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之外）都宣布独立。

美国总统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称戈尔巴乔夫仅仅是“过时了的中央的一片阴影”。叶利钦及其亲信利用八月事件摧毁了国家的中央政府，而且非常残酷无情，采取了以下一系列举措：

其一，禁止苏共活动。苏共留下的政治真空被那些只需自称是“民主派”的人闪电般地填充。几乎所有这些人昨天还都是共产党员，没经过任何内在演化——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是如此。

其二，从1991年8月到12月的四个月的时间里，苏联的分离进程在继续。联盟条约已经没有人记得了，8月下旬，各个主要的加盟共和国都已经宣布了独立。严格说来，叶利钦还没有在8月叛乱之后立即声明独立，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极其有利的时机，将以前苏联的杠杆掌握手中。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是，他已经丧失权柄，他的意见基本上只具有纯学术意义。

其三，结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从1654年以来形成的历史性同盟。

其四，尽管没有群众运动参与独立，但是，俄罗斯实际上推动其在联盟中的伙伴脱离共同的国家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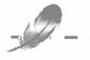
其五，在个别关键国家（如乌克兰）的要求迅速加码的情况下，《联盟条约》方案已经没有意义。8月25日，叶利钦重申：将签署新《联盟条约》。可叹的是，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

其六，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决斗中，获胜的是那个较少因不履行承诺而损害自身威信的人。

苏联的命运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乌克兰，而是取决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斗争。自从叶利钦在1990年6月掀起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10月确立加盟共和国法律对苏联法律的优先地位之后，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只是跟随俄罗斯，步其后尘。尽管叶利钦没有在八月叛乱之后马上宣布俄罗斯独立，但他获得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机构和财产，走上了一个僭位者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叶利钦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1991年8月28日，在承认叶利钦权力增长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想恢复中央对统一的武装力量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的权力，以便将俄罗斯和全苏联的事务分开。

但是，就在同一天，叶利钦单方面采取行动，将国家银行、财政部、苏联对外经济核算银行掌握到自己手中。叶利钦不仅在挫败叛乱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其作为胜利者的优先权，积极地争夺联盟中央的权力。



1991年10月底，俄罗斯联邦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复会。叶利钦在大会上发表告人民书：“俄罗斯不允许有一个凌驾于她之上的中央复活，也不会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俄罗斯只有一个政权：俄罗斯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总统。”由此，俄罗斯总统得出结论：“改革场地埋设的地雷已经被清除”，应该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从放开物价开始，一次性地向实行市场价格过渡。叶利钦警告说，过渡时期将很短，但是也会很艰难，政府不可能保护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必须为俄罗斯国民准备一些救济房和免费的“慈善性的汤”——他们很快就需要这些东西了。不过，他说，从1992年秋天开始，经济就会稳定下来，人们的生活会逐步改善。

俄罗斯联邦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了总统的权限，授权他组建“改革内阁”，在一年之内领导政府并发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从 1992 年 1 月起，着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代表大会还选出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鲁·伊·哈斯布拉托夫当选。哈斯布拉托夫向总统保证，在重大、艰难的改革过渡时期里提供协助。并非所有的人民代表都支持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戈里亚切娃公开称总统的告人民书是叶利钦的“道德破产”，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人民领袖”，正是由于他许诺说推行经济改革，不使人民生活恶化，不提高物价。她认为，一旦叶利钦开始将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立刻就会被人民抛弃”。

1991 年 11 月，俄罗斯总统作为政府首脑，成立了“改革内阁”，其成员包括：叶・盖达尔（Е. Гайдар）（担任政府副主席，主管经济政策和财政问题：从 1992 年 2 月起，成为主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从 1992 年 7 月起，担任政府代主席）、根・布尔布利斯（Г. Бурбулис）（担任政府第一副主席到 1992 年 11 月，1992 年 5 月之前他还同时兼任国务秘书和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国务委员会秘书）、安・丘拜斯（А. Чурбайс）（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人。

盖达尔是激进市场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他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获得真正的政治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和其他加盟共和国。1991 年 12 月 8 日，改革的这一政治条件在别洛韦日丛林（白俄罗斯）得以实现。三个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Л. Кравчу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凯维奇（С. Шушкевич）］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布：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并成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不设统一的权力和管理机构。

这份协定翻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经过一小时讨论，

批准了协定（188票赞成，占与会代表的93%，占名单上登记的代表的76%；6%的代表反对，7%弃权）。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叶利钦承认：协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立场和观点在1990年12月就已经磋商过了，而1991年12月签署的协定只是其“合乎规律的结果”。

1991年12月12日，米·谢·戈尔巴乔夫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宣称：“这不正常，不过，就让进程继续吧。最主要的是：要在合乎宪法的、正常的形式下进行……我将下台……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支持取消苏联、成立独联体的协定（《阿拉木图协定》）。

12月25日，苏联总统卸掉自己的全部权力。同一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确定国家新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联邦，取代原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克里姆林宫上空升起了俄罗斯三色旗。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上院（联盟院，主席是康斯坦丁·鲁宾琴科）的决定，正式承认苏联解散并自动消失。

苏联崩溃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1991年12月，美国总统祝贺自己的人民在“冷战”中获胜。

以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评价这一事件：“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它已经被各国人民接受，得到国际社会和俄罗斯联邦的承认。这是一些拥有全权的独立国家，应该尊重他们。尊重的意思是：要承认他们的合法利益。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它对于我们来说，同样也有积极之处。积极之处就在于：俄罗斯必须不再充当所有人的奶牛了。”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摘自1991年8月2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工作成果的电视讲话**

联盟的国家组织应当保留，这一国家组织体现了我国许多代人、各民族的劳动；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真正自愿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所有民族都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当然，不能将事情简单化。《条约》将规定对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的重大革新，要求制定并通过新宪法，改革选举法，进行选举，改革司法体系。等这一进程展开的时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政府以及苏联其他机关都必须积极行动。

我们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些改革是整个国家所必需的。新的《联盟条约》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克服危机，使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

26.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新思维”

1980年代中期，苏联新领导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明显地活跃起来。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传统的任务：达成普遍安全和裁军；巩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巩固同被解放国家——首先是那些“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关系；恢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利关系；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这些任务在1986年初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得到认可，但在1987年到1988年间又对其做出重大修正，这些修正最初反映在米·

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1987 年秋）。苏联外交部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爱·谢瓦尔德纳泽（Э. 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和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亚·伊·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都积极参与了苏联外交政策"新思维"原则的确定和实施。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谢瓦尔德纳泽（此前，他只有团工作和警察工作的经验，一门外语都不懂）代替经验丰富的安·安·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象征着外交路线的改变。

对外政策方面的"政治新思维"是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改革思想"的尝试。"政治新思维"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如下：放弃那种认为当代世界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政治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观点，承认当代世界是统一、互相联系的；放弃那种认为当代世界的安全维系于两大相互对抗的体系的力量平衡的信念，承认利益平衡才是这种安全的保障；放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其他任何价值（民族价值、阶级价值，等等）。

遵照新原则，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的优先方向：国家间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共同解决全球性的跨国问题（安全、经济、生态、人权问题），共同建设"全欧洲共同家园"和欧洲共同市场，计划在 1990 年代初加入其中。

走向这条道路的决定性一步是：遵照苏联领导人的倡议，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于 1987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先解散各自的军事组织）的《柏林宣言》。

1980 年代下半期，苏联采取了许多重大实际步骤，实现国家间关系正常化，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苏联的国际威信提高了。1985 年 8 月，在纪念对广岛核轰炸 40 周年之际，苏联暂停核试验，并提请其他核大国支持苏联的倡议；而作为回应，美国领

导人邀请苏联代表参观其核试验。因此，暂停核试验行动在1987年4月被临时废除了。1990年，暂停核试验的计划又恢复了。1986年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2000年不再有核武器》的声明，提出：到21世纪来临之前分阶段、完全销毁核武器的计划。1987年2月，在莫斯科“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的国际论坛上，戈尔巴乔夫号召80多个国家的代表“使国际关系人道化”，将道义和政治结合起来，放弃“要想得到和平，就要准备战争”的古老原则，而代之以当代的“要想得到和平，就要为和平而斗争”原则。

在苏美高层会晤的进程中，推行争取无核化世界的路线具有连续性。1985年11月，美苏高层会晤恢复，以后每年都举行一次。米·谢·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会晤和谈判使双方都消除了对方是敌人的形象，调节了两国间的全面关系，最终两国签署了两份军事条约。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短程导弹条约，通过销毁这一整个级别的武器，以实现从军备竞赛转向裁军。1988年5月，两国都批准了该条约。这样，到1990年5月前，销毁了2500多枚导弹（其中2/3是苏联导弹），大约占世界核武库的4%。1991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是规定销毁部分核武器的第二份条约。

26.1 从阿富汗撤军

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发言，提出要尽快将苏军从阿富汗撤出：“我们想在最近的将来就让苏联军队回到祖国——他们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而驻扎在那里的。”1987年，在米·谢·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谈判过程中，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停止对阿富汗“圣战者”提供军事援助，而苏军则从那里

撤走。

1988 年 2 月 8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已商定了苏军开始撤离的具体日期：1988 年 5 月 15 日。1988 年 4 月 14 日，在日内瓦签署了政治调节阿富汗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不涉及阿富汗的内政问题，只有阿富汗人民自己才有权解决内政问题。日内瓦协议的意义在于：它对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事务设置了障碍，给阿富汗人自行建立国内和平与和解的机会。协议于 1988 年 5 月 15 日起开始生效，其中规定了苏联撤军进程，并宣布提供国际保障，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由苏联和美国承担相关担保责任。1989 年 2 月 15 日，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最后一批苏军撤离了阿富汗。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是苏联最重要的一个外交行动。1989 年 12 月，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谴责出兵阿富汗并承认对阿富汗“不宣而战”是一个愚蠢的政治错误，该评价也反映在代表大会《关于对 1979 年 12 月苏军进入阿富汗的决定的政治评价》的决议中，这样，就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在阿富汗有 1.3 万名苏军士兵阵亡，数万人受伤，几百人被俘。从 1989 年到 1991 年间，苏联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主要形式，是提供武器、弹药和粮食。

26.2 签署《维也纳宣言》

1989 年 1 月 1 日，在签署《维也纳宣言》之后，苏联必须使自己的全部法律、法规和实践都符合国际惯例，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应该承担的责任，当年五月，苏联政府起草了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草案以及苏联公民出入境的命令。1989 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1989 年到 1990 年间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和国防

开支》的命令，遵照该命令，当年就开始裁军50万人，苏军加紧了从其他国家撤军的进程。国防开支减少了14.2%。

1989年也是苏中关系转折性的一年。因为苏军从阿富汗撤离，并且已经开始从蒙古撤军，就消除了“三大障碍”中的两大障碍（中国领导人认为，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是：苏联在蒙古驻军、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只剩下“柬埔寨问题”。苏联领导人能够以自己做榜样和直接施加政治影响，说服越南领导人必须从柬埔寨撤军（到1989年秋天撤军完毕），为苏中高层会晤开辟了可能性。1989年五六月间，苏中高层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商定就有争议的边界领土问题恢复谈判，将各自军队撤离边界线，调节两国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

1989年也成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的转折性的一年。苏联政府推行新的路线：不再在经互会内部结算，而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用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结算；这就严重影响了卢布稳定，也影响到整个“经济互助体系”。这种情形还成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威信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长期推行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与苏联保持紧密同盟的路线。在东欧国家里，反苏和反共情绪爆发，逐渐发展为一系列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被赶下台（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

26.3　领土争议

日本看到，在苏联同美国关系的所有方面，苏联都做出很大让步，也决心不错过机会。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北方领土”问题一直都列入苏联和日本领导人所有会晤的议事日程。

日本的社会舆论要求归还千岛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悬挂着标

语的汽车在东京街头巡行："立即将北方领土归还日本！""请苏联停止对色丹、齿舞、国后、择捉四岛的非法占领！""北方四岛自古就是日本领土！"这些"自发活动"其实是日本政府策划的。日方宣称：日本要与苏联签署和平条约，条件是必须在条约中写明："北方领土"将交给日本。作为论证这一立场的理由，日方列举了许多依据。但是，如同认为"北方领土"应归属日本的日本人一样，苏联公民也认为这些岛屿自古以来就属于俄罗斯。

1991 年 4 月，米·谢·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日方期望苏联总统会就苏军撤离"北方领土"问题做出评论；但是，访问结果，苏联仅仅承认日本有领土要求，列出了争议岛屿的清单，确认了两国的立场，签署了苏、日两国政府间磋商备忘录以及苏联和日本政府就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而由日本向苏联提供技术协助的协议；但是，关于转交北方四岛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而也就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26.4 取消《华沙条约组织》

1989 年初，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再次责成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组建政府，但是，这次尝试没能成功。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1989 年 4 月，雅鲁泽尔斯基开始同反对派进行谈判。为成立联合政府，邀请了"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一些"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试图抵制这一进程，但是，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干预。1989 年 8 月 22 日，他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在戈尔巴乔夫与拉科夫斯基具有决定意义的电话交谈中，戈尔巴乔夫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从而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得知华沙发生的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

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匈牙利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反对。对于苏联来说，民主德国的局势仍然极其危险。1989年8月，130名民主德国公民躲藏在西德驻东柏林的外交使馆，而戈尔巴乔夫则要求东德政府持中立态度，从而第一次使苏联与东德关系复杂化。9月，5.5万名东德人要求到捷克斯洛伐克避难，随后，匈牙利开放了自己的西部边界，东德居民开始越境匈牙利前往奥地利。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米·谢·戈尔巴乔夫访问东德，随后，东德立即发生了大变局。此前，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为这次访问做准备。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与别斯梅尔特内赫会晤时，向他提供一些数字，证明东德取得了重大经济成就；而昂纳克身边的一名支持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人则告诉别斯梅尔特内赫，提供的部分资料并不符合实际。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向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报告说，昂纳克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而且，连他身边的人都已开始反对他。

在柏林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他证实，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但是，昂纳克最近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看到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连他本人也感到震惊。苏联经济已经陷于低迷，而东德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却是生活得最无忧无虑的。可竟然还有人指示他们，应该如何推进事业！

在正式场合，戈尔巴乔夫号召东德人开始推行改革；他还宣称，东德的政策“不应在莫斯科制定，而应在柏林制定”。

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

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

国内发生的事件。

10月7日，昂纳克下令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用武器和催泪弹驱散示威人群，但是，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领导人克伦茨得知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后，反对昂纳克的命令，国内游行还在继续。

10月25日，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的时候宣称："苏联既没有道义上的权利也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干预东欧事务。

这样，在许多东欧国家驻扎军队的苏联就丧失了"安全带"，几年之后，这些地带就成为他国的势力范围，北约的军事基地距离彼得堡只有一小时的车程。

苏军撤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这些已经是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就中断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1991年2月25日，在布达佩斯通过了废除《华沙条约》的决定。

26.5 德国统一

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示威游行具有大规模性质。示威者的主要要求，是实现政治体制的自由化。民主德国领导人就如何对待不满者的问题发生分歧，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不满都是由领导人自身导致的。

昂纳克做过大手术刚刚痊愈，主张对抗议者采取武力；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十月底，昂纳克及其主要盟友都被迫下台。克伦茨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总书记，政府领导人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区党委书记莫德罗，因支持经济政治改革而闻名。

新领导人试图稳定局势，答应了示威者提出的某些特别普遍的要求：给公民以自由出国的权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过境点对民主德国公民开放），宣布自由选举；但是，这些步骤仍然不够，克伦茨在党的领导人的位置上只待了46天，就下台了。

1990 年 1 月，在紧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早先曾经为东德持不同政见者辩护的法学家基西成为改革后的党的主席。

令东、西德两国政治家都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同意通过民主德国归并到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989 年 11 月，两国之间开放了国界，柏林墙被摧毁。

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很复杂。美国官方倡导德国统一，西德总理科尔持积极立场。苏联利用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的对话，来解决自身问题——首先是获得西方贷款，推进改革。而对于美国来说，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苏联是否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作为德国统一的条件，苏联提出了一系列看法：40 万苏联士兵文明地撤出；履行民主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所有商业合同；裁减联邦德国的军队；德国对苏联增加投资。

1990 年 2 月 28 日，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给米·谢·戈尔巴乔夫，态度非常强硬地告诉他：布什与正在美国访问的科尔总理都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考虑一下。"

专家们都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必须至少达到让统一后的德国离开北大西洋联盟这样一个目标。1990 年 3 月 5—6 日，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对记者们表示："绝对排除"统一后的德国以任何形式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1990 年 3 月民主德国举行的人民院选举中，赞同与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结盟的政党集团获胜，该政党集团要求与西德统一，形势进一步激化。

国际社会对德国重新统一看法不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说：看到一个实力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心脏地带，"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对这种前景漠然视之。英国人和俄罗斯人一样，都曾因德国而受害，而现在，德国发生的变化进程

实在是太快了，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正在发生的一切”。

对德国统一最感到担心的是法国和英国。法国总统密特朗竭力延缓德国统一的进程，因为统一后的8200万德国人会将6000万法国人变成不对等的伙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两次派外交部长赫德到莫斯科，让俄国人停止“投降”。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做出决定：他将美国和德国视为自己的主要伙伴。

1990年6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哥本哈根会晤，在这次会晤过程中，确定有关德国的事宜。美国人这样评价这次会晤：在回答美方提问时，谢瓦尔德纳泽没有一丁点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时的犹豫，在苏联政府许可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的问题上，迈出更大一步：如果美国提供保证，苏联同意德国在1990年底之前就实现统一。

1990年9月12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德国统一条约。统一后的德国承认战后与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划定的边界，宣布：在德国境内将只产生和平，德国有责任不在本国境内生产和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裁减陆军、空军力量。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与联邦德国实现统一。

26.6 《欧洲限制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1990年11月19日，《欧洲限制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最终在巴黎签署，这是结束“冷战”的极其重要的一步。遵照这一条约，苏联向西方承诺：非同寻常地缩减自己对欧洲常规武器的优势。

尽管这是一个多边条约，但是，一切都在于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答应大幅削减军备。西方总是强调：苏联军人千方百计地利用条约中的含糊之处和理解上的歧义，试图保留一部分裁

减了的武装力量。

驻扎在摩尔曼斯克和克里米亚的海军陆战队的 753 辆步兵战车的命运仍存在争议，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也通过一系列谈判再次获得苏联的让步：苏联同意把 753 辆步兵战车归入限制欧洲常规力量的范畴。1991 年 5 月 27 日，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电话通话，主要涉及三个问题：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裁减进攻性武器和经济合作。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苏联能够再“稍稍”前进一步，就可以为布什总统访问苏联开辟道路；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已经收到布什总统的信，并已指示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1991 年 1 月起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给《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注入一些“新思想”。1991 年 7 月 1 日，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在里斯本会晤时，做出关键性的决定。

1991 年 7 月 1 日，在维也纳大使专门会议上，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多年以来，苏联在欧洲战场对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重大优势：6 万辆坦克（加上每年新生产 4400 辆坦克）使苏联地面部队拥有重要筹码。

现在，这一筹码已经丧失威力。作为与西方关系正常化付出的代价，俄罗斯的坦克数量限制在 6400 辆之内。常规武器的生产部门生产下滑，储备可能只够用 5—10 年，暂时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需要重新生产自己的武器。

实际情况

我们援引参加过这些谈判的美国人加特霍夫的话：“所有问题都由于苏联单方面答应进一步承担某些附加责任而最终得以解决，它在削减武器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便满足 21 位参加谈判的代表。苏方‘保住了面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承担了进一步削减武器的附加责任。美国人甚至都找不到含糊些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

大说：‘就外表来看，苏联（或者，应该说是总参谋部）并没有做出致命让步，但实质上，它基本上是做出了这些让步’……”



26.7 《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1991 年 7 月，美国总统老布什抵达莫斯科，莫斯科会晤的主要问题是 1991 年 7 月 31 日签署《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一份长达 700 多页的巨大文件，规定在八年内完成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在《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第一阶段谈判结束之后，美国立即转向了战略力量方面。一些数目（主要数字）已经商定。草拟中的《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各方可拥有 4900 枚战略导弹弹头，为达到这一水平，苏联必须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数目从 6595 枚削减到 3028 枚，战略潜艇上的核武器从 2810 枚核弹头削减到 1872 枚。苏方必须以每 66 小时削减一枚的速度、在七年内将自己的弹道导弹削减完毕；美国同意将自己的深井发射的洲际战略核弹头的数目从 2450 枚削减到 1444 枚，战略潜艇的导弹从 5056 枚削减到 3456 枚。

美国人十分担心苏联的 CC-18 型（“魔鬼”型，一枚导弹携带 8 枚核弹头）和 CC-19 型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 6 枚核弹头）。在他们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加快用电视摄像一体机更换洲际弹道导弹的分导式导弹头部，这样一来，监视敌方将更加简单，更容易发现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将从前携带 6—8 枚弹头的旧武器安装一个弹头，比设计只携带一枚核弹头的新导弹要简单得多。

最主要的问题是：组成苏联战略力量主体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被削减了一半（从 308 枚削减为 154 枚），而美国核力量的结构（核潜艇占主体）实质上仍旧原封不动。

让美方费尽心机的是苏联的两种导弹系统：CC-18 陆基弹道导弹（美国人认为，该型导弹可携带 14 枚或更多的核弹头）及 CC-H-23 海基导弹（可携带 4 枚战略弹头）；最让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苏联有可能很快就摆脱《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束缚。1991 年，美国对苏联方面的压力不加掩饰，非常粗暴，这一点也特别得到美国国务卿贝克的承认：在许多年里，我们一直努力说服苏联领导人削减其核弹头的数量，现在他们终于同意我们的意见了，可我们突然对他们说："不，停一下！我们又想出了削减你们武器的更复杂的办法。"

苏美双方都有权保留 1600 件战略性地下发射装置和潜艇发射装置，双方的核弹头数目限制在 6000 枚（4900 枚陆基弹道导弹，装在重型导弹上的 1540 枚弹头，1100 枚装在机动发射装置上的弹头）。

快速导弹系统被削减最多。

对削减导弹的规定是不对等的：美国削减 25%，而苏联削减 35%，苏联还必须将自己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削减一半。

规定还要继续谈判。苏方希望了解何时开始削减战术性核武器，但是，美国非常强硬地回绝了类似想法；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停止地下核试验），美方也同样强硬地答复了戈尔巴乔夫，答复非常简单：美方不准备考虑这一问题。

1989—1991 年，苏联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迫使国家领导人寻求世界主要大国——首先是"七国集团"（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援助。1990—1991 年间，这些国家对苏联提供了"人道援助"（粮食、药品、医疗设备），但是，并没有接着提供重大的财政援助。"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答应提供援助，但是，到 1991 年夏天，却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而拒绝援助。这些国家越来越热衷于支持苏联的个别加盟共和国，从政治和物质上鼓励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分

离主义，而且，还通过非公开渠道以贷款的形式提供了大规模援助。结果，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里，苏联的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这还不算因租借而产生的债务）。

1991年12月8日，三个斯拉夫人的加盟共和国通过决议，取消苏联，成立独联体，并首先将这一消息告知美国总统。

同时代文献资料

■ 爱德华·安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的个人履历

谢瓦尔德纳泽1928年1月25日出生于格鲁吉亚兰奇胡特地区的玛玛梯村。1951年毕业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1959年毕业于库塔伊斯国立楚鲁基泽师范学院。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6年从事共青团工作。1964年担任格鲁吉亚公安部（格鲁吉亚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68年开始担任公安部长。1972—1985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年7月，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1991年，成为苏联总统下属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成员。1992年，担任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在议会选举中成为格鲁吉亚国家元首——共和国议会主席。1995年11月5日，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2000年4月9日，连任总统。2003年11月24日，对反对派的要求做出让步，下台。

■ 摘自1989年12月7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

我们打算扩大对联合国领导下和全欧进程框架内的人权监督机制的参与。我们认为，海牙国际法院通过的、对于人权领域的协议的解释和适用的法律，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

在赫尔辛基进程的背景下，我们正在考虑减除所有外国电台对苏广播的干扰。

总体来说，我们的看法是：解决政治问题，只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人的问题，就只能用人的方式……

同我们的华约盟国协商后，我们决定在1991年之前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将其解散，还将从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军集团撤出空降部队和包括空中运输部队的其他许多兵团以及武器和军事装备。驻在这些国家的苏军将削减5万人，武器方面，将削减5000辆坦克。

所有暂时留在我国盟国境内的苏军师一级部队都将重新编组，它们的结构将不同于今天的结构，在没有大量坦克之后，毫无疑问，它们将只能进行防御。

同时，我们还将削减苏联欧洲部分军队人数和武器数量。

■ 摘自乔治·布什对米·谢·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1989年12月）的回忆录

我提醒说，赫尔辛基文件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盟友，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自行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会同意这一点吗？让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耸了耸肩，说："对，是这样的。"

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阿赫罗梅耶夫和瓦连京·法林对视了一下，在椅子上不安起来。鲍勃·布莱克韦尔给我递了一个纸条，上边的问题是：我是否能让戈尔巴乔夫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我向他示意一下。"我感到满意，我和您在各国选择自己盟友的权利问题上意见一致，"我说。

"我愿意公开宣布，美国和苏联都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并给它机会，最终解决它希望留在哪里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说。

"我是用另一种方式说了这句话"，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将尊重他们的决定"。

"我同意。"戈尔巴乔夫说。

"对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我又寻求确认。

"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回答说。

"好"，我说，"我们可以让部长们就此问题着手工作了吗？"

"让他们开始研究过渡期的工作吧。"戈尔巴乔夫说。

此前，苏联代表团成员的慌乱非常明显。阿赫罗梅耶夫目露凶光，对法林做了一些暗示。他们不注意戈尔巴乔夫，而是高声地、用舞台剧式的私语在交谈。这简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舞台剧，此前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从未见过类似场面，这是针对苏联领袖的公然反叛。

我不知道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这样行事——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或许，他的出发点在于：反正我们已经占了上风，这样，他在自己的班子中解决这一问题会更轻松。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场令人惊奇的演出。



27. 改革与 1990 年代前后苏联社会在精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985 年成为苏联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分界线。米·谢·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原则为在通过决定和客观地反思过去等方面更加开放而创造了条件（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对“解冻”初期的继承性）。但是，苏共新领导人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条件，革新社会主义，因此，当时提出口号“更多的公开性、更多的社会主义！”以及同样精彩漂亮的口号“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就绝非偶然了。公开性要求主题和观点更加多样，媒体提供材料的风格更加生动，但并不等于确立了言论自由原则和可以不受障碍地自由表达观点。实现言论自由原则，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和政治机制，而在 1980 年代中期的苏联，还并无类似机制。

1986 年召开苏共二十七大的时候，苏共党员人数达到创历史记录的水平：1900 万人，此后，执政党的党员人数开始减少（1989 年，为 1800 万人）。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首次谈到：没有公开性也就不会有民主。党组织中不断激化的讨论，表现出对国

家的发展前景缺乏统一意见，而在“公开性”条件下，就汇集成对一些病态问题的汹涌而来的社会大辩论。对公开性设置障碍或控制在分阶段实施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1986年4月26日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该事故暴露出国家领导人对提供客观信息还没有做好准备，提出了应该对悲剧负责任的问题）。

在社会中，公开性被视为在报道时事和评价历史方面放弃从前的意识形态禁锢，这似乎就为形成新的信息空间和在媒体上公开讨论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开辟了无穷的机会。在改革初年，政论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正是这种风格的媒体言论能够最尖锐、高效地回应那些激进社会的问题。1987—1988年间，媒体开始广泛讨论一些极为耸人听闻的话题，就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而在几年前，类似的尖锐文章在遭到审查的出版物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在短期内，政论家们真正成为“大脑的主人”。由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和历史学家组成的新的权威作者群体成为关注的焦点。刊登了有关经济崩溃和社会政策的骇人听闻的文章的刊物（《莫斯科新闻》、《星火》、《论据与事实》、《文学报》等）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新世界》杂志［主编为作家谢·巴·扎雷金（С. П. Залыгин）］刊登的有关苏联实验的历史、现状与前景的系列文章［伊·伊·克里姆亚金（И. И. Клямкин）的《哪条大道通往修道院?》（Какая улица ведет к храму）、尼·彼·什梅廖夫（Н. П. Шмелев）的《预支与欠债》（Авансы и долги）、弗·伊·谢柳宁（В. И. Селюнин）与格·哈宁（Г. Н. Ханин）的《伪造的数据》（Лукавая цифра）等］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列·伊·阿巴尔金（Л. А. Абалкин）、尼·彼·什梅廖夫、拉·皮亚舍娃（Л. А. Пияшева）、加·哈·波波夫（Г. Х. Попов）、塔·科里亚金娜（Т. И. Корягина）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被广泛讨论。亚历山大·齐普科（А. А. Ципко）提出，应当用批评的态度

看待列宁留下的思想遗产和社会主义的前景；政论家尤·车尔尼琴科（Ю. Черниченко）号召重审苏共的土地政策；尤·尼·阿法纳西耶夫（Ю. Н. Афанасьев）于1987年春主办了题为“人类的社会记忆”的政治历史讲座，其反响超出了他所领导的莫斯科历史档案研究所之外。

一批装帧相同的政论集受到极大欢迎，读者像读引人入胜的小说一样来读这些政论集。1988年名为《别无选择》（Иного не дано）的政论集首印5万册，发行后立即销售告罄。文章作者［尤·尼·阿法纳西耶夫、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Т. И. Заславская）、安·德·萨哈罗夫、亚·亚·努伊金（А. А. Нуйкин）、弗·伊·谢柳宁、尤里·卡里亚金（Ю. Ф. Карякин）、格·格·沃多拉佐夫（Г. Г. Водолазов）等人］是一些因其社会地位而知名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些文章都热切地、不妥协地号召苏联社会实现民主化，从每一篇文章中都可以读到要求变革的愿望。主编尤·尼·阿法纳西耶夫在其简短的序言中谈到，书中存在“不同的题目，相互矛盾的意见，别具一格的解决办法，或许，正是这些使文集的主导思想具有特殊的说服力：改革，是我们社会生存的条件，舍此别无选择”。1989年成为出版界的“辉煌时刻”，出版物的印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论据与事实》周刊发行量达到3000万份（周刊所达到的这一绝对纪录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劳动报》达到2000万份，《真理报》达到1000万份。“大型杂志”的订数也急剧飙升——尤其在1988年底传出订阅丑闻之后（当时，有人借口纸张不足，限制其订数）。社会上掀起了捍卫公开性的浪潮，从而订阅量得以保持。1990年，《新世界》发行量达到270万份，这是文学杂志从未有过的印数。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89—1990年）的直播聚拢了许多听众，人们在工作时开着收音机，或把便携式电视机从家里带到办公地点。人们确信：就在这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立场和观点的交锋将决定国家的命

运。人们通过电视节目和收音机直播来收听、收看来自事发地点的报道，这是时事报道方面的革命性步骤。

各种直播节目产生了：圆桌会议、电视连线、演播厅讨论等。毫不夸张地说，一些政论节目和信息节目（《观点》、《午夜前后》、《多余的人和事》、《600 秒》）受到全民欢迎，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对信息的需求，而且还在于人们渴望置身事发现场的中心。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以自己为例，向人们证实：国内已经出现了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讨论那些困扰人们的问题（诚然，在改革年代，电视台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回到旧的、预先录制节目的做法）。1990 年代前后涌现出来的一些出色的纪录片也充满争议性观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Так жить нельзя）、《我们失去了的俄罗斯》（Россия，которую мы потеряли）（导演是谢·戈沃卢欣（С. Говорухин））、《做年轻人容易吗?》（Легко ли быть молодым）（导演是尤里·波德涅克斯（Ю. Подниекс））。《做年轻人容易吗?》这部电影是直接面向年轻观众。

有关现实的最有名的生活片（不加美化和虚饰）描述了年轻一代的生活［瓦·皮丘尔（В. Пичул）导演的《小女孩薇拉》（Маленькая Вера）、谢·索洛维约夫（С. Соловьев）导演的《阿萨》（Асса），两部电影都于 1988 年搬上银幕］。索洛维约夫召集一批青年参加影片最后劲头的群众场面的拍摄，并预先宣布说：维克托·措伊（В. Цой）将前来演唱并拍戏。维克托·措伊的歌曲对于 80 年代的那一代人来说，就如他们上一代人对于弗·维索茨基的诗作一样狂热。

刊物中实质上已经不存在“违禁”题目。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等遭到镇压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重又回到历史中。一些从前从未公布的党的文献被发现，一些档案开始解密。较为独特的是：国外已经出版的、西方作者有关我国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科恩的《布哈林》、拉比诺维奇的《布尔什维克上台》、

意大利史学家博法的两卷本《苏联史》）成为思索历史的“报春鸟”。布哈林一些不为新一代读者所知的著作的出版，立即引起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选择问题的激烈争论。布哈林本人及其思想遗产与斯大林对立，而在“改革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就选择发展模式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需要思考历史真相、回答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些问题，因而就引起人们对20世纪祖国史论著——尤其是对那些业已出现的、未经审查删改的回忆性书籍的浓厚兴趣。1988年，《我们的遗产》杂志第一期出版，该期杂志刊载了一些关于我国文化史方面的不为人知的资料（包括俄罗斯侨民的思想文化遗产）。

当代艺术作品也在寻求那些困扰人们的问题的答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田吉兹·阿布拉泽（Т. Е. Абуладзе）导演的电影《忏悔》（Покаяние）（1986年）中，关于体现一望便知的独裁者面目中的世界之恶的寓言震动了整个社会。片尾的警句“我们干吗需要一条不通向寺院的道路?”成为改革时期的主题。人的道德选择问题，成为我国摄制的两部主题不同的优秀电影关注的焦点——这就是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М. А. Булгаков）的中篇小说《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改编的同名电影［导演В. 博尔特科(В. Бортко)，1988年］以及《寒冷的53年夏天》（Холодного лета 53-го）［导演亚历山大·普罗什金（А. Прошкин），1987年］。一些以前不许搬上银幕或遭到审查机关大幅删改的如阿·尤·赫尔曼（А. Ю. Герман）、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基拉·穆拉托娃（К. П. Муратовая）、谢尔盖·帕拉加诺夫(С. И. Параджанов）等人导演的影片现在都可以租来看。亚·雅·阿斯科尔多夫（А. Я. Аскольдов）导演的影片《人民委员》（Комиссар）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社会辩论的白热化，在改革时期的宣传画中得到突出表现。宣传画从苏联时代人们习见的宣传手段变成暴露社会恶习、批判经济

困难的武器。一些习见的日常生活形象被作为表现手段，并且很快就将苏联的象征符号排挤出去。第一次持消极情绪的展览“宣传画：致改革”于1988年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一直持续到半夜，并因参观者络绎不绝而延期。内容相似的第二次展览“改革与我们”（1988年在莫斯科为迎接共青团成立70周年举办）也使参观者反响强烈，兴致浓厚。

实际情况

展览会的参观者在留言簿中写道：“宣传画发挥的作用还不充分。应该将问题曝光，让庸人们睁开眼睛，但不应在展览大厅，而应在每个路人都能驻足参观的地方。有关改革的宣传画展板应该摆在大街上，复制多份，多摆一些在商店货架上。官僚是不可能看这个展览会的，应该给他们留下痕迹，将宣传画钉在官僚云集的地方。”



宣传画很快变成批判改革半途而废、表达日益增长的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手段。

1990年代前后，各民族开始了历史性的自我意识迅速高涨的时期，社会积极性达到顶峰。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不要发生逆转，而对改革的优先方向、机制和速度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围绕“改革派的”刊物，聚集了一些支持政治路线激进化或主张渐进推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得到改革初期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实际情况

后来，政论家维克托·列昂尼多维奇·舍伊尼斯（В. Л. Шейнис）在《议会的上升与衰落。俄罗斯政治的转折年代

（1985—1993）》一书中写道：支持改革的阵营中，有一个最大众化的阶层，是较快被唤醒的社会积极分子。他们首先是大城市里的居民，或听过“电台之声”的、读过进步杂志和刚刚渗透到他们中间的私下出版物和境外出版物的人……清除了新斯大林主义浪潮的人们却试图让他们回到过去。但是，整整一个时代里的持续学习并没有白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关于苏联历史的较为克制的“启示”也产生了影响……对1965年起步（但很快就被搁置）的经济改革的讨论，“《新世界》派”在我国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所做的清理性工作、创造性工作都发生了作用。

基础就是这样。但是，为了让社会动起来，必须首先使社会从不言而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不是害怕丧失性命（对丧失性命的害怕也是有的），就是害怕失去自由、工作和生存手段等——这一切，都可能因一个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而在瞬间丧失。恐惧心理和逆来顺受心理结合在一起，是苏联体制的基础，但现在恐惧心理开始消退了。



拥有了依托于媒体的社会舆论，对于我国历史来说是一个崭新、独特的现象。国内产生了一些社会舆论领袖，他们出身创作知识分子：记者、作家、学者，其中不少人都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和巨大的个人勇气。

1986年底，安德烈·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城回来。安德烈·萨哈罗夫以氢弹制造者之一、维权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5年）而广为人知。他不但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道德的捍卫者，但他的公民立场并不总是被理解。萨哈罗夫被选为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杰出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德·谢·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在悼词中，称萨哈罗夫为“先知”：“是在古老的、自古就有的意义上所说的先知，也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人：号召自己的同代人，为了未来，要在

道德上洗心革面。”

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中，德·谢·利哈乔夫的名字与整整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苏联末期，在人们对社会政治理想失望的情况下，作为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以忘我地为社会服务而做出了个人榜样。他认为，“做知识人”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而知识人的概念首先就意味着“能够理解他人”。他的古罗斯文学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渗透着这样一种信念：保存和增加民族精神财富，是我国在 21 世纪里成功发展的保证。在改革年代里，有千百万人都听到了这一号召。在保护历史文化文献事业方面，这位学者以其不妥协立场和忘我的教育活动而知名，正是由于他的干预，不止一次地使历史遗产免遭毁灭。

德·谢·利哈乔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以自己的道义立场和公民立场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精神氛围。在人们对国家和周围世界的惯常信念遭到摧毁的时代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道德准绳。

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促使公民积极性高涨。在改革年代里，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首创精神的社会团体。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即不是由国家组织的积极分子）聚集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如“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等重大社会组织的“屋檐下”。与从前不同的是：这些思想意识团体都是自下而上成立的，由持各种观点和思想立场的人们组成；将所有人团结到一起的，是他们都准备通过个人参与，使国家向最美好的方向急速变革。作为正在形成中的政治流派的代表，他们成立了一些研讨性俱乐部（“社会倡议俱乐部”、“改革”，随后又成立了“改革-88”、“民主改革”等）。1988 年底，“莫斯科讲坛”俱乐部成为权威的社会政治中心，其成员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舆论领袖，他们举行集会的目的是：就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政治、半政治的思想团体涌现出来，旨在从事维权

活动（如“公民尊严”）、保护环境（“社会生态同盟”）、组织地方自治、组织娱乐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而那些以复兴俄罗斯精神为己任的团体，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1989年初，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约200个非官方俱乐部，国内一些大的工业和技术中心也都有类似的社会自发组织形式存在。这些团体对社会舆论有重大影响，有能力动员支持者和同情者。在改革年代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诞生了公民社会。

苏联人的出国潮迅速汹涌起来，而且多数不是旅游，而是在社会思想团体的框架内（“民间外交”、“儿童外交”、家庭交流）出国。改革为许多人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

但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想起了上一代人改革希望破灭的先例，因而持观望态度。有人发出响亮的号召：“捍卫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遗产，以免被“伪造”。1988年3月，列宁格勒的一位老师尼娜·安德烈耶娃（Н. Андреева）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不能牺牲原则》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还有人持另外的立场。著名的作家和画家瓦·伊·别洛夫、瓦·格·拉斯普京、伊·谢·格拉祖诺夫等人则主张与“对我们民族具有毁灭性的西方影响”的渗透作斗争，保持民族特性。支持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民主改革的人与赞同改革社会主义本身、回到“真正”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之间、热衷于公然的反共立场的人与那些支持革新苏联体制思想的人之间的冲突，有超越在刊物和人民代表大会讲台激烈争论的范围的危险，冲突本身也反映出社会中业已开始了从政治上划清界限。

社会意识的变化导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生改变，文学开始丧失其作为社会辩论中心、表达公民立场的主要手段的垄断地位；但是，寻求对那些困扰人们的问题的答案的其他来源和可能性又没有马上出现，而在改革初期首次发表的“迟来的文学作品”，仍然是社会关注的中心。1986年，《旗帜》（Знамя）杂

志发表了亚·阿·别克（А. А. Бек）的“解冻”小说《新任命》（Новоенаэна’че-ние）（在1960年代没能发表），该小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斯大林时期行政指令性体制的弊端。安·雷巴科夫（А. Рыбаков）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Дети Арбата）、弗·杜金采夫（В. Дудинцев）的长篇小说《穿白衣的人们》（Белые одежды）、尤里·多姆布罗夫斯基（Ю. Домбровский）的长篇小说《废物系》（Факультет ненужных вещей）、丹尼尔·格拉宁（Д. Гранин）《死硬派》（Зубр）等，受到有好奇心、同情心的读者的喜爱。就如改革时期的那些优秀电影一样，将读者联合起来的，是对反思过去、并做出道义评价的渴望。钦吉兹·艾特马托夫（Ч. Айтматов）在长篇小说《断头台》（Плаха）（1987年出版）中，首次涉及苏联社会不曾公开涉及的吸毒问题。所有这些题材新颖的作品的写作，都沿袭了俄罗斯文学的“教化”传统。

从前在苏联遭到查禁的作品现在又开始回到读者中间。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30年之后，《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第一波”俄罗斯侨民作家［伊凡·蒲宁（И. А. Бунин）、鲍·康·扎伊采夫（Б. К. Зайцев）、伊·谢·施梅列夫（И. С. Шмелев）、弗·弗·纳博科夫等］以及1970年代才被迫离开苏联的作家［亚·阿·加里奇、约瑟夫·布罗茨基、弗·弗·沃伊诺维奇（В. В. Войнович）、瓦·巴·阿克谢诺夫（В. П. Аксенов）］的书也先后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瓦拉姆·沙拉莫夫（В. Т. Шаламов）的《科雷马河故事集》（Колым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以及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安魂曲》（Реквием）、瓦·谢·格罗斯曼（В. С. Гроссман）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也首次在祖国出版。在读者们看来，各种各样的大量“迟来的文学作品”的回归，简直就是神启。人们终于可以接触到我

国诗歌和小说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可以从中自由选择那些感到亲切的、与自身精神探索相适应的作品。在许多年里，因被迫忘却而被“活生生”割裂的、共同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空间又开始重建。1990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报刊和其他大众媒体法》，最终将书报审查制度废除，从而，苏联的文化管理体制基本上被摧毁了，这是支持民主改革的人们的重大胜利。

但是，能够自由接触那些不久前还遭禁的作品，就使文学作品丧失了从前对于整个思想界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力量，出现了其他可以形成公民立场的来源。最主要的是，公共的政治讨论范围在快速扩大，而用文学讨论取代政治讨论的需求却迅速下降，结果，先是文学、随后是政论（到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都在形成国内精神氛围方面丧失了特殊作用。

政治生活变化促成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正常化。还在 1970 年代的时候，主要宗教（特别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们积极的和平活动已经促进了国家与宗教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1988 年，“罗斯受洗”一千周年被作为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来庆祝。庆典的中心，就在转交给教会、并加以修复的莫斯科“圣丹尼尔”修道院。

1990 年，苏联通过了《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保障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所有宗教和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保各宗教组织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日历中出现了新的国家节日“基督诞生节”（1991 年 1 月 7 日首次出现），表明东正教传统在国家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承认，而此前，宗教生活的复兴进程早已如火如荼了。希望受洗的人数迅速增加，到 1990 年代初，人们的宗教信仰程度迅速提高。神职人员严重不足，开设了首批宗教教育中心，出现了首批普通读者都可以看的宗教书籍，登记在册的有许多教区，许多寺院开放了——多数寺院的状况较为凄惨，需要大修。宗教管理机构在半毁灭状态中得到恢复。千

万人投入到建立新教区的工作中。

按照问卷调查资料，俄罗斯公民认为改革年代是国家历史上的“艰难时期”。新领导人上台时人民激情迸发，而仅仅两三年后，激情就消退了。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路线感到失望。许多方面都鲜明地表明，国家在沿着社会不平等不断加深的方向前进。首次出现了一些可以选择的就业形式和快速致富的方式。商业中介公司增加，这些公司按照国家价格收购商品，然后转手倒卖，或者利用国家的设施来维持自己的工作，从而就导致在当时国内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因原料紧缺而停产、工资迅速贬值的条件下，还产生了首批富人。国内出现的首批“非法的”百万富翁给人留下令人吃惊的印象，例如，企业家、苏共党员 A. 塔拉索夫（A. Тарасов）交纳了几百万元收入作为党费。同时，苏联政府发起“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的运动（1986 年）严重打击了那些赚外快、在街头卖花、私下载客的人。

生产的无序状态导致再分配体制毁灭，由于货币供应缺乏保障，经济继续摇摆不定。结果，在和平时期，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节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这让老一代人想起了战后初期的岁月。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苏联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运动——禁酒运动——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备受争议。米·谢·戈尔巴乔夫上台领导国家不久，就宣布采取非常措施，限制酒类消费。卖酒的商业点被大幅削减，报刊上广泛宣传、提倡“不饮酒的婚礼”，还取消了苏联南方的高级葡萄种植园，结果，酒类非法买卖、私酿酒现象迅速泛滥。

类似的各种非常措施使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社会经济路线威信扫地。国家试图加以“补救”，开始削减对国防和科研项目的拨

款。几百万人名义上还在企业或科研院所，但是已经领不到工资，或只领最低线以下的工资，导致许多人失去生存手段，被迫寻求各种就业机会（与自己的专业技能毫无关系）——首先是经商。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继续下降，医疗和药品保障方面继续紊乱。到1980 年代末，国内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一些工业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共青团员号”核潜艇沉没）加深了社会对国家领导人处理危机现象的能力的失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脱离”苏联体系，让人们对所选择的路线是否正确感到没有把握。

1980 年代末一个较为独特的趋势，是人们对“肥皂剧”——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是墨西哥和巴西的电视连续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些非传统的崇拜和信仰（包括一些扩张性教派）开始传播，国内出现了外国传教士。电视直播宣传的民间秘方吸引了大众。这也证明：面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在收入急剧减少的条件下，对于多数人来说，在自家的自留地劳动，成为维持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苏联人原本习惯于指望国家的帮助，现在也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些问题。报刊对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的热烈讨论，并没有产生明显好转。著名政论家瓦·伊·谢柳宁曾用一个很有分量的公式表示：“公开性是有的，可是听不见。”

“我们渴望变革！”广受欢迎的电影《阿萨》中的主人公提出这样的要求。维克托·措伊的歌词（1988 年）也很独特：

> 我们的心灵要求变革
> 我们的眼睛要求变革
> 在我们的泪与笑中
> 在我们的脉动中……
> 变革，我们期待变革。

我国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结束了。

供思考的信息

关于改革及苏联崩溃原因的争论，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

有四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与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开始向市场过渡、苏联解体。尽管其中的每一项变革都非常重大，但对其评价却是极为矛盾：谁也不会为全球性对抗以及经常在核毁灭边缘游走的状态终结而感到悲伤，但是，也很少有俄罗斯人会为苏联崩溃而感到高兴（基辅和塔林变成了外国首都，皮聪达和苏呼米成为发动军事行动的场所）。但是，这些事件之间有必然联系吗？能否在推行民主路线的同时，保留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都深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在这方面，他的个人性格和他热衷的意识形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个性。美国总统里根的行政部门中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杰克·马特洛克曾被派驻莫斯科，担任大使。马特洛克指出，"戈尔巴乔夫甚至都不可能提出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任何他人的想法"。

在思索这个具有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记忆力超群、有乐观主义气概的人的命运时，美国大使得出一个结论："在他的内心，个人因素对政治评价占了上风：戈尔巴乔夫不愿意与自己那些有才华的同事分享舞台灯光。他只在与一些沉默、低调的助手在一起时才感到自在，这是可以解释戈尔巴乔夫物色人选方面的情形之一，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与叶利钦的斗争中会遭到失败。"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认识戈尔巴乔夫方面比马特洛克更进

一步。他的一个有关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广为人知：戈尔巴乔夫就像一名从未被击倒过的拳击手，而这名拳击手野心勃勃，自信到了极点。两位外交家也都指出了苏联新领导人的弱点：过分贪权。

戈尔巴乔夫周围是些什么人？他身边的人看到，起初总书记根本没有朋友，到后来，他的外国同行成了他的朋友。

好几位苏联官方人士都曾告诉马特洛克说，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与外国人在一起比与本国公民在一起更自在："他觉得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更亲近些。您与他说话可以比我们与他说话更直率。在这里，他没有亲近的朋友。"

最让西方外交官感到惊讶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评价民族问题方面的满不在乎。马特洛克写道："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宣传背后的现实力量几乎可以说非常盲目……或者他不知道，或者就是不想知道民族感情（包括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表现。"

国家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主要品质是：了解航线、确定目标、做指路灯。对于戈尔巴乔夫确定的道路，西方同样表示怀疑。

马特洛克大使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明白，共产主义制度在所有东欧各国已经丧失任何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希望，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制度，而且也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已经成为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从内心来说，戈尔巴乔夫不准备承认现有的、对共产党的敌意，但他对东欧事务的真实现状外行得令人惊讶。"

意识形态。在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必然产生一个主要问题：改革是否不可避免？显然不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在 75 岁生日的时候，回答"如果不搞改革，现在在干什么？"的问题时，已经自己表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以自己天生的幽默回答说："当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体还行，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确实，苏联体制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

外来危险：核武器排除了攻击苏联的可能性，任何军备竞赛方面的落后，原则上说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而且，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到处渗透的克格勃机关排除了出现地下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当然，会有一些自发的动乱，但是，缺乏革命性组织，这些动乱并不危险。没有外部入侵的威胁，也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发生更迭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政权自身自上而下的行动。既然政权没有任何直接威胁，就必须有一些以高尚理想作为依据的行动。

这种对苏联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思想依据，只能来自苏联意识形态本身。这种依据的自然的、唯一的形式，就是追求净化意识形态，清除一些后期的积淀，诉诸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按照民主自由的精神阅读其著作的“新心得”，使意识形态活跃起来。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德·富尔曼称类似思潮为“改良共产主义”派或“马克思主义新教”。这种思想在 1950 年代下半期和 1960 年代（始于苏共二十大，以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而告终）的苏联社会非常受欢迎。假如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接替了赫鲁晓夫，苏联体制完全可能会逐步发生演变，先演变为较为民主的制度，而最终就完全演变成为民主制度。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就曾试图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性既没有在苏联实现（当时苏联领导人中还没有能够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当时还不允许它这样做）。

只有当戈尔巴乔夫说“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列宁教导我们说”，并且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才使他有力量发动改革。只需相信“人民的创造力”、“社会主义的潜力”、“新思维”等等，就可以给予这种力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出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非最佳发展方案。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得更早些、出现在

1960年代要好得多：当时，真正是多数群众都相信，应该革新苏联制度、成功改革从斯大林继承下来的体制。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社会思想中，“我们能否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属于应被诅咒的问题。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

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的范例，被迫走在新垦地上。在对他执政的6年时间进行梳理，并将其与中国经验对照后，多数研究者（首先是美国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经济改革使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才应该推进政治改革。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断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给苏联公民政治自由先于向市场过渡的完成。实在说，这样的结论出自一个几十年里一直指责苏联践踏自由的人之口，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嘲讽。但是，这种判断的主要缺陷在于脱离了1980年代苏联的现实情况。正是因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改革者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来自官僚特权阶层的阻力，米·谢·戈尔巴乔夫才加速了政治改革。

在民主化条件下，苏联解体是否不可避免？改革时期的民主阵营代表至今都在证实：就其结构来说，苏联只有在权威体制下才能存在。用最初三届国家杜马中“亚博卢集团”代表谢·米特罗辛

的话说，苏联是一座童话中的冰屋，只能在严寒中存在，一旦被春日阳光照射，就必定会融解。

历史学家科恩反对这种断然的论断，他列出整整一份苏联曾面临的岔路口的清单，在每一个岔路口，苏联历史都可能走另一条路。

他是用一系列问题来表述的：

“假使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化之前（或根本就不搞什么民主化）成功地推行了市场改革（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版本，迄今为止，大多数俄罗斯改革者还都认为，这是最佳方案），假使不是 1986 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和 1988 年亚美尼亚地震把苏联财政预算掏空，会怎样？

假使作为联盟总统（是否是全民选举的总统，并不重要）的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一两个加盟共和国动用武力（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制止民族分离活动，会怎样？

假使他在 1987 年叶利钦辞职后，将他派往某个遥远的非洲国家当大使，或者在 1990—1991 年间不让他上国家电视台（就像后来 1996 年大选时叶利钦对自己的共产党反对派所作的那样），会怎样？

另一方面，假使叶利钦本人当选为苏联总统、而不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总统（这在 1990 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 1991 年“8・19”叛乱失败之后，他自己对此也很抱希望）的话，他还会侵犯联盟政府吗？

当叶利钦与另外两个苏联领袖于 1991 年 12 月秘密废除苏联的时候，假使苏军和其他强力机构反对他（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情况又会怎样？

如果在注定失败的 1991 年 8 月政变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将三个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撤职（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现这些人密谋反对戈尔巴乔夫），政变还会发生吗？

如果美国和七国集团接受戈尔巴乔夫1991年中期提出的请求，对苏联的改革提供重大财政援助，在苏联谁还敢反对他?”

类似问题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但是，所有因素悲剧性的因缘际会（如，发动改革的初期，石油、天然气价格暴跌），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而戈尔巴乔夫也丧失了权力。

外国史学著作常常依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声明的精神，说苏联解体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但是，这种解释没有注意到：改革根本不是美国人发动的，是苏联人做出了倾向于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选择，而且是自主做出的。我们并没有输掉“冷战”。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了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审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米·谢·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当代俄罗斯关于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社会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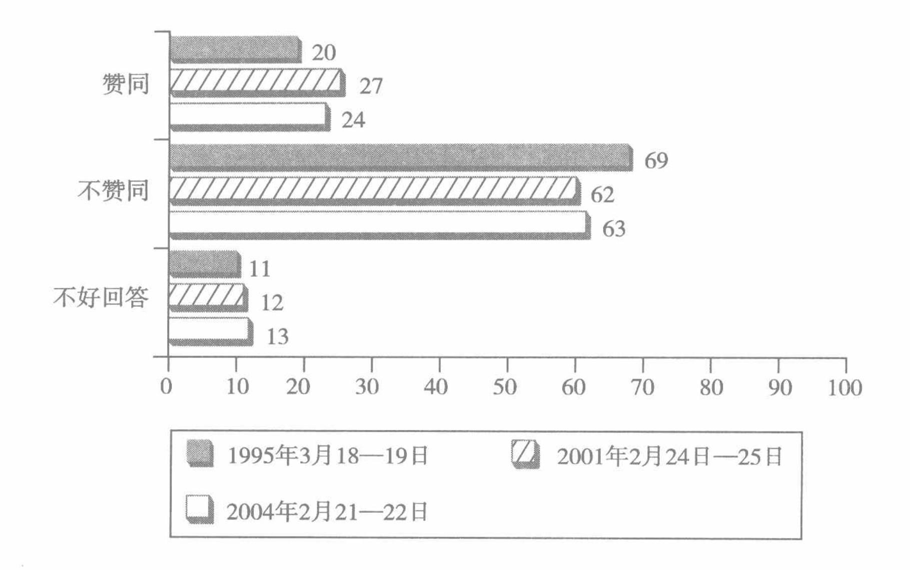
我们援引“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意调查资料（2004年2月26日，调查1500人，统计误差不超过3.6%）：

西方大多数人都认为，米·谢·戈尔巴乔夫是20世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您本人是否赞同对米·谢·戈尔巴乔夫持这种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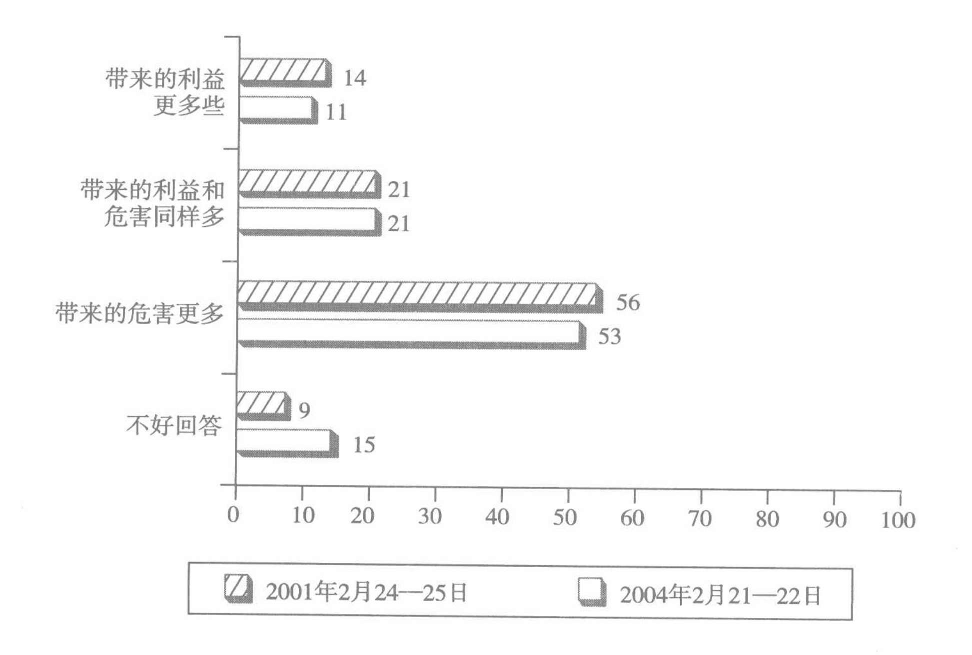
答“赞同”的，占24%（1995年3月18--19日的调查结果，占20%；2001年2月24—25日的调查结果，占27%）；

答“不赞同”的，占63%（1995年3月18—19日的调查结果，占69%；2001年2月24—25日的调查结果，占62%）；

答“不好回答”的，占13%（1995年3月18—19日的调查结果，占11%；2001年2月24—25日的调查结果，占12%）；



总体上说，您认为米·谢·戈尔巴乔夫为我们民族带来的利益更多些还是带来的危害更多些？



答“带来的利益更多些”的，占 11%（2001 年 2 月 24—25 日的调查结果，同样回答的占 14%）；

答“带来的利益和危害同样多”的，占 21%（2001 年 2 月 24—25 日的调查结果，同样回答的占 21%）；

答“带来的危害更多”的，占 53%（2001 年 2 月 24—25 日的调查结果，同样回答的占 56%）；

答“不好回答”的，占 15%（2001 年 2 月 24—25 日的调查结果，同样回答的占 9%）。

第5章 改革后的俄罗斯

28. 叶利钦改革的开始：鲍·尼·叶利钦的政治方针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联邦与邻国之间尚不存在经条约确认的国界线，俄罗斯联邦也没有海关和边境部门。直到1992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才签署了建立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命令，在这之前俄罗斯没有陆军和海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因为黑海舰队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当时克里米亚面临爆发军事行动的危险，政治家们好容易才得以控制事态的发展。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和危险在于消费市场几近崩溃。虽然1991年的粮食收成是那几年中最好的一年，然而国家的粮仓却空空如也——农庄农场不把粮食卖给国家。商店里的柜台同样空空荡荡的。1991年秋天，莫斯科的许多食品店除了一些类似香辣酱罐头的辛辣调味品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售。入冬后人们不得不为能否饱腹而忧心忡忡。

经济危机迫使叶利钦总统和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问题上。1991年11月1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了总统推进经济改革的最广泛的权力。授权总统亲自领导政府，他下达的经济指令比立法机构通过的法令具有更大的法律效力。在与各相关的人民代表苏维埃机关协商，总统就可以拥有任命地区行政长官的权力（共和国除外）。这样，叶利钦就掌

握了足以使其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统治者的政权，然而这只是在 1993 年 1 月 1 日之前相当短的一段时期内。

在 199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在其纲领性的报告中宣布了自己市场改革的主要方向——稳定财政、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叶利钦组建的政府于 1991 年 10 月 28 日开始实施市场改革。新政府中制定经济政策的班子由年轻的经济学博士、著名的政论家叶·铁·盖达尔（Е. Т. Гайдар）领导。他曾经认为，正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才葬送了苏联政府和联盟本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正是彻底的价格改革葬送了“盖达尔政府”。盖达尔明确了新政府的优先方向：价格自由化、贸易自由、国家财产私有化。1991 年 12 月末，以总统令形式出台的政府经济纲领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支持。

经济转向市场轨道成为 1990 年代初实施的改革内容。当时预计改革能够迅速完成。改革的政策被称为“休克疗法”。叶利钦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曾这样预测：“最糟的情况会持续半年左右，之后价格开始下降，消费市场的商品供应日趋充足。在 1992 年秋之前，就像我在竞选时所承诺的，经济将达到稳定，人民生活逐渐改善。”

改革纲领的基本步骤如下：

1. 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从 1992 年 1 月开始实行一次性的价格自由化。其预期结果将表现为：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建立起来，消除了商品短缺现象，开启竞争机制，刺激商业积极性，加快商品流通，建立国产产品和进口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

2. 稳定财政。预期结果表现为通货膨胀率下降，形成稳定的卢布汇率。

3. 大规模的国有财产私有化。预期结果表现为：人民变为私有者，建立能够提高人们的商业积极性的经济刺激机制。

农业的基础仍是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绝大多数只是在形式上转变为股份公司。1993年10月2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颁布了《关于调整土地关系和开展土地改革》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土地私有制建立起来。然而相关法律的颁布却遭到国家杜马的阻挠。

实际情况

叶·铁·盖达尔回忆说："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来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构（军队、海关、民警机构），——由于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这些机构已经被损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在俄罗斯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和波兰那样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没有一戈比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已没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情。"



1992年1月2日价格自由化政策开始实施。大约90%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开始放开。总统下达了《关于贸易自由》的命令，这一命令成为向新的经济关系体制过渡的革命性转折。该命令使所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和所有公民不需特别许可就有权进行贸易、采购和中介活动，其中包括独立制定价格。生产产品的统一分配（由国家计划和控制）情况改变了。公民和企业可以在任何他们方便的地方进行贸易（包括沿街叫卖、摆摊和汽车上），人行道和地铁站的通道除外。

稳定财政和缩减预算赤字的措施同时进行。国家实际上停止了

对工业和农业的资金投入。所有的国家开支，特别是与军工生产和援助友好国家相关的开支急剧缩减或者完全停止。税收体制也发生变化——实行了幅度为 28% 的增值税。这可以增加预算的收入，但也加快了价格的上涨。

价格自由化政策实施以后，价格很快就上涨了 9—11 倍，而工资和津贴只微微增长了 70%，大多数居民濒临贫困。

私有化运动同时展开。私有化的实质是财产权从国家转到私人手里。在 1989—1991 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从反对官僚私有化转而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

实际情况

阿·鲍·丘拜斯在谈到经理私有化时强调："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盗一空，但这一行为并非非法，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合法的非国有化模式。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

在第一种情况下，任何合理的想法都被公开和无耻地忽略。国有企业'能源'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的财产被列入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而某位彼得罗夫同志的个人财产则构成了这一股份公司的另外一部分股份。由于对股份份额的技术估价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注明，因此该国有企业的资产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评估为彼得罗夫同志的个人投资。

第二种方法是企业私有化的典型方案——赎买租赁……有资产项目、有出租人（通常是经理）和承租人。经理签署了关于出租×企业的为期五年的合同，其中对租金的规定令人可笑，由此中饱私囊。

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是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你以十亿签署了出租

合同，而本来应该是一万亿！为什么？我愿以十亿出租，难道我违反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违反，因为没有什么不可违反的。”



住宅私有化的规模更大。国家为住宅租户进行了无偿的住宅私有化，并建立了自由买卖房屋的机制。

少数企业被竞拍。1994年6月之前有8.5万个商店、饭店、餐馆和企业转入私人手里，占小企业总数的70%以上。

大中型和特大型企业的私有化按照另一套方案进行。最初它们被改制为股份公司，然后其股份被股份公司出售。1992—1994年期间，出售股份并非靠钱来完成，而是靠特别的有价证券——私有化证券。证券私有化正因此得名。

证券私有化具有社会公平性。人民作为财产的集体持有者得到了可以证明公民有权分得国家财产某些份额的有价证券。根据1984年的数据，企业的资产值按照公民数量被划分，经过计算后分给公民与其“个人股份”相当的支票。私有化证券的面值被定为1万卢布。事实上，两年之后（证券私有化已经结束），由于通货膨胀这些钱只能购买两公斤香肠。

私有化证券一共发行了1.44亿张，共有96%的居民得到了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使每一个俄罗斯联邦公民可以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成为某一企业的股东：或者参加国家组织的证券拍卖；或者把私有化证券投到债券投资基金中；或者购买某一公司的股份，根据内部协议，公民将成为该公司劳动集体的成员。对俄罗斯公民来说，所有这些途径新鲜而陌生。

这些措施的效果互相矛盾。到1992年春天的时候，消费市场已经商品充足，商店里开始出售乳酪、黄油和香肠，排队现象有所减少。街头贸易发展较快。国民经济崩溃和经济联系完全中断的威

胁得以消除。商品匮乏演变为货币匮乏，印制卢布被改革者们视为当时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条件。

实际情况

阿·丘拜斯回忆道："我记得1990年在彼得堡发生了恐怖的'烟草风暴'，当时我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每天听到的汇报都是这样：还剩下多少烟草，有多少可以运来……像在战场上一样……然而有一次这一系统发生了中断，持续一星期没有烟草。在涅瓦大街的中心烟草商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站着，等着，但商店却空空如也，没人知道商品何时被运来。于是人们开始纷纷拿木料（旁边正在修理房屋），堵塞街道，点起了篝火。民警赶来，但被人们团团围住……这就是卢布失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这样命令烟厂的工人：星期六去上班，给加班费，争取再生产一批香烟。他将这样回答，'给我三倍工资我都不会去加班，你们的纸币对我有什么用？'工厂没有必要开工，工人没有必要去工厂，他们领了工资也买不到东西，因为商店里空空如也。经济基础本身就这样遭到了破坏。"



对旧的经济机制的破坏和为市场关系腾出发展空间的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广泛，但是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工业生产下降18%，固定资本投资大约下降了40%。稳定财政的目标没有实现，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2500%—2600%（尚无更加确切的统计数字）。生产下降和高通货膨胀引发国民经济关系的紊乱，这进一步导致了生产的危机。通货膨胀使企业的周转资金大幅贬值，开始出现债务拖欠危机，企业几乎有一半的产品收不到付款，企业开始以物易物。以物易物现象成为俄罗斯整个1990年代的长期经济问题。

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储蓄所中的存款迅速贬值，而国家组

织和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涨幅缓慢，通货膨胀速度明显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列入预算内的职工，首先是幼儿园教师、中学教师、医生都在勉强度日。

证券私有化的后果至今仍饱受争议。私有化证券是一种有价匿名证券，可以出售。收购居民持有的证券行为大规模展开。大多数情况下私有化证券以极低的价格出售，那些决定把证券投到债券投资基金的人们成了投机组织行为的牺牲品。而债券投资基金的专家常常不善于从私有化证券中获得商业利润。债券不见了，债券持有者的利润也没有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价证券工作者经验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没能保障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伴随着私有化过程出现的大量招摇撞骗导致部分私有化的企业被犯罪分子所控制。犯罪团伙可以用非法获得的钱财来购买企业，并通过武力保护自己的“赃物”。在俄罗斯，经济决策常常由犯罪团伙的大头目作出，并通过武力火并来“摆平”的方式加以贯彻。

国家的软弱为各种形式的招摇撞骗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经济上的损失，大规模的招摇撞骗事件破坏了公民和俄罗斯外交伙伴对我国有效管理内部事务能力的信任。许多这样的“招摇撞骗活动”得到俄罗斯境外的商人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著名的企业家阿·塔拉索夫（А. Тарасов）在自己的《百万富翁》（Миллионер）一书中谈到对外经济银行的 80 亿美元如何消失的事件。塔拉索夫之所以谈到这一招摇撞骗案件，是因为这一案件的主角伊利亚·梅德科夫（Илья Медков）（吉阿姆股份制银行的所有者和行长）于 1993 年被杀。

同时代文献资料

■ 引自1991年12月3日颁布的《关于放开价格的措施》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令

1. 从1992年1月2日起，根据供求关系，基本上实施生产—技术用途产品、日用品、劳动和服务向自由（市场）价格及收费标准过渡……

……

3. 责成俄罗斯联邦政府：

确定具体的生产—技术用途产品、基本消费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和最高收费标准及价格调控办法；

于1992年开始实施垄断企业产品价格调控办法；

1992年，在与主权国家——前加盟共和国的相互关系中，根据世界价格，国家间商品与产品的供应向统一的结算方式过渡。

■ 引自阿·塔拉索夫的《百万富翁》一书

一天伊柳沙（伊利亚的昵称——译注）来到伦敦并问我：

“阿尔乔姆·米哈伊洛维奇（塔拉索夫），您能否往银行存放现金？我需要取很多钱，大概一天需要取1亿美元现金！我将用飞机把这些现金运来，不久前我买了一架专用飞机……”

“伊柳沙”，我回答道，“大概只有在摩纳哥才能取这么多现金，但也不是每天都能！在一个正常的西方国家你很快就会被逮捕。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阿尔乔姆·米哈伊洛维奇，现在正进行着一桩大骗局……但您不要往坏处想，我个人并没有卷进去！国家和所有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对我们一半的居民进行了抢劫，我只不过被吩咐做些小生意。如果我把1亿美元运走并存到外国银行，我就可以得到1%的提成。货物是官方的，由俄罗斯国家银行寄出，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我已经多次转运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和匈牙利，但人们希望把钱存在更可靠的西方国家……您大概听说过，几个月前对外经济银行宣布

自己破产了，实际它的账上还剩下80亿美元。银行的顾客被这样建议——当然是非正式的——如果想要取出部分资金就必须付费，不然这些钱就会彻底消失。您为了救出自己的存款也会付一点钱吧?”

“是的”，我同意。

“您瞧吧，开始是付存款的10%，然后是20%，现在已经是30%了。对外经济银行的银行家们雇佣了很多像我这样有飞机的信差。我们负责把现金运到国外，存进银行，然后得到自己的提成。”

伊柳沙陷入沉思……

“我明白我正在作一些不正当的事”，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但是要知道，如果有法律的话，国家首先应该遵守！如果国家请求我干现在的事，这就意味着这是国家的委托。我明白，这件事与最高苏维埃，肯定也与中央银行行长，甚至可能和克林顿都商量过”。

这起特大骗局在几个月之内就把现金从对外经济银行全部运出去了。



29. 1992—1993年两个政权并存的危机

1992年俄罗斯危机持续增长。这种情况促使反对叶利钦总统政治路线的政治家们积极活动。一些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组织开始出现：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联盟、俄罗斯共产党人党。1992年1—2月期间，组织了公民与爱国力量大会、俄罗斯民族会议等反对派的大型论坛讨论会。副总统阿·弗·鲁茨科伊（А. В. Руцкой）参加了公民与爱国力量大会的工作。1992年2月23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许多其他城市发生了

反政府的群众集会，提出了恢复苏联和停止改革的口号。这意味着政治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要知道直到当时，“街头抗议”一直被民主派的组织所垄断。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所形成的政权体制把苏维埃民主和议会民主的特征以矛盾的形式相结合：在宣布划分权力的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却主宰一切。苏联时期形成的政权机构继续运作，首先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造成从法律上阻挠俄罗斯按照叶利钦授意的方针前进的可能性。



区分总统和议会斗争的原因和理由很有必要。斗争主要根源在于权力划分问题，确切地说是对政府控制权的划分问题。宪法规定，总统对政府首脑的任命与撤销应得到最高苏维埃的同意，尽管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无权任命总理，但可以在任何时候，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简单多数而解散政府。总统有权单独任命和撤销总理职位，但是不能解散议会或者暂时中止其活动；此外，宪法还辟有专门条款禁止解散任何经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机构。这样，无论是议会，还是总统，都有理由寻求对政府的控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解决不可避免的冲突，宪法并没有作规定。也正因此，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斗争才持续数月之久。双方固执己见，矛盾最终通过 1993 年 10 月的武力冲突才得以解决。叶利钦及其亲信所倡导的社会经济政策成为双方争执的理由。价格的急剧上涨和生活水平的下跌降低了总统威信，并引起议员们对政府的方针提出批评——有时真心实意，有时只是为了追求政治得分。



叶利钦的班子和反对派之间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 1992 年 4 月 6 日举行的第六次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统的报告一直伴随着反对声和讥笑声，大厅里嘈杂一片。

代理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似乎仅仅在1992年西方就会拨款240亿美元。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进行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这一行动迫使大会在4月15日发表政治宣言，冲突双方在宣言中都可以找到反映自己意愿的内容。

代表大会的其他几次会议是专门讨论如何把苏联解体所形成的新的现实写入俄罗斯宪法的问题。尽管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涉及权力划分问题的提案（无论是总统方面提的，还是反对派方面提的）获得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票数。代表大会于4月21日结束。

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1992年12月1—14日）成为历次大会中气氛最紧张和最具戏剧色彩的一次。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1月30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完成了对"苏共案"的审理，承认叶利钦在1991年8月23日颁布的《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总统令、1991年8月25日颁布的《关于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财产》总统令和1991年11月6日下达的《关于苏共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总统令是符合宪法的。

代表们甚至都没有讨论叶利钦在大会上的报告。相反，最高苏维埃主席鲁·伊·哈斯布拉托夫的报告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结束，并给为期5天的会议讨论定了调子，对政府的严厉批评重新开始。代表们用两天时间讨论了修宪问题，有关权力划分的原则性变化之一如下：代表有权批准或驳回对强力部门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的提名。12月9日，总统对盖达尔任政府首脑一职的提名被大会驳回（467票赞成，486票反对）。

12月10日总统在讲话中说，"没办法与这样的代表大会工作"。他严厉指责了哈斯布拉托夫为"一条失败路线主导人"。叶利钦主张就以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以解决分歧："您认为谁可以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政治危机和重振俄罗斯联邦：目前的人民代表

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还是俄罗斯总统？”

结束自己简短的发言后，叶利钦号召自己的拥护者离开会议厅，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集会。大约有 100 位代表尾随他而去。哈斯布拉托夫很快就宣布将递交辞呈，由尤·亚罗夫（Ю. Я. Яров）主持会议，然后就走出大厅。登记记录显示，会议仍超过了法定人数（715 人，超过最低人数 24 人）。因此大会根据会议日程继续工作，并且没有接受哈斯布拉托夫的辞呈（议长后又回到主席团，继续主持会议）。副总统鲁茨科伊在发言中宣称效忠于“宪法、法律、代表大会、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总统被排除在外并非偶然）。大会还听取了宣称忠实于宪法的各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发言。

总统和议会关系的危机继续发展。宪法法院院长瓦·德·佐尔金（В. Д. Зорькин）呼吁双方达成妥协，尽快进行磋商，以摆脱目前的困境。12 月 12 日，大会通过了由九项内容构成的《关于稳定宪法制度》的决议。根据这项决议，4 月 11 日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而已经达成的对宪法的修改案则被冻结。

实际情况

政府总理通过投票程序来任命。

叶利钦回忆道：“各代表团提出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盖达尔、斯科科夫（Скоков）、切尔诺梅尔金（Черномырдин）、卡达尼科夫（Каданников）、舒梅科（Шумейко）、彼得罗夫（Петров）、希扎（Хижа）、特拉夫金（Травкин）……我从这些名单中选出 5 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夫和舒梅科。接着，就像象棋选手常说的稳扎稳打，开始投票表决。斯科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两个人遥遥领先，分别获得 637 票和 621 票，盖达尔获得 400 票，比卡达尼科夫多 1 票，位列第三。”



总统提名切尔诺梅尔金为候选人，后者获得721张支持票，并于1992年12月14日当选总理。

1993年3月，双方达成的妥协被第八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3月10—13日）打破。没有指定要进行全民公决。叶利钦总统在3月20日的电视讲话中说，他将签署《关于克服危机前的特别行政办法》命令。3月23日，宪法法院认为总统的行为构成启动弹劾程序的根据。3月26日，第九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中进行了弹劾投票表决。总统命令警卫队的领导人亚·科尔扎科夫（А. Коржаков）做好驱散会议的准备。

实际情况

亚·科尔扎科夫这样回忆这一经历："一昼夜之后总统得悉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先把代表们从会议厅，然后是从克里姆林宫中驱逐出去。根据计划，有关在弹劾时刻解散代表会议的命令应装入封好的信封内。统计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如果弹劾成立），军官要在翻译室以坚决的语气通过扬声器宣读总统命令。如果代表们在听完命令后拒绝执行总统的意志……那么就把人民代表从室内撵出去。在阳台上放置装有三氯硝基甲烷的桶。这种物质一般用来在熏烟的房间中检验防毒面具，哪怕防毒面具有一个很小的窟窿，实验者必须以比香槟酒瓶塞更快的速度跑到室外。占领阳台的军官们准备遵照命令释放有刺激的物质，自然，任何代表都不可能再思考罢工的事情了。

'烟熏计划'在弹劾程序有可能被通过的情况下对总统更富吸引力：这种方法可以保证百分百的成功，因为代表们没有防毒面具。

每一个参加行动的军官都事先清楚自己在哪里负责把哪一个代表弄出大厅，外面有舒适的汽车等着他们。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毫不动摇地敲定了计划。

3月28日，弹劾投票程序启动。巴尔苏科夫（Барсуков）每五分钟就报告一次投票统计结果……然而，用不着宣读总统命令

了，因为大约在宣布投票结果一小时之前我们就已知道了结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给总统打电话报告说：‘弹劾不会被通过。’叶利钦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让他们在那接着交谈、接着投票、接着发言吧……’”



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新一轮的斗争伴随着把叶利钦逐出政权和解除哈斯布拉托夫职务的无果尝试。

罢免总统的投票失败后，代表大会决定在4月25日就四个关键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1. 您是否信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

2. 您是否满意俄联邦总统和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

3. 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4. 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

宪法法院认为，全民公决的前两个问题具有道德评价性质和政治性质，为了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要求投票人数的多数赞成方可通过。第三和第四个问题的决定具有宪法性质，要求所有选民的多数赞成方可通过。这样就形成分别按第一、第二个问题和第三、第四个问题进行的两种统计得票率的方法。

全民公决如期举行，约64%的选民参加了投票。58.7%的投票者表示信任总统，53%的投票者表示赞成社会经济政策。提前终止总统和人民代表全权的建议未获通过。俄罗斯人民要求政府继续工作并寻求妥协。

5月1日，当全民公决的统计结果未完成时，反对派领导的游行队伍在莫斯科与民警发生冲突。一名民警军官在冲突中丧生，游行人群中有人受伤。“流血五月”是新的危机尖锐化的前兆。

总统叶利钦把全民公决的结果视为自己的政治胜利和总统比人

民代表大会更具合法性的证明。但是此时他没有尝试用武力解决持续的冲突，而是通过改革宪法解决。总统和政府在全民公决之后马上开始积极着手新宪法的起草工作。

1993 年之前的宪法在直接的法律基础上以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和宪法法院的全权制约了总统权力。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希望扩大总统的全权，缩小最高苏维埃的权力。通过加强俄罗斯市场和民主发展道路的新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特有权力。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及其拥护者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政权体制。

8 月叶利钦宣布将采取对于通过新宪法十分必要的“坚决措施”。他同时说，9 月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事件。

1993 年 9 月 21 日，叶利钦下达第 1400 号总统令，宣布解散最高苏维埃并进行新的议会选举。总统令还建议宪法法院在新的议会选举之前中止自己的工作。

宪法法院认为第 1400 号总统令为非法，因为宪法没有授予总统这样的权力。最高苏维埃也宣布叶利钦的行为违宪。不少代表聚集在位于红普列斯尼亚滨河大街的最高苏维埃大楼（现在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即白宫）中，许多人在危机爆发一开始就来到这里。他们宣布解除总统权力。根据议员们的决定，副总统鲁茨科伊于 1993 年 9 月 21 日晚进行总统就职宣誓。

9 月 23 日第十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组建新政府。代表们首先任命了各强力部门的部长。

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亚列克西二世多次试图使矛盾双方议和，以避免流血冲突。但是社会状态异常紧张，双方政治家使事件发展到公开冲突。

白宫被民警包围，水电被切断，通道被铁丝网所堵。来自各个反对派组织的非法“总部”的志愿者给抗议者送去食物。

莫斯科的骚乱发展成为军事冲突。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于 1993 年 10 月 3 日，当天数千个游行者和最高苏维埃的拥护者在与民警

的冲突中取得胜利。骚乱开始从白宫蔓延到首都其他区域。反对派的武装队伍从10月3日夜里试图占领“奥斯坦诺基”电视中心，企图解除位于“红普列斯尼亚”地铁站区和“1905年大街”的民警分局的武装，但都没有成功。

10月4日早晨，叶利钦的拥护者组织了一支联合突击队。在民警防暴队的掩护下这支队伍从坦克上向白宫射击，“阿尔法”特别分队占领了被烟火熏黑的大楼。这场危机也带来了流血牺牲。

在冲突中有28名军人和内务部工作人员及100多名公民死亡：12人死在大街上，45人死于“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区域，75人死于对“苏维埃大楼”进行射击和突击的过程中。1993年10月3日和4日是俄罗斯历史上悲伤和黑暗的日子……

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界的代表对这一事件评价不一。

许多人赞同总统的行为，但不少人认为他们是违反宪法的政变。俄罗斯公民对这一事件忧虑不安，这在随后进行的选举中有所反映。

不久，不仅最高苏维埃被取消，而且所有地方苏维埃也被取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徽被双头鹰国徽所代替。

观　点

1993年9—10月事件引起了有关合法性和正当性理解的冲突。叶利钦的行动并不合法（按照法律字面意义理解，总统犯了刑事罪——国家政变），但是却是正当的——在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俄罗斯人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最高苏维埃的行动虽然合法，但却不具备正当性。

美国国务卿沃·克里斯托弗对1993年十月事件这样评价：“叶利钦总统除了诉诸武力外，别无他法。他的行为完全正当。”



30. 1993年的选举与持续不断的政权危机时期

用武力方式解决总统和议会的冲突消除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危机。1991—1993年这一阶段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其最重要意义在于排除了那些可能有助于恢复苏联或者在俄罗斯框架内保留苏维埃制度的所有重要势力和权力机关。到1993年底这一问题被新的政权解决。

虽然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再，苏联复辟的根源也被消除，但是国内政治紧张的局势并没有停止。很多权力执行机关的首脑（通常是总统）解散议会后发生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多次出现的。在这些情况下通常的出路是实行专政。然而这条道路对于俄罗斯却是行不通的，新的领导是打着民主口号上台的，这限制了实行专政所需的足够资源。叶利钦并非军人，又不可能实行军事独裁。此外，在危机期间，军队虽然表示对总统忠诚，但是行事消极，总体上袖手旁观。类似于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也被排除在外，叶利钦没有政党，支持他的民主运动排斥组成政党的形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排除了公开专政：俄罗斯政权受控于西方，西方不会允许事态朝专制方向发展。

这限制了叶利钦及其战友选择“控制政权”的方式。“控制政权”只有保存民主的形式才能做到。民主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无论选民在议会选举中如何投票，政府都将是由总统任命的政府。

1993年12月12日经全民投票（之所以称全民投票而非全民公决，是为了回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法》中的规定，即宪法的改变须所有选民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通过的宪法奠定了俄罗斯国体的法律基础，这一国体以后苏联体制和市场经济为特点。

1993 年 12 月 12 日，进行了全民投票和新一届议会的选举。二者同时举行具有一定风险性：如果投票支持宪法的选民没有超过选民的 50%，议会选举就不合法，新的立法权力机关的工作就无法展开，这使社会情绪更加紧张。不过事情进展顺利！54.8% 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58.4% 的人支持新宪法。1993 年 12 月 25 日，选举结果和通过的宪法内容公布，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正式生效之日。

新的政体在俄罗斯联邦形成。基本法律可以防止国内战争爆发和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解体。

在同时进行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中，弗·沃·日里诺夫斯基（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削弱了总统的威信和在 1993 年 10 月 3—4 日事件之后成为起积极作用的反对派的俄共的势力。日里诺夫斯基党的胜利表明，社会对爱国主义有巨大的需要。

1993 年宪法生效之后，俄罗斯成为总统—议会制共和国。根据新的体制，俄罗斯联邦的立法权由议会——两院组成的联邦会议行使。下院，即国家杜马由俄罗斯公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上院，即联邦委员会由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地方的立法权由俄罗斯人民选出的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立法会议、杜马等等）。

由政府主席领导的俄罗斯政府行使执行权。联邦各部门和局组成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机构。在联邦主体一级，执行权力由各个主体的执行权力机关行使（政府、行政机关），其领导人是州长、行政首脑和各共和国的总统等。

司法权由最高联邦法院（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联邦法院（诉讼法院和仲裁法院）及联邦主体法院（调解法院、宪法法院和法定法院）组成。

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国家权力系统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总统不属

于三大权力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总统是国家的首脑，是俄罗斯联邦宪法、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证，决定国家内外政策方针的基本方向，在各个领域颁布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总统凭借专门的协商程序，成为联邦政府与地区政府之间及联邦主体政府之间分歧的仲裁者。总统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领导所有强力机构。

需要补充一点：选民在相对自由的选举中（重要的是这一选举被视为是自由的），在形式上存在另外的选择对象的情况下，应该投票选叶利钦。

为此就要争取精英阶层的支持。或者甚至干脆制造一个完全依赖于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私有化成为使精英重新团结在政权当局周围的手段。自然，当局实行的私有化不受社会监控，催生出国家机关与新的大型私有者阶级的复杂结合，结果政权与私有者互相包庇。精英普遍关心保住叶利钦政权，因为如果反对派掌握政权，他们就会重新审视这种私有化的后果。

这种不稳固的局势最终一定会导致对抗。国内的气氛从1994年2月开始日趋紧张。杜马在1994年2月23日的决议中发出公开挑战，宣布对1993年9月21日至10月4日事件涉及的人实行大赦。反对派针对总统关于公民和解的倡议，发起“和睦俄罗斯”运动。该运动的创始人有亚·鲁茨科伊、阿·卢基扬诺夫（А. Лукьянов）、瓦·佐尔金、阿·图列耶夫（А. Тулеев）、根·久加诺夫（Г. Зюганов）、谢·巴布林（С. Бабурин）、斯·戈沃鲁欣（С. Говорухин）。1995年夏，国家杜马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并试图弹劾总统，但没有成功。

同时，俄罗斯社会对苏维埃时代简朴、但安全的生活日益怀念，对俄罗斯丧失了世界地位的怨愤情绪上升。这种社会情绪保证了尚未从国家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共产党人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自由派开始失去选民。这意味着，叶利钦总统及其政府得不到议会的支持来贯彻市场改革方针。

总统的威信继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一系列原因所导致：政府军在北高加索采取军事行动，大肆宣扬的改革并未取得成效，腐败增加，经济指标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下降。叶利钦实际上丧失了选民的信任，1996 年初他的支持率不到 4%—5%。此外，众所周知，叶利钦的健康状况非常严重。在 1996 年的总统大选中，提出重拾苏维埃时代价值观的久加诺夫具备了取胜的一切条件。

然而大多数选民虽然对叶利钦政府的改革结果不满意，但也不愿并认为不可能恢复旧的苏维埃体制。1994 年，据全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70% 的选民认为不可能回到 1985 年之前。因此，叶利钦可以求助于一半以上选民不愿回到过去和 2/3 以上公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叶利钦调动国家机器的所有力量，利用在大规模的资本私有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庞大资源，展开积极的竞选运动并取胜。安全会议秘书亚·伊·列别德（А. И. Лебед）在第一轮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几乎 15% 的选票，他的战略配合使有利形势向叶利钦一方倾斜。

此外，久加诺夫和俄共的领导人很清楚，永远都不会让在竞选中打出“审判叶利钦一伙人”口号的反对派掌握政权。这样的反对派取得胜利将意味着内战的爆发。3 月，俄共的杜马党团得到证实，如果国家杜马通过了废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的《别洛韦日协定》的决议，总统准备采取强力措施，将下令解散杜马，禁止俄共活动，并将总统选举日期推至 1998 年。叶利钦之所以没有签署这些命令，是因为内务部部长阿·库利科夫（А. И. Куликов）宣称，内务部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实施这些措施，而竞选总部领导人阿·鲍·丘拜斯则有把握地说，会赢得选举。三年之后这些事情才公之于众，当时库利科夫在媒体上公开刊登了自己的部分回忆录。但是俄共领导人在 1996 年 3 月就已得知这些，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之间的 16 天中，当叶利钦还因心肌梗塞躺在病床

上时，当丘拜斯的两个助手随身携带用复印纸包好的50万美元现金被拦截在白宫的通道上时，久加诺夫行动消极，没有利用手中握有的任何一张王牌来赢得选举。从本质上讲，反对派帮助叶利钦赢得了大选。

包含有“革命”的、但无力上台执政的反对派的政治体制必定危机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自身的特殊情况使难以避免的矛盾更加尖锐，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充分履行总统职责。政府出现新一轮的人事变动。1994年有20个政府成员分别被任命和解职，1995年有11个，而1996年政府几乎被重组（只有总理留任），1997年政府改组，1998年一年之内有三届政府相继更替。

同时代文献资料

■ 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

问题：你是否接受俄罗斯联邦宪法？

选民登记人数——106170835

发出选票数——58174707（54.79%）

有效选票——56368956（53.09%）

赞成票——32931018（占有效选票总数的58.42%；占发出选票总数的56.61%）

反对票——23437938（占有效选票总数的41.58%；占发出选票总数的40.29%）

■ 1993年12月12日全联邦选区选举结果

选民总数——106170835

发给选民的选票数——58187755（54.81%）

投票箱中符合规定格式的选票数——57697698

有效选票（百分比统计基础）——53751696（占选民总数的50.63%）

1993年12月12日各选举联盟得票数

（按递减顺序排列）

排名	名　称	得票数	得票率（%）	获得杜马席位数
1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12318562	22.92	59
2	俄罗斯选择	8339345	15.51	40
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6666402	12.40	32
4	“俄罗斯妇女”政治运动	4369918	8.13	21
5	俄罗斯农业党	4292518	7.99	21
6	亚博卢集团	4233219	7.86	20
7	俄罗斯统一和谐党	3620035	6.73	18
8	俄罗斯民主党	2969533	5.52	14
9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	2191505	4.08	
10	稳定公民联盟	1038193	1.93	
11	俄罗斯未来——新人	672283	1.25	
12	“雪松”建设性生态运动	406789	0.76	
13	“尊严和仁慈”运动	375431	0.70	
14	反对所有政党	2267963	4.22	

1995年12月17日全联邦选区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结果

选民总数——107496856

参选人数（根据发给选民的选票数决定）——69614693（64.76%）

1995年12月各选举联盟得票数

（按递减顺序只列举得票率超过3%的）

排名	名　称	得票数	得票率（%）	获得杜马席位数
1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5432963	22.30	99
2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7737431	11.18	50

3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7009291	10.13	45
4	亚博卢集团	4767384	6.89	31
5	俄罗斯妇女	3188813	4.61	
6	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争取苏联	3137406	4.53	
7	俄罗斯公众大会	2980137	4.31	
8	劳动者自治党	2756954	3.98	
9	俄罗斯民主选择——联合民主派	2674084	3.86	
10	俄罗斯农业党	2613127	3.78	

■ 俄联邦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1996年6月16日）

选民总数——108495023

参选人数——75744553（69.81%）

鲍·尼·叶利钦	26665495（35.28%）
根·安·久加诺夫	24211686（32.03%）
亚·伊·列别德	10974736（14.52%）
格·阿·亚夫林斯基	5550752（7.34%）
弗·沃·日里诺夫斯基	4311479（5.70%）
斯·尼·费奥多罗夫	699158（0.92%）
米·谢·戈尔巴乔夫	386069（0.51%）
马·柳·沙库姆	277068（0.37%）
尤·彼·弗拉索夫	151282（0.20%）
弗·阿·布伦察洛夫	123065（0.16%）
反对所有人	1163921（1.54%）
无效选票	1072120（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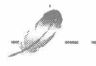
■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1996年7月3日）

选民总数——108589050

参选人数——74800449（68.88%）

鲍·尼·叶利钦	40202349（68.88%）

根·安·久加诺夫	30104589（40.31%）
反对所有人	3603760（4.82%）
无效投票	780592（1.05%）



31. 分离主义与俄罗斯解体的危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状况明显复杂化。停止与西方对抗这一积极因素的作用开始被削弱，因为盟国中的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体，它们根本不想做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

苏联解体后要求建立明确的俄罗斯民族国家体制。根据现行宪法，国家采取联邦制。领导人也尝试缓和尖锐的民族国家问题。1992 年 3 月在莫斯科签订了联邦条约。根据这一文件，俄罗斯联邦由 89 个主体（21 个共和国、6 个边疆区、49 个州、10 个自治区、1 个自治州和 2 个联邦市）构成。本质上说，形成了“条约联邦”模式，即按照美国的方式构建国家。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只有在联邦条约各主体同意其建立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这种模式不仅与俄罗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经多个世纪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不相符，而且与现实情况也相矛盾，现实情况是在俄罗斯 89 个地区中，66 个地区是由叶利钦总统任命的州长治理。这种模式还暗含着另一危险，即这种模式在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仍处于“过渡”状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而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仍未形成。然而车臣和鞑靼斯坦拒绝签署条约，巴什基尔在签署条约的同时附带了一系列补充议定书。联邦中央向地方作出了重要让步。

然而中央的让步被理解为软弱，地方的独立倾向有增无减。

边疆区和州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例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与其相邻的州的地域上，宣布成立乌拉尔共和国。1993 年车里雅宾斯克州苏维埃出于同样的目的提出了南乌拉尔共和国问题。

在旧的自治共和国中出现的分离主义情绪反映在制宪会议中，当时提出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提案，如建立由若干个民族共和国和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联合所有的边疆区、州、自治区和自治州。这一方案由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 K. 伊柳姆日诺夫（К. Илюмжинов）提出。在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这种方案将导致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解体。

1993 年 12 月 12 日经全民投票通过的俄罗斯宪法规定各联邦主体在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一律平等，这解决了部分问题。然而，宣言中的一律平等并没有成为事实。实际上联邦当局签署了中央与各联邦主体在管理范围和权力划分方面的协议，后者希望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独立性。结果，一些共和国（巴什基尔、鞑靼斯坦、亚库特）得到了比其他联邦主体大的多的权力。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行为能力，中央无力阻止这种情况。

1990 年代民族关系持续恶化。统一的国家思想被严重破坏，民族自我意识膨胀。俄罗斯联邦各主体掀起一场更名浪潮：马里埃尔、萨哈、伊奇凯里亚[①]等等。新的名称反映出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

俄罗斯政府未能很好地解决讲俄语居民问题。2500 万俄罗斯人和 500 万俄罗斯其他民族的人居住在俄境外，他们和其他 200 万难民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援。

车臣事件的爆发使联邦危机达到顶点。1991 年 9 月焦·杜达耶夫（Дж. Дудаев）领导的“车臣人民联合委员会”夺取了车臣

---

① 原马里自治共和国改为马里埃尔共和国，原亚库特共和国改为萨哈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改为伊奇凯里亚。——译者注

政权并宣布车臣共和国独立。杜达耶夫对联邦当局持怀疑态度并公开采取行动展示自己的实力：在格罗兹尼驱逐温和反对派，在广场上将斩首刑犯示众等等。从 1992—1994 年几乎每个月，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都有劫持汽车扣留人质，在火车上大肆盗窃，把非车臣居民驱赶出车臣的事情发生。

俄罗斯领导人决定诉诸武力。1994 年 11 月叶利钦总统下令对车臣叛乱实施军事打压，于是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 年）。俄罗斯军方对叛乱分子的力量估计不足。1994—1995 年的冬天进行了争夺格罗兹尼的血战。1995 年夏，武装分子在巴萨耶夫的指挥下占领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医院。紧急调到该市的联邦军队准备进行突击，但是有可能牺牲近一半的人质。总理维·斯·切尔诺梅尔金自担重任，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最终匪徒们撤离了城市，退回到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利用这之后的和平谈判开始为恢复和重新部署军力做准备。

1995 年末，车臣共和国全境的军事行动明显活跃。12 月，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之后武装分子开始向达吉斯坦城市基兹利亚尔进攻，战斗发生在五一城村庄里。1996 年 3 月 6—8 日，叛乱分子向格罗兹尼发起攻击。随后车臣军方在他们控制的居民点开始转向防御行动，对俄罗斯的交通线进行袭击。到 4 月末，联邦军队成功扭转了不利的军事行动。4 月 21 日深夜，伊奇凯里亚共和国总统杜达耶夫被击毙。政府军使武装分子节节败退。

在总统选举前夕，1996 年 5 月 27 日和 28 日，俄罗斯代表团和伊奇凯里亚共和国代表团（鲍·叶利钦总统和泽·杨达尔比耶夫（З. Яндарбиев）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晤。在会晤中双方达成了从 1996 年 6 月 1 日起停战和在两星期之内全面交换战俘的协议。

1996 年叶利钦连任总统后，联邦中央根据安全会议秘书列别

德的建议又一次进行了粉碎叛乱分子的尝试，但是行动没有成功。1996 年 8 月在哈萨维尤尔特（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联邦代表和车臣地方当局签署了关于调解局势的协议。

1996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和约——《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结束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双方协商的结果是结束军事行动，联邦军队从车臣撤出。1997 年 1 月 27 日，马斯哈托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车臣独立成为事实。

但是条约并没有解决问题。车臣领导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在车臣境内出现了恐怖主义基地，其中包括武装分子训练营。他们部署了向俄罗斯境内渗透的恐怖主义组织密使，供应武器和资金。车臣毫不掩饰准备实现 19 世纪伊玛目沙米尔曾周密考虑的计划——先占领达吉斯坦，然后夺取整个北高加索。

在这种情况下，车臣仍继续从联邦中央得到资金。然而从莫斯科得到的钱不是用来恢复共和国的建设，而是用于培训和装备新的军队。

1999 年武装分子进攻达吉斯坦之后，俄罗斯联邦单方面废除《哈萨维尤尔特协议》。

叶利钦制止分裂国家的尝试造成了可以有不同理解的结果。在与反对派连续不断的斗争中，在军队瓦解、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军事行动只会加重危机。情况似乎表明，国家领导人无论是用军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都解决不了车臣问题，车臣实际上已从俄罗斯分离。然而军事行动不仅证明脱离联邦（某一地区从国家中分离）是可能的，而且还证明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战争。这大大抑制了其他地区日趋白热化的分离主义情绪，使为此发热的头脑清醒。俄罗斯地方的分离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边缘化，不再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力量。

32. 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

改革的矛盾性导致19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5%，对俄罗斯经济的投资缩减73%，军工开支缩减84%。1990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5%（苏联时期占8.5%），到1999年的时候，只占1%多一点。

从1990—1998年间，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开采量几乎下降到苏联时期的一半（由原来的每年5.9亿吨缩减为不到3亿吨）。俄罗斯的石油开采水平降到1990年水平的40%。由于私有化后失去了国家的支持，许多企业只能缩减生产。1993年，工业生产下降了25%，农业生产下降了5.5%。由于资金短缺，开始大量拖欠工资。

宏观经济问题和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成为危机频发的原因。1994年出现了“黑色星期二”，在1994年10月11日一天之内，美元汇率暴涨27%，居民对卢布的信任自然大为降低。货币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为解决当前问题政府开始举借外债。俄罗斯的外债持续上升，1992年外债数额为1080亿美元，1998年为1232亿美元。以国家短期债券形式发行的国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1995年国债为1万亿卢布，1998年为10.3万亿卢布。

同时，政府采取了刺激商业积极性的措施。开始了新一轮的私有化。决定按市场价值公开出售公司的所有股份。国有企业尝试进行改革。从1994年7月1日起，取消了对出口商品和服务所规定的限额和许可证制度。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来进行对外贸易，实际上这些都是燃料能源企业。

税收总额缩减，盈利税和增值税下降了10%—12%。为了吸

引外资，政府有意鼓励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并且认为，通过银行系统更容易收集和利用居民资金。

然而鼓励投资并未收到显著成效，金融工业集团却开始进行投机买卖。政府开始发行官方的高息债券（300%），试图弥补预算赤字。同时为了吸引国外资金，政府开始为俄罗斯银行的外债进行担保，这些外债被银行用来购买国家短期债券。金融工业集团和银行买卖的就是这些有价证券。

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寡头成为新社会制度的构成性因素。现在意义上的寡头一词从1997年12月起开始被使用。只有极其少数的一些人被视为寡头，任何一个寡头名录都包括以下八个集团和名字：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弗·波塔宁（В. Потанин）］、洛戈瓦兹集团［鲍·别列佐夫斯基（Б. Березовский）］、桥集团［弗·古辛斯基（В. Гусинский）］、梅纳捷普［米·霍多尔科夫斯基（М.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首都储蓄—农工集团［阿·斯摩棱斯基（А. Смоленский）］、阿尔法集团［米·弗里德曼（М. Фридман）］、天然气工业集团［列·维亚希列夫（Р. Вяхирев）］、卢克集团［瓦·阿列克佩罗夫（В. Алекперов）］。

俄罗斯寡头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这些寡头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接近政权或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篡夺政权的行为。

寡头的出现与两件事紧密相关——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1996—1997年间的私有化交易。

抵押拍卖的实质一目了然。形式上金融家贷款给政府，可是以此得到大型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而这些公司在法律上是禁止被私有化的。显而易见，实际上政府也不准备偿还这些贷款——预算中没有计划偿还这笔债务。一年期满后，抵押的股票就转到债权人名下。这样，绕过现行法律，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仍在运作和盈利的企业就这样在事实上被私有化了。

抵押拍卖的想法是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的领导人波塔宁提出的。

实际情况

丘拜斯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样的私有化呢？只有这种私有化才能以某种荒诞的方式把众多反对者中的某些人变成我们的支持者。很明显，在这一阶段，私有化企业的经理并不会变成我们的支持者……这意味着，买家是我们潜在的同盟。怎样才能让他们慷慨解囊呢？此时波塔宁就向政府提出了抵押拍卖的建议。我立即明白，我会全力支持这一建议。抵押计划会自动把买家变成我们的拥护者，并给予私有化以新的推动力，使其在最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继续。”



实际上在1996年总统大选前夕，政府通过抵押拍卖赢得了政治上的同盟者。

第一次抵押拍卖于1995年11月3日在苏尔古特进行。科研生产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以890万美元获得了贷款给政府的权力，同时政府把“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40.12%的股票作为抵押。最后一次抵押拍卖是1995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进行，“金融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鲍·别列佐夫斯基、A. 斯摩棱斯基、罗·阿布拉莫维奇（Р. Абрамович）］以1.003亿美元获得了“西伯利亚石油”国有公司的控股额。

“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实际上是被自己的经理购买了，因为收购其股票的科研生产公司是由原公司的组织和人士所创建的。在抵押拍卖过程中股票按照类似方式被抵押的有卢克公司（该公司5%的股票以1.41亿美元被抵押，现在的资本估值为500亿美元）、新俄罗斯海运公司（2265万美元）和纳弗塔—莫斯科

股份有限公司（2011 万美元）。

车里雅宾斯克冶金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的股票以 1330 万美元被抵押拍卖给地方金融工业集团“拉比科姆”。其余七个企业转到大型银行手中，拥有者被称为寡头。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国际金融集团得到了作为抵押的“诺利尔斯克镍”公司（以 1.701 亿美元）和远东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与阿尔法集团共同以 1.3 亿美元购得，1998 年以 5 亿美元出售了该公司的 10% 的股票）的控股额，以及西北河运公司的封闭式股票（以 600 万美元）和新利佩茨克冶金联合公司的股票（以 3100 万美元）。梅纳捷普银行获得了尤科斯（以 1.59 亿美元，尤科斯公司最大资本估值为 266.2 亿美元）和摩尔曼斯克海运公司（以 412.5 万美元）。

所有抵押拍卖的参与者都积极地资助叶利钦竞选 1996 年总统选举。1996 年 3 月，据当时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4% 的选民准备投票支持叶利钦，久加诺夫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总统与七大俄罗斯银行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到场的有 B. 维诺格拉多夫（B. Виноградов）（国际商业银行）、弗·古辛斯基（桥银行）、鲍·别列佐夫斯基（公司集团）、米·弗里德曼（阿尔法银行）、弗·波塔宁（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阿·斯摩棱斯基（首都储蓄银行）、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集团）。双方达成了相互支持的协议。这一阶段被称为“七大银行家”时期。叶利钦在总统竞选中花费大量资金，很快吸引了不少政客、歌手、音乐家、演员和记者，还动用了电视和广播。结果，叶利钦的支持率迅速蹿升到足以制胜的数字。

1996—1997 年，出现了新一轮的公开的丑陋的私有化违法交易现象。这一次克里姆林宫把国家财产分给了那些帮助叶利钦重新掌权的人。1996 年 11 月 22 日，“违法交易年”形成（根据《商人—金钱》杂志的说法）：首都储蓄银行（法定资本为 240

亿卢布）在整顿农工银行（1995年前叫做“俄罗斯农业银行”）的竞争中胜出，后者根据法定资本额（1300亿卢布）和居民储蓄额是俄罗斯第三大银行，其分行数量（1200个分行）在俄罗斯排第二位。

1997年东方石油公司被私有化，按照时间顺序该公司是俄罗斯第四个石油公司，年产石油量达1100万吨（不计东方石油公司产油量，尤科斯年产石油量达3400万吨）。政府计划通过拍卖该公司至少获得20亿美元。该公司84%的股票被分为两部分拍卖——专项资金拍卖（竞拍者投入资金，股票按投资比例划分）和普通拍卖。梅纳捷普、国际金融集团、卢克集团纷纷申请参与专项拍卖的申购（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然而组织拍卖的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的官员们认为国际金融集团和卢克集团所递交的申请不符合规定，最终梅纳捷普以7.5亿美元得到了该公司的控股额。这以后，东方石油公司的普通拍卖连续两次被中断——当51%的股票已经转到尤科斯手中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竞争者不想为了34%的股票再掏钱，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也不准备为此再花费5.2亿美元（初始价格加上东方石油公司的欠款已接近其预算）。1998年国家财产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和财政部完成了对股份公司乌斯季伊利姆斯克森林工业综合体、远东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秋明石油公司、托木斯克能源综合体、奥伦堡石油股份公司、东方石油公司的国有股份与商业银行梅纳捷普股份的交换。梅纳捷普的股份实际上并非物有所值，但是与其交换得来的股票却具有很大的价值——俄罗斯最大的森林工业综合体之一和五个石油公司的股票。

最大的私有化丑闻是对通信投资公司控股权的竞争（该公司掌握88家电视通信公司的控股额，为3000万有线通信的客户服务，其中包括俄罗斯主要的国际和城际通信公司“俄罗斯电视通信”）。25% +1的股票的初始价格被定为11.18亿美元。塞浦路斯

离岸金融公司 Muscom Ltd 和 БВ 电视公司（与荷兰电视通信公司同名，隶属于阿尔法集团、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递交了申请。塞浦路斯离岸金融公司是由俄罗斯复兴—资本投资公司（该公司的经理 B. 乔丹加入了俄罗斯联合进出口—国际金融集团）、一个塞浦路斯公司和一个来自泽西群岛的公司（后来才清楚该公司属于索罗斯名下）共同成立的。Muscom 公司以 18.75 亿美元的出价胜出，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通过媒体指责竞拍的组织者协助了胜出者——Muscom 递交申请稍晚一些。寡头们大肆利用具有重要影响的电视台——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进行炒作。1996 年总统选举后，隶属于古辛斯基“桥媒体”的独立电视台，获得了 1/4 米频段的在任何节目时间播放节目的许可。虽然俄罗斯公共电视台 51% 的股份属于国家，实际上其小股东别列佐夫斯基（握有 8% 的股票）掌管着电视台的资金，并具有实际控制权。这两个电视台都掀起了反政府的信息战，一些被其指责涉嫌腐败的部长不得不辞职。

1996 年国家通过抵押拍卖实施的借贷机制导致了无法避免的危机。银行获得国库券的同时贷款给国家，然而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加，对国家偿还能力的信任逐渐下降，为此国家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由于大量外债，俄罗斯开始受制于贷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实际上由美国所操控，每一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

1997 年，根据第一副总理丘拜斯的倡议，政府开始实施财政紧缩政策——预算支出项目急剧削减。但是这些措施没有扭转经济的发展趋势。1997 年经济出现了短暂好转的症状，但只涉及一些再加工和原材料领域。1998 年之前，俄罗斯实际的国内总产值是 1990 年水平的 57%，经济衰退特征比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表现更明显。

1998 年以前国家饱受巨额债务拖累。国际局势加重了危机，并在俄罗斯表现出两种致命的趋势：第一个是 1997 年秋天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市场摇摆不定，许多公司的股票纷纷开始下跌，投资者把资金投向欧洲和美国更为可靠的市场。俄罗斯卷入这场风暴，投资开始从经济领域中撤走，这意味着国家税收的减少、生产的下降和无法完成预算。第二个悲剧表现为，从 1998 年开始石油价格急剧下降，每桶价格一直滑到 10 美元以下，在俄罗斯开采石油变得不合算。

俄罗斯精英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问题上，忽视经济问题的解决，这成为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谢·弗·基里延科（С. В. Кириенко）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直到 4 月末，杜马经过第三次的审议才通过对其的提名。到 1998 年 5 月中旬，新一届政府才组建，解决危机的上好时机已经错过。由于政府更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 月末才达成 1998 年财政纲要的协议，这使市场表现摇摆不定，信任危机加剧。

债务负担急剧加重，这主要是因为短期国债利率的提高。1998 年夏，政府应支付的内外债共计 600 亿美元。截至 1998 年 3 月末，拖欠退休金额约 10 亿卢布，国防订购债务达 170 亿卢布。而这段时间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的 200 多亿美元。

此外，俄罗斯还承担着苏联的债务。急剧衰退的经济状况迫使政府作出延期偿还债务的请求，西方不得不同意。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起与伊拉克、古巴、利比亚及其他苏联传统盟友的关系就开始恶化，因此不太可能期望他们偿还对苏联的欠债。此外，1997 年俄罗斯承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对法国的俄国有价证券持有人的债务，尽管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赔偿。债务总额（加上利息）达 1300 亿美元，债权人分别是国家组织和私人有价证券持有者（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

1998 年 8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最

终对外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货币贬值（政府破产）和无力偿还债务。此外，还暂停商业银行向国外投资者支付债款。这一决定与国家利益无关：国家欲通过这一行动来保护由个别人士组成的范围极其狭窄的集团——银行所有者。这是史无前例的丑闻。8月23日叶利钦解散基里延科政府，金融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1998年9月叶·马·普里马科夫（E. M. Примаков）出任政府总理。

同时代文献资料

■ 1998年8月17日政府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联合声明

由于对外经济形势的恶化和预算收入不善，国家债务管理问题日益尖锐。在低水平税收的情况下偿还以前所发行的公债券及利息成为国家预算的重负。俄罗斯政府在缩减联邦预算开支、对外举债的情况下被迫削减内债。7月，政府的经济纲要得到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发达国家的支持。

然而亚洲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世界石油价格的继续下跌阻止了对俄罗斯有价债券的信心回复，预算危机未能缓解，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减少，银行体系处境困难。

因此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银行认为有必要采取综合措施使金融和预算政策正常化。

1. 从1998年8月17日起，俄罗斯银行开始实行外汇走廊新界限内卢布浮动比价政策，新界限为1美元兑换6—9.5卢布。为了平息卢布汇率的剧烈摆动，俄罗斯银行将采取干预措施。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俄罗斯银行将运用汇率政策。

2. 1999年12月31日前（含31日）到期的国家有价债券（短期国债和联邦公债券）将改为新的有价债券。兑换的技术参数将于1998年8月19日，即星期三公布。国家有价证券的重整结束之前，停止短期国债券和联邦公债券市场上的交易活动。

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例规定，政府和俄罗斯银行暂时限制俄罗斯联邦的侨民进行资本性质的外汇交易活动。从1998年

8月17日起，宣布对非俄罗斯联邦的侨民那里取得的金融贷款的还款、以有价证券抵押贷款的保险费、定期外汇合同付款，实行为期90天的延期支付。同时禁止非俄罗斯联邦侨民对卢布资产进行为期1年（含1年）的投资。



33. 1998—1999年危机

由于1998年8月17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贷款，所有俄罗斯银行濒临崩溃，一些大型银行破产。以卢布计算，居民在商业银行中的存款缩减了15%，实际损失了52%。存款人无法从商业银行取回自己的资金，消费品的价格大幅上升，许多公司破产，属于所谓中产阶级的几十万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

尽管如此，卢布的三次贬值使经济开始恢复。卢布的贬值为本国产品与进口商品竞争提供了机会。1999年初，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出现了一些回缓现象，生产开始增长，尤其是在大众消费品和饮食领域中。税收开始增加。

叶利钦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根据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从1996年开始。寻找接班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集团斗争日益尖锐。

观　点

任何一个没有建立明确权力交接机制的制度，权力的更替总是伴随着危机和残酷的斗争。君主制度通过一定的王位继承制、民主制度通过选举来进行权力交接。苏维埃体制的权力交接机制比后苏联时期更加明确和程序化（政治局选出党的领导人，然后经中央全

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尽管如此，每一次的权力更替都伴随着领导层的斗争和分裂。在后苏联的俄罗斯体制中，始终缺少一种能够形式上确定继任者的机构。在1993年宪法中，叶利钦希望能够支配所有的权力机构，取消了由选举产生、因而也相对独立的副总统一职。由总统本人任命或解职的政府总理成为在总统辞职或死亡情况下临时掌权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这导致政治局势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总统具有在确定继任者方面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切尔诺梅尔金被解职后，政府总理的频繁更迭就反映出叶利钦的这种考虑。

危机进一步扩大。俄共为迫使叶利钦提前辞职开始斗争，并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中组织了表决。叶利钦宣布“绝不辞职”后，俄共倡议启动弹劾程序（指由于刑事指控被解职）。同时，为了选出不受制于叶利钦的接班人，精英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祖国”运动（由尤·米·卢日科夫（Ю. М. Лужков）领导）和“全俄罗斯”运动（由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明·沙·沙伊米耶夫（М. Ш. Шаймиев）领导）的成立就是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表现。卢日科夫为成为总统候选人进行着日益明显的准备活动。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是另一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杜马进行弹劾表决前夕他解散了普里马科夫政府。罢免总统的尝试中断后，叶利钦提名内务部部长谢·瓦·斯捷帕申（С. В. Степашин）为政府总理候选人。士气低落的议会代表们立即同意了总统的提名。

然而危机并未就此平息。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后与卢日科夫联合，成立了“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精英和上层的分裂显而易见，俄罗斯处于新一轮的危机边缘。

此时，对于那些试图改变北高加索局势的冒险家是极其难得的好

机会。1999年8月2日，车臣武装分子向达吉斯坦发动侵袭。恐怖行动的策划者和始作俑者——巴萨耶夫（Басаев）、哈塔布（Хаттаб）、乌马罗夫（Умаров）宣布达吉斯坦独立（包括共和国的博特利赫区和楚马金区）。侵袭的目的是建立“从海到海的沙里亚国”。

曾试图与达吉斯坦的瓦哈比教派①达成妥协的斯捷帕申总理于8月9日被解职。持不妥协态度的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叶利钦公开宣称普京为自己的接班人。

8月10—26日在达吉斯坦展开了打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恐怖分子被击退回车臣。达吉斯坦人民对恐怖分子的侵袭进行了抗议，他们迅速组织了2万人的民兵团，与部分联邦军队一起击退了恐怖分子对共和国的进攻。

实际情况

达吉斯坦人民诗人拉苏尔·卡姆扎托夫（Расул Гамзатов）在接受《达吉斯坦传媒新闻》采访时（1999年8月27日至9月2日）说：“发动侵袭的侵略者对我们宣称，他们想把我们从俄罗斯人手中解放出来，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想把达吉斯坦从达吉斯坦人手中夺走。怎么能够口中说着伊斯兰教的教义，而手持武器占领别人的家园，甚至是与国际恐怖集团为伍？〈……〉在这点上我更欣赏哈吉·马哈切夫在哈萨维尤尔特发表的告民兵书。他说，那些来到我们土地上似乎是来建立伊斯兰教的人实际上与信仰没有丝毫关系。不然如何解释今天在车臣所发生的事，难道所有人都是谨遵伊斯兰教法典生活？到处都是被劫持的人质，国际慈善组织的代表被恶意杀害，恐怖主义学校培训如何杀人——难道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成就？”

① 瓦哈比教派，产生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伊斯兰教宗教政治派别的信徒。——译者注

不甘心失败的恐怖分子又转而对善良的民众发动了战争。1999 年 9 月 4 日在布伊纳克斯科，一座民宅被炸毁。9 月 9 日，莫斯科古里亚诺夫大街发生了民宅爆炸事件。9 月 13 日，卡申公路上的一座房子被炸毁。1999 年 9 月 16 日，恐怖分子在伏尔加顿斯克炸毁了一座民宅。9 月 17 日，政府总理普京称，在哈萨维尤尔特签订和约是一个错误。9 月 23 日，叶利钦发布了关于在车臣进行军事行动的命令。1999 年 10 月 18 日前，联邦军队包围了格罗兹尼，并为善良的居民备好撤离城市的通道。

竞选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反恐行动同时展开。尽管一些电视台大肆宣传应给予车臣自由和停止军事行动，俄罗斯人民仍表示支持联邦当局的行动。人民的支持明显表现在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信任率的上升中。8 月，当普京成为政府总理时，其支持率为 10%。10 月，武装分子被赶出达吉斯坦，反恐行动在车臣开展后，普京支持率上升到 20%。联邦军队成功消灭了恐怖分子和武装分子，格罗兹尼被包围，国家领导人在消灭犯罪集团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1999 年 11 月末，普京的支持率上升到 45%。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之所以如此高，主要是因为他在打击北高加索的恐怖主义和犯罪分子方面采取果断行动，政府在未来总统的领导下积极着手解决经济问题。1999 年秋，退休金欠款完全偿清。尽管车臣仍在进行反恐行动，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稳定了外汇市场，降低了失业率，甚至减少了工资欠款。正是与恐怖主义的战斗给予了普京强大的社会支持，也正是凭借这种支持，未来的总统才能够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2000 年 2 月 7 日，格罗兹尼被攻克，但在车臣的武装行动仍在继续。2000 年 3 月 20 日，弗拉基米尔·普京乘坐歼击机飞抵格罗兹尼。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抵抗被镇压下去了，开始恢复了正常生活。2000 年 6 月 12 日，艾哈迈德·卡德罗夫（Ахмат Кадыров）

被任命为车臣临时行政首脑，这是向当地人民移交权力和恢复和平生活的第一步。

同时代文献资料

■ 1999年12月19日联邦选区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结果

选民总数——108073956

参选人数（根据发给选民的选票数量决定）——66840638（61.85%）

■ 各选举联盟得票数（递减排列）

排名	名　称	得票数	得票率（%）	杜马议席数
1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6196024	24.29	67
2	团结党（熊）	15549182	23.32	64
3	祖国—全俄罗斯	8886753	13.33	37
4	右翼力量联盟	5677247	8.52	24
5	日里诺夫斯基党团	3990038	5.98	17
6	亚博卢	3955611	5.93	16



34. 叶利钦总统时期的对外政策

在叶利钦改革时期，俄罗斯为了打破划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界限迈出了非常重要的步伐。1993年以前，西方在国际关系生活中的关键问题上从未听到俄罗斯说“不”。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安·科济列夫（А. Козырев）公开表示：“如果华盛顿的对外政策更

好，我们为何还需要自己的对外政策。”

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有意推进北约东扩之后，俄罗斯的外交开始发生转折。这对俄罗斯非常意外，以至于叶利钦在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对此表示“毫不反对”，但在回到莫斯科后又宣称“冷战”的到来。1994—1996 年期间，俄罗斯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何会使力量得到加强的西方军事同盟惧怕。1990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非同盟化宪章，华沙条约就此消失。但是为何北大西洋联盟仍继续扩张？

北约继续扩张，欧盟成员数量不断增加，俄罗斯在欧洲的真正地位问题被尖锐地提出。远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能容易理解对一个强大欧洲国家的忽视。

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未停止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进程，但感到越来越难以与美国保持平衡。当美国总统老布什迅速从戈尔巴乔夫转向叶利钦之后，他的做法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为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他向俄罗斯领导施加压力。叶利钦则向所有人表示，现在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基础不是威慑武器，而是持续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1992 年 2 月，在布什和叶利钦的第一次高层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的具体问题，但统一的文件在 11 个月后才完成。

根据《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双方同意削减 2/3 的潜在的战略核力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规定削减 1/3），在地方设置检查机构，并规定在 2003 年之前销毁所有“重型导弹”（CC-18 和 CC-19 型号）和所有多弹头战略导弹。条约规定，在 2000 年之前，陆海空导弹的装药总量应限制在 4250 个以下，2003 年之前为 3000 个。到 2003 年之前，潜水艇弹道导弹的数量应限制在 1750 个以下。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在国家杜马中历经艰难才得

以批准，许多议员不愿放弃超级大国及其自我防卫的最后象征。1995 年，俄罗斯和美国把禁止各种类型核武器试验延长到可预见的未来。

1997 年北约决定吸收 10 个新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并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达成的关于北约不再扩张的条约为依据。但是这些条约只具有口头协议的性质，并没有被充分考虑。

出于双方相互利益的考虑，西方确实不准备公开激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俄罗斯也无力阻止北约的扩张。1997 年 5 月，俄罗斯和北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本文件》。文件规定，双方不把对方视为敌人。但是，这一文件只是一个不包含任何应承担责任条文的宣言。

这一友好步伐很快被西方盟国作出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大西洋联盟传统责任范围外使用武力的决定所破坏——1999 年春南斯拉夫遭到轰炸。事情经过如下。

1998 年，所谓的科索沃危机突然爆发，南斯拉夫政府开始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展开战斗。军事冲突使人民备受煎熬，国际社会要求停止违反人权。然而在这一冲突中，北约国家开始站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一边。西方谴责南斯拉夫种族灭绝行动，并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就于 1999 年 3 月 24 日开始进攻南斯拉夫。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称，贝尔格莱德政府在北约大规模空袭的压力下将于第四天投降，科索沃省脱离南斯拉夫的条件将成熟。然而美国人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坚定性估计不足，在轰炸的第 78 天，当贝尔格莱德仍准备继续战斗的同时，叶利钦政府派切尔诺梅尔金直接迫使南斯拉夫总统斯·米洛舍维奇签署了对西方的投降书。

但就是这样的效劳也未唤起美国领导人把俄罗斯视为伙伴的意愿。俄罗斯希望暂时接管科索沃一小部分领域的要求（为了保护

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免遭镇压）被华盛顿愤怒地驳回。得知俄罗斯部分军队向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开进后，美国方面开始在莫斯科和赫尔辛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这正好是北约军队占领整个科索沃和把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军队完全排除在外所需要的时间。西方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唯一请求，即围绕历史上的斯拉夫修道院和能够为几千名塞尔维亚人提供避难处所以免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解放军侵袭的地方建立飞地的要求。

很快科索沃就被美国及其盟国占领，亲美国政府掌握了南斯拉夫政权。

西方在巴尔干的行动是北约借着保护人权的口号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又一次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俄罗斯精英认为这次行动是对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公开挑战，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被视为北约未来反对俄罗斯联邦及其盟友，首先是白俄罗斯而进行的预演。

这些事件促进了北约的扩张进程。1999 年，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了北约。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国家成为加入北约的新的预备成员。

就在这一年北约推出了新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除集体防御之外，北约准备在北约参加国的领土之外执行其他军事政治使命。

1990 年代末的科索沃危机和车臣武装行动的恢复及其他因素，导致俄罗斯联邦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十年之内第一次出现了西方以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制裁的形式直接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可能。这一切都证明，西方在对俄关系上采取了严重的敌对立场，双重标准政策证实了这种观点。同样是在 1990 年代，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开始积极批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针对车臣和整个高加索地区。但同时，他们长期忽视波罗的海地区讲俄语居民权利遭受侵

犯的现象。



观　点

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的压力下，俄罗斯亲西方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消散，他们对美国的倾向和喜好曾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实施亲美的对外政策方针的思想基础。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树立起正面的西方形象，正是他们为了维护和保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准备冒险与政府机构发生冲突。

根据社会舆论调查结果，如果1993年有近74%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那么十年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到受访者的50%。

俄罗斯倡议的结束“冷战”给从军备竞赛中解脱出来的西方节约了3万多亿美元。俄罗斯从原来的华沙条约国家领土撤回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把东欧变成西方的势力范围。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不再通过同盟者在越南和安哥拉彼此打仗，双方的军队为了维和使命而互相合作。

但是，如果共产主义的消失未使美国和俄罗斯成为朋友，那么我们不得不提请注意俄罗斯政治的华盛顿西方诠释者所推出的第二种解释：“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





观　点

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妥协究竟得到了什么？具体如下：

1. 美国违背间接的许诺，没有为正在进行民主化的俄罗斯提供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援助。在“专制制度”垮台后，在俄罗斯绝没有出现某种新的“马歇尔计划”，即西方对“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的援助。美国人曾慷慨解囊，在1948—1952年间曾对西欧提

供这样的援助，拯救了西欧的民主国家。“马歇尔计划”——1951年的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0亿美元——等于美国2%的国内生产总值，而给俄罗斯的援助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005%。西方实际上并不希望俄罗斯恢复本国的经济。

美国对俄罗斯的援助集中于解除核武装、经济改革和人道主义领域。20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得到了54.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主要用于削减苏联潜在的核力量，在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方面几乎无所作为。留学美国的俄罗斯大学生只有5300名（中国学生则有10万人），其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能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两国间的国际交流萎缩。一切都归结为削减俄罗斯的战略潜力，缩减程度大约为5000枚核武器。

2. 不久前推出的极富吸引力的关于把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能实现。在上万亿美元投资到共产主义中国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相形见绌的资本投入量就是俄罗斯西欧主义者经济幻想破灭的见证。更坏的是，俄罗斯多年来向西方的资本流失供养着西方经济，而使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新的社会群体——新俄罗斯人——并没有成为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相反，这一群体一味讲究实际的思想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起分离作用的因素。

美国只是向俄罗斯提供其雄厚的国内市场很小的份额（这以前让台湾地区和韩国成为经济巨人，现在是中国），就是这小小的份额都没有取消如歧视性的瓦尼克—杰克逊修正案这样的“冷战”象征。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

3. 尽管军事对抗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扩大了北约在东方的行动区域，直逼俄罗斯边界线。1990年7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中这样写道：“北约准备与您在建设新欧洲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总统许诺“逐渐对北约进行改革”。西方至少两次允诺不利用复杂的态势来获取针对东方的地缘政治优势。

政治上的允诺很快被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1994年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北约扩张的可能性取决于原华沙条约组织国

家。美国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给新俄罗斯的外交家们一个严酷的教训，即与“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新思维”相比，更应优先对各方具体的力量进行分析。

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的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付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

严格地说，在北约扩张的情况下，所涉及的不是新加入北约国家的军队是对北约几百万军队的补充，也不是距离俄罗斯边境仅1小时航程的现代机场，甚至不是对那些可以充当进攻莫斯科的桥头堡地区的控制，而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的政策的失败——是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4. 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曾用以隔绝俄罗斯而设置的签证限制很重要。打破“铁幕”和拆毁柏林墙并不是为了要设置新的边界，不是为了阻碍俄罗斯公民前往加里宁格勒，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在“冷战”高峰时期去西柏林那样。关于统一的文化空间和今天买票明天就可到达柏林、巴黎和伦敦的梦想，因签证障碍而破灭。西方和东欧严格的签证限制严重孤立了俄罗斯，以至于让人不禁又回忆起“铁幕”。俄罗斯在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中被忽视，1991年曾战胜共产党孤立主义而赏识西方的所有看法被改变。



第6章
主权民主

35. 普京总统团结社会的方针

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在新年到来前夕向公民宣布自己提前辞职的决定。他在这个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总结了本届政府的工作。

实际情况

叶利钦新年前夕对俄罗斯人民的讲话：

亲爱的俄罗斯人！

到达我们历史上的神奇日期已经剩下不多时间了，2000年即将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岁数来衡量这个日期。从童年时代开始，再到成年时，我们都在估量，到2000年我们的年龄将有多大，我们妈妈的年龄将有多大，而我们孩子的年龄将有多大。有时候会感到，这个不平常的新年离我们非常遥远。

可是这个日子来临了。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发表讲话，致新年的问候。我经过长久的认真的思考，已经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我多次听说——“叶利钦是权力熏心的人，他不会把权力交给任何人。”这是谎话。事实并非如此。我常常说，我坚决按照宪法的要求行事。杜马选举应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我们也这样做了。因此，我希望按时举行

总统选举——在2000年6月。这对于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开创一个文明和自愿交接政权的先例，一个总统把权力交给新选出的总统。最终我做出了另外的决定，我提前辞职。我明白，我必须这么做。俄罗斯必须带着一批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新的聪明能干和年富力强的人进入新千年。而我们这些已主政多年的人应该离开政坛。

当我看到在杜马选举中，人们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和信心投票选举新一代政治家的时候，我明白了，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再回到过去。现在俄罗斯将只会永远前进。

因此，我不应该妨碍这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今天，几乎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还要再执掌半年的权力呢？我为什么要妨碍他呢？为什么还要等半年呢？不，这不是我的想法！不符合我的性格！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重要日子，想要比平常多说几句有关我个人的话。我想请求你们的原谅。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理想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是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非常沉重而艰巨的。我辜负了那些相信我们一下子就能够从灰色、停滞和极权主义的过去跳跃到光明、富足和文明的未来的人们的期望，我为此请求原谅。我自己也曾轻信，认为冲刺一下就可以战胜一切。

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某个方面我显得过于天真。有些问题过于复杂。我们通过错误和失败奋斗着前进。许多人在这个复杂的时期体验了内心的震荡。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这一点，今天，我认为对你们这样讲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中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了我的痛苦，引起我心里的痛苦。不眠之夜，痛苦的感受——为了使人民哪怕只是稍微生活得更轻松或更好一些，应该怎样做？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了。

我将辞职，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辞职不是由于健康原

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接替我的人是新一代人，是能够做得更多、更好的一代人。



俄罗斯总统选举在2000年3月26日提前举行。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把普京说成是实际上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人，这并不是信口雌黄随便说的。在12月份（1999年）普京的支持率为49%，在1月份（2000年）已经增长到55%。

在鲍利斯·叶利钦自愿辞职的前一天，普京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文章，各大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对国家形势的看法和俄罗斯应该发展的方向。政府首脑坦承，19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差不多一半，俄罗斯居民的货币收入降低，公民的健康状况恶化，平均寿命缩短。

那时俄罗斯已经不再属于代表现代世界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它面前摆着一系列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1/10，中国的1/5。在1998年的经济危机后，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不到“七大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平均水平的1/5。

政府总理认为必须从历史经验，特别是从俄罗斯1990年代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根据他的判断，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破坏性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极端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者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住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应当明白，如再来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社会简直就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

第一次宣布说，有责任心的社会政治力量应该给人民制定出一个能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这个战略应当依据在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积极经验，并且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来实施。此外，确立了保持政治稳定的原则和确定要实现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生活条件的稳定。

这样就显出了叶利钦的改革和普京的改革之间的一个原则性的界限。在1990年代的改革进程中奠定了市场经济基础，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牺牲品。“为了改革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可以把这个公式看做叶利钦治国的口号。普京则为自己的国事活动确立了新的原则——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是首要的任务。

2000年2月25日，普京在给选民的一封《公开信》中阐述了上述思想，他决定“不是通过中间媒介，而是简明地说明，我在思考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应当做些什么使生活变好。”作为总统候选人，普京阐述了自己的纲领：“任何纲领都是从提出主要目标开始的。国家的目标要从如何才能团结自己国家的所有公民开始。对俄罗斯公民来说，重要的是他最早在家庭中获得的道德基础，这些道德基础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核心。这是主要之点。没有这个，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没有这个，俄罗斯就无从谈民族尊严，甚至无从谈国家主权。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国家主权远远不是无可争议属于自己的东西。主权的定义众所周知——这是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主权意味着国家自己决定它的国内制度和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然而，实际上远不是所有国家都掌握有主权。相对来说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不仅仅是当代的现象，实际上在全部世界历史上都是如此。

真正的主权要求有独立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要求有本国的、

能不受外部影响并由国家和民族资本控制的银行系统。在现代条件下，国家具有强大的、依赖外债程度不大的财政体系有着巨大的意义。在 1999 年和 2000 年之交，俄罗斯面临外债问题，所以国家主权处于威胁之中。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基本问题是，国家的软弱和不敢做出决定。代总统说，消灭车臣的匪帮政权就是国家意志坚定地做出决定的一个例子。普京指出，俄罗斯缺乏由国家规定的并被社会接受和加以执行的明确规则。他号召对俄罗斯的资产进行清点，以便确定谁掌握什么资产，谁对什么资产负责。最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四个国家优先任务。

“第一个优先任务——战胜贫困……我们总应该对自己说一下：我们是穷人的富国……国家现在还有几百万人勉强维持生计，在各方面节俭，甚至缩食。父母和孩子每年不能筹集到去探亲的路费。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和创造了俄罗斯世界强国荣誉的老人们生活得不好，甚至还有在街头乞讨为生的。

第二个优先任务——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我们今天不仅有义务保障私有权的安全，而且要使企业主免受专断的、不正确的行为对他的活动进行干涉。如果国家不给予保障，这个真空地带很快就会被犯罪集团所占领，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个地带就不能受到国家的保护。

第三个优先任务——为了国家崇高的民族尊严，恢复公民个人的尊严。

第四个优先任务——制定要以国家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就是应当承认外交政策服从于国内事务。我们应该最终学会这一点。”

2000 年 3 月 26 日俄罗斯进行的总统选举结果证明了民众对普京提出的方针的高度信任。普京在选举的第一轮就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时期，新的领导声明，国家不再容忍寡头对国家管理的

干预。2000 年 2 月 28 日在与大资本家的代表会面时，普京讲了政府将平等对待市场各主体的思想。虽然未来的总统在这次会面时让寡头们确信，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正是普京关于政府像对待其他生意人一样对待大生意人的讲话，成为很快就爆发的国家与寡头的冲突的依据。

社会肯定了年轻总统的行为。此外，普京让寡头们远离能影响进行决策的权力机构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居民的支持。俄罗斯公民也赞同开始在国内确立人们长久期待的秩序。为此，在车臣进行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并在国内开展了反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经济形势的改善也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在俄罗斯出现了这样的领袖，他能够在一致赞同的必须保持国家主权和完整性的原则基础上把社会团结起来，主张坚决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并建议确立明确的适合全体公民的游戏规则。在 2000—2001 年，据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统计，对普京总统活动持赞同态度的超过了俄罗斯公民的 60% 。

2000 年 5 月 17 日，普京总统对俄罗斯公众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自就任总统之时起，他将首次向国家杜马提出一套法律草案。总统强调，他提交国家杜马的法律草案是要从实质上改组国家权力，他提出了这些法案的共同目标：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俄罗斯的最边远的地区，都要同样严格尊重公民权利，同样准确地理解并执行全俄的立法。在讨论普京提交的文件过程中，出现了对俄罗斯来说是崭新的形势——在国家杜马形成了支持普京政策的一大批党团。无条件支持普京方针的是“统一”党团，而团结在总统的倡议周围的议员数超过了议员总数的 2/3。总统在国家杜马获得了可依靠的力量，这支力量很快形成了有组织的议会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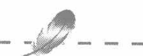
总统和立法者在对国家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上达成了一致，这成为进行紧张和高效的改革活动的保证。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之交开始的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在几年的时间里得到

了完善和系统化。



正如学者、政治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国家杜马代表安·科科申解释的，真正的主权首先要求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国家对各战略部门实现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表面上的）监控。

“真正的主权必须以国家对经济命脉的监控为前提，它包括对飞机场和空中交通管理的监控，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及相应的终端设施的监控，对铁路网、联邦公路运输，以及一系列与国防工业有密切联系的民用高科技工业部门的监控，保证它们不让外国资本介入。发展本国的基础科学，而且做到国家首先负责对基础科学进行财政拨款，这是保障真正主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政治阶层’、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安全领域，其中包括国防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进行独立战略思考的才能，以及依靠广泛的理论的和实用的社会科学基础及爱国主义情感进行思考的才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总统提前选举的结果（2000 年 3 月 26 日）

选民总数——109372043

参选人数（根据发给选民的选票数确定）——75181 073（68.74%）

弗·弗·普京	39740467（52.32%）
根·安·久加诺夫	21928468（29.21%）
格·阿·亚夫林斯基	4351450（5.80%）
阿·摩·图列耶夫	2217364（2.95%）

弗·沃·日里诺夫斯基	2026509（2.70%）
康·阿·季托夫	1107269（1.47%）
埃·阿·帕姆菲洛娃	758967（1.01%）
斯·谢·戈沃鲁欣	328723（0.44%）
尤·伊·斯库拉托夫	319189（0.43%）
阿·伊·波德别列兹金	98177（0.13%）
乌马尔·贾布赖洛夫	78498（0.10%）
反对所有人	1414673（1.88%）



36. 21 世纪初的对内政策——国家的复兴

36.1 政治改革

普京总统在就职典礼（2000 年 5 月 7 日）后的最初的重大倡议是改革联邦关系。尤其是要使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与俄罗斯宪法相符。以前州长都是联邦议会上院的代表，这与分权原则相矛盾。在 2000 年 8 月通过新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法之后，上院由地区议会选举产生的或由地区长官委任的代表组成。

除了使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与宪法相符之外，这些改变大大改善了总统与联邦会议上院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联邦中央也关心调整好同地区领导人的建设性关系。根据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建立了国务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州长既可以提出全国性的议案，也可以代表本地区的利益。

在 2000 年 5 月，根据普京的总统令组成了七个联邦区：中央

区、西北区、南方区、伏尔加沿岸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在每个联邦区中都设立了总统全权代表的职位，全权代表的责任是，保障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贯彻执行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权力，提高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办事效率，完善对它们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办法。那时候，地区的很多法律与俄罗斯宪法相违背，因此，造成国内法律混乱的局面，威胁着俄罗斯的主权。回想一下1998年在各地区发生的违宪法令的危机就足以，当时这些法令阻碍了粮食从各地的输出，实际上设立起了国内海关。在2000年开始组建统一的法律空间，在2001年已经基本完成。

在2000年组成联邦区和实行总统全权代表制后，国家领导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明确地划分俄罗斯联邦与其主体的职权，在此基础上重新审定联邦法。由于Д. Н. 科扎克领导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专门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分阶段（2003—2004年）通过了一些使联邦改革构想固定下来的法律。

给各区规定了他们必须靠自己的财政预算去履行并承担执行责任的权限。其他共同管辖的权限归联邦中央，只有在具有相应的财政资金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这些权限转交给俄联邦主体。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由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那时候地区领导人不去行使自己的权限，把自己职务上的不作为责任推给联邦中央。这种情况的明显表现就是，在国家的许多地区对居民的取暖和电力保障上普遍违反规定，而预算中拨给解决这些问题的资金却是由地区当局掌管的。

2003年7月4日的联邦法律（联邦法第95号）确定了对外不公开的地区权限清单（共41项）。这就降低了地区预算资金不专款专用的风险。给地区规定有权用自己的收入来给这些开支拨款。同时联邦中央极力减少用货币代替优惠措施的数量，目的是要使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市场现实相符。从2005年1月起，关于以货币补偿代替优惠办法的法律开始生效。很遗憾，由于没有很好地研

究这个法律，地区也没有对其实施做好准备，它引起了享受优惠者的极大不满。政府不得不提高补偿金，这才消除了社会上的紧张局面。

这些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让地区领导人集中精力处理本地区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向联邦当局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税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它从2000年开始，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税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降低企业的税负，加强作为创税大户的采掘部门的作用，同时简化对小商业的课税。在居民方面，对自然人的收入税实行“平缓”的税率——对任何有收入的公民的税率确定为不超过其总收入的13%。这样做的结果，依靠“从暗处浮出明处”的税收收入，使预算得到极大的充实。

在2001年，彻底取消了对住房及社会文化设施的维修税，取消了汽车购置税。统一的社会税取代了上缴预算外资金的保险费。这项措施同样有助于部分工资的明朗化，虽然统一的社会税仍然保持着高水平。2002年企业利润税率降到24%（2001年达35%）。矿藏开采税开始与世界市场的原料价格挂钩，它成了俄罗斯的预算的重要补充来源。

2003年，用征收交通税取代了公路使用税和运输工具所有人税，同时取消了外汇购买税，这大大地减少了地区的收入。然而改变消费税的分配办法——酒类产品的消费税有利于联邦预算，而石油产品消费税则有利于地区预算——对国家的形势起到了稳定作用。

在小商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降低了企业主的税率，简化了纳税办法。在联邦层次上确定了有权缴纳收入统一税的企业主的名单。在2004年，取消了销售税，然而地区预算中减少的收入，由于再一次提高企业利润税的提成定额得到了补偿。

在改变税法的同时，也尝试改善了税收的行政管理。比如，在2003年实行了“一个窗口”原则，这使得企业只要向税务机关提

交了文件就可以办理登记注册。但是在税收领域依然存在着严峻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不正当的苛捐杂税紧密相连，这些苛捐杂税是那些不择手段的收税人员向企业主索取的，有时他们甚至搞得公司破产。紊乱不堪的报表也带来大量问题，这些报表只有专业会计才填得了，这给小商业的经营造成严重的障碍。尽管税收改革有不同的结果，但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即在俄罗斯有别于以前，出现了有能够起实效（尽管还不完善）的税收系统。

36.2 司法改革

200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成立了完善诉讼程序立法问题工作组。工作组制定的法律草案，在司法界引起了重大的争论。2000年末，这些法律草案在第五次法官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而在2001年末，国家杜马通过了一个改变立法的折中方案。在俄罗斯实行了世界上采用的法官体制，陪审法庭开始真实地运行（虽然不是在所有地区），同时实行了法警制，改变了法官本身的地位，极大地减少了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同时也加强了司法人员的独立性。

国家还进行了诉讼程序立法改革，在2001—2002年，国家杜马通过了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仲裁诉讼法典。现在审理公司的纠纷主要是仲裁法庭的权限。对主管经济问题的部委，如征税机关，联邦有价证券市场委员会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也可向仲裁法庭提出。排除了检察机关对涉及维护私人利益的诉讼纠纷的干预，不管进行诉讼的是谁，是公民还是公司。民事诉讼程序中不再设人民陪审员，因为他们不能从专业角度判断经济纠纷。之所以要通过刑事诉讼法典是因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实践没有什么效果。刑事诉讼法典保证使被告、受害者和证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更多的权利。

2001年通过了新的行政违法法典、劳动法典、土地法典和民法典第三部分。2003年通过了海关法。2004年通过了住宅法典之后，可以认为俄罗斯法典的编纂工作事实上已经完成。

36.3 与寡头的冲突

普京在当总理及后来当代理总统时，最初采取的行动就引起了不少寡头的不满。2000年2月28日，在与大资本家代表的见面会上，普京讲了不能容忍商界对国家决策的干预，尤其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要求商界同政权当局同等地保持距离的原则涉及商界的所有人，总统的行动证明了，这不是在口头上随便说说的，而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相当一部分寡头安于现状。传媒寡头集团的两个代表——弗·古辛斯基和鲍·别列佐夫斯基，不准备放弃对政权当局施压的工具。2000年和2001年的特点是同这两个寡头的冲突不断。对政权当局来说，就是要摧毁大众传媒的寡头控制系统。摧毁这个系统是使国家的法定权利和权限回到国家手里的必要条件，更何况寡头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本身就是非法的。

在现代大众社会里，对大众传媒的监督——是影响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政策取决于舆论，而舆论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大众传媒形成的。1990年代下半期，寡头对电子和报刊大众传媒的控制是其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的基础。

当古辛斯基没能及时偿还向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储蓄银行借的贷款的时候，就开始了独立电视台的破产和将它归还给国家的审理过程。结果独立电视台公司转给了"天然气工业—传媒"控股公司，而古辛斯基以自己的公司股票换得3亿美元，并迁居国外。稍后，国家也恢复了对公共电视台的控制。在法律上电视媒体就永远属于控股51%的国家了。对别列佐夫斯基霸占的所有权是通过简单的

撤换经理的途径予以取消的。

就这样制止了想用操纵信息资源的办法敲诈勒索政权的一切图谋。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继续待在国外。古辛斯基不再参与公开的政治活动，而别列佐夫斯基则经常在俄罗斯和国外的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行为，在2006年还明目张胆地宣称，他的活动目的是用武力在俄罗斯夺取政权。

接下来国家同寡头的交锋是在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的总裁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新西伯利亚的机场被捕。他及其同伙被指控为偷税漏税和诈骗国家资财。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辩护人却说，追捕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他给反对党派以财政支援。的确，在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前夕，尤科斯总裁试图保障自己在未来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立即给一系列政党拨款，交换条件是将他的人列入候选人名单。然而必须公道地承认，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给反对党派提供财政支援，同时也给亲政府党派提供财政支援。这与其说是对反对派的支持，不如说这是“寡头搞报复”的一种尝试，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尝试让议会和整个政党体系，不管各个政党和党团的政纲如何，都腐化堕落。

除此之外，国家第一次声明，必须维护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资源，把它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科斯案件”的意义在于，日益强固的国家向商业巨头发出了含义明确的告示：遵守法律，付清税款，不要试图凌驾于国家之上。这个告示被听从了。2004年，在“尤科斯案件”后，联邦从大纳税户那里征收的税款与2003年相比一下子增加了133.8%。而且，如果说2002—2003年石油公司上缴的利润税是下降的话，那么2004年从这个行业收上来的税款增长了225.3%。某些公司吸取“尤科斯案件”的教训，自愿补缴了税款。“尤科斯案件”使寡头想保持对俄罗斯国家的操纵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观 点

尤科斯石油公司案件有许多方面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案件相类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美国石油运输市场，硬行吞并竞争对手并大肆进行议会院外活动。在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集团为所欲为，破坏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商人把自己公司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而且常常偷梁换柱，把自己企业的利益偷换成民族利益。由于垄断集团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置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于不顾，使国家行使其功能的能力受到威胁，这使得社会上的愤恨情绪不断增长。美国公民对国家保障“诚实游戏”规则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联邦当局开展了反对大垄断集团的运动。约翰·洛克菲勒领导的石油标准公司成了主要斗争目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支持总检察长对大垄断公司展开侦查。1906年开始对标准石油公司立案审查，1907年对其起诉7次。本来也可以对洛克菲勒提出刑事诉讼，但是他同意配合侦查。审判的结果是，确认公司及其领导犯了破坏反托拉斯法罪。标准石油公司集团被分成38个公司。这是向大公司发出的明确信号：意味着做事必须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36.4 车臣问题及同恐怖主义的斗争

在2000年作战行动的主要阶段结束，6月任命车臣的宗教领袖艾哈迈德·卡德罗夫担任车臣临时行政领导人之后，恐怖分子的抵抗转入了恐怖战争阶段。在2000—2003年，联邦中央在车臣采取了使车臣政治、经济形势正常化的措施。虽然在此时期中经济领域的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政治的变化非常显著。

2000年8月，车臣共和国的阿斯兰别克·阿斯拉哈诺夫

（A. Аслаханов）当选了国家杜马代表。2003年3月，针对是否赞成新的共和国宪法，在车臣举行了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宪法里，共和国被授予在俄罗斯法律范围之内的广泛权限。2003年10月，车臣共和国举行了总统选举，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取胜。联邦中央指望依靠车臣领导人的力量，而不是采取从莫斯科向其派总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共和国的问题。

为了减缓北高加索的紧张形势，俄罗斯当局没有放弃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如在2001年11月，南方联邦区的全权代表维克托·卡赞采夫（Виктор Казанцев）与恐怖分子的代表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 Закаев）进行了会面。很快，同恐怖组织领导的代表的谈判显现得毫无意义。2002年10月23日，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东北风"音乐厅发生了劫持观众事件，结果130人丧生。

从2002年11月开始，恐怖分子展开了活跃的恐怖战争，在12月末自杀炸弹引爆了格罗兹尼的车臣政府大楼，2003年7月，在莫斯科图希诺市的摇滚乐会演场地制造了爆炸，8月引爆了玛兹多克军医院，12月在斯塔夫罗波尔炸毁了电车。2004年2月，在莫斯科地铁的列车上制造爆炸。每一次的恐怖主义行动都夺去了几十人的生命。在2004年庆祝胜利日时，恐怖主义袭击使车臣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牺牲。2004年8月末，恐怖分子引爆了两架飞机，在莫斯科的里加地铁站附近进行恐怖行动。2004年9月1日，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学校，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结果牺牲了330人，他们大多是儿童。

2004年末，车臣共和国的形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04年8月29日，73%的选民投票选举艾·阿勒哈诺夫（A. Алханов）为车臣共和国的新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为政府总理，他是牺牲的车臣第一位总统的儿子，2007年3月，他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政府领导层采取了使罪行不严重的恐怖分子融入社会的路线，同时

开展消灭恐怖分子头领的战斗。2005年11月进行的车臣共和国议会选举再一次证实了局势的正常化。到2006年7月，消灭了北高加索的全部恐怖分子的首领：巴萨耶夫，在此之前消灭了马斯哈多夫。丧失了头领和失去了财政支援的恐怖分子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

2003年12月，在好不容易才取得稳定的背景下，俄罗斯联邦进行了议会选举。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亚博卢自由党和进步力量联盟党没有得到超过5%的选票，因此，他们的代表没能进入国家杜马。大多数在只有一个名额的选区参加竞选的议员都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党团，结果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符合宪法的议会多数。

2003年12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决定支持普京候选俄罗斯联邦总统。2004年3月1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俄罗斯公民确认在2000年给予普京的信任是正确的。

同时代文献资料

■ 2003年12月7日，国家杜马代表按比例选举制选举的结果

（只列超过1%选票的党派）

名　称	得票数	得票率（%）	杜马席位数
1. 统一俄罗斯党	22779279	37.57	120
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7647820	12.61	40
3. 自由民主党	6943885	11.45	36
4. 祖国党（人民爱国联盟）	5469556	9.02	29
没有超过5%选票的政党：			
5. 亚博卢集团	2609823	4.30	

6. 右翼力量联盟	2408356	3.97
7. 俄罗斯农业党	2205704	3.64
8. 俄罗斯退休人员党	1874739	3.09
9. 俄罗斯复兴党	1140333	1.88
10. 俄罗斯联邦人民党	714652	1.18
11. 统一构想党	710538	1.17

■ 2004年3月14日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

选民总数——108064281

参选人数——69572117（64.38%）

弗·弗·普京	49558328（71.31%）
尼·米·哈里托诺夫	9514554（13.69%）
谢·尤·格拉济耶夫	2850610（4.10%）
伊·穆·袴田	2672189（3.84%）
奥·亚·马雷什金	1405326（2.02%）
谢·米·米罗诺夫	524332（0.75%）
反对所有人	2397140（3.45%）



37. 主权民主方针

37.1　经济发展

摆在21世纪初俄罗斯议事日程上的经济纲要，它包括必须完

成经济结构改造，形成市场体制，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及进一步使经济资本化。这将有利于达到战略目标——完成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过渡。

2000 年，已经开始摆脱 1998 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2001 年，居民收入的增加头一次超过了生活费用的增长，这就保障了居民实际货币收入的增长，同 2000 年相比实际增长 6%。2002 年，实际货币收入又增长 9%，2003 年增长 14.5%，2004 年增长 11%。2005 年，实际货币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增长 8.3%。最低劳动报酬的水平不断提高，退休金和平均工资也有所增加。

改革最初十年的经济下降被经济高涨所替代，到 2000 年，国内总产值增长 9%，2001 年增长 5%，2002 年增长 4.3%，2003 年增长 7.3%，2004 年增长 7.1%，2005 年增长 6.4%。这些指标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利的对外经济行情（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格）保障的，但同样也证明国家生产发展了。

为了解决所提出的任务，曾建议采用一种有序的市场经济与高效的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国家所起的作用，不仅是保障对大家都一视同仁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而且是协调全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去达到使国家社会经济快速而稳定发展的共同目的。在普京总统给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经济理论中，国家应当承担起国家经济战略家的角色，成为协调的国家经济乐团的指挥。分析俄罗斯未来发展可以依靠的哪些优势，是这个经济理论的基础。这些优势可以归结如下：

1. 丰富的自然资源（占世界自然资源储量的 30%）；

2. 欧亚大陆便利的地理交通运输状况，尤其是过境运输业务（可以保障从过境的货物运输和从东方到西方，从北方到南方的能源运输获得巨大收入）；

3. 科学和技术潜力（在物理、化学、电子、军工生产、航天运输基础领域和核能技术等等领域）；

4. 教育系统（国外对俄罗斯专家和学者的需求，包括对年轻的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就是证明）；

5. 人力资本（具有独一无二的科学和设计团队与集体、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较高、俄罗斯传统的较灵活的创造性思维）；

6. 生机勃勃的企业经营活动。

普京所进行的许多行政改革，是以符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标准作为目标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俄罗斯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专家赞同俄罗斯加入，因为这将使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首先是进入自然资源的国际市场，并将大大增加俄罗斯经济的原料部门的收入。而另一些人则担心，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最终会破坏民族工业，因为它不能承受来自廉价的进口商品的竞争。

所有这些进程都追求一个目的——俄罗斯应该作为平等的一员融入世界市场。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市场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改革，建立了高水平的资本化的大公司，它们能够成为俄罗斯经济的火车头，能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可以举国家的大康采恩，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和“俄罗斯石油”为例子。

国家是一系列其他部门中进行合并的首创者，如国防和汽车工业。同时这也促使国家加强了在一些战略部门，首先是能源部门中的影响力。

俄罗斯成功地解决了外债问题，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超过了250亿美元，而且每星期增多数亿。2004年1月1日建立了稳定基金，它从由于石油价格的攀升而得到的超额收入中，成功地吸纳了760亿美元。这些基金将用来降低与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对外经济行情相联系的风险。投资迅速增长了，其中包括外国的直接投资，2005年外国投资占到了投资总数的1/4（2004年占1/5）。

与此同时，经济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高通货膨胀率（达到10%）。然而，它与1999年相比降低了1/2。与2000年相比贷

款率缩减了 12%，实际上是减少了 2/3。卢布的巩固导致了进口商品的增多，使俄罗斯生产的商品的竞争力降低，有些领域的生产在 2000—2005 年呈现出停滞取代增长的现象。

37.2 行政改革

2004 年 9 月恐怖分子劫持别斯兰市学校，丧失人性的恶性事件检验了地区管理和执行权力机关对在危急情势下采取有效行动缺乏准备。2004 年 9 月 13 日，俄罗斯总统提出了在新秩序下，按照国家杜马和众议院选举代表的新体制选举省长。在 2004 年末，这些提案变成了法律。按照新的法律，地区立法议会根据总统的提名选举地区新的首脑。总统有权召回执行义务不力的行政长官。立法会议也有权对行政长官表示不信任。这样，总统就对行政长官的工作承担了责任。

废除了按单席位选区选举国家杜马代表的做法。向着完全按政党名单进行选举的办法实行过渡的主要论据是，这样可促使政党制度在国内得到发展。按新的制度进行选举，也可消除"党内的腐败"，因为这样就可迫使各个政党把真正有能力吸引选民选票的人列入自己的选区候选人名单。

设立俄罗斯联邦公共事务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Ф）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加速了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的组建。公共事务院补充了国家议会的工作。

地区的扩大是联邦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这种扩大主要是采用通过公民投票把经济上不富有的自治区归并到州和边疆区中去的办法实现的。在 2005 年年初，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彼尔姆州和科米—佩尔米亚基自治区联合为彼尔姆边疆区的进程。对扩大地区的支持者来说，就泰梅尔自治区、埃文基自治区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联合问题，科里亚克自治区和堪察加州的联合问题，以及

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和伊尔库茨克州的联合问题进行的公民投票都已顺利地完成了。

在2004—2005年，进行了第一阶段行政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使执行权力的各个机关的职能变得具体化，并实行更明确的分工。结果产生了新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结构，新结构由三类下属分机构组成：部、局、代表处。

部——是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对下属管理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承担全部责任。联邦的各个部应准确地按照俄联邦宪法成为以俄联邦政府为首的执行权力体制的支撑要素，在政治上要在为它们确定的管理领域中有效地实施国家政策承担责任。联邦局——是为直接实施专业的执法和监督功能而建立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代表处——是负责为居民和其他权力机关提供一定项目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

同腐败作斗争，是提高现代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效率的关键方向之一。今天在俄罗斯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使法制土壤同反对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斗争相适应。2006年，俄罗斯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于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一整套同腐败作斗争的综合措施，如对腐败行为进行警告，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的义务，其中包括贿赂和受贿应负的刑事责任，实行跨国协作的方向等。

37.3　政治改革

2004年，对有关国家杜马选举的联邦立法进行了修改，而在稍早一些时候，即在2002年，对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的选举法也作了修改。这两项改革，方向是一个，即从单席位选区的选举制度（按相对多数计票的多数选举制）向按比例的选举制，也就是按政党名单计票的选举制过渡。

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都一致证明了一点：按照政党名单进行选举，可以比按单席的选区多数制进行的选举更准确地反映出选民在政治上的选择的细微差别。除此之外，按照政党名单进行选举，可以使选民更注意各个政党的党纲，而不是去注意候选人本人。这就使选举变成一场各种思想的斗争，从选举人表示自己的政治意志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最终，按照比例制进行选举可使政党得到加强。将不可能在政党之外登上高层的选举职位。

为形成强大的全国性政党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按照总统或他在议会中的政治同盟者的倡议实施的，特别是在选票的栏目中取消了“反对所有政党”这一项，再是提高了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得票率的最低门槛，从5%提高到7%。

这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名副其实的大的政党是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主要联系环节，可建立保障权力责任制的机制。此外，大的全国性政党也是保障国家统一的一种机制。正在推行的这一政策是旨在发展现代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这些措施的总的目的是在俄罗斯形成现代政治制度，使之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为国家保证必要的领导。总统助理弗·尤·苏尔科夫（В. Ю. Сурков）提出了“主权民主”这个术语，用来标明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制度。按照他的意见，“可以确定主权民主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社会的权力机构和行为完全由具有全部多样性和整体性的俄罗斯民族选举、组建和指导而成，目的在于让构成俄罗斯的全体公民、社会集团和民族得到物质财富、自由和公正。”苏尔科夫在发展自己的思想时补充说：“把这个术语差不多逐字地翻译成历史上曾时兴过的（人民专制）和现代的（自由人民的统治）俄语就可确定主权民主的简要定义。”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和独立的权力，主权不容异化。

“主权民主”这个术语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遇到许多反对意

见，这些反对意见基本上可归结为一种意见，即认为民主不需要另外的定义，所要明确的只是有还是没有民主的问题。可是对民主是有着不少的补充定义的，例如，A. 莱比哈特对多数民主（基于多数）和共识民主（基于最大限度的广泛共识）就进行了区分。这类定义所强调的是把重点究竟放在民主制度的哪一个方面。如果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不经来自外面的准许就不能做出政治决定，这种政治制度难道是民主的吗？因此，没有国家主权，就不会有民主——“主权民主”的定义所强调的也正是问题的这个方面。

主权民主——是符合以下8个条件的政治制度：

1. 宪法把对国家决策的监控交给被选举出来的官方人士负责。

2. 这些官方人士定期在诚实地举行的、排除任何强迫的选举中产生。

3. 事实上全体成年居民都有权选择官方人士。

4. 事实上全体成年居民都有权竞选取得经过选举产生的职位。

5. 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不必害怕由于自己的政治动因而受到追究。

6. 公民有权从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获得信息。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受到法律保护。

7. 公民有权建立独立的协会和组织，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

8. 国家拥有完全的主权。它具有合法使用暴力和征税的全权，对领土实行监控和保障安全，也就是它是充分体现了国家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它控制国家经济、重要的战略部门、工程项目和交通运输线。一些部门的重要性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过去铁路是关键的交通线，而将来就可能是航天器发射场。但国家的监管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民族经济处在依附于外国资本、进口商品或世界市场行情的状况，国家——消费者是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所以，主权民主的含义中还包括具有创新型的经济，能生产对全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现实的主权意味着国家有能力在事实中

（而不是表面上）独立推行自己的对内、对外以及国防政策，缔结和废除条约，加入或不加入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主权和民主，在俄罗斯的领导所推行的概念框架内，应该成为精英和大众团结在其周围的价值体系。这里精英的团结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德·阿·梅德维杰夫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精英团结起来，作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就将消失。过去存在的一系列帝国，当它们的精英丧失了使自己团结起来的思想，陷入死命的争斗时，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俄罗斯精英只有在一个纲领基础上才能团结起来——那就是在现有的边界范围内保持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其他的一切思想都是第二位的。”

37.4 国民优先工程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 2004 年在致联邦会议的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达到了高速度发展的机会，得到了解决大规模的社会任务的机会。现在我们既有足够的经验，也有必要的手段来给自己提出确实是长期的目标。今天，在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我们已经能够预测我们的生活，不是预测几个月，甚至也不是一年，而是几个十年。近年来的成就给予了我们最终能够开始去解决我们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的基础，但是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稳定和积极的公民社会。”

2005 年 9 月 5 日，总统在政府、议会和地区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国民工程的概念：“俄罗斯今天具有的可能性使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使俄罗斯人民能更切身地感受到的提高福祉的成果。在不破坏基本经济指标的平衡，不允许爆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争取实现这些成果。因此我们不应错过在俄罗斯经济中已经出现的这些契机。

今天我想特别讲一下在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建设这些领域中

实现优先国民工程的实际步骤。

首先，正是这些领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自我感觉。其次，归根到底，正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国内的人口形势，十分重要的是这将创造必要的启动条件发展所谓的人的资本。”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已制定了四项优先国民工程：“健康”、“有质量的教育”、“可买得起的舒适住房”和“发展农工综合体”。每一项工程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家钱财和政权的组织力量（预算和行政资源）同时集中起来，以提高俄联邦公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列出了关键的着力点。

在“健康”工程中，就是发展基层的医疗服务（诊所网等等）和保障高技术水平的医疗服务（涉及建设配有新的高技术设备的医疗中心）。

在“高质量教育”工程中，是要奖励优秀的教师，鼓励采用创新的教学计划的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实现学校的信息化和发展学校教育的物质基础，建立国立大学和企业——学校网。

特别得到重视的是“高质量的和大众买得起的住房”。大多数俄罗斯人都需要住房，但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国家在保障住房市场上对供需的平衡刺激与通过市场机制支持建设新的住房的同时，打算在最近5年内扭转局势。到2010年，住房建设至少增长26.6%，使等候改善住房条件的时间缩减至7年，而把抵押贷款年利率减少到8%。

37.5　人口问题

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在他向联邦会议作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强调指出：“我们俄罗斯公民在一年一年变得越来越少，好几年来，国家人口数平均每年减少75万人。如果相信预测，而预测是以研究这个问题、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项工作的人们所做的实际工作为

依据的，那么再过 15 年，俄罗斯人将减少 2200 万人。我请求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数字：这是国家居民 1/7 的人数，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不变，国家的生存将陷于威胁之中。我们面临着变成一个衰弱民族的危险。今天人口形势——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然而经济状况不允许采取大规模的、要求巨大和长期的财政支出的措施。国家只能限于采取一些相对局部性的措施。如通过了旨在反对居民中的酗酒现象（这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的法规。

然而只是到 2006 年，所达到的经济水平，优先国民工程的开始实施（首先是健康和住宅建设），使我们能够采取新的办法来着手解决人口问题。

2006 年 5 月 10 日，普京总统阐述了鼓励生育的计划，包括一系列综合措施。第一，增加了对抚养一岁半以下的孩子的津贴（第一个小孩津贴 1500 卢布，第二个津贴 3000 卢布）。第二，给因妊娠和生育休假（即常说的法定休假）或休假一年半以照顾小孩的妇女支付工资，工资额增至休假前所获工资的 40%。第三，实行新的社会支付方式——补偿儿童的学前教育费用（托儿所和幼儿园）。第四，扩大分娩人身财产保险的额度。第五，实施俄罗斯全新的鼓励生育方式——建立数额为 25 万卢布的“母亲资本”，供生育二胎的妇女支配。这个计划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这些就是关于 2000—2006 年俄罗斯国内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成果的简要叙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中我们已走过了多长的一段路程，俄罗斯已摆脱了持续很久的经济危机，已解决了债务问题，已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着手解决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当然这只是在漫长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实际上每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措施都是与普京总统的名字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俄罗斯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全权的结果，他按照根本大法的规定决定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的基本方向。叶利钦由于年龄和疾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元首所肩负的许

多任务。当一位身体健康和精神旺盛的人接替了他，就充分显示出，总统的权力有多大。联邦总统手中的宪法权力具有自己的另一个方面——为了做到某件事，总统应亲自抓。不是总统提出的或不受到总统支持的倡议很少有机会得到贯彻实施。国家的生活如此依附于一个人，对俄罗斯无疑会成为一个危险因素。民主的发展应该减少政治家个人的作用而增大机构的作用。

同时代文献资料

■ 国家近年来在普京治理期间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摘引总统每年致俄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的话作简要描述

2000 年："今天我们首先要提出在权力机关中加强秩序的任务。这只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初阶段。需要整合联邦、地区和地方当局的资源以解决其他复杂的任务。"

2001 年："今天已经可以说，国家的'爬行'时期已经过去了。国家的非一体化已被制止。2000 年明显地表明，我们是能够在一起工作的，而现在我们全体都应该学会有效地工作。"

2002 年："我们应该使俄罗斯成为繁荣昌盛和富裕的国家。人们在俄罗斯应能生活得舒适和安全。人们应能在这里自由地劳动，不受限制和没有恐惧地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孩子挣钱。应使他们都要来俄罗斯，而不是离开俄罗斯。在这里让孩子受到教育。在这里建设自己的家园。"

2003 年："在三年时间内，我们不仅仅极其认真地弄清了积压的许多问题——而生活本身迫使我们实际上每天都要处理这些问题，并且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现在应当迈出下一步。我们的全部决定，我们的全部行动，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要使俄罗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稳固地在世界上那些真正强大的、经济发达的和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崭新的任务。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过去由于一系列的原因，由于有大量其他的紧迫问题，所以没有能够赶上。现在我们有

了这个可能，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 2006年普京总统致俄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摘录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它的科技优势。但遗憾的是，俄罗斯工业部门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技术装备落后于先进水平甚至不是一年，而是几十年。……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经济还是在苏联时期建成这样的。但是光知道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改变局面。……俄罗斯应该在现代化的动力工业、通信、空间技术和飞机制造等高技术领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应该成为智力出口的大国。当然我们希望企业家在所有经济领域都积极进取，我们将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在上面提到的我国一贯很强的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是我们把这些领域作为发展动力的机会。这是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应有地位的现实机会。

■ B. 特列季亚科夫的文章：《主权民主：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治哲学》（《俄罗斯报》2005年4月28日）摘录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任职的第六年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它是偶然地，在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所进行的思考的影响下产生的，还是在掌权之前就考虑到的，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门政治哲学于2005年宣布的。重要的是现在有了这种哲学……

普京政治哲学的主要形而上的观念是：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一个最大的欧洲国家。

在三百年的时间内，俄罗斯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人民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市民社会方面一起发展，在某些方面落后，在某些方面则超过了西欧“古典”国家和民族。俄罗斯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具有上千年的国家历史。

民主的传统不是从什么地方传给俄罗斯的东西，而是通过自然的途径，在一定的历史时刻产生在俄罗斯本身的一种价值观。在俄罗斯的社会意识中与之有同样意义的还有两个价值观——自由（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公正。

年轻的（新的）俄罗斯民主是俄罗斯国家的继续，而不是它的崩溃。

俄罗斯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愿望从苏维埃制度转到了它的新的发展阶段，转向同时建设民主的、自由的（主权的）和公正的社会和国家。而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将自己决定这种发展的时期、阶段、条件和方式。

俄罗斯的主权（和公正）民主——这就是普京政治哲学在语言上和实质上的表述公式。



38. 在对外政策中俄罗斯立场的回归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千年之交，俄罗斯所遇到的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主要在于，国家极其软弱，外国伙伴不相信俄罗斯内部政治形势的稳定，在前任总统任职期间俄罗斯领导的行为的不可预测。巨额的外债以及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决定国际社会方面对俄罗斯的态度的一些主要因素。

到2000年1月1日，俄罗斯国家外债总额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1328亿美元），而外债累计总数达1777亿美元。所有债权人对俄罗斯及时偿还债务的能力都表示怀疑。他们，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力图利用债务问题对俄罗斯施压。

这些状况导致俄罗斯社会重新评价对西方伙伴的行为所采取的态度。

在选举普京为俄联邦总统后，债权人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变得略为温和。分离主义在俄罗斯威胁的降低，使国家的形势对外国伙伴来说变得更可以预测。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试图达成长期的外债

重组。巴黎俱乐部同意延期支付 1999 年和 2000 年该按期支付的数额为 80 亿美元的债务。还在 2000 年与伦敦俱乐部达成了改组 290 亿美元的债务的协议。但是 2000 年对外经济行情的改善和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日程上取消了关于改组或冲销外债的谈判。只是在 2001 年秋天得以与捷克达成冲销 36 亿美元中的 25 亿债务的协议。2006 年，俄罗斯偿还了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全部债务。

俄罗斯领导人在 2000—2006 年采取的一些外交行为也旨在解决债务问题。莫斯科曾试图从自己的债务人那里获得资金。在 1991 年之前，有 57 个国家共欠苏联大约 1500 亿美元。然而，由于贷款常常是出于政治动机，是用卢布或可代换卢布，也有用商品支付的，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苏联国家银行的汇率。而且，在 1997 年加入巴黎债权人俱乐部之后，俄罗斯同意冲销 70%—90% 的苏联债务。最后，俄罗斯的大部分国债偿还的概率极低。由此专家们给苏联债权评定的市场价值为 50 亿—70 亿美元。

2000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俄罗斯总统在古巴访问。古巴欠苏联的债务总数为 220 多亿美元。普京向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议，在巴黎俱乐部的框架内重组债务。卡斯特罗予以拒绝，并建议俄罗斯自己首先每年支付租用洛尔德斯情报监测中心 2 亿美元的租金。结果俄罗斯做出了不宜保持在洛尔德斯的军事基地的决定，因为类似的信息可通过卫星得到。

2001 年 3 月 1—2 日对越南的访问具有同样的目的——协商归还债务问题。达成了关于重组为数 100 亿美元的越南债务的协议。越南领导人则提出要俄罗斯为租用金兰湾海军基地支付每年 3 亿美元的租金。而由于俄罗斯已在太平洋上不再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2001 年夏天决定不再重订租用金兰湾的条约，这个条约在 2004 年失效。

从 1997—2006 年，俄罗斯总共冲销了总数为 400 亿美元的债务。然而应当强调，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是前途无望的，也就是说很难能成功返还。

俄罗斯为偿还自己的债务每年应偿付约130亿美元。偿付高峰是在2003年（达190亿美元）。但是有利的对外经济行情，预算的盈余和贸易平衡的顺差，使俄罗斯足以让经济不受影响地度过了2003—2005年的债务偿付高峰，甚至提前偿还了债务。

国家为了提前解除债务利用了稳定基金。俄罗斯提前全部付清了对国际外汇基金的债务。也达成了关于完全偿付对巴黎俱乐部的债务的协议。俄罗斯从极其沉重的利率很高的（每年达15%）债务负担中摆脱了出来。

实际情况

联邦政府副总理亚·德·茹科夫指出说：“当没有外国贷款就无法办的时候，苏联政府向巴黎俱乐部借了钱，他们拧住了我们的双手以很高的利率贷给我们钱。现在俄罗斯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借贷，所以继续偿付这样高的利率是不合适的。”

2000—2004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债务

2000年1月1日	1328亿美元
2001年1月1日	1167亿美元
2002年1月1日	1030亿美元
2003年1月1日	968亿美元
2004年1月1日	982亿美元
2005年1月1日	974亿美元
2006年1月1日	714亿美元
2006年4月1日	37亿美元



2000—2005年，俄罗斯因为在车臣共和国采取了确立合法权

利的行为经常遭受指责。2000年1月，欧洲理事会议会联盟主席拉塞尔·约翰斯顿说，他不排除中止俄罗斯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地位的可能性。2002年3月欧洲理事会议会联盟的关于车臣问题的报告人贾德爵士发表言论，主张就车臣问题建立国际法庭。2003年4月欧洲理事会议会联盟通过了关于建立这个法庭的决议。美国对待车臣的立场较为克制。美国当局对2005年11月车臣举行的议会选举表示欢迎，并希望车臣共和国中的局势进一步正常化。观察车臣这次选举的欧洲理事会议会联盟代表团也认为，这次选举总体上运行正常。

2000—2001年俄美相互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华盛顿力图摆脱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领导人认为，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破坏了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稳定，会导致美国取得战略优势。

相反，俄罗斯和美国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发展是顺利的。2000年4月14日，国家杜马批准了俄联邦和美国之间《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CHB-2）。它规定到2007年前夕，俄美双方各把核弹头削减到3000—3500枚。为发展在这个领域中的合作，2002年5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是妥协性的，它大大降低了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对俄罗斯的影响。条约规定，到2012年之前，俄美双方将各自把进攻性战略核弹头分别削减到1700—2200枚。该条约保证保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略平衡。该条约解除了CHB-2条约规定的对俄罗斯在发展携带多弹头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限制。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自杀恐怖分子持枪劫持了两架飞机撞击了纽约的世贸大楼，劫持另一架飞机撞向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还有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炸毁。在

“9·11”恐怖袭击后，华盛顿宣布自己的主要敌人是国际恐怖主义。俄罗斯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主义立场。按照美国当局的意见，恐怖组织“基地”的头领，恐怖分子拉登那时隐藏在阿富汗。1996年在阿富汗夺取了政权的塔利班极端主义运动的头领奥默尔给他提供了庇护所。

普京表示支持美国关于消灭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的倡议。俄罗斯政府同意提供俄罗斯领空供反恐怖主义联盟使用，不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建立军事基地。俄罗斯采取这一步骤是由于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威胁的增长，这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南方边界的安全。在2001年10月，美国和英国对阿富汗境内实施了空中和火箭攻击。很快在“北方联盟”——在艾哈迈德·马苏达指挥下的阿富汗部队——的积极参加下开始了反对塔利班的陆地战斗。战斗于2002年3月18日结束，扫除了塔利班和基地武装分子的力量。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有积极的合作，但是在相互关系中许多矛盾依然存在。在结束阿富汗的战斗后，美国不准备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撤走军事基地，北约的进一步东扩（2002年11月，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成为俄美相互关系中又一个消极因素。几个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第一次成了北约的成员国。



2000年7月19—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朝鲜访问，他极力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停止弹道导弹试验，作为交换条件，俄罗斯向平壤提供卫星。金正日同意了，然而几天后，拒绝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俄罗斯未能成功消除认为危险来自于所谓的流氓国家的论据。莫斯科倡议欧洲建立非战略性的反导防御体系，这个建议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支持，然而美国不同意俄罗斯的建议。2002年10

月，美国总统小布什采取了原则性的政治决定，在2004年扩大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然而，专家坚信在近十年内，俄罗斯具有遏制还不完善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力量。



伊拉克事件是体现美国对调整国际关系采取新态度的一个例子。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恢复联合国核专家在伊拉克境内的核查活动的1441号决议。然而美国却违反联合国决议，利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指控，在英国支持下侵入伊拉克。2003年3月20日开始了伊拉克战争。俄罗斯、中国，甚至还有美国反恐同盟的一系列盟国及北约都尖锐地反对战争。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极力想找到一个能替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供应者。伊拉克的“黑金”在储量上占世界第二位，是最合适的候选供应者。

尽管莫斯科力图使局势不向战争的方向发展，然而华盛顿对俄罗斯在伊拉克危机上的立场置之不顾。200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对美国破坏国际安全体系的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完成得非常快——在4月已经粉碎了伊拉克军队的主力及其下属部队，反伊拉克的盟军部队进入了巴格达。萨达姆逃跑了，但是2003年12月落入美军手里，在2006年12月被处绞刑。在伊拉克始终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5年12月15日，伊拉克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开始形成文职行政当局。与此同时，国内的宗教冲突变得更为尖锐起来。在不受行政当局和反伊拉克同盟军队控制的地区中，军事化的极端主义集团十分活跃，导致伊拉克居民中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伊拉克人反对占领军的斗争也持续不断。

独联体国家中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美国政策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

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政变的结果是亲美政权的产生，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方面的抗议和反对。

在同后苏联空间中的国家关系中，莫斯科同第比利斯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形成了最有冲突性的关系。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执政时期是车臣武装分子活动的桥头堡，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愤慨。在2003年末谢瓦尔德纳泽被推翻，2004年初，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М. Саакашвили）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格鲁吉亚成了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国家，经常采取反俄罗斯的立场。2006年，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格鲁吉亚的质量低劣商品的制裁措施，同时提高了载能体价格，使之大大接近于世界能源价格，并停止了对格鲁吉亚经济的补贴。格鲁吉亚把这看做是政治打压。

波罗的海国家于2002年加入北约，这成了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统治集团经常为“占领”问题对俄罗斯提出意见，他们用“占领”这个词指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这个时期。在2005年5月9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特别尖锐。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总统拒绝来俄罗斯参加庆祝活动。莫斯科既不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方面提出的指责，也不承认他们对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

在这个时期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也是复杂的。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时期，俄罗斯对当时担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的维·亚努科维奇（В. Янукович）这个候选人表示了支持。他提出了要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在乌克兰给予俄语以官方语言地位的竞选纲领。他的主要对手是维·尤先科（В. Ющенко），尤先科是以他的反俄罗斯倡议（尤其是主张加入北约）出了名的。亚努科维奇是唯一一个能与尤先科对峙的候选人。因此俄罗斯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许多西方社会组织以及一系列国家，如美国和波兰，还有某些

国际组织（欧盟和北约）给予尤先科以支持。在乌克兰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准备实施在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编制好的那种“革命”脚本。在 2004 年 11 月进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亚努科维奇以微弱优势获胜。然而，尤先科不承认选举结果，宣布它们是伪造的，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到基辅的独立广场上去集会，这样乌克兰就开始了“橙色革命”。

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华沙对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列·库奇马（Л. Кучма）施加压力后决定进行第三轮所谓的“重新投票”。库奇马同意采取这个程序，使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失去了已获得的胜利而变得士气沮丧，尤先科的支持者队伍得到了扩大，显示了尤先科的力量。结果是尤先科在第三轮选举中获胜。

尤先科胜利后，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了前后不一贯的政策。在 2005 年末和 2006 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尖锐化，与此相联系的是乌克兰不愿按国际市场价偿付俄罗斯的天然气。“天然气危机”的结果是最终达成了协议，乌克兰今后将按接近国际市场水平的价格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同样也达成了按固定价格给乌克兰支付天然气过境费的协议。

在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政权的被推翻，在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以及 2005 年 3 月吉尔吉斯在议会选举后发生的导致共和国总统阿·阿卡耶夫被推翻的政变，这一切向莫斯科提出了更积极地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相互协作，在后苏联空间中推行更富有雄心的对外政策的任务。

尤其是 2005 年 5 月在安集延（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州首府）发生恐怖骚乱事件以后，俄罗斯表示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卡里莫夫。在这之后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就脱离了“古阿姆”（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联盟的简称——译者注）这个反俄罗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ЕврАзЭС）的成员，并积极参与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工作。俄罗

斯所持的坚定立场，使反对派在2005年末举行的阿塞拜疆议会选举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选举中不能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俄罗斯采取了承认2006年3月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的明确立场。在这些选举过程中（哈萨克斯坦除外），当地的反对派按照“橙色革命的方案”采取行动，事先就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到中心广场组织集会，向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议会联盟发出呼吁，这些组织派出的观察员经常视形势而执行不承认选举为合法的指令。

俄罗斯同国际组织的关系是建立在建设性的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是支持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一贯拥护者。在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5月10日，在俄罗斯—欧盟峰会上，俄罗斯与欧盟通过了在四个“共同空间”中的“路线图”——经济空间，自由、法律和安全空间，外部安全空间，科教文化空间。四个“共同空间”思想是在2003年5月举行的俄罗斯与欧盟圣彼得堡会议上产生的。这个思想将用来取代《伙伴与合作协议》，该协议是于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在希腊科孚岛签署的（其有效期将于2007年终止）。

俄罗斯积极参加像欧亚经济共同体这样一个组织的工作。欧亚经济共同体是2000年10月在阿斯塔纳建立的，其目的是制定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统一立场，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成员国的关税同盟。这个组织的创始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观察员国为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从2006年1月起，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正式成员。除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外，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是独联体国家领土上的一个发挥作用的机构。

俄罗斯与中国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被称为《大条约》）。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条约明确肯定，双方对对方没有领土要求。2004 年在普京访问中国时，双方签订了解决两国东段边界的补充协定。俄罗斯把塔拉巴罗夫岛和大乌苏里岛（离哈巴罗夫斯克不远处）[1] 的一半退让给中国。俄中边界是沿阿穆尔河[2]主航道划定的，这彻底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俄罗斯还从中国取得了对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俄罗斯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同中国积极开展合作，上海合作组织联合了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该组织是 2001 年 6 月 15 日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上海五国”元首非正式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后苏联空间中一个最积极的发展中组织。现在上海合作组织有四个观察员国：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还同阿富汗建立了一个联络小组，与联合国、独联体、东南亚同盟国家和欧共体也有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成员国利益上采取自主的立场。2005 年夏天，在美国干涉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内政后，上海合作组织向美国提出建议，要求它确定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军事基地的日期。2007 年将进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更确认了这个组织认真严肃的意图。

“能源外交”在俄罗斯政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西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试图采取双重标准，他们在极力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能源供应条件时，毫无根据地指责俄罗斯利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政治武器”，提出削弱俄罗斯国家对能源资源的监控，以及把这个战略领域向西方公司广泛开放的要求。

在同欧盟的能源对话中，俄罗斯坚持自己根据国家利益制定能源政策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建立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关系考

---

① 塔拉巴罗夫岛和大乌苏里岛，中国统称黑瞎子岛。——译者注

② 中国称黑龙江。——译者注

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俄罗斯总统倡议下，保障国际能源安全问题成为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八国峰会的主要议题，这不是偶然的。

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公开声明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力图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认真的伙伴。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2006年我们国家担任了“八国峰会”（世界发达国家共同体，参加的成员有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美国、法国和日本）的主席。今天所有的观察者——有的带有恐慌，有的带有敌意，有的带有怀疑与希望——都确认：俄罗斯返回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台。

同时代文献资料

■ 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的演讲摘录

我确信：只有联合国宪章可以成为通过使用武力决定的唯一机制……只有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和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使用武力才能认为是合法的。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都不可能取代联合国。当联合国真正把能够确实对个别国家中的事件作出反应的国际社会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消除对国际法置于不顾的情况，那时形势就可能改变。否则，形势只会走进死胡同，严重的错误必将增多。

……扩大北约的进程对实现盟友本身的现代化或与保障欧洲的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性的和降低相互信任水平的因素。因此，我们有正当的权利公开质问：这种扩大是针对谁的？西方伙伴们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作出的保证现在变得怎样了？现在这些保证在哪里呢？甚至谁也不记得这些保证了。但是我在这个大厅里要提请大家回想一下他们过去说了什么。我想引用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先生1990年5月17日在布鲁塞尔的讲演，那时他说：“我们不准备把北约的军队部署到联邦德国的领土之外这

个事实本身，给苏联提供坚定的安全保证。”如今这些保证在哪里呢？

■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综览，俄联邦外交部，2007 年 3 月 27 日**

近年来在世界舞台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尽管有其矛盾的后果，但导致对影响力和经济增长资源更加平衡的分配，并奠定国际关系多极结构的客观基础……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为巩固了。强大的、更加自信的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发生的积极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大大提高了。近年来的主要成就就是俄罗斯重新获得在对外政策上的独立性。有必要重新思考新形势，包括在理论水平上。

在正在实现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可能有安定的孤岛。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可能脱离全球的和地区的联系加以保证。在全球化条件下，内部改革的成就越来越取决于存在于我们边界之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此外，很明显的是，俄罗斯只有作为一个在现实地估计自己可能性的基础上，对所有迫切的国际问题都推行主动的首创性政策的世界大国，才能够在现今的边界内生存。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际立场的巩固直接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状态。俄罗斯内部的巩固，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更有目的性和更富有成效，会使人们对俄罗斯外交产生更高的要求。变得坚强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共同发展进程的重大积极因素。我们正在为国内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我们也从外界寻找对自己的创造性工作的启示。我们能够对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首先应当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实现。

■ **B. 特列季亚科夫的文章《亚洲俄罗斯》（《莫斯科新闻》2006 年 3 月 3 日）摘录**

在普京治理的这些年里，俄罗斯过去曾经拥有的对外和对内主体性中的很大一部分得到了恢复，从这以后俄罗斯已不简单的是前

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最大的一块领土，也不只是欧亚地区的超级强国之一，而（在总的特征上）已具有恢复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前景，能进入五强行列的二级世界强国，五强的其他成员是美国、中国、欧盟与印度。

如果还不能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那么在欧洲—亚洲—非洲这些次地区内，没有俄罗斯，已经不能，或者至少是很难解决大部分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

从各方面看，如果能胜任的话，俄罗斯已经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急剧发展的冲突中发挥特殊作用做好了准备。

克里姆林宫采纳的“主权民主”理论，排除了俄罗斯作为一个附属成员加入任何国际联盟的可能，而相反，要求在自己的历史存在和历史影响所及的空间内建立自己的联盟，这其中也包括中亚。

俄罗斯联邦现在的边界是非天然的，或者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政治阶层的大多数是这样感觉的——首先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这些边界不能足够保证俄罗斯的安全。这个不足应该得到弥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同盟。



39. 转型时代俄罗斯社会的精神生活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以国家精神生活中发生的急剧变化和新的文化发展进程作为标志的。言论自由的确立、全球通信网的发展和俄罗斯日益融入世界文化与信息空间，成了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最重要条件。

苏联人已习惯了的世界图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苏联人曾感觉他们是先进思想的先驱者、体现者，

是伟大社会变革的参加者。国家在工业化、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中取得的成就为此提供了基础。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被破坏的经济的迅速恢复，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力量的自信心。从俄国取消农奴制到世界上第一个人——这个国家的公民飞向宇宙，总共只相隔了 100 年，也就是四代人的时间。战后的一代人眼见到了人民福利的明显提高。但是在 1970 年代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批评情绪在社会上开始增长，对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自信心开始被冲毁。强加给苏联的军备竞赛给了国家领导人一张宣传上的王牌，他们把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是为了保持国防的必要性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上，以此解释经济困难的原因。改革不仅为国内发展遇到的困难进行重新思考开辟了可能性，还为拿苏联的生活水平、政治和创作自由同西方进行比较打开了可能性。比较的结果并不有利于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以及国内危机的发展，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苏联人曾引为骄傲的国家的大国地位提出了问题。

其结果是 1990 年代上半期社会上失望情绪广泛流传。在出现了可供选择的就业形式和与收入方式的条件下，把劳动作为基本价值的观念开始被冲毁了。人们对明天失去了信心，出现了得不到保护的感觉。这是与国家承担社会义务的制度发生的动摇联系在一起的，而大多数居民是习惯于指望得到国家的保护的。西方的形象看来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改革的后期，人们期望西方国家会帮助建设新俄罗斯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伴随着物价的急剧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迫使人们想起过去年代的困难。但是如果说在那时候这些困难的后面还看得到国家的共同目标的话，那么在 1990 年代中期，国家的发展目标已经被冲毁了。社会急剧分化，生活上和社会上的紧张程度迅速增长。对变革抱有希望和要求保持民主成果、不回到过去的意愿曾经唤起的高涨的社会积极性，由不断蔓延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情绪所替代。关于社会上一

些不能允许的行为准则的观念被打破了。语言文化中发生的变化就明显显示了这一点。不仅大量来自英语的外来语，而且还有取自边缘化的社会集团的字典中的词语和概念迅速在俄罗斯语言中扎下了根。人们对是否需要社会思想产生了怀疑，在公众的空间不再形成文化氛围。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开始失去充当社会情绪的喉舌的作用。许多对社会事务热心积极的人转而关心个人生活，局限在家庭和亲戚朋友范围内的狭窄交流圈子里，这些都说明了价值取向的变化。

然而，后苏联时期的最初阶段，俄罗斯社会的社会进程并不具有方向单一的性质。也发生了长时期被思想专制所遏制的创造能量和社会能量的释放。人们得到了选择不与国家的监管有联系的另类职业的机会，自己如有愿望就可进入私人的经营领域。商店门前的排队现象消失了。在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的种类迅速丰富起来，在苏联时期感到尖锐短缺的各种服务变得多种多样了。市场关系的形成使人们的生活水平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否对进入这种关系和能否使自己劳动习惯适应市场的需求做好了准备。其结果是到1990年代中期，对再教育的需求急剧增长了。需求最大和最受欢迎的是与新的市场机制的发展有联系的一些职业（如经理、金融工作者、律师、房地产经济人和审计员）。

后苏联时代最初几年的文化生活敏锐地对发生的变化作出了反应。各种流派在色彩斑斓、风格多样和已没有苏联时期指导文化发展方向的“社会指令”的形势下的共存，成了此时文化全景的主要特征。

个人的首创精神刺激了祖国新的文化活动方向的形成。出现了许多私人图书出版社。市场开始充满了人们对之有需求的书籍，“短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开办了私人的画廊，出现了大量适应各种口味的戏剧和展览项目。

艺术创造的“官方”与“非官方”领域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在1990年代上半期，国家财政对文化项目——博物馆、剧院、图

书馆的拨款急剧地缩减了。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在改革年代空前高涨之后也如此急剧地下降了。大多数过去的读者根本没有钱去订阅报纸和杂志。但是对报刊兴趣的这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同提供大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电视影响的增长是有联系的。游戏娱乐性节目和长得无尽头的电视系列片吸引了大量观众。在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中，从西方的实践中借用来的与观众的互动形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外国日用商品和文化产品向俄罗斯市场大量涌来，而且大多是低质量的。但是它们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长时期中受到人为的抑制，需要时间来使市场充盈起来。休闲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大小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商业性的娱乐中心和夜总会。演出行业成了新的经济中最有活力和最能盈利的一个领域。作为对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回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商业性健身中心；同时运动学校和俱乐部都被关闭了，免费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大大缩减了。

在改革之后的最初年代里，大众文化在发展方向上几乎完全采用外来的形式。在影片发行业中取得成功的基本上是美国的面向大众的片子（《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等等）。在书籍发行中领先的是翻译过来的以广大的读者群为对象的外国出版物。在青年文化中追求西方的音乐风格和行为模式的时尚广为流传。说唱音乐派和哥特摇滚派很快就挤走了朋克派和金属摇滚派。

西方生活方式的标志——麦当劳快餐店、可口可乐商标和各种公司广告成了俄罗斯城市风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国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市场也很快形成了。最早问世的是色彩鲜艳夺目的彩色杂志，这些杂志希望读者仍会喜欢读印刷文字。这个市场很快就分成多种门类，面向所有读者的娱乐性读物（如《七天》）、面向男读者和女读者的读物（如《莉沙》、《时尚》，等等）以及各种兴趣性读物（如烹调术、园艺学、工艺美术设计和体育运动，等等）。轻松格调的书籍得到广泛的流行，特别是侦探小说

［亚·马林尼娜（А. Маринина）、达·唐佐娃(Д. Донцова)、鲍·阿孔宁（Б. Акунин）等］、爱情小说和幻想文学（尼克·佩鲁莫夫、亚·布什科夫等）。

在舞台文艺节目中划分成摇滚音乐和轻音乐（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占据了电视节目时间的很大一部分。在本国的电影院中出现了商业性片子，采用了世界通用的上映票房收入高的电影产品的经营手法［如《夜间巡逻队》（Ночной дозор）和《土耳其式下棋开局》（Турецкий гамбит）］。他们为争夺国内观众而进行竞争。在本世纪头几年，电影观众大约达5000万，1/3的观众看的是俄罗斯国产影片。

大众文化的“盛行”在后苏联社会中开创了性质不为人们所习惯的一个文化空间，其衡量标准就是商业成就。商业化进程很快就超越了大众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领域的范围。他们首先抢占了旨在吸引大众观众的观赏艺术。在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几年里，由于票价的上涨和电视、影像制品的增多，剧院和电影院失去了大量观众。在现实中，剧院寻找生存下去的新路子。结果就产生了许多戏剧演出团体——临时创作集体、实验制片厂为具体的演出编排各种各样的戏剧演出剧目。出现了与观众交流的新形式。戏剧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演出［如2003年5月，由马林斯基剧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心教堂广场上演出的莫·彼·穆索尔斯基（М. П. Мусоргский）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在戏剧中广泛采用了纪实体裁的手法，在脚本中引用采访谈话或人们的街谈巷议（例如莫斯科剧院就采用了这种技术）。戏剧作品开始注重与观众的交流［比如，在维·波卢宁（В. Полунин）的《雪花飘落》（Снежное шоу）的演出中，小丑不停地从旁而过］。

在电影中广泛使用的不仅仅有价格高昂的各种特技效果和电子计算机技术，还运用真实情景下的电影摄影技术［《俄罗斯方舟》

（Русский ковчег），亚 · 索库罗夫（А. Сокуров），2002 年］和电影纪录片摄制方法，包括在一些典型的讽刺情调的片子中［《第一次登月》（Первые на Луне），阿 · 费多尔琴科（А. Федорченко，2005 年）］。

在电视纪录片中广泛应用真实事件的“历史再现”手法。所有这些工艺技术都是为了把观众吸引来参与演出，使他们充当演出的参与者。现代剧和电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莎士比亚的思想：“整个世界都是剧院，其中的人都是演员。”

当代人的生活体验本身成了现实艺术的对象。采用这种风格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所寻找的是抹去公众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界限的道路。在这种处理方法的框架内，所注意的是行为的各种艺术形式——艺术行动。行动的目的是“创造新颖”、模仿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奥 · 库利克（О. Кулик）、阿 · 奥斯莫洛夫斯基（А. Осмоловский）］。情景剧（来自英文“performance”）把艺术家在现时中的行为在观众面前转变为艺术对象。这些对真实的艺术思考形式是在国外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在 1970—1980 年代产生的。但是在后苏联取消书报检查时期中，这样的实验超越了这些“先行者”的小圈子的范围。

2005 年，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次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也举行过《莫斯科—柏林，2004》那样的大型现代艺术展览会。

把一些城市设施（地铁大厅、有顶棚的过街桥）和未使用的厂房、车间和仓库利用起来改装成了展览场地。

城市空间和自然环境（土地艺术）也成了艺术创作的天地。在墙上的涂鸦画作——一种不需要专门艺术修养、能很快就完成的业余艺术表现形式，变成了城市环境中司空见惯的东西（虽然从事这行艺术的也有一些职业画家）。

社会情绪决定着现代文学创作的基调。处在 1990 年代的艺术

探索中心的是对当代现实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后现代主义格调的作品融合了对俄罗斯文学的“教师”传统的摒弃。

实际情况

这就像女研究员 B. 波格丹诺娃（В. Богданова）在《现代文学进程》（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圣彼得堡，2001 年）一书中写的：“……宣告《在一切方面的自由》——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在思想及其表述特征上，在‘是什么’和‘是怎样的’的选择上，在反映现实或引发幻想上，在作者和英雄的融合或拉开距离上，在对情节或体裁的偏爱上，在对塑造的形象采取‘开玩笑’还是‘严肃’态度上都有自由。”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还在 1970 年代就成为对消费社会的一种反抗形式。在俄罗斯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在苏联时代的末期用这种情调写下的作品是对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的一种挑战。在这些作品中，主人翁的生活都是在完全日常的、没有社会目标的场景中度过的［维·弗·叶罗费耶夫（В. В. Ерофеев）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谢·多·达夫拉塔夫（С. Д. Довлатов）、柳·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Л. С.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的散文］。“另类散文”（人们特意这样称谓 1980—1990 年代在祖国文学中崇尚后现代主义美学立场的作家的作品）被推向“自己”的读者群，这些读者愿意通过亲自参与理解其意义和引用其词句的游戏的方法，对作者的自我表现形式表示支持［维·奥·佩列温（В. О. Пелевин）、维·阿·别楚赫（В. А. Пьецух）］。

在 1990 年代，讽刺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对社会理想的否定和对各种体裁的经典准则的重新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失落”和它的非意识形态化进程。后苏联时期的文学写作

中广泛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这类书（无论散文，还是诗）找到了自己的读者。这些趋势证明，现代俄罗斯艺术已融入世界艺术进程。

俄罗斯加入到全球信息空间和接触各种信息源的机会的增长，给予精神生活很大的影响。存在了几十年的禁锢很快就倒塌了，出现了迅速获得信息以及通过因特网进行即时互动的机会。据社会问卷调查，2007 年冬季，俄罗斯使用因特网的人数已达 2800 万（占 18 周岁以上成年总人口的 25%），这远远少于欧洲国家（据 2005 年的情况，瑞典占总人口的 77%、德国占 61%）。

现代俄罗斯形势的一个特点是使用网络的人数不断急剧增长。出现了许多电子出版物和艺术网站（最早是在 1996 年）。

信息空间的扩大，为学术创作、为思想的迅速交流和人们之间的接触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在 1990 年代初期，对祖国科学的财政拨款数额急剧缩减。许多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到国外去工作了。由于拨款不足，以及干部短缺，许多有前途的国家研究项目暂时中止。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在 1990 年代减少了 3/5，发生了干部老化现象。在最近这个十年的初期，国家投入到科学和教育的资金数额渐渐增多。寻找创新部门的发展以及通过科技园区和新科技城，把科学和生产结合起来的道路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

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同教育制度的改革直接有联系的——这是社会争论中一个最大的痛点之一。像类似教育的形式多样性、国家教育标准的质量、在中学实行统一的国家考试、高等教育向两级制过渡（按照西方的模式，使俄罗斯与欧洲教育接轨）、根据高等学校支持率的排名来分配资助高等教育的资金，教育服务的付费部分的不断扩大等一些问题成为广泛讨论的问题。像在科学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上一样，人们有理由表示了对失去国家教育优势的担心，特别是担心失去它的基础特征。然而教育仍然保有很高的威望。在世纪之交，在爆发出对“市场”职业的需求之后，又出现了对人文

知识的传统性的执著的兴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有了更多的机会广泛了解祖国人文科学的遗产，了解当科学从意识形态定式中解放出来之后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科学知识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有关的。尤·米·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①]、德·谢·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②]、谢·谢·阿韦林采夫（С. С. Аверинцев）[③]、米·列·加斯帕罗夫（М. Л. Гаспаров）[④] 和许多其他的祖国科学活动家奠定了对俄罗斯文化史及文明遗产史的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广阔空间。无论是“俄罗斯往何处去?”或者它应该走什么道路，探寻这些问题合适答案的任务或责任，都转到了（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文学和时评的遗产对当代现实进行科学思考的领域。

在新的千年之交，当在文化领域中实现首倡精神的物质基础开始扩大的时候，文化生活的组织本身开始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多样形式。开发国家文化遗产成了一个大方向，这方面的兴趣是与寻找过渡时代的坚实的世界观基础相联系的。复兴传统文化环境的进程促使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恢复了许多历史纪念碑，开办了新的博物馆，包括建立在私人收藏品基础上的博物馆。提出要采用一些不平常的纪念历史文化传统的形式（编写历史和民族史剧本，绘制被认知的城市和地区的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旅游。

开始恢复地方志工作，对地方志文献和旅行指南书籍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急速增长。在经历了转向商业经营原则的痛苦时期之后，出现了复兴许多已经消失了的手工艺和发展民族工艺的机会——如

① 洛特曼（1922—1993），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译者注

② 利哈乔夫（1906—1999），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版本学家。——译者注

③ 阿韦林采夫（1937—2004），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译者注

④ 加斯帕罗夫（1935—2005），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翻译家。——译者注

黏土制的、木制的玩具（德姆科沃镇的、博戈罗茨克的），花边织物和纺织品，精细的漆具和木制器皿（霍赫洛马的绘画木器）。

许多大小城市举行了庆祝建城的周年纪念活动——如圣彼得堡的 300 周年、普斯科夫的 1100 周年、喀山的 1000 周年、古老的拉多加的 1250 周年，等等。

一些大规模的展览会使过去的一些杰出文化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先锋派的名字回到了现代文化空间中来［举办了 20 世纪初的大量优秀艺术家和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另一种艺术”的著名代表人物的个人展览会，1993 年举办了献给 1915—1932 年艺术的大规模展览《伟大的理想国》（Великая Утопия）］。人们对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兴趣促使出版了大量的国家历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尼·米·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瓦·奥·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谢·米·索洛维约夫（С. М. Соловьев）等人的全集，谢·费·普拉托诺夫（С. Ф. Платонов）的没有出版的著作］。祖国文化和历史活动家［科·伊·丘科夫斯基（К. И. Чуковский）、Л. К. 丘科夫斯卡（Л. К. Чуковский）、米·米·普里什温（М. М. Пришвин）、德·谢·利哈乔夫等等］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的原著（没有删节的）成为思考过去的重要源泉。

广大读者所不了解的俄罗斯哲学家思想遗产书籍的出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是尼·亚·别尔嘉耶夫、伊·亚·伊利英、弗·谢·索洛维耶夫、瓦·瓦·罗扎诺夫、谢·尼·布尔加科夫、格·彼·费多托夫等等。他们对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思考，是深刻地与当代的精神探索相呼应的。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俄罗斯哲学家和在“第一个浪潮”中侨居国外并在流亡中去世的俄罗斯作家［伊·阿·布宁、伊·谢·什梅廖夫、鲍·康·扎伊采夫、维·伊·伊万诺夫（Вяч. И. Иванов）、Г. В. 伊万诺夫（Г. В. Иванов）等等］的思想遗产，使大家能够探讨如何开始恢

复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共同阵地和如何恢复历史记忆的进程。21世纪初，在俄罗斯迁葬了费奥多尔·夏里亚宾（Федор Шаляпин）、安娜·巴甫洛娃（Анна Павлова）、伊万·伊利英、伊万·什梅廖夫的骨灰。革命后移居国外的一些代表返回了祖国［如作家И. В. 奥多耶夫采夫（И. В，Одоевцев）、诗人Г. В. 伊万诺夫的寡妇、歌唱家阿·尼·巴亚诺娃（А. Н. Баянова）］。1994年，亚·伊·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俄罗斯。

人们宗教自我意识的增长是新俄罗斯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进程。对宗教信仰的回归，打开了复兴精神传统和现时代继承性的道路。宗教的复兴涉及所有的传统宗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

信仰东正教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按照社会调查问卷所提供的材料，现在自己认为是东正教徒的已占俄罗斯公民的60%以上（虽然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明显比这少）。俄罗斯东正教教会2006年初有2.7万个教区（1986年为6800个），680个修道院（1986年为18个），5所神学院，33所中等宗教学校和40所神学堂。在大多数教堂里都有图书馆和供孩子学习的星期日学校。现在教会组织继续了在1917年以后中断的做社会工作的传统，帮助改善孤儿院的设施，救助吸毒者和因教派而受迫害的人，照顾老人。有数千人参加了调整宗教生活和教区生活的工作。宗教艺术正在恢复，许多工艺能手——传统的知名传承者，例如帕列赫斯克流派的，正在从事复兴圣像画和水彩壁画的工作。恢复被破坏了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工作正在阔步前进。

把珍贵的圣器交还给教会。1991年把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圣徒的圣尸迁移到了谢拉菲姆—季韦耶沃修道院（Серафимо-Дивеевский обитель），季韦耶沃已成为复兴东正教的中心之一。

宗教节日和教堂生活的活动已成为许多人的精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基督诞辰2000年的时候，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中

受折磨的新的苦难圣徒和传教士做的祷告，成为宗教和信徒生活中的重要事件。那年在莫斯科恢复和开放了救世主基督教堂。信徒们把这些变化视为俄罗斯精神复兴的开始。

宗教教育领域正在得到发展。活跃的书籍出版活动——无论是教堂神甫写的，还是我们的现代人写的书籍，开辟了通向多种多样的精神体验的道路。许多人在信仰中寻找创造性的生活之路。曾在大不列颠主持创建了俄罗斯东正教苏拉日主教管辖区的苏拉日的安东尼牧首（1914—2003 年）的神学著作是把生活中的信仰和信仰的语言、精神的体验和对这种体验的神学阐释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

他的讲道和谈话在苏联时代是作为地下出版物出版的，从 1990 年代起在俄罗斯广泛出版。这些著作的中心是现代人通向上帝之路。安东尼大主教在思考人的生存意义的时候，不仅叙述了他与上帝会见的喜悦，而且还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找到自己的路。例如，他在《基督教生活之路：关于信仰的谈话》一书中写道："我们被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在这个世界面前做一个见证人。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能对人说：我走过同一条道路，我会告诉你如何在这条道路上哪怕是走出最初的几步……我们能够做见证人吗。"

这些和其他的思考都是面向正在探索的人们，面向年轻人的。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在俄罗斯最近几年，正是在年轻人和城市居民的中年人中，可以看到宗教意识增长。这不仅仅涉及东正教，而且还涉及其他宗教。例如，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俄罗斯穆斯林的平均年龄为 45 岁。俄罗斯现在已有 6000 多个清真寺进行着宗教活动。2004 年，在俄罗斯广泛庆祝了国内最大的莫斯科索波尔清真寺的建寺一百周年。

在电视上出现了不同宗教的节目。宗教组织和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了。

这有助于进行对话，包括在社会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上进行对话：如关于把国家所有的一些财产交给宗教组织的问题、关于坐落在宗教建筑中的博物馆的地位问题、关于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问题等。虽然这些有争论的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这是问题得到解决的一些正面例子，表示进行对话的愿望说明，宗教组织、国家和社会都愿意积极参加新俄罗斯的精神建设。

祖国的文化遗产中体现了道德、精神和理智传统的连续性。在1990年代末人们对思考性地阅读这类精神传承书籍的兴趣明显增长了。一些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被搬上了银幕，这是着眼于广大观众的，一些优秀的影片（《白痴》（Идиот），根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小说于2003年改编；《大师和玛加丽塔》（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根据米·阿·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于2005年改编）吸引了数百万观众。据社会调查材料，电视剧《白痴》的收视率为俄罗斯成年居民的28%，而《大师和玛加丽塔》的收视率为34%。

备受欢迎的祖国和世界古典戏剧作品决定了剧院的节目单（最受欢迎的仍然是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些演出显示了演员对有名的台词的诠释的特色。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在这个剧院的历史上第四次上演了米·阿·布尔加科夫的作品《白卫军》（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2004年）。

在国家的文化生活中呈现出了一些领军的艺术团体。马林斯基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在瓦·阿·格尔吉耶夫（В. А. Гергиев）的领导下，大量上演了俄罗斯（谢·谢·普罗科菲耶夫（С. С. Прокофьев）的所有歌剧）和世界经典剧目（理查德·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个剧院也吸收了在国外的俄罗斯侨民的遗产，上演了在俄罗斯不熟悉的著名的乔治·巴兰钦（Дж. Баланчин）和列·费·米亚辛（Л. Ф. Мясин）的芭蕾舞，广泛地邀请外国著名的导演和演奏家。这个团体的发展的特点就是

有活力和不断探索面向观众和听众的新形式（例如在“历史场景”中上演歌剧）。

1990 年，在俄罗斯出现了第一个非国家的乐队，它是在钢琴家米·瓦·普列特尼奥夫（М. В，Плетнев）的领导下成立的。俄罗斯国家乐队是国家的主导音乐集体之一，是公认的演奏柴可夫斯基音乐和相对稀少的优美的古典剧目的乐队之一。俄罗斯国家乐队每年沿伏尔加河沿岸城市举行巡回演出，继承了祖国的光辉文化传统。

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社会今天转向关注和思考自己的渊源和遗产，以及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急剧改革时期和在国家广泛融入世界文化进程之后，人们意识到了俄罗斯历史的继承性，苏联的历史就是俄罗斯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 20 世纪世界的发展趋势作出评价，使我们有可能有权衡地看待苏联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并利用它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支持这一思想，就是在 21 世纪要想在文明上取得突破，仅仅依靠文化组织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国家应当确定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优先方向，并保证对它们的支持。国民工程的实现，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一个例子。

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

结束语

俄罗斯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一种世界模式开始对抗另一种模式，在这场对抗中浮现到表面上的是过去隐藏在后面的超级大国的冲突。在西方领导世界500年之后，我们期待世界相互依存时代的来临，但是这个进程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面临极大的复杂性。

俄罗斯是唯一的从来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从来不当任何国家的附庸，在历史上为了独立的地位，在将来为成为自由的民族，并且为了给后代保持住这种选择而准备做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会改变的。

对自己命运深沉的信念，乃是在久远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强不息的最重要前提。未来的社会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当代一些伟大强国的实力也是建立在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基础之上，这些国家的力量正在确定21世纪的走向。一些自身受尊重的民族的目标，是不被历史所抛弃，而要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俄罗斯固有的最高程度的处世态度。

一个具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和有教育素养的人民的伟大国家，为了跻身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它还存在哪些不足呢？答案是明显的，就是要对国家的领导们所采取的政治决策的后果和系统性进行分析。研究了战后的祖国历史，我们看到错误的国家政治方针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尼·谢·赫鲁晓夫于1958年做出的消灭郊区、村镇和农村居民个人副业的决定是错误的。它导致

了 1950—1960 年之交的粮食危机。力图靠开垦生荒地来解决粮食问题是不正确的，——在 1956 年的丰收之后，紧接着发生的就是歉收，而后又是毁坏克服了那么大的困难开垦出来的一部分耕地的沙尘暴。这些不利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就是迫使苏联不得不走上进口粮食的道路。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战略也是错误的——采取出口石油，进口粮食和人民的生活日用品的办法来保障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解决粮食问题。这使国家陷入依赖世界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的地步，而无论是石油价格，还是粮食价格都取决于对苏联不友好的国家，如美国（最大的世界粮食出口国）和沙特阿拉伯（最大的世界石油出口国）。在 1980 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的下跌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

米·谢·戈尔巴乔夫作出的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从国家预算中对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办法来解决危机的决定是致命的错误。这些投资只是加重了危机，因为它们要滞后几年才能有产出，而支出很快就使财政不堪负担。反酗酒运动彻底击溃了国家的财政预算，使国家丧失了 1/4 的财政收入。

苏联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性的现象。在现代世界上民主政治制度能保障有效的领导。政治家通过争取选民选票的途径获得作出国家决策的权力，把争取权力的斗争从破坏性力量转变为建设性力量。犯错误的领导会输掉选举，而他的竞争对手则会取得纠正所犯的错误的权力。分权和权力制衡可阻止一个人的、匆促的决定，让整个社会来参加对问题的讨论。相反，在苏联的制度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具有破坏性质，决策是由一个人或在极少数人的圈子里决定的，完全不让社会参与政治决定的拟定和通过。

在俄罗斯逐渐扎根的民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能使我们恢复世界几个主导国家的领袖地位。然而，民主不是万应灵丹，不能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1990 年代的经验表明，在群众对政权表示不满的浪潮中，一些不会创造，而只会破坏的领导人可能会取得权

力。其结果是旧的苏维埃制度被破坏了，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被长期拖延。

俄罗斯社会在对美国或欧盟的关系上可不可以同意接受充当小伙伴的地位或者不管充当什么角色都行呢？丘吉尔和戴高乐当年赞同的一些思想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哪怕是处于危机年代，一个国家也不应当对自己能力做悲观主义的评价！相反，丘吉尔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俄罗斯为什么不用这个思想武装自己呢？

解决经济现代化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这个主要任务时，国家应当依靠前辈的经验，由于他们的牺牲使我们有了选择的宝贵自由。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按照他们指引的历史方向和范围行动，按照他们在若干世纪来历经沧桑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行动。

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就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两个主要特点是：严酷的气候和彼此很难相连的巨大地域，因此国家就要担负起其应有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俄罗斯的情况下是极端必要的。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

人名译名对照表

A

阿巴库莫夫，维·谢（В. С. Абакумов）
阿布拉莫夫，费·亚（Ф. А. Абрамов）
安德烈耶夫，安·安（А. А. Андреев）
安东诺夫，阿·因（А. И. Антонов）
阿赫玛托娃，安·安（А. А. Ахматова）
阿利卢耶娃，斯（С. Аллилуева）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安·弗（А. В.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
阿利卢耶娃，斯（С. Аллилуева）
阿里斯托夫，阿·鲍（А. Б. Аристов）
安德罗波夫，尤·弗（Ю. В. Андропов）
安德罗诺夫，尼·伊（Н. И. Андронов）
阿赫玛杜林娜，贝·阿（Б. А. Ахмадулина）
阿科波夫，波（П. Акопов）
阿克肖诺夫，瓦·帕（В. П. Аксенов）
阿斯塔菲耶夫，维（В. Астафьев）
阿布拉莫夫，费（Ф. Абрамов）
阿列克谢耶夫，谢·谢（С. С. Алексеев）
阿尔巴托夫，格·阿（Г. А. Арбатов）
阿布拉泽，田吉兹（Т. Е. Абуладзе）

阿法纳西耶夫，尤·尼（Ю. Н. Афанасьев）
阿巴尔金，列·伊（Л. А. Абалкин）
阿卜杜拉季波夫，拉·哈（Р. Г. Абдулатипов）
阿克谢诺夫，瓦·巴（В. П. Аксенов）
安德烈耶娃，尼娜（Н. Андреева）
阿斯科尔多夫，亚·雅（А. Я. Аскольдов）
阿列克佩罗夫，瓦（В. Алекперов）
阿布拉莫维奇，罗（Р. Абрамович）
阿韦林采夫，谢·谢（С. С. Аверинцев）
阿勒哈诺夫，艾（А. Алханов）
阿孔宁，鲍（Б. Акунин）
阿斯拉哈诺夫，阿斯兰别克（А. Аслаханов）
阿尔乔姆（Артема）
艾特马托夫，钦吉兹（Ч. Айтматов）

Б

贝奈斯，爱（Э. Бенеш）
贝利亚，拉·帕（Л. П. Берия）
勃列日涅夫，列·伊（Л. И. Брежнев）
布尔加宁，尼·亚（Н. А. Булганин）
别尔嘉耶夫，尼·亚（Н. А. Бердяев）
巴伊巴科夫，尼·康（Н. К. Байбаков）
巴季茨基，帕·费（П. Ф. Батицкий）
别洛夫，瓦·伊（В. И. Белов）
邦达列夫，尤·瓦（Ю. В. Бондарев）
贝科夫，瓦·弗（В. В，Быков）
巴克拉诺夫，格·雅（Г. Я. Бакланов）
邦达尔丘克，谢·费（С. Ф. Бондарчук）

В

华西列夫斯基（Василевский）
沃兹涅先斯基，尼·阿（Н.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韦尔纳茨基，弗·伊（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
万尼科夫，鲍·利（Б. Л. Ванников）
伏罗希洛夫，克·叶（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维兹博尔，尤·约（Ю. И. Визбор）
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弗洛济米尔斯基，В. Л（В. Л. Влодзимерский）
沃罗比约夫，康·特（К. Д. Воробьев）
瓦西里耶夫，鲍·利（Б. Л. Васильев）
沃兹涅先斯基，安·安（А.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沃伊诺维奇，弗·尼（В. Н. Войнович）
维索茨基，弗·谢（В. С. Высоцкий）
韦什尼亚科夫，А. А（А. А. Вешняков）
沃多拉佐夫，格·格（Г. Г. Водолазов）
沃伊诺维奇，弗·弗（В. В. Войнович）
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亚希列夫，列（Р. Вяхирев）
瓦尔加，叶·萨（Е. С. Варга）

Г

哥穆尔卡，瓦（В. Гомулка）
吉列尔斯，艾·格（Э. Г. Гилельс）
金兹布尔格，叶（Е，Гинзбург）
葛罗米柯，安·安（А. А. Громыко）
戈格利泽，谢·阿·（С. А. Гоглидзе）

Д

多夫拉托夫，谢·多（С. Д. Довлатов）
达涅利，Г. Н（Г. Н. Данелии）
多姆布罗夫斯基，尤里（Ю. Домбровский）
杜达耶夫，焦（Дж. Дудаев）
唐佐娃，达（Д. Донцова）
达夫拉塔夫，С. Д（С. Д. Довлатов）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米（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达尼埃尔，尤·马（Ю. М. Даниэль）

Е

叶戈雷切夫，尼·格（Н. Г. Егорычев）
叶甫图申科，叶·亚（Е. А. Евтушенко）
叶利钦，鲍·尼（Б. Н. Ельцин）
叶罗费耶夫，维·弗（В. В. Ерофеев）

Ж

日丹诺夫，安·亚（А. А. Жданов）
朱可夫，格·康（Г. К. Жуков）
热姆丘任娜，波·谢（П. С. Жемчужина）
日瓦涅茨基，米·米（М. М. Жванецкий）
日里诺夫斯基，弗·沃（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

З

佐琴科，米·米（М. М. Зощенко）
兹韦列夫，亚·格（А. Г. Зверев）
扎哈罗夫，马·阿（М. А. Захаров）
扎多尔诺夫，米·尼（М. Н. Задорнов）
扎伊采夫，亚（А. Зайцев）

И

К

卡韦林，康·德（К. Д. Кавелин）
库兹涅佐夫，阿·亚（А. А. Кузнецов）
科布洛夫，波·扎·（Б. З. Кобулов）
科兹洛夫，弗·罗（Ф. Р. Козлов）
科涅夫，伊·斯（И. С. Конев）
卡拉托佐夫，米·康（М. К. Калатозов）
基姆，尤·切（Ю. Ч. Ким）
库津，B（В. Кузин）
克利莫夫，埃·格（Э. Г. Климов）
科兹洛夫斯基，伊·谢（И. С. Козловский）
卡尔采夫，罗·安（Р. А. Карцев）
克罗皮夫尼茨基，列·叶（Л. Е. Кропивницкий）
克罗皮夫尼茨基，B（В. Кропивницкий）
卡巴科夫，伊·约（И. И. Кабаков）
基里洛夫，И（И. Кирилов）
库纳耶夫，丁·阿（Д. А. Кунаев）
科尔宾（Г. В，Колбин）
库纳耶夫，丁·阿·（Д. А. Кунаев）
克拉萨夫琴科，谢（С. Красавченко）
科瓦廖夫，C（С. Ковалева）
克留奇科夫，弗·亚（В. А. Крючков）
克拉夫丘克，列奥尼德（Л. Кравчук）
克里姆亚金，伊·伊（И. И. Клямкин）
科里亚金娜，塔（Т. И. Корягина）
卡里亚金，尤里（Ю. Ф. Карякин）
卡达尼科夫（Каданников）
科尔扎科夫，亚（А. Коржаков）
库利科夫，阿（А. И. Куликов）

Л

利哈乔夫，德·谢（Д. С. Лихачев）
卢基扬诺夫，阿（А. Лукьянов）
列别德，亚·伊（А. И. Лебед）
卢日科夫，尤·米（Ю. М. Лужков）
洛特曼，尤·米（Ю. М. Лотман）
列昂尼德（Леонид）

M

莫洛托夫，维·米（В. М. Молотов）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
马林科夫，格·马（Г. М. Маленков）
米霍埃尔斯，索·米（С. М. Михоэлс）
马萨里克，扬（Т. Масарик）
姆拉温斯基，叶·亚（Е，А，Мравинский）
马雅科夫斯基，弗·弗（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穆拉杰利，瓦（В. Мурадель）
莫罗佐夫，М. М（М. М. Морозов）
米留科夫，帕·尼（П. Н. Милюков）
梅德韦杰夫，罗伊（Р. Медведев）
梅尔库洛夫，弗·尼（В. Н. Меркулов）
梅希克，帕·雅·（П，Я. Мешик）
马姆苏罗夫（Мамсуров）
莫斯卡连科，基·谢（К. С. Москаленко）
莫扎耶夫，鲍（Б. Можаев）
马林诺夫斯基，罗·雅（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
曼德尔施塔姆，奥·埃（О. 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
穆拉托娃，К. Г（К. Г. Муратова）
马斯捷尔科娃，利·阿（Л. А. Мастеркова）

П

别尔乌辛，米·格（М. Г. Первухин）
普罗科菲耶夫，谢·谢（С. С. Прокофьев）
帕斯捷尔纳克，鲍·列（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普多夫金，弗·伊（В，И. Пудовкин）
佩里耶夫，伊·亚（И. А. Пырьев）
波列伏依，鲍·尼（Б，Н. Полевой）
波斯佩洛夫，彼·尼（П. Н. Поспелов）
波波维奇，帕（П. Попович）
波梅兰采夫，弗（В. Померанцев）
帕斯捷尔纳克，鲍·列（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波普科夫，维·叶·（В. Е. Попков）
普罗霍罗夫，亚·米（А. М. Прохоров）
波利扬斯基，德·斯（Д. С. Полянский）
波德戈尔内，尼·维（Н. В，Подгорный）
佩斯科夫，瓦·米（В. М. Песков）
潘菲洛夫，格列布（Г. И. Панфилов）
保斯托夫斯基，康·格（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普拉托诺夫，安·普（А. П. Платонов）
普里戈夫，德·阿（Д. А. Пригов）
彼得罗夫（Петров）
帕霍莫娃，柳（Л. Пахомова）
帕夫洛夫斯基，Г（Г. Павловский）
帕托利切夫，尼（Н. Патоличев）
帕夫洛夫，瓦·谢（В. С. Павлов）
波波夫，加·哈（Г. Х. Попов）
彼得拉科夫，尼（Н. Петраков）

P

捷列什科娃，瓦（В. Терешкова）
特瓦尔多夫斯基，亚·特（А. 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
特里丰诺夫，尤·瓦（Ю. В. Трифонов）
塔姆，伊·叶（И. Е，Тамм）
特里丰诺夫，尤（Ю. Трифонов）
托尔斯泰，阿·尼（А. Н. Толстой）
塔尔科夫斯基，安·阿（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
塔拉蓬卡（Тарапунька）
季莫申科，尤·特（Ю. Т. Тимошенко）
特列季亚克，弗（В. Третьяк）
图列耶夫，阿·古（А. -Г. М. Тулеев）
季贾科夫，亚·伊（А. И，Тизяков）
特拉夫金（Травкин）
塔拉索夫，阿（А. Тарасов）
塔尔科夫斯基，安德烈（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

У

乌博列维奇，叶·彼（И. П. Уборевич）
乌斯季诺夫，德·费（Д. Ф. Устинов）
乌马罗夫（Умаров）

Ф

弗廖罗夫（Флеров）
法尔克，罗·拉（Р. Р. Фальк）
法捷耶夫，亚·亚（А. А. Фадеев）
费多托夫，格·彼（Г. П. Федотов）
伏龙芝，米·瓦（М. В. Фрунзе）
福尔采娃，叶·阿（Е. А. Фурцева）

Х

Ц

Ч

丘尔巴诺夫，尤·米（Ю. М. Чурбанов）
契尔年科，康·乌（К. У. Черненко）
崔可夫，瓦·伊（В. И. Чуйков）
切特韦鲁欣，С（С. Четверухин）
丘拜斯，安（А. Чурбайс）
车尔尼琴科，尤（Ю. Черниченко）
切尔诺梅尔金（Черномырдин）
丘科夫斯卡，Л. К（Л. К. Чуковский）
丘科夫斯基，科·伊（К. И. Чуковский）

Ш

舍尔斯秋克（Шерстюк）
什维尔尼克，尼·米（Н. М. Шверник）
肖斯塔科维奇，德·德（Д.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舍巴林，瓦·雅（В. Я. Шебалин）
什捷缅科（Штеменко）
谢列平，阿·尼（А. Н. Шелепин）
舒克申，瓦·马（В. М. Шукшин）
肖洛霍夫，米·亚（М. А，Шолохов）
谢列平，亚·尼（А. Н. Шелепин）
什捷普谢尔（Штепсель）
希洛娃，А（А. шилова）
沙季洛娃，А（А. Шатилова）
沙塔林，斯·谢（С. С. Шаталин）
沙赫赖，谢·米（С. М. Шахрай）
沙赫纳扎罗夫，格（Г. Шахназаров）
沙伊米耶夫，明·沙（М. Ш. Шаймиев）
什梅廖夫，尼·彼（Н. П. Шмелев）

Щ

Э

Ю

Я

亚纳耶夫，根纳季（Г. Янаев）
亚佐夫，德（Д. Т. Язов）
雅科夫列夫，亚·伊（А. Н. Яковлев）
亚罗夫，尤（Ю. Я. Яров）
杨达尔比耶夫，泽（З. Яндарбиев）
亚努科维奇，维（В. Янукович）

参 考 文 献

一 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

Алексашкина Л. Н.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XX-XX Ⅰ века: 11 кл. -М. ,2004.

Алексашкина Л. Н. , *Данилов А. А.* , *Косулина Л. Г.*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в XX веке: 11 кл. -М. , 2003.

Волобуев О. В. , *Клоков В. А.* , *Покомарев М. В.* , *Рогожкин В. А.* Россия и мир. XX век: 11 кл. -М. , 2004.

Волобуев О. В. , *Кулешов С.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 : 11 кл. -М. ,2003.

Георгиева О. В. , *Геогриев В.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6.

Данилов А. А. , *Косулина Л. Г.* , *Брандш М. Ю.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начало XX Ⅰ в. : 9 кл. -М. ,2006.

Загладин Н. В. , *Козленко С. И.* , *Минаков С. Т.* , *Петров Ю. 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начало XX Ⅰ в. : 11 кл. -М. ,2005.

Орлов А. С. , *Георгиев В. А.* , *Геогриева Н. Г.* , *Сивохина Т. 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 ,2001.

二 参考文献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Справочник школьника. -М. ,1996.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лицах: Справочн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Под ред. В. А. Федорова. -М. ,1997.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ый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Под ред. В. Х. Блохина. -Брянск, 1996.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1998.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 1961 – 1976. -Т. 1 – 16.

Ушаков А. В. Справочник школьника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ХⅠХ-ХХ вв. -М. ,1997.

三 补充文献

第一章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 1994.

Берия С. Л. Мой отец-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 ,1994.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1991.

Боффа 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94.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Вожди и советники. -М. ,1990.

Б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4.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емь вождей. -М. ,1995.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И. В. Сталин. -М. ,1989. -Кн. 2. -Ч. 2.

Гиренко Ю. С. Сталин-Тихо. -М. ,1991.

Горбач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XX съезд и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 50-летию XX съезд КПСС; От Фултона до Мальты: Как началась и закончилась《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 ,2006.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 – 1964. -М. ,1993.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Под ред.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М. ,1997. -Т. 1 – 2.

Медведев Р. Они окружали Сталина. -М. ,1990.

Мунчаев Ш. М. , *Устинов 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1999.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 1991. -Т. 1 – 2.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М. , 199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 ,1996. -Т. 1 – 2.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 – 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Ту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 – 1953 гг. -М. ,2000.

Халин Г. И. Динами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1.

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М. ,1991.

第二章

Аксюкин Ю. В., *Волобуев О. В.* XX съезд КПСС: новации и догмы. -М.,1991.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1994.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М.,1992.

Арбатов Г. А. 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1953 – 1985). -М.,1991.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Вожди и советники. -М.,1990.

Добрынин А. Сугубо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 посол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при ше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х США (1962 – 1986). -М.,1997.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 – 1964. -М.,1993.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Под ред.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М.,1997. -Т. 1 – 3.

Медведев Р. А. Н. С. Хрущ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М., 1990.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1999.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91. -Т. 1 – 2.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М., 199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1996. -Т. 1 – 2.

Рисунов В.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ПСС в 50 – 60-е год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8. -№9.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 –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М. ,1995.

Хрущев С. Н.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книга об отце. -М. ,2000.

第三章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 1994.

Алексеева Л.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М. ,1992.

Арбатов Г. А. 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1953 – 1985）. -М. ,1991.

Боффа 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94.

Л. И. Брежнев：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1991.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Проблемы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в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1970 –80-е и начало 90-х годов）. -М. ,1999.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 – 1991. -М. , 1992.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 1994.

Громов Б. В. Ограниченный контингент. -М. ,1994.

Громыко А. А. Памятное. -М. ,1998.

Добрынин А. Сугубо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посол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при ше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х США（1962 –1986）. -М. ,1997.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Под ред.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М. ,1997. -Т. 1 –3.

Медведев Р. А. 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Л. И. Брежнева. -М. ,1991.

Мунчаев Ш. М. , Устинов 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1999.

На пороге кризиса: нарастание застойных явлений в партии и обществе. -М. ,1990.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91. -Ч. 2.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М. , 199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 ,1996. -Т. 1 – 2.

Сахаров А. Д. Тревога и надежла. -М. ,1990.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Чазов Е. Здоровье и власть. -М. ,1992.

第四章

Бакатин В. В.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КГБ. -М. ,1992.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 1994.

Горбачев-Ельцин: 1500 дн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М. ,1992.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 ,1995.

Добрынин А. Сугубо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 посол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при ше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х США（1962 – 1986）. -М. ,1997.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Брянск; СПб. , 1994.

Материалы XXⅤⅡ съезда КПСС. -М. ,1986.

Мунчаев Ш. М. , Устинов 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1999.

Несостоявшийся юбилей: почему СССР не отпраздновал своего 70-летия? -М. ,1992.

Опыт словаря н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М. ,1986.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апрель 1985 – апрель 1995) . -М. ,1995.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М. , 199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 ,1996. -Т. 1 – 2.

Путч: хроника тревожных дней. -М. ,1991.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1985 – 1991. -М. ,1991.

Сахаров А. Д. Тревога и надежла. -М. ,1990.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2007.

Фалин В. М. Без скидок н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М. ,1999.

Хоскинг ДЖ.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 – 1991. -М. ,1994.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М. ,1993.

Чешко С. В.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бза: эт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 ,1996.

Шахназаров Г. Х. Цена свободы. -М. ,1993.

第五章

Волобуев О. В. , *Кулешов С. В.* Россия в 90-е годы XX-начале XX I

век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учебнику-практикуму для 11 класса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М. ,2000.

Горбачев-Ельцин: 1500 дн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М. ,1992.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М. ,1994.

Ельцин Б. Н.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марафон. -М. ,2000.

Костиков В. Роман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 ,1997.

Млечин Л. Формула власти. -М. ,2001.

Перегудов С. П. , Лапина Н. Ю. , Семененко И. С. Группа интересов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 ,1999.

Перегудов С. П. Корпора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волюц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 ,2003.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апрель 1985-апрель 1995). -М. , 1995.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 ,1996. -Т. 1 – 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Дубна, 2001.

Примаков Е. М.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99.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радикальные реформы: мониторинг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дикаторов. -М. ,2001.

Сакс Д.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оссии. -М. ,1994.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2000.

Сорокин К. Э.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гео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М. ,1996.

Яковец Ю. В.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 , 2001.

第六章

Волобуев О. В. , *Кулешов С. В.* Россия в 90-е годы XX-начале XX I век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учебнику-практикуму для 11 класса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М. ,2000.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разговоры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М. ,2000.

Перегудов С. П. Корпора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волюц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 ,2003.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Дубна, 2001.